



灯塔

Inland Lighthouses

[以色列]尤迪特·卡兹迩／著

鲍士月／译

终于想开了，也想明白了，

那差不多耗尽了他毕生所追求的从政之路，

只是一场实现不了的美梦而已。

安徽文艺出版社



独自穿行在这座吵嚷而纷乱的城市，不禁让他思绪万千，从而对其之前所经历的生活也同时做了一次心灵之旅。他痛心地回顾了自己在事业上的不断进取和所怀抱的远大政治抱负，回顾了自己对因另一个男人而离开了自己的前妻的深深眷恋，回顾了自己对儿子的担心和那些已断了联系——或去世或不再往来——的朋友们。他终于想开了，也明白了，那差不多耗尽了他毕生所追求的从政之路，只是一场实现不了的美梦而已。

ISBN 978-7-5396-2900-1

9 787539 629001 >

定价：18.00元

以色列当代女作家小说丛书

Inland Lighthouses

灯塔

[以色列]尤迪特·卡兹迩／著　鲍士月／译

终于想开了，也想明白了，

那差不多耗尽了他毕生所追求的从政之路，

只是一场实现不了的美梦而已。



安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灯塔/[以]尤迪特·卡兹迩著;鲍士月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07.9
ISBN 978-7-5396-2900-1

Ⅰ.灯… Ⅱ.①尤…②鲍… Ⅲ.中篇小说—作品集—以色列—现代
Ⅳ.I38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041436号

引进图书合同登记号:1201458

灯　塔　　　　**[以色列]尤迪特·卡兹迩　著　鲍士月　译**

责任编辑:凌　敏
出　　版:安徽文艺出版社(合肥市圣泉路1118号)
邮政编码:230071
网　　址:www.awpub.com
发　　行:安徽文艺出版社发行科
印　　刷:合肥义兴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700×1000　1/16
印　　张:11.25
字　　数:180,000
印　　数:4000
版　　次:2007年9月第1版　2007年9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978-7-5396-2900-1
定　　价:18.00元

译　者　序

本书作者尤迪特·卡兹迩是一位获奖颇丰的以色列畅销书作家。在1988和1989两年的时间里，她就因在报刊上发表的短篇小说而三度获得以色列的三个文学奖项；她还曾各获得一次以色列出版社联合会颁发的黄金和铂金书籍奖；1993年，她还在纽约获得了美国的普利策文学奖；1996年，尤迪特·卡兹迩获得了以以色列前总理列维·艾希科尔（在位时间：1963年6月~1969年3月）名字命名的文学创作奖；2004年，尤迪特·卡兹迩还因其创作的长篇小说《马蒂斯腹中的太阳》在法国获得了国际犹太复国主义者妇女组织（WIZO）颁发的奖项。

《灯塔》一书原作为希伯来语，此中文版主要译自德国贝塔斯曼出版社于2001出版的巴巴拉·里内尔（Barbara Linner）的德文译本。本书是由三个独立的中篇小说组成的。

用作书名的首个中篇《灯塔》是本书的主打篇。它讲述的是一位工会律师的故事。劳依温·沙非尔，60岁，是来自卡迈尔的一个工会律师；有一天早晨他要去耶路撒冷出庭。然而，他第一次婚姻所生的儿子却忘了如约将他从特拉维夫的某个汽车站接送到城市另一头的一个汽车站，结果劳依温不得不自行择路前往。独自穿行在这座吵嚷而纷乱的城市，不禁让他思绪万千，从而对其之前所经历的生活也同时做了一次心灵之旅。他痛心地回顾了自己在事业上的不断进取和所怀抱的远大政治抱负，回顾了自己对因另一个男人而离开了自己的前妻的

深深眷恋，回顾了自己对儿子的担心和那些已断了联系——或去世或不再往来——的朋友们。他终于想开了，也想明白了，那差不多耗尽了他毕生所追求的从政之路只是一场实现不了的美梦而已。

《云彩飘啊飘》是本书的第二个中篇小说。在这个故事里，女作家尤迪特·卡兹迩也让那位35岁的主人公——一个女画家做了一次生活之旅。尽管女画家和她的丈夫及孩子过着一种幸福的生活，但她感觉，在家中自己更像是一个局外人。为了摆脱这种令人窒息的感觉，她循着自己的足迹回到了过去。

第三个中篇故事《一首家庭练习曲》，其内容与女作家尤迪特·卡兹迩自己家里发生的故事有关。本篇小说是以作者祖父母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婚前真实的书信往来为基础创作的。祖父母俩人相识于一艘轮船上。女作家的祖母有过一段饱受创伤的情感经历，对此她一辈子缄默其口，未曾向外人道出；真实的情况到底如何，女作家本人因此也并不知晓。女作家在自己祖父母这些书信内容的基础上，虚构了一个似乎与真实情况非常接近的祖母莫瑞雅的故事，从而补全了书信中缺失的那部分内容。

《灯塔》一书的三个中篇故事其结局都处于一种危机的状况，但女作家卡兹迩却让故事的主人公最后都从危机或教训中汲取了新的力量，从而赋予了这些故事相同的、大团圆的结局。

阅读卡兹迩的作品，会让人深深地感慨她在作品中对宏大场面的把握以及她对人物心理活动及感受的细腻描写。她在这部作品中那驾驭自如的高超倒叙手法也让人深感震撼。对于时间是如何改变一切的描写手法，恐怕难以再找到一位比女作家更好的人了：她让爱情的错失和生活的失败笼罩在一层新颖、并时而非常柔和的光影里。因此，卡兹迩的作品不仅受到读者欢迎，而且在评论界也是好评如潮。“一种完美地表现当代以色列画卷的独特形式……”“卡兹迩的《灯塔》完美无缺……”甚至资深政治家、以色列前总理希蒙·佩雷斯也对她的作品有如是的评说：“尤迪特·卡兹迩是一位说故事高手；其恳切和常

带诗一般的语言描述感人至深。”卡兹迩的作品被译成的文字达10多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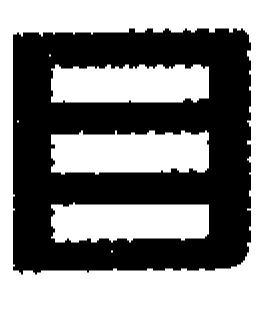
翻译本书时，为了尽可能准确理解并以中文传达出原书的精神，我翻阅查找了一些有关的资料，这无疑大大丰富了我对中东地区、对以色列国、对以色列的人文社会及犹太文化以往的知识累积，更对我的翻译工作起了极大的帮助作用。但尽管如此，译作中还是难免有肤浅或不当之处，还望读者及各位专家、同行不吝赐教。




目录

CONTENTS

目录





灯　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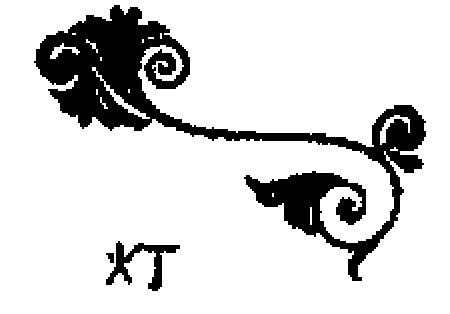
独眼巨人①的眼睛

从他过完六十岁生日开始，特别是自他收到通知他提前退休、被其称为辞退通知书的信函以来，劳依温眼前浮现的总是过去的生活情形，一个片段接着一个片段，就跟他在早春的那个下午对奥佛尔讲述的一样。

当时他同奥佛尔俩人一起坐在奥佛尔位于亚尔孔大街家里的大阳台上眺望着大海。摄像机镜头像希腊神话故事里独眼巨人的眼睛似的冷漠地看着他，使他无法忽视它的存在，他突然觉得，自己无须用华丽的辞藻对着镜头说话。

奥佛尔说，如果你觉得打搅的话，我可以把摄像机关了，我把录音机打开；这只是前期录像中的一部分，我们还不定用得上用不上这些资料呢。说完，奥佛尔点了支烟，眯着眼看着他。劳依温感到嗓子里有股咸咸的味道，因为此情此景让他想到了艾玛努爱拉，以往她也总是这样眯着眼，以防烟熏着了她的绿眼睛；他还记得，那些年里她总是不停地咳嗽，离婚前是这样，之后也是如此，在他们为数不多的通电话的时候，以至最终都是这样。然而他什么也没说，同样他也避而不问奥佛尔为什么还不结婚，像他这样年纪的男人可都是早有了家室，有了孩子；他还极力安慰自己，并在心里对自己说，这只是个时间问题而已，

① 希腊神话中的人物。——译注





奥佛尔太热衷于摄影了,上个星期,《新消息报》上登载了一条消息,报道了他准备拍摄一个系列纪录片的情况。片子的内容是有关摩萨德[①]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情况,特别是关于五十年代那个可耻的"拉冯事件"[②]和艾希曼[③]的绑架案,此外也收录有关其他一些军事行动的内容,而劳依温在上面提到的那个早春的一个早晨,因为要参加在政治局大楼里召开的一个会议而来到了特拉维夫。他很高兴有这么个机会来看望他的儿子,并借此机会重温他在摩洛哥执行秘密任务时的记忆。他在那儿化名与其他一些间谍一起开展活动,目的是将最后一万名犹太人接送到以色列去。

如今在他看来,或许那是一段比当时的实际情况更危险,更令人激动人心的时期。他谈起了艾米尔·塔尔蒙,即卡萨布兰卡"组织"的指挥官;这时候他问奥佛尔,你还记得他吗?我们常去拜访他们的,当时你还很小,和你的母亲一道。奥佛尔说,他还记得艾米尔,他是个高大魁梧的人,高高的额头上有一些白发,乱蓬蓬的;他的蓝眼睛很亮,他的笑声低沉爽朗;他也记得他的妻子尤迪特,她差不多跟她的丈夫一样高大强壮,有着一张大脸,厚厚的金发用两把梳子向后梳理着;她的眼睛也跟她丈夫的一样又蓝又大;笑起来声音也是低低的,说话的时候法语口音很重,"尔"字听起来像"石",她叫他奥佛石,他很喜欢听她这么叫他;他也同样喜欢去他们位于海册里亚—皮图亚赫的家,在他们家的游泳池里欢快地游来游去;他还记得,他当时总是对他们的眼睛和游泳池的颜色如此相近而感到吃惊,并在私下里认为,这一定是因为他们经常一天里游好多次泳的缘故:睁着眼睛把头浸泡在水里。他们家没有他这般大的孩子,他还为此而感到遗憾过。还有让他搞不

① 以色列情报机构。——译者注

② Lavon(拉冯)为以色列前国防部长。——译者注

③ Eichmann(艾希曼)是纳粹盖世太保犹太部主管,"屠犹元凶";1960年被以色列的"摩萨德"从阿根廷缉拿归案,经过两年114次的开庭审判,最终被送上了绞刑架。——译者注

懂的是，他们家没有孩子，一个都没有，可他们怎还会笑得那么高兴呢，两个人还在游泳池里相互击水玩呢。他很不经意地问劳依温，他们为什么没孩子？劳依温回答说不知道，我没问过，我倒是很想问来着，你呢？你问过吗？然而他却没问出口，而是将目光投向了将这一切都记录了下来的摄像机镜头。

他扶正眼镜，清了清嗓子讲道，艾米尔是大屠杀的一个幸存者，在从波兰逃往匈牙利的途中，他失去了父母和他的小弟弟，因是犹太复国主义青年团的一名游击队员，他本人被盖世太保抓住，受到了严刑拷打，并被判处死刑；然而就在执行死刑前的两个小时，他被占领了这座城市的苏联红军解救了下来，他就跟随苏联人胜利地进军到了维也纳，参加了名为"复仇"组织的行动，这个组织专门追踪高级别的纳粹分子。他曾亲手杀死了好几个这样的纳粹分子。劳依温将他的两个手掌伸到摄像机前，将两只手紧紧地握在一起。看着，就像除掉老鼠一样，他把他们给杀死了；然后他乘阿尔塔雷纳号船来到了以色列，并自愿报名加入了摩萨德。



有一天，他来到中心，声明要找一个有趣而危险的差事干干，摩萨德当时的负责人沙尔·阿威古尔就派他到欧洲去执行了一个任务。在布鲁塞尔，他认识了尤迪特，她那时叫卡特琳。她母亲生于比利时的皇室，父亲是个德国人。尤迪特会五种语言，并且长得跟希蒙·西格诺里特年轻时一样漂亮。她改信犹太教，不顾父母的反对跟他结了婚，并随他来到了以色列。六十年代，当伊撒尔·哈赖尔派艾米尔去摩洛哥时，尤迪特坚持要跟着一块儿去。伊撒尔不同意，对她说，她应当安静地待在巴黎或是什么地方把孩子养大。尤迪特却回答道，她不打算像那些外交官夫人们一样待在巴黎，整天只忙着购物和参加鸡尾酒会，她能够证明自己是有用的，因为自己是个非犹太女教徒。

说完，她直视着他的眼睛说道，我可是为了以色列这个国家而放弃了我的比利时王冠，而这很显然说动了他。乔装成英国商人约翰·桑德斯和他的法国爱人，他俩一起来到卡萨布兰卡，在"自由"大厦里租



了一套豪华公寓，并加入了一家价格昂贵的高尔夫球俱乐部，目的是引起上流社会的注意。他们在很短的时间里就结交上了政府机关的官员；理发时，尤迪特还跟那些部长夫人们聊天，她被邀请去参加她们所有的各种各样的聚会，再后来我到了那儿。

说到这儿，劳依温下意识地提高了嗓门。雅哥布·拉芒先生，一个法国里昂皮货商的儿子，这就是我的伪装身份。正如常言所道，这恰恰好就像是命运的一个讽刺，因为我的祖父就是一个制革工人，他死在了奥斯维辛集中营里。我因在大学里学习法律而获准推迟服兵役，刚好过了这段时间，我就被直接招募进了秘密警察局。

在那儿我上了一个短训班，学习如何摆脱跟踪，在学编译电报时学了点阿拉伯语，所有诸如此类的东西，还在联邦法语学校以色列联校里学了些法语。我经巴黎来到卡萨布兰卡，找到了艾米尔的办公室。他当时正经营着一家草制品进出口公司，尤迪特担任秘书工作。他坐在标有"法兰西"字样的总经理室里，就像人们常说的那样，身穿从香榭里舍大街购买的西服，足蹬精制的皮鞋，周身散发着高级科隆香水的芳香。他给我们两人各倒了一杯威士忌酒，而此前我只喝过凯杜施葡萄酒，此外就是安息日时跟我父亲去犹太教堂，在吃鲱鱼的时候，喝过一点点白兰地。当看到我被辣得歪鼻子斜眼时，他大笑起来，问我道，你多大了，小姑娘。我回答，二十三。他那时三十五六岁。紧接着我告诉他，在过去的两年里，我曾担任希伯来大学学生联合会主席一职。他当然知道这一点，他知道我的一切。他从侧面打量着我说，他们给我派来了一只政治小狐狸，是不是？喝起酒来像一个新手，肯定还是个处女吧，我……

劳依温说着突然浑身战栗着大笑起来，奥佛尔眯着眼看着他。

我用力将一个在他办公桌上找到的回形针拧变了形，并极力忍着没有脸红；他这时站了起来，拍拍我的后背说，尽管如此，我看我们还是可以相信你的。他给我起了个代号叫迈考，我们每人都有一个这样的代号，还教我与各区及总部的间谍间如何协调配合。就这样，我们在

苏丹·穆罕默德五世，即哈桑国王父亲的眼皮子底下，将犹太人从极其偏远的乡村，从地图上能找到的地方，从马格里布，从万里之遥的地方，用大巴车，用面包车，每五十人为一批将他们全部接送到了以色列。我们总是在星期五的夜里运送他们，并没有人认为，犹太人这样做亵渎了安息日。犹太法师们对此可是许可的，因为迁居到那个神圣的国家比过安息日更加重要。

他们登上船，驶往直布罗陀，并从那儿乘以色列航空公司的飞机前往劳德。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爱高茨号发生了不幸，谁能料到老天会起风暴呢！这让艾米尔很多年都难以释怀，当时他怎么能让他们在那样一个天气，不带救生小船就登上了大船呢！所有的人，还有那些孩子们，都被淹死了。他的心都碎了。劳依温将嗓子里再次涌起的咸味吞了下去。他看了一眼手表，吃惊地对奥佛尔说，不早了，哈雅还在等他，他答应她要早些回去，陪她去购物中心，去堪扬专卖店，乔纳森需要买新裤子和球鞋。而奥佛尔本想问他，爱高茨号轮船沉没的当晚你在哪里，但却关上摄像机，说了声，行了，我们下次再接着拍吧，反正我们还不定用不用这些资料呢！很可能就不用它呢。

劳依温站起身来，边走边说，你一定要给艾米尔单独拍一个片子，去找他的妻子谈谈，她可以给你讲很多事情。你知道，他死后我就跟她断了联系，已经有好多年了。有人告诉我说，她在雅法的老城开有一个美术馆。他的手在身后摆摆以示道别，出了门，走下楼梯，上了他的苏巴鲁车，他打开车窗和收音机，收音机里正在播送晚间新闻，但他却没在听，而是思考着艾米尔的事情，特别是想着与艾玛努爱拉以及他们俩一起去里维埃拉海边度假的情形。他们四人乘坐一辆双马牌小汽车，车顶窗打开着，沿着蔚蓝色的大道，从摩纳哥到尼斯再到戛纳，一直开到马赛，然后再继续开往巴黎，那是在什么时候？已经是在执行完任务和婚礼过后的事了。马上就要满三十五年了，艾米尔已不在人世了，艾玛努爱拉也走了，时间过得多快啊！就在他开车正要进入卡米尔的时候，一个配有无线电通讯装置的巡警车拦住了他，原因是他开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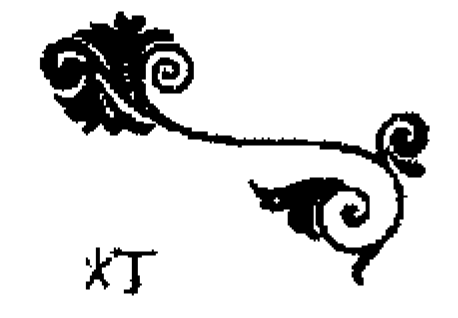
超速，速度高达一百六。他跟他们解释说，他是工会的律师，因在北方的企业职工委员会间来回奔跑，因此离不了车。可那位年轻的警察根本不听，仍要处罚他，其结果是可能要长期吊销他的驾照。那警察弯下腰，不慌不忙地靠在他的车窗旁说，作为律师，您是更应该遵守法律的。说完大笑道，至少您不用为您的这个案子聘请律师了。

一个月后，他真的不得不拼了老命来为自己辩护。然而那个戴眼镜、负责处理交通案件的年轻法官，年龄还没有奥佛尔大，却判吊销他一个月的驾照，并处罚金一千谢克尔，这比吊销他的驾照更让他心疼。因此他现在只好乘火车从海法去特拉维夫。本尼在巴特-嘎里母车站接到他，在去修理铺时顺路将他带到了哈代拉，而奥佛尔会在特拉维夫附近的沙罗母十字路口接他的。那儿是奥佛尔去耶路撒冷电影学校的必经之路，他每个星期要在那儿上两次课。很巧的是今天恰好是其中的一次。而他则必须于八点半到达国家劳工法庭。他希望，那个阿布·扎拉尔的儿子，他的名字也叫扎拉尔，他暗自觉得好笑，今天早晨可别再发病了，希望阿布·扎拉尔这一次能够到庭，而且是按时到庭，因为那个姓阿维娜丽的女法官，她叫什么名字来着？叫达夫娜，由她主持庭审，她是法院的副院长。上一次庭审，原告又一次未到庭，她都有些不耐烦了。尽管劳依温跟她说了，法官阁下，我委托人的儿子有癫痫病，发病时，不能把他一个人丢在家里的，我的委托人必须陪着他。而女法官却提高嗓门说道，沙非尔律师，您别找借口浪费我的时间了，案子推迟到5月18日八点半再审，您得第一个到，可别迟到了，这可是最后一次推迟庭审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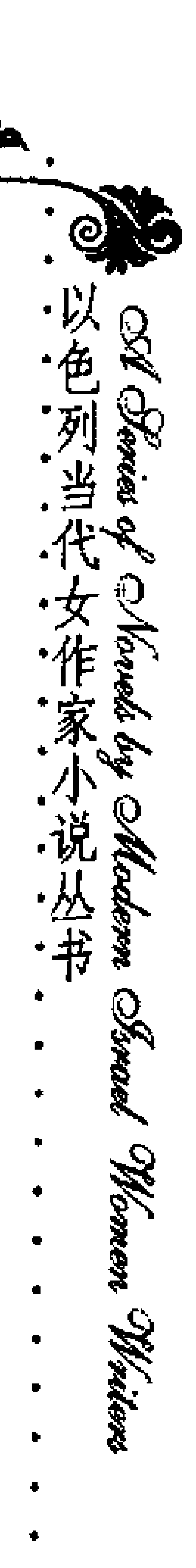
是的，他必须让这个人回到厂子里去。他的妻子有病，老怀孕，有五个孩子，老大有癫痫病。毕竟像其他人一样该做的事他都做了，除了被抓以外。他回想着阿布·扎拉尔那高大强壮的身体和他那从未开过笑颜的脸，他压抑着自己的愤怒说，我拿的都是些什么东西啊，五件针织的童衫，几条内裤，几双袜子，都不是什么好东西，哪个俄罗斯婆娘不给自己的孩子和老公夹带内衣回家呢？我每次看见了都不做声，反

正工厂的仓库里有的是库存，多得足以供全军将士再打三次战争的。长内裤也有，免得把在黎巴嫩那儿的穷鬼们的蛋给冻坏了。我敢肯定，他们偷偷地监视了我，要不然怎么会偏偏在那一天，他们派个人站在那里查包呢，那人对我说，把包打开，然后就把我拖到了达翰那儿，达翰当场就给我下了解雇通知。他早就不想要我了，他一直对我不快活，我有时不能来上班，这是因为扎拉尔又病了，我用的是我的病假和公休假，并不用达翰花钱，上帝保佑，可他想让他的小舅子顶替我，来负责这个部门。你相信他不往家里拿东西吗？律师先生，没有了这份工作我就走投无路了，只好在院子里的树上吊死了算了，可为了扎拉尔我却不能这么做。劳依温对他说，别担心，我们会让你回到厂里去的。

尽管他知道，来清算这家企业的人已定了下来，不久大家都得走人了，无论是来自拿撒勒和约克内亚母的俄罗斯婆娘，以及来自马伊里亚和塔石卡的阿拉伯婆娘，还是那三个部门的负责人、达翰以及他的小舅子，复兴工厂的开始阶段，厂里要裁减掉百分之五十以上的人员，越来越多的新成员加入到失业大军中。这个队伍一天比一天壮大，这就像跳一种叫呼啦圈的舞一样，有越来越多的舞者加入进来，而很显然，他自己也被迫加入了进来，毕竟在年初的时候，他收到那封措辞客气的信，信里解释了让他提前退休的条件，这令他喉头如鲠鱼刺。



在与北方区法律顾问沙克德律师见面时，他对他说，你还抱怨什么，沙非尔，干了三十五年后，这些条件对你来说的确不赖，你可以不用到处奔波了，开始在家好好安排安排吧！侍弄侍弄花园，照顾好老婆和孙子，找点爱好，木匠活啦，钓鱼啦。劳依温很想回答说，卡米尔并没有海，并且还要努力地使自己的语气显得很坚决，但说出口的却是，到时候他们还得用三个年轻的律师才能替代我，这可要花不少钱哪。沙克德说，怎么办呢，工会需要新鲜血液，这不仅仅就是一个竞选口号，对我们这些老战舰来说，是到了上岸的时候了。在经历了一番努力和跑动，并且在写了三封信之后，他终于成功地将退休时间延迟到了六月底，即下个月；在海法区法院审判庭前，里西特曼法官小声地对他



说，您何必再为这个案子浪费时间呢！您不如为您的当事人弄一笔补偿费算了，整个厂子都要完蛋了，他的判决有利于工厂而不利于阿布·扎拉尔。然而劳依温，出于某种他自己都不明白的固执心理，硬是要把此案上诉至国家法院，尽管阿布·扎拉尔没有出庭，但他坚持延期审理此案，之后又再一次要求延期，以使他能走到证人席上，来陈述他不服被解雇的理由。此刻，他脑子里正想着如何作他的最后陈述，并在为是否要提及让·瓦尔吉恩——那位在亨利先生的文学课上打动了他的心的人而犹豫不决时，他听到女法官阿维娜丽很快地说道，声音听起来非常疲惫，就像是一位女教师说出的一般，先生，您的文学比喻与此案无关，它超出了法庭的范围，我请求您说得简短些。

劳依温瞥了一眼手表：六点二十。火车大约七点十分到达沙罗母车站，然后步行五分钟就到了十字路口。他希望，就像他们星期六晚约好的那样，奥佛尔七点一刻就已在那儿等他了，预计到时候进城连堵车要花上一个小时的时间。他会给他讲几个摩洛哥的逸闻趣事，这是他们在奥佛尔的家里见面之后他想起来的，见面是什么时候的事了，差不多是在两个月前。一阵令人舒服的风从海面上吹过来，奥佛尔赤着脚，穿着短裤，背对着渐渐西沉的太阳坐在阳台的栏杆上，他那金色的卷发一下子如火般熠熠闪亮，此时此刻他定是想起了艾玛努爱拉走在尼斯林荫大道上的情形，当时她穿着露膝短裙，黄白条子的，光洁的小腿肚子煞是好看，脚上穿着时尚工艺凉鞋，带着猫眼形状的太阳镜，还有她的香烟。她背对太阳，非常开心地对着相机，他的心里一阵收紧。

可他什么也没说，因为奥佛尔又怪他了，你跑题了，爸爸，注意力集中些。而他这时才发觉，怎么把以往自己开车长途旅行和被吊销了驾照后乘公共汽车的情形，还有他与奥佛尔那次的见面，都交织在一片幻觉中了。他并没按时间顺序把自己生活中的片段一件一件地讲述给他听，就好像摄像机的镜头仍对着他，胶片还在沙沙低语转动似的，这时，他将头靠在高高的椅背上，紧闭双眼，在火车行进的节奏声里陷

于沉思之中。注意力非常的集中，奥佛尔当时在阳台上的面部表情清晰地浮现在自己的眼前。他对他说，你明白吗？担任希伯来大学学生联合会主席一职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对我来说绝对是这样，你可别忘了，我是海法一个普通工人的儿子，建筑安装工人，索莱尔博纳公司的，就是工会的那家建筑公司，一个新移民，家里很穷，我们一家四口人挤在一个房间里住，另外一间房被母亲租给了和她同乡的一个家庭。

我用做家教赚来的钱购买学校的课本，我七岁时就开始辅导比我大的孩子了，我这里弄一个钱，那里弄一个钱，因为我一直都是班里第一名，就是为了获得奖学金，他们从全国各地，来到位于哈尔哈措费母河畔的耶路撒冷大学，他们都是精华中的精华，有特拉维夫大建筑公司老板的儿子，有银行家和律师的儿子，但也有像我一样工人的子弟。

和我同年级的巴黑力，当时他叫威斯，现在在高等法院。巴鲁辛在特拉维夫区法院。还有塞嘉尔，他当上了部长。他从小跟我在一个区长大，他父母住在盖乌拉大街，我们一块儿踢过足球。哈诺亚哈奥维德队对哈泼艾尔哈米茨拉西队，我是守门员，跳起来接球的样子跟扬克勒·库多罗夫一样，他们都叫我拼命三郎施比策尔。塞嘉尔当时想当守门员，但他们却选择了我。我想起来，我曾经请品夏斯·萨非尔给学生做过一个报告，这个大人物萨非尔是贸易和交通部长，他可是领导着整个国家。报告完后我走上讲台，以学生联合会的名义向他表示感谢，他问我，你叫什么名字，年轻人；我说我叫施比策尔，劳依温·施比策尔。你会达到你事业的顶峰[①]的，施比策尔，接着就朗声笑了起来。

而就在那个时候，我决定把我的姓改为沙非尔，或许是与萨非尔音近似的缘故。那一年里，我遇到了你的母亲，她当时是大一的新生，她走进我的办公室，来诉说什么不顺心的事儿。到底是什么事我给忘了，我只记得她问我是否打算毕业后从政，我对她说，你正在跟一位工

① 顶峰一词与施比策尔谐音。——译注





党——工人党——的党员说话，一个工人的儿子就是一个工党党员，对此她却回答道，她出生于一个泛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家庭，她的父亲是特拉维夫雷乌米银行分行经理，但这不碍事，这一点都不碍事。

劳依温睁开眼。他突然感到自己出汗了。从车窗射入的阳光，将他的头和身体直至胸部的地方圈在了一个四角形的区域里。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块手帕，将额头上的汗水擦去，然后下意识地取下眼镜，擦净镜片，移坐到右边阳光照射不到的位子上，这时候他注意到，除了一个正在打盹儿的大兵和一个老年妇女外，车厢里已几乎空无一人了。那个士兵将穿着军靴的脚伸到对面的座位上，身体靠在一个海军背包上；老妇人泛着些微蓝光色的头发梳理齐整，先前在她上车的时候，他曾帮她把装有汽车模型的红箱子拎上了车厢，一边还对她笑着说了个“请”字；她的脸就像被风雨侵蚀的花岗岩般饱经风霜，张嘴时露出两排健康的牙齿，带着烟味说了声，多谢；他问她，是不是坐车去看她的孙子的？她面带微笑答道，说话带德国-捷克一带的口音，是的，我得去照看他们，我的女儿女婿要去国外。她问他是否也做了爷爷？他说，还没有，也可以说已经是爷爷了，我有两个孙子，是一对双胞胎，四岁了，一男一女，不是我亲生的，是我妻子的亲孙子。老妇人耐心地点点头说，我明白了。

劳依温此刻觉得，自己似乎把什么人给出卖了，或许就是本尼吧，自他跟他的母亲结婚后，当时他多大了，是六岁，比奥佛尔小五岁，他马上就极利索地喊他爸爸了。而且他对他无论在哪一点上都像是跟自己的亲生父亲一样。他从不提及他自己的父亲，他早在十月战争——以色列与埃及的消耗战——开战前就阵亡了。可能是他年纪太小的缘故，他不记得他了，哈雅也总是独自一人去参加战争纪念大会。现在本尼已经结了婚，自己也做了父亲，并在海法开了一间电视机修理铺。

他更喜欢住在卡米尔市他们的旁边，跟他们就住在同一条大街上，差不多每天下班后就顺道过去，带着小孩子，料理料理花园，修修

补补家里损坏了的东西。他有一双巧手。哈雅已不再抱怨了，那些年里，她是怎么熬过来的。照劳依温的意思，东西坏了就只能随它去了。她忘了自己夜里像个瞎子似的摸索着上马桶的事儿，因为过道里的灯八十年代初就坏了。可能就是保险丝烧断了，换个灯泡就可解决的问题，可他就是懒得用梯子爬上去查看一下，她要是提醒他的话，他就总说，好的，好的，但仍继续看他的法国电视频道，有什么好看的，那个所谓的文学核心人物，他当自己是上帝。我搞不清楚抽水马桶坏了有多长时间了，马桶上的坐圈也没了，我已经习惯坐在冰冷的陶瓷马桶上了，但我们实在不好意思请客人上家里来玩。厨房里的柜门就更别提了，开门时得小心翼翼，否则门会掉下来砸了你的脚。可你管什么事了，你上次上厨房是什么时候的事了，幸亏我儿子搬到我们家附近来住了，这个家才又慢慢有了家的样子，或许哪天我们该把客厅的家具换了，换成新潮时尚些的。她上楼走进卧室，拿来些妇女杂志《您》里有关家居生活的副刊来，指着让他看她喜欢的那个客厅，里面有一个L形的大沙发和两个宽扶手、椅腿粗大、椅套为粗麻布的扶手椅。而他认为那些东西既不舒服也不实用，或许就只适合放在凯尔萨莱亚的那个别墅里。这张照片就是在那拍摄的，别墅的墙上挂着油画真迹，上面还有石子小径和一个三角形的游泳池。游泳池透过窗户微微地闪着蓝光，这令他想起了艾米尔和尤迪特的家，可这并不适合他们这样的普通人家。哈雅说，那好吧，我也并不认为，阿巴贡先生会同意把这些家具买来放在客厅里，但我们可以去特拉维夫的海册尔大街专做仿制家具的店里看看，去找一些类似的家具。

几年前，他们看过《吝啬鬼》话剧的演出，阿巴贡这个角色是由姚思·格拉伯扮演的，演出是在海法剧院的小剧场进行的。事先，哈雅通过市政企业职工委员会购得了优惠票，她当时担任福利部的副主任一职，每天在俄罗斯移民家庭和政府机构间来回奔波。去看戏的前一天他还上班来着。早晨六点钟，他就开始坐长途车去了米克达尔-哈埃迈科或是开亚-特史莫纳。他匆忙冲个澡，并按她的指示换上了黑裤子、





白衬衫和一双正儿八经的鞋子,因为她不能忍受他穿着那双舒适的拖鞋去剧院,即使夏天也是如此。那双鞋是他自己前些年在拿撒勒买的,无论如何她都不让他穿着那双鞋带她去看戏,穿上袜子也不行。穿戴停当之后他不得不开车去了海法市,在被塞得满满的小巷子里找了个停车位,然后进了剧院,在顶层第八排他们的座位上坐了下来。尽管他极力睁大眼睛,集中精力注视着舞台上剧情的发展,但却不管用,剧场休息前,他才被观众的掌声吵醒,自己的大手也随着别人一起拍了起来,甚至比别人拍得更起劲儿,更夸张。他还侧身对哈雅微笑着,而哈雅对他很失望,只好给他讲解剧情。他却指望着,要是能喝杯咖啡就好了,这样下半场就可以撑下来了。回家的路上,她给他讲她对剧情、导演、舞台设计,还有每一个演员的感受,而他根本不知道她在说些什么。

一天傍晚,大约是在一个月前,他参加完乌尔康蓄电池厂的企业职工委员会与厂领导班子间的没完没了的诉讼庭审,刚从马亚洛特回到家里,人比平时更感劳累,就建议她另带一人替他陪她一起去看话剧,带萨里特,本尼的妻子,或是乔纳森去。但她却大发雷霆,很显然,愤怒在她身上蓄积已久了。她大声叫道,乔纳森从不待在家里,她不知道他整天在哪里闲荡,肯定在城里和他的狐朋狗友们在一起,每天回来,不是耳朵上带着一个耳环,就是身上新添了一个文身。

他的房间里挂满了眼窝里滴血的骷髅头画,他听那种非常可怕的音乐,哪天也没让人看起来有点斯文相,也别提做什么作业了,你为什么就不说说他?你一点都没有做父亲的威严,一个十四岁的男孩子有时候还是需要这些东西的;你上次跟他谈话是什么时候的事了?你就只会拿钱跟他讨价还价。劳依温控制住自己,没对她说,一年前,在犹太教堂举行的乔纳森的成人受戒礼仪式上,他就曾说过"感谢上帝,使我解脱了对这个孩子的罪应负的责任"的话。因为他知道,那样的话,她的火气会更大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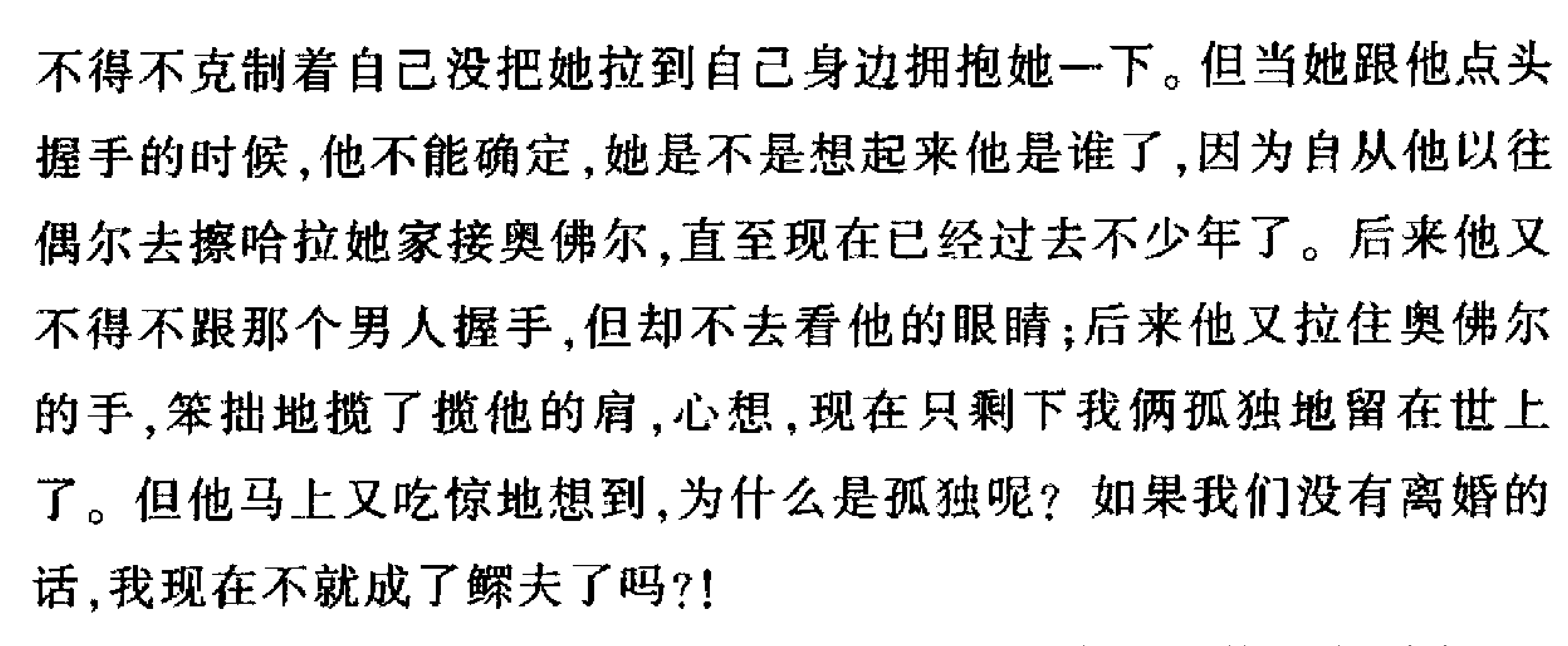
他盯着电视屏幕,等着她平息下来,他想,一年多前,自己还曾和

乔纳森及他的朋友们在屋后的草地上踢过足球，他一般都站在两棵松树间的球门前，队员们踢出各种刁钻的球，让他应接不暇。他像扬克勒·库多罗夫一样跳起扑球，有几次，自己的肚子甚至下身都被球砸得生疼。但是无论怎么说，去年自乔纳森的受戒礼过后至今，他再没跟他们踢过球了，或许是因为乔纳森和他的朋友们现在对足球的兴趣已经没那么大了；也可能是由于哈雅请人铲了草坪、挖了土的缘故，因为她打算让人来修建一个小游泳池。对此他无力反对，可当时的情况是，取得建游泳池的许可证不那么容易，而且这件事儿也很费钱，结果就在后院里留下了一个大坑。

冬天的时候，里面堆了一大堆野草，现在还得小心地看管好本尼的那对双胞胎，防止他们掉下去。乔纳森已不再与他一道看安息日那天二频道里转播的赛事了，就在不久前，他还问过他，是否愿意跟他一起去开亚特-爱里策尔体育馆看哈泼亚尔-海法队对白塔尔-耶路撒冷队的比赛，乔纳森说，他不去；劳依温还自我安慰道，他至少可以省下买球票的钱了。乔纳森过去确实把他的钱都给骗光了，所有的钱他都拿去干什么了，他又不喝酒，不抽烟；如果哪次不给他点钱，那乔纳森就叫他阿巴贡；他是跟哈雅学的，他自言道，老来才得到的孩子自然是很受宠的。他想起，他当时是哈雅和他的第一个孩子，唯一的一个孩子，为生下他，他们吃了多少年的苦啊！月复一月，哈雅跟他叨叨着那些日子，他眼光朝上不去看她，心里也不敢多想。

两个星期后，失望和歉疚感接踵而至，因为他们两人经检查发现，老天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儿，他的精子无生殖能力，老天保佑，是精子稀少。他这才明白了，为什么他和艾玛努爱拉试图在生下奥佛尔后，想接着再生的努力没有成功了。不过这不是她要跟他分手的原因，其中另有缘由。可她走后，去擦哈拉跟她的另外一个男人共同生活一年之后，她就又生了一个女儿，名叫诺娅。他曾在葬礼上见过她，当时她站在奥佛尔和她父亲的旁边，染成金色的头发稀少而卷曲，直挺的鼻子红红的。他走过去，跟她握了握手，只说了一句，请接受我的哀悼。说话时还




不得不克制着自己没把她拉到自己身边拥抱她一下。但当她跟他点头握手的时候，他不能确定，她是不是想起来他是谁了，因为自从他以往偶尔去擦哈拉她家接奥佛尔，直至现在已经过去不少年了。后来他又不得不跟那个男人握手，但却不去看他的眼睛；后来他又拉住奥佛尔的手，笨拙地揽了揽他的肩，心想，现在只剩下我俩孤独地留在世上了。但他马上又吃惊地想到，为什么是孤独呢？如果我们没有离婚的话，我现在不就成了鳏夫了吗?!

乔纳森出生时，他四十七，哈雅四十一。他本想给他取名叫大卫，跟他几个月前去世的父亲同名，父亲曾在护理院住了几年。但哈雅反对，她说，大卫是个流亡者的名字，这个名字充满了愤怒。他反问道，说话时声音并没提高，为什么就是流亡者的名字呢？大卫是领袖，是国王，是拯救妇女的英雄，有着一头红发和一双漂亮的眼睛，还有诗篇作者大卫王也是用这个名字，为什么你要说它是流亡者的名字呢？哈雅说，那好，就算他不是个流亡者吧，我是认为这个名字太老了，不如给他起名叫乔纳森吧，这是圣经里的名字，现在也很时髦。他想到了乔纳森·内坦尼亚胡——“昂特贝救险行动”中那个英雄的名字，结果他们决定还是用乔纳森这个名字。乔纳森前些日子开始就不叫他爸爸了，并开始用法语跟他讲话。如果劳依温偶尔去一下地下室里——他常在那儿看那部旧电视，那部电视常常色彩失真，变成了黑白的，而当色彩重又出现时，颜色又过于浓重，不自然，就好像里面所有的人物角色都患了一种皮肤病似的，就连本尼都调试不好——乔纳森就会学他的样子说：“我们可千万别把法语丢掉了。”他还用法语问，“你怎么样？你好吗？”就跟邻居史罗母·科纳福似的。他每星期六的早晨总要到他那里去一下，用法语跟他聊上几句，尽管他们大多时间是在默默地下棋，只有当他俩中谁出人意料地下出了一着妙棋时，对方才会大笑着用法语说“老先生”，间或也会说“我的老先生”。劳依温青年的时候，就曾和几个年轻人一道与一位俄罗斯的世界锦标赛冠军比试过一回，那场棋赛最后以和棋告终。几年前，劳依温加入了阿卡-北方象棋俱乐部，曾获

得过好几个奖杯。史罗母·科纳福是个不错的棋手,跟史罗母下棋,他不得不偶尔输给他,否则他就不愿意跟自己下棋了,每个安息日他也不能去拜访他了。

下了两三局后,他俩就一边喝着依冯给他们准备的薄荷茶,吃着家里自制的甜点,一边又没完没了地聊起记忆中对卡萨布兰卡、几家咖啡馆及一些电影院的印象来了。那些电影院放映的都是最好的法国影片,有夏布罗尔的《失望的人们》,有特鲁佛特的《他们既吻他又打他》,还有哥达特与贝尔蒙多和简·色贝哥合作的电影《气喘吁吁》,后者面容朝气蓬勃,令他又想起了艾玛努爱拉。他们还带着掩饰不住的渴望谈到了安法,那是个休闲度假的地方,在卡萨城外的海边,在当时,这是他们每个周末必去的地方。史罗母 17 岁时就跟他的父母和弟弟妹妹们一起登上了开往直布罗陀的大船,他次次都要说,看看你把我们带到了什么地方,那儿真是糟糕透了;劳依温每次都回答说,是我?那次是本·古里安把你们接出来的,我充其量只是个送信的。他又用法语说了一遍,我只是个信使。而依冯,史罗母是在大船的甲板上跟她认识的,她说道,如果不是你把我们大家都塞到一艘船上的话,我现在肯定生活在巴黎,跟那个人的第二个侄子结了婚。那时他们是要撮合我俩的,他是个整形外科医生,非常富有,在阿龙迪塞芒大街十六号有一所房产,家里有梅塞德斯车和仆人。劳依温扬扬眉毛,将一个手指头向上高高地伸出,搞笑地说道,这就是那个上帝之手。他们三个都禁不住哈哈大笑起来,他晓得,他们都很喜欢他,而且在农庄举行的北非传统节日弥姆纳节上,他是个很受尊敬的客人。许多在亚辛军事行动时期拖儿带孙来到以色列的人受邀来农庄参加了这个节日庆典。他在自己家附近的那个犹太教堂里也很受欢迎,他总在十月战争纪念日时去那里做祷告,而且比起阿诺肯纳犹太教堂,他更喜欢这个犹太教堂。有时教堂做晚间祷告,凑不够十人时,教堂的差役就会来敲他的门让他去凑数,他就从他的苏巴鲁牌汽车里那个放毛巾的抽屉拿出犹太经书,欣然地去教堂加入到晚祷的行列里。



此时火车正驶经内坦亚，士兵咳嗽着醒来了。他伸手将身后的包抓到面前，从里面拿出一瓶矿泉水，大口大口地喝了起来，颈部突出的喉结随之上下移动着。这让劳依温想起了他的儿子，所有的，共计三个儿子，包括本尼。战争初期，本尼曾在格瓦提旅服役，去过纳布路斯、拉马拉和海布隆，有一次回来度周末，他竟然睡了整整两天。如果他爬起来吃饭了，哈雅就问他，那儿发生了什么，在被占领土，他们到底在那里干什么。他只会咕噜一句，狗屎，这就是我们在那儿干的，然后就又去睡觉了。哈雅疑惑地摇摇头对劳依温说，从他嘴里根本掏不出话来，跟你一个样。他心想，性格内向、不爱说话的本尼确实很像自己，他们之间不用多说，就能各自明白对方的意思，他肯定比奥佛尔更像自己一些；奥佛尔比本尼早五年应征入伍，那是在黎巴嫩战争的初期。

当时是艾玛努爱拉陪他去特拉维夫体检的，当天晚上，劳依温忍不住打电话过去问，事情进展得如何了，尽管当时他担心那个男人会来接电话，艾玛努爱拉只干巴巴地说，一切顺利，又补充了一句道，我晚上都睡不好觉；这让原本已不再担心的他一下子又害怕起来。伞兵新兵训练结束的时候，劳依温听说，奥佛尔感到身体和心理都难以承受，他咨询了军中的心理医生，并得以降低军级，去了以色列军队发言人的摄影兵部，在那里他仍旧服预备役；就剩下乔纳森了，他离入伍到底还有四年的时间，或许到时上来一届新政府，一些情况比起以往可能会发生变化的，因为自拉宾被枪杀以来，所有的一切对我们来说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拉宾遭谋杀的那个晚上，他只是偶然中断收看电视五台的那部电影，转到二频道去看新闻节目上正公布消息的镜头。

在那上面，他看到了以色列政府发言人艾坦·哈伯和脸上挂着眼泪、分散在医院周围的群众，还有一些伤心欲绝的人们；此时此刻他没有任何感觉，大概跟人被猛击了一下，但却没有痛感似的；要过一会儿，那个地方才灼痛，并肿了起来，颜色也变掉了。他这一生里还另有过两次这样的感受，如堕深渊般，人完全瘫掉了。一次是当艾玛努爱拉

跟他说，她要跟他分手，她有了别人的时候；还有一次是当尤迪特给他打电话，告诉他，艾米尔突发心脏病去世的时候。他坐在那儿，呆呆地盯着电视屏幕看了一会儿，然后才站起来，走进卧室，看了一眼侧身躺在床上的哈雅。

她的头发剪得很短并染成了橙色，一缕一缕的粘在了一起，脑袋上几处无毛，疤痕便暴露出来，塌鼻梁的她，嘴巴大张着，呼吸声很重，一只手夹在一本名为《廊桥遗梦》的书里。他将书小心地抽出，没有立刻合上，而是细心地在书页边上折了一下；他把书放到床头柜上，关掉床头的灯，然后走了出来，一边对自己说，让她睡吧，让她睡吧，一边轻轻地又回到地下室里。整晚，他就在那儿，没完没了地从这个频道调到那个频道。他用他那苍白的手紧握着电视遥控器，从美国有线电视台调到天空台，然后又调到好些个法语和德语的频道，好像这样调过来调过去，自己就可以让这个世界朝着与现实情况相反的方向发展了似的，或者是至少可以听到某个新的新闻报道，附带的细节给人提供一个解释，因为有些被无情曝光的事实反让人不明事实就里。之后有几个星期，不，是几个月之久，劳依温都深深地被这种感觉所困扰，每天里不知有多少次如临深渊的感觉。他不禁自问，我们到底怎么了！我们遭遇了什么不测！是一次地震吗？



当他从电视里看到拉宾生平的画面，在六日战争和签订奥斯陆协议，以及刚才的那个公布消息的画面时，胸中涌动着一种思念的波涛，自己与拉宾不多的几次见面又出现在记忆里，尤其是七三年在党务中心的那次，也就是在十月战争之后大选前与拉宾的那次见面。那次的选举让劳依温想起来就心痛，因为自己作为党的积极分子一直在幕后工作，两次大选的时候，他都被派往过渡地带和穷人聚居区，他在那儿指导新移民如何参加选举，以及应当把哪张选票放到信封里，由此他成功地进入了以色列议会第四十九席候选人的名单。他投入了他的全部的休息时间，奔走在家乡和全国各地的社团协会之间，与中心的同志们见面，有几个星期之久深夜才回到家里。



他几乎跟艾玛努爱拉和奥佛尔见不上面，奥佛尔当时只有十岁。当他有一天夜里很晚到家时，他发现艾玛努爱拉坐在拐角的那张饭桌前，胳膊支在桌上，一头卷发披散下来，身旁放着烟灰缸，里面的烟灰堆得满满的。她泪痕满面，抬眼看着他说，艾玛努爱拉是你家里的一个衣柜、一个沙发还是一只冰箱？我们从来不一块儿去什么地方，也不去看电影，不跟人来往。

听到这些，他的心里一阵发紧，然而他知道自己别无选择，什么办法也没有。当他终于当选议会第四十九席候选人时，他向她保证，自己一旦进入了议会，就会放弃掉工会的工作，到那时他们就可以离开海法，搬到特拉维夫去了。这是艾玛努爱拉一直向往的，她常常去那儿探望父母亲，并和自己的女友们会面，她们以前都劝她留在特拉维夫。那次在党务中心召开的大会上，拉宾曾握着自己的手，用他舒缓而独特的声音说道，沙非尔，祝我们成功！然而就在议会选举前，有几个党内的同志却劝说他，请他照顾照顾阿卡的那个副市长，放弃自己的候选人机会。他们说，他的党龄和年龄都比他长，而且他来自东方，他们强调，候选人名单上东方犹太人的名额不够，还说，反正第四十九席把握不大。就这样好说歹说把他给说通了，把他降为第六十五席的候选人。就在那天晚上回到家时，他看到艾玛努爱拉坐在拐角处的饭桌前抽着烟，他把情况都告诉了她，并说，我还年轻，还不到三十七岁，我有耐心等待机会，只不过要稍稍晚一点，再等个四年，八年，到四十五岁时我会进入议会的。而艾玛努爱拉却说，如果进不去怎么办？这时他将两个张开的手掌伸到空中回答道，每个人在离开这个世界前都会有一些未了的愿望的。艾玛努爱拉好似避开烟熏似的眯起眼睛，一句话也没有说。

选举结果证实，第四十九席并非无足轻重，因为他们党总共赢得了议会的五十一个席位，而阿卡的那位副市长也因此成了议会议员。接下来在七七年的选举中，劳依温连议会候选人的边都没有沾上，因为利库德党在选举中获得了胜利，一切都发生了变化，并且自己那时

也已跟哈雅结了婚。哈雅无所顾忌地对他直说道，你，艾米尔，还有本·古里安，你们应对这个结果负责任，你们为什么非要把他们接送到这个国家来呢！现在他们可是联合贝京及其手下的那些老修们一起，从我们的手中把这个国家给偷去了。他当时吃惊地看着她，可什么也没说就走开了，他去向史罗母·科纳福和伊冯表示祝贺去了，他们在院子里摆了张桌子，把所有的亲朋好友都请来了；他跟他们一起举杯，对史罗母说，祝你们健康，顺利，真心地祝福你们。

火车进了沙罗母站，劳依温走到那个上了年纪的德国妇女跟前，帮她把箱子拎了下去，又将手递给她，扶着她走下车厢。外面有个年轻人，很可能是她的女婿，走到她的跟前，从他手上接过箱子。她笑着对他说，祝您一切顺利，并取得成功！他转身离去，手在身后挥挥跟她道别，祝您万事如意，万事如意。这时他心里想，她让他想起了露特，艾玛努爱拉的母亲，她在多年前就去世了，自己很喜欢她，她高贵典雅的气质里透露着坚强不屈。她跟自己的母亲完全不同，自己母亲总是套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格子工作服，是那种在家做家务活时才穿的，口袋里放着一块男人用的手帕。



每当她想起死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父母和五个兄弟姐妹时，她就用这块手帕擦眼泪。她只有一个妹妹活了下来，这个妹妹和她的一家人生活在德国，住在汉诺威，他还想起，有不少个夜晚，他的母亲弓着身，吃力地看着那本小书上印的密密麻麻的外国字，有时站在炉边时，母亲也会手拿着书，把书靠到嘴边，从牙缝里挤出一句，他们为什么不把我也接过去呢？为什么我没有跟他们一起待在那边呢？

他那时九岁或是十岁，那时他们才得知，除一个小姨以外，其他人都没活下来，但尽管如此，他还是带着最后一丝希望，仔细地收听广播里的“寻亲栏目”，等待着自己的祖父母，堂、表姊妹名字的出现，他是从照片和他们以往年年寄来的信件上认识和了解他们的。每当母亲给他和妹妹米拉端来鸡腿熬的汤，还有被她叫做“雷巴乐”的煎肝和“扑皮克莱西”的鸡肫（他很爱吃鸡肫）时，他习惯就着面包把它们全部都



吃下去，因为他知道，只要还有人因挨饿而死去，那么盘中就不能剩下东西。

他偷偷地朝米拉看去，这个比他小四岁的妹妹头发金黄，扎着两只细细的小辫子，她有一双水汪汪的眼睛，脸色略显苍白。他一边看着妹妹一边在想，如果在少吃挨饿时期，我们俩一共只有一小块面包，我会把面包给她吃呢，还是自己一个人把面包独吞掉呢？每次吃饭的时候，他都拿这个来折磨自己，探究自己的灵魂深处，很想让自己给出一个真实的答案。而当他亲眼看见，自己极快地偷咬了她一口面包，并吞下肚去，弄得她因此而鬼哭狼嚎时，嗓子里就像是堵了一团东西，他发誓，某一天，等到他长大了，自己会满世界地追踪她，并亲手将她杀死。

现在他乘上了自动扶梯，他抓着扶手两步并作一步地往上去，一边感慨地打量着玻璃天花板和那些漂亮的锻铁，这让他想起了巴黎的奥赛火车站。以前去见巴黎秘密机构的指挥艾夫拉依母·罗内尔时，自己曾多次经过那个火车站，前些年，它却被改造成了一个艺术博物馆，他还没参观过这个博物馆，尽管哈雅催促着什么时候去趟巴黎，因为自从跟第一任丈夫去巴黎度蜜月后，哈雅再没机会去那儿了。

怎么像你这样一个整天粘着法国电视节目的亲法分子却偏偏不想去巴黎？你是不是害怕哈桑国王的秘密机构在那儿把你抓起来还是别的什么？哈雅总是这样挖苦他，而他每次都微笑着说，我们去，我们一定会去的，巴黎又不会跑掉的。他又拿起一张他们四个人的合影，好像是在一个夏天的傍晚，他们几个坐在波拿巴咖啡馆里喝着白兰地时拍的，艾米尔在讲一个荤段子，边说边开怀地大笑着，尤迪特宽容地看着他，艾玛努爱拉也在笑，但脸不好意思地红了，她给自己点了支烟抽起来，他用一只手臂揽住她的肩头，将她的肩搂向自己的怀中，拿嘴吻了吻她的卷发，很显然，艾玛努爱拉就是在那天晚上，要么绝对就是在那次旅行途中，在他们停车休息的时候怀上奥佛尔的。但愿这趟行程一切顺利，路上少堵车，因为自己是无论如何不能再迟到了，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了，庭审时间再也不能往后推了。

泰莱马胡斯

劳依温走出火车站，映入眼帘的是两座巨大的混凝土建筑，高耸入云，其中一个呈三角形，另一个是圆形的。他想起自己曾在《国土报》上看到过对这个工程的报道，自停订工党的《话报》后，他就一直订阅这份报纸。报上说，此工程为沙罗母和平中心，其建筑风格独特，上面有三座塔楼，据说是中东地区最高的建筑，一个呈三角形，另两个分别是圆形和四方体的，但后一个尚未建成，或许是因为和平尚未到来的缘故。他痛苦地心想，尽管和平可能最终未必到来，但是和平进程却一再地被推迟，再推迟，直到其味变酸，甚至发霉。那个百货商店，就是那个新沙罗母购物中心也在那里，那是不久前紧随那些塔楼之后开张的。

听哈雅说，购物中心很大，相当的宏伟，很值得一去，或许就顺道去逛逛海册尔大街，把那些客厅的家具买回去。他站在马路的安全岛上，安全岛上立着一根柱子，上面钉有两块牌子，箭头朝东的写着“和平路”，朝西的上有“弹药山”的字样。他的眼东张西望寻找着奥佛尔的白色雷诺·克丽欧车，尽管没找到，他还是赶在信号灯变红之前过了马路。

他从一群身穿彩色图案T恤、头戴安全帽的泰国工人旁走过，他们正在用红、灰两色的砖块砌一段人行道，他站到用蓝色的柱子和平板搭成的雨棚前，眯着眼睛，以便能够看清缓慢行进的车流，以及拐入阿亚龙南路的汽车。还好，我比他先到，他心想，这儿反正不能停车，头脑里还在梳理着上车后要给奥佛尔讲什么内容，很希望这些东西能让奥佛尔感兴趣，就接着上次的内容讲。他要给他讲，爱高茨轮船沉没后，许多特工是如何被抓，又受到了怎样的折磨，还有整个机构和地下联系陷于了崩溃，以及往外偷运犹太人的海滩被发现的情况。艾米尔不顾危险，坚持要留在卡萨布兰卡，却把他派往巴黎，让他去找罗内



尔。我们有固定的会面地点——要不要跟儿子说呢——会面地点在卢森堡公园里那个下棋的地方。那是一个寒冷的冬日，树叶凋零，天上下着雪，我们俩人下着棋，公园里没有其他人，罗内尔说，你就留在这儿，直到我们找到一条重新开展活动的路子，这可能要花几个月的时间，在此期间，你不妨给自己找点有益的事情做做。

他让我想起来，他那里还存有一些我的信件和明信片。我的父母亲以前一直认为，我是在巴黎的索邦大学里学习，罗内尔负责每月给他们寄一封我写的信和明信片，明信片上不是埃菲尔铁塔就是蒙娜丽莎的头像。我心想，我何不弄假成真呢！于是我就到索邦大学注了册，申请读国际法博士学位。随后的几个月，我一直在写一篇题为《北美犹太人的法律地位》的论文，白天我坐在图书馆里，晚上我往往去弗罗尔咖啡馆喝上一杯啤酒。那时候的名人谁不到那里坐坐？萨特和西蒙·德·波伏娃，他们在那儿就有固定的位子，周围还有一群仰慕者；希蒙·西格诺里特和伊芙·蒙瑭坐在另一张桌旁；有几次我还看到了喝得醉醺醺的爱迪特·皮亚，每次身边总跟着个年轻的男人。

有一次毕加索经过这里，他往咖啡馆里还瞥了一眼——劳依温自己也不能断定，那个身穿长大衣、戴着白色围巾的光头先生到底是不是毕加索，但他还是决定跟儿子这么说——后来穆罕默德五世死了，他的儿子哈桑继承王位后实行了大赦，所有被抓的间谍都获得了释放，艾米尔因此决定继续往外偷运犹太人。这样，我就结束了巴黎的大学生活，重新返回到了摩洛哥。我们新的登船地点是位于拉巴特市郊的一处海滩，这是由艾米尔选定的，此地就在王宫的下方，谁也怀疑不到，运人的轮船会从那儿起航，而且海湾里的天气条件很好，唯一的缺点是，沿着那里的海滩到处都是王宫巡逻卫队的人。

艾米尔买通了其中的一个队长，并让我化装成一个摩洛哥女人。我穿上一件长袍，头戴织有金线的头巾，头巾将我的脸遮住。那个海滩上有一间小屋，我一个星期去跟那个队长会两次面。他手下的士兵们看着我俩手拉着手走进小屋里，就让我们不受干扰地在里面幽会；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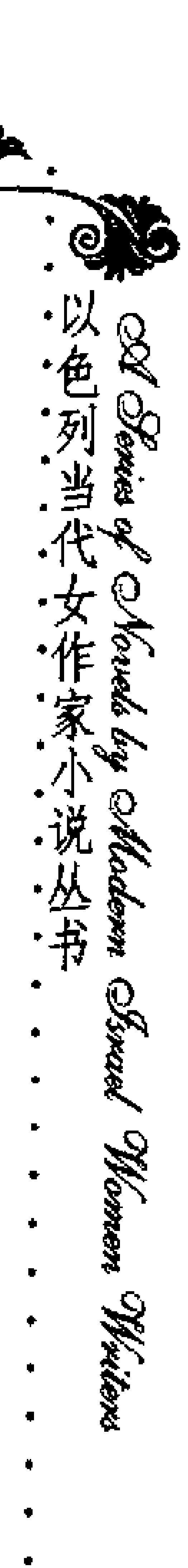
个队长向我提供王宫卫队的巡逻时间表，而我则把藏在胸罩里的钱付给他。

劳依温想起来仍觉得好笑。他看了一眼手表，已经七点二十五了，奥佛尔晚了十分钟了，看来他出城时碰到堵车了，早晨这个时段的交通很拥挤——就这样我们又把几千个人，在国王的鼻子底下成功地偷运出去了，与此同时，艾米尔与内政部长达成了一致，犹太人可持集体护照在以色列以外的国家旅行，而作为交换，以色列政府每船一千个人付二十五万美金，这是在私底下谈好的，为的是不让左派的反对党也分享好处。在后期，我们还成功地组织了乘法航从卡萨布兰卡到尼斯的飞行，然后再从那儿乘以色列航空公司的飞机飞到以色列。到了1963年，那儿差不多就没剩什么犹太人了，我们回到了以色列，我中途还去了趟巴黎，为的是拿到我的博士学位，后来正好还赶上在耶路撒冷的总统府举行的授勋仪式，仪式极为秘密，连我的父母和妹妹我都不能邀请，我们大家：艾米尔，尤迪特及其他全部的特工，我们都被总统，当时是夏扎尔总统，授予了勋章。仪式之后，我就离开总统府，去了咖啡馆，去那儿见你的母亲，那时她正参加毕业考试，尽管我俩三年没见面了，并且在这期间，我听说她还曾交过两三个男朋友，但她还是同意跟我恢复关系，而实际情况是，在我走之前我们俩的关系并未明确。

劳依温想起那次在里夏维亚街区溜达的情景，那是在夏初一个临近傍晚的日子，干燥的空气中充满了松树的香气，那时他才二十八岁，拥有总统授予的勋章，获得了索邦大学的博士学位，还有在塔亚蒙咖啡馆等着他的艾玛努爱拉，未来就像红地毯般在他的面前铺开了。

此刻，他感到自己的眼睛湿润了，他竭力忍住，因为他连自己甚至都羞于承认，他是多么的怀念那一天，在过去的时间里，他常常一遍又一遍地回想那天的情景，他不知道自己是否会把那一切都说给奥佛尔听，他担心奥佛尔会拿他开玩笑，这本来跟奥佛尔对摩萨德作的调查就没什么关系，可他为什么还没来呢，都七点三十五了，即使现在就出发去法院，那时间也晚了。他想了想星期六晚上他们的通话，约好了就





是在这个地方，在沙罗母车站对面，七点一刻见面，一点都没错。可尽管如此，或许还是该给他往车里打个电话，以确定他确实已在路上了，他走到雨棚另一边的公用电话前，从钱包里拿出电话卡，摘下听筒，然而却没有声音，这才明白是电话坏了。

他现在才后悔没听哈雅的话带上她的手机，他在外出差总喜欢轻松些，不带多余的东西，只带着钱包和装有法庭材料的公文夹，钱包放在后裤兜里，公文夹拿在手上的，他很不习惯带手机。而现在为了给奥佛尔打电话，自己却不得不再次横穿马路，回到车站，他看见车站入口处有两部电话机，奥佛尔这个时候可能会开过去的，他在他们约定的地点看不到他，或许他就开过去了，所以还是再等几分钟吧，他决定，如果奥佛尔七点四十五还没到的话，他就过马路去打电话。

他走到有个泰国工人正在弯腰干活的拐角处，眼睛吃力地在长长的车流中搜寻着那辆白色的雷诺·克丽欧轿车，车流从政府办公区往他这个方向滚滚而来，然而他却能从中辨认出哪辆是他儿子的车。政府办公大楼上由蓝色的七杈大烛台和橄榄枝组成的国徽在闪烁着，他喃喃自语道，那个国徽到底是原来就在那儿，还是五十周年国庆时才安上去，而后就忘在那儿了。一个女军警从他的身边走过，而后站到招手搭车的地方，她又高又苗条，黑色的头发梳了一个马尾辫，肩上挎着一杆枪。她高举着手示意要搭车，过去了五六辆车都没停下，她不耐烦地跺跺凉鞋，他想，要是他开车的话，他就捎上她，可他自己是不是也该拦一辆去耶路撒冷的车呢，不然的话，真的没希望按时到达法院了，因为乘公共汽车去法院，必须穿过位于市中心的汽车站，这既费时又费力，可他们连那个女军警都不捎带，又怎会捎带他呢？

他很快做出决定，离开他站的那个地方到马路对面去，他一边快步地过马路，一边不停地向后张望着，说不定就能看到那辆白色的雷诺·克丽欧轿车呢，当他到达火车站入口处时才发现，有两部电话已经没影了，另两部正被别人占用着。他犹豫不决，不知是否该进火车站里去，用里面的电话打给奥佛尔，可又担心那样做，真的就把奥佛尔给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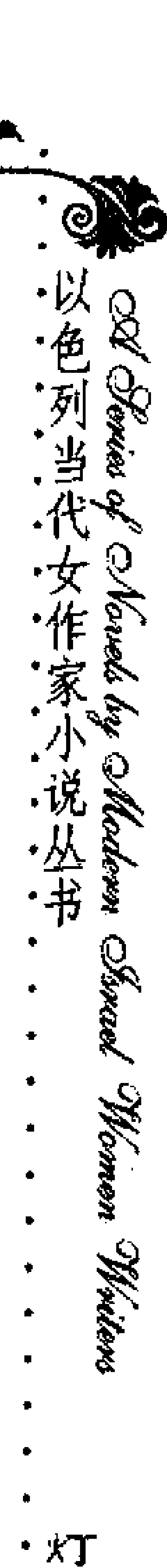
过了。想到这，他就站在原地，等着别人打完电话，这时他下意识地抬眼朝公共汽车站近处墙上的广告屏幕望去，上面是一个年轻女人的黑白画面，那几乎还是个孩子，她双手抱膝，赤身裸体地坐在那儿，身体的私处隐约可见，她的头发飘垂下来，盖住了双臂，遮掩了胸前的双乳，一张小脸神情严肃，圆唇大眼微微张着，旁边放着一个小瓶子，里面很显然是香水，在她的头顶上出现了两个大字"迷幻"，他感到身体里一阵骚动，感到很羞愧，转而又继续朝十字路口望去。

那个女军警已不见了，他惊慌地想起来，他根本就没看见是哪辆车把她给捎带走的，那么他也可能会把奥佛尔给看漏掉的，会不会就是他把她捎带走的。火车站的时钟指向了八点四十五分，他自言自语道，就算奥佛尔现在到了，他也不可能在九点之前或哪怕在九点一刻的时候到达法院了，归根结底，所有的机会都失去了。可尽管如此，他还是一定要去耶路撒冷，去到女法官阿维娜丽的办公室里，让她再给一次延期庭审的机会，理由是，他的当事人不能由于其律师的迟到而蒙受损失，也就是说，这是因为他本人迟到造成的。他可以想见她脸上惊讶的表情，她会慢吞吞地说，沙非尔律师，您应当明白，我说话是算话的，我说最后一次就是最后一次了。



他想到了阿布·扎拉尔，他正朝自己走来，嘴里抽着烟，心里憋着火。正在这时，有一个人打完了电话，他赶紧从口袋里拿出电话卡，打奥佛尔的手机，可令他吃惊的是，听到却的是语音提示：我是奥佛尔，您可以留下您的信息，我会尽快给您回电。

他挂断电话，又拨了家里的电话，电话里同样自动播放了奥佛尔的录音：我是奥佛尔·沙非尔，鸣声过后请留言。劳依温犹豫不决，不知是否该留言，最终还是挂上了电话。他又拨了一次奥佛尔的手机，鸣声过后他说道，奥佛尔，我是爸爸，我在我们约好的十字路口等你，之后他就不知该说些什么了。他挂上听筒，感到很疲劳，沮丧中不知该回到十字路口，还是再等一会儿，抑或是到市中心的汽车站去，从那儿继续乘车去耶路撒冷，他想，不管怎样，自己应该给法院的秘书处打个电



话，请他们无论如何要找到阿布·扎拉尔，告诉他，自己要迟到了。

有那么一会儿他甚至希望，这次阿布·扎拉尔还是不到庭，这样的话，庭审无法进行就不是他一个人的责任了，他又不由自主地朝电话看去，等着别人打完电话，同时将目光移向大屏幕那个光身子的大姑娘上，她让他感到既受了伤害，又有种失落的感觉，此刻，当他再盯着姑娘看时，心里已不再那么激动了，后来他又习惯性地跑到那个十字路口等，尽管他知道奥佛尔是不会来了。

他们在星期六，也就是前天晚上通电话的时候，他跟他说过，他今天八点半钟要去电影学校上课，他不可能无缘无故地不去上课。并且劳依温知道，这个课对他来说非常重要，因为课上可以接触到一些富有才华的年轻人，更主要的原因是，可以以此维持生计，因为在这个国家里靠执导纪录片为生是很难的，尽管他的影片获得了成功，在电视里播放了，而且还应邀参加了国际电影节，还在其中的一次电影节上，他忘了是在斯图加特还是在慕尼黑举行的电影节上，他以他反映大屠杀第二代人的片子获得了头奖。

在儿子获奖的那个星期的星期五，他打开《新消息报》，在副刊上发现有一篇对他儿子的采访文章，有两页多，还配有一张照片，照片上的儿子很像艾玛努爱拉：卷发，绿眼睛以及微笑的样子。史罗母·科纳福曾过来向他表示过祝贺，甚至在单位里也有几位同事拍拍他的肩说了，恭喜，恭喜，之后几个星期他总是向别人这样介绍自己："我叫劳依温·沙非尔，是奥佛尔·沙非尔导演的父亲。"当遇到不解的目光时，他才不再这么说了，他明白，他们并不知道奥佛尔·沙非尔是谁，有一些人也曾看过报上的文章，但早把它给忘了。尽管如此，他还是很为自己的儿子感到骄傲，他心想，自己也为他所选择的道路作出了一部分贡献，因为奥佛尔小的时候，他常常带他去看电影。

艾玛努爱拉在哈达尔大街一家本地人开的律师事务所里上半天班，有一天她向他宣布，她报名上了用视听教学法教授的法语班，是由大使馆办的。他想，这个主意不错，他答应，自己每星期抽两个下午的

时间来照看奥佛尔。他们总是去哈达尔大街，上阿尔蒙或罗恩电影院看电影，如果要参加工会或者党务会议的话，他就把奥佛尔放在电影院里，电影放完了再来接他。奥佛尔知道，他必须在电影院耐心等着，等到他来接他。

劳依温突然想起来，有一次他带他去看片名为《邦比》的电影，当时放映此片的是奥拉电影院，然而那天的会开了很长时间，结果他晚了一个多小时才去接他。到电影院时，他看见儿子坐在台阶上哭得很伤心，而当他发现了劳依温时，就奔向他，用他的小拳头边捶打他的肚子，边哭叫道，爸爸，爸爸，你别死！劳依温伸出双手将他抱起，故意压低了嗓音跟他说，爸爸是个英雄，爸爸很威猛，我永远都不会死的。

奥佛尔盯着他的脸认真地说，可你最后总是要死的，每个人最终都是要死的。劳依温仍用低沉的嗓音跟他说，我会跟爷爷的爷爷一样活到一百零五岁的，他叫雷波·卢本，是个采矿工。当他们开着河马牌车回家的时候，奥佛尔突然开口说道，你知道吧，爸爸，我认为，没被生下来是一件比死亡更悲哀的事情。劳依温暗觉好笑，就问他为什么，奥佛尔说，因为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被生出来的，而每个人都是要死的，所以说我们很幸运，恰好我们这些人都被生出来了，我们应当感到高兴才是，对吧？劳依温说，是的，活着是件令人高兴的事。奥佛尔继续说道，可尽管如此，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是英雄，甚至像我这样的小孩子也是，因为他们以后要工作，要上学，要玩，要过日子，就好像他们都不会死似的，尽管他们心里都知道，人人都是要死的，或许每个人晚上入睡前都很害怕，但他们从不跟任何人谈起这事，就连那些最重要的大人物，包括国家总统，也不说他们害怕。

劳依温向奥佛尔很快地瞥了一眼，这个小家伙停了一会儿就又说道，可是老年人，比如说你吧，都是更大的英雄，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剩下的时间不多了。劳依温大笑起来，他在儿子金色的卷发上摸了摸说，我，老吗？我一点都不老，我才 34 岁——此刻他想起，奥佛尔现在正是这个年龄，当年自己是开怀大笑，如今心里却是一片凄楚——后来他



们就到了他们以前在阿胡撒的家,家里散发着一股菜肉蛋卷和沙拉的香味,艾玛努爱拉神采飞扬,笑意盈盈。

他吻了吻她的卷发,用法语问了声,你好吗?艾玛努爱拉笑着说,很好,谢谢。直到离婚后,离婚后好些年后,他才突然意识到,艾玛努爱拉就是利用那些个下午的时间, 开始跟特拉维夫的那个男人约会的,法语课只不过是个借口而已, 他有几个星期之久思想上都很痛苦,可苦于自己没有证据,也不好盘问她,当时她已诊断出患有疾病,并常去医院做理疗,这样就更不便多问她了。

那个说俄语的小伙子打完了电话,劳依温就走过去,拨打以色列国家劳工法庭秘书处的电话。他记得这个号码,他记得的其他电话号码有几十、上百个,还有一些很少用得上的电话号码他也记得清楚,他听见电话里传来忙音,就挂上重拨,后来又这么试了几次。在这过程中,他一直不快地看着那个头戴雪青色贝雷帽的士兵,他正等在自己后面要打电话,最后他还是放弃了继续拨号,对那个士兵说,我这儿占线,你打吧,那个士兵说了声谢谢,就走过来打电话。从传到自己耳朵里的只言片语中劳依温断定,他正跟一个姑娘通话,而且很显然是他的女朋友。

他想起来,他去卡米尔看奥佛尔的次数虽不多,但一次都没见他带回女友来,他脑子里突然跳出一个荒诞的念头:奥佛尔刚做了艾滋病检查,而且就在昨天,他得到了回复的检查结果,因此他今天就不来耶路撒冷,也不接电话,断绝了一切联系,或许他该去他的住处看看,看看他在不在,好不好,可谁知道,在那儿他会遇见谁,碰到什么事儿?他对儿子了解得太少,然而他们在以前,在他离婚前,可是很亲近的啊。

那时, 他在海法的那个叫太平海滩的地方教奥佛尔穿着脚蹼潜水,在巴特·嘎里母游泳馆教他从高台上往下跳水,还教他骑自行车、打牌、下棋,他们还常去卡迈尔运动中心打保龄球,奥佛尔不喜欢足球,劳依温曾经尝试着要拉近他和足球间的距离,试了几次后就不得

不放弃了。有时候他们开车去斯特拉·马里斯，那里有座卡迈尔山，山上一片碧绿，山临海边，悬崖绝壁，在他们坐着的山下面，大海像是许下了诺言似的，向遥远的国度冒险地延伸开去。他们坐在灯塔下的一块礁石上，他将双手合在一起，用嘴沿手掌间的缝隙吹奏出汽笛的鸣声。

后来他给奥佛尔讲了奥德修斯的故事，讲了他几次迷航的经历；讲吃人的独眼巨人和迷人的女妖瑟西的故事，讲了仙女卡露普索以及当奥德修斯的船遇岸搁浅后，帮助奥德修斯顺利返家的公主娜西卡的故事，讲海妖塞壬童话般而又危险的歌声，讲忠诚而诱人的珀涅罗珀的故事，还讲了不认识自己父亲的泰莱马胡斯的故事以及他如何回到家里，参加射箭考试等等。

奥佛尔很喜欢听这些故事，劳依温给他重复讲过多次。而当奥佛尔上了学，开始认字时，他经常从工会的图书馆借各种各样的书给他看，在5月1日的阅兵式和那个所谓的舞蹈游行仪式上，他把他扛在自己的肩上，还有一次他带着他去参加了在特拉维夫的贝特-拜尔会议中心举行的党务大会，当时高尔妲还摸摸他的头，捏捏他的脸蛋问了句，你多大了，小家伙，奥佛尔回答说，六岁半，而后高尔妲还说了句，你有一个漂亮的儿子，他吃不准她是不是记得他叫什么名字，就对她说，我是沙非尔，劳依温·沙非尔博士，高尔妲不相信似的看着他说，我知道你是谁。

可当艾玛努爱拉离开了他，把奥佛尔带到特拉维夫之后，一切都变了样。他们卖掉了位于阿胡撒的住房，那还是艾玛努爱拉的父亲给他们买的，他不得不又搬回到海法市玛萨达大街父母的两居室里去住，有好几个月的时间，他都不给奥佛尔在擦哈拉的家中打电话，都是因为害怕那个男人来接电话。当奥佛尔给他打电话时，他向他保证，他会去接他的，并且都说定了在哪一天，什么时间去接他，但到了时候，他却没去，也不说一声。

到了晚上，艾玛努爱拉就怒气冲冲地打电话来跟他说，儿子一整



天都在等他,你怎么可以这样对待他。他就道个歉,再重新定了个日子,但到时候他仍旧不去,结果奥佛尔后来就拒绝再跟他通电话了。一个月后,妹妹介绍他认识了哈雅,他就搬到她那儿去住了,他们带着本尼去艾拉特度假,途中,他们在特拉维夫停留了一下,带上奥佛尔一块儿去度假,劳依温站在院子的篱笆外,看到他们三个人在抛飞碟,那个男人,奥佛尔,还有怀了孕的艾玛努爱拉,他们笑着相互间抛掷那只红色的飞碟,线路呈三角形,他在大门边把儿子叫出来,奥佛尔低着头向他走来,身后拖着他的包,艾玛努爱拉也跟了过来。她身穿宽大的孕妇裙,指间夹着根香烟,脸微微发红,她眯着眼看着他说,你瞧他多快活,他得到了他该得到的东西。

他转过身去说,是的,是的,就从背后挥挥手告辞了。可住进艾拉特的宾馆后才发现,奥佛尔和本尼根本就合不来,因为奥佛尔总是利用一切机会打本尼,本尼一开始是想讨他的好来着,每次本尼挨了打,就哭叫着跑到劳依温跟前说,爸爸,他老是打我,劳依温就跟奥佛尔解释说,本尼比你小,长得也没你壮实,不能打比自己弱小的人。奥佛尔说了声,知道了,然后就去游泳池游泳,本尼也跟了过去,可没过几分钟就又传来了哭叫声,哈雅和劳依温跑到游泳池边看见,奥佛尔正要往死里淹本尼,他按住他的头,弓着身骑在他的身上,小脸累得通红。

劳依温跳到游泳池里,将他们分开,两只胳膊下一边夹一个,将他俩拖上岸来。本尼将头埋在他妈妈的怀里号啕大哭,这时他再也控制不住自己,接连打了奥佛尔几个耳光,直到把他打倒在地,又拿自己的光脚继续踢他,奥佛尔像个胎儿似的蜷曲在地上低声抽泣着,劳依温用力把他抓起来,晃晃他并叫道,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不能殴打弱小的人,我是不是跟你说过了,你这样会把他给弄死的。他们被迫中断了度假,在开往特拉维夫的长途行程中,他们都沉默寡言,本尼和奥佛尔都睡着了,要么就是装睡。当他们到撩哈拉,放下奥佛尔时,他连再见都没说,就消失在大门里了。

哈雅说,或许等奥佛尔习惯了新环境,习惯了她和本尼后,再去他

们那儿更好些，他也就放弃了邀请他来住的念头，他俩结了婚，搬到卡米尔去住后，也是如此。因为哈雅说，那儿的生活水平很高，而地价却很便宜，我们可以单独盖一幢房子，尽管他因公务繁忙，很不愿意从海法的党务中心分部搬走，但最终还是妥协了。建那所房子，可让他忙了不少时候，耗费了他很多的钱和精力。他想，反正奥佛尔更愿意跟艾玛努爱拉住在一起，好像也爱跟那个男人，他那个新爸爸住在一起，他已经长大了，十二岁了，有自己的生活了。每隔两三个月时间，他都要去特拉维夫的工人委员会大厦开会，那时他会招呼不打地突然跑过去，隔着篱笆喊出奥佛尔来，然后把他带出去玩上一两个小时。他们或是去亚尔孔河上划船，或是去鲁纳公园玩电动玩具，一个不少地全都玩个遍，玩的时候，奥佛尔从未表现过害怕，最多也就是紧紧地抓着他，甚至在坐过山车时，他也只是两眼瞪得大大地坐在那里，双手紧抓着扶手。

在出口处，劳依温给他买了一个冰激凌吃，奥佛尔总是要吃那种样子像贝壳的冰激凌，有时候他的钱用完了，他的经济压力一直很大，因为盖房和需付赡养费，他还欠着一些债，那时他就要求奥佛尔用他的零花钱来买冰激凌，他心安理得地认为，他的零用钱反正也是他出的赡养费的一部分。他从部队退役之后，尤其是艾玛努爱拉去世之后，他才会在诸如犹太人新年或逾越节等星期五聚餐的时间来卡米尔，上他们的家里来吃顿饭。吃完饭哈雅收拾走餐具的时候，劳依温就和三个孩子，奥佛尔，本尼，还有乔纳森一起坐在大阳台上。前几年时，还包括本尼的两个双胞胎孩子，他们就在他们脚边玩，他们的母亲则在厨房里帮哈雅忙，他们嘴里嗑着葵花子，眼睛看着郁郁葱葱的小山。他想，哈雅是对的，他们的房子没盖错，这儿的空气真好，生活质量不赖，沙罗母·科纳福还跑过来笑着说，你们可是三代同堂啊，是不是，他挥挥手，自豪地说，不错，是三代同堂。

那个戴雪青色贝雷帽的士兵还在跟他的女友聊天，可那个操罗马尼亚语打了半天电话的老太婆却放下了电话，她身上浓重的香水味和





沾在听筒上的口臭味直刺他的鼻子。法院的电话还在占线，但他决定就这么一直打下去，直到打通为止，也不管谁在边上等着打电话了。其间他又给奥佛尔打了电话，两个号码都打了，刚才的留言还没给回音，然后就又给法院打电话，他一定要找到阿布·扎拉尔，告诉他，他不能去法院了，幸好没人等着打电话，他可以继续不停地拨打电话。

九点差十分的时候，他终于听到法院的一个女工作人员的应答声，是奥丽。她甚至也还记得他呢，她说，沙非尔律师，您难道不想问问刚才这儿发生了什么吗？您的当事人，那个阿拉伯人，是带着他的儿子来的。八点半，当法官们走到各自的座位上，全体起立时，他的儿子开始大哭大叫起来，像是有人要拿刀杀他似的，他倒在地上，缩成一团，好似鬼魂附身的样子，他口吐白沫，还拉了一裤子的屎，请原谅我这么说，阿维娜丽法官她，您猜怎么着，臭味以及所发生的一切，让她既害怕又恶心。

那个父亲把他儿子带出了法庭，像抱着婴儿似的抱着他，他体重一定不轻，看样子年龄有十五六岁了，他把他放到外面的长椅上，替他擦净脸上的污物，在旁边守着他。他们还在那里，他还没醒过来，阿维娜丽问了您在哪儿，那个阿拉伯人说您还没到，她说，这个案子会要了我的命的，他说，陛下，我们还能再往后推迟一次吗，他话说得让人听起来很舒服，她说，在这种特别的情况下她必须再好好考虑一下，当天就会公布决定的。

劳依温觉得身子都麻木了，他咽了下口水，嗫嚅着说，麻烦您告诉她一声，我不能去了，我有事脱不开身，我遇到倒霉事了，是一起车祸。奥丽吓了一跳，什么样的车祸，伤着人了吗，他说，不是什么严重的事儿，我回头再打电话。他放下电话听筒，将光光的脑门抵靠在电话机上，紧闭着双眼，直至感觉自己的肩上被人搭上了一只手，先生，您感到不舒服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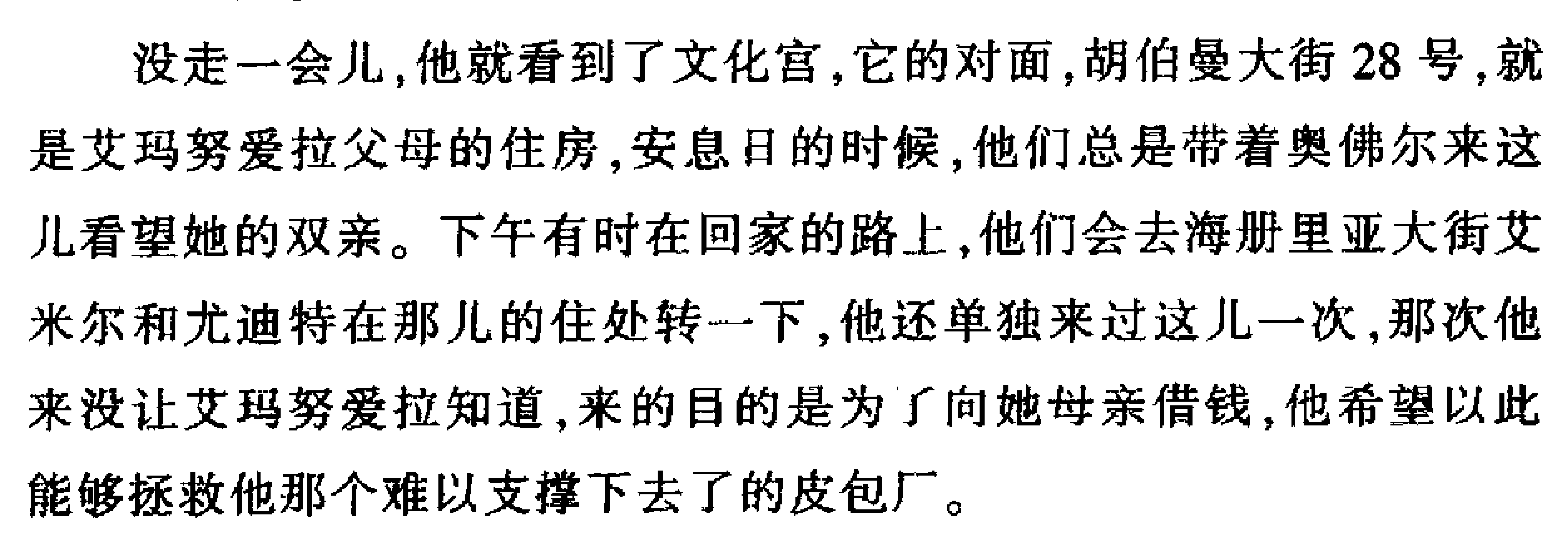
他回头一看，是那个头戴雪青色贝雷帽的士兵，他不得不振作起来，说了声，没事，谢谢您，然后又补充了一句，我要去看我儿子，他病

了，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要这么说，他只晓得，自己得马上动身了，背后那个士兵大声说了一句，祝他早日康复，他把手伸到身后摇了摇示意着再见，就赶紧迈着大步向西，穿过和平中心附近的塔楼和堪扬购物中心的底下，从弹药山大街，向齐亚方向的政务区走去。

珀涅罗珀

劳依温走过有着红色屋顶的政府大楼，二次大战前，德裔“犹太法师”们曾在这里的一个叫萨罗纳的住宅区里居住过。他看到，右边就是以色列军事基地的入口。向上，他看见，浅咖啡的底色上新印了这样醒目的字样“拉宾军营，以拉宾将军的名字命名”，这时，他的喉咙里涌出了一股苦味。在大门和两边的岗亭旁，可以零星地看到几个懒散的士兵。他继续沿卡普兰大街一直向前走去，经过作协和记协大楼，走过易普恩-格威罗尔路口，上了帝岑高夫大街，那些树冠硕大的无花果树下绿荫浓浓，下面的人行道上，到处都是被踩碎了的腐烂的无花果留下的斑斑黑点。





没走一会儿，他就看到了文化宫，它的对面，胡伯曼大街 28 号，就是艾玛努爱拉父母的住房，安息日的时候，他们总是带着奥佛尔来这儿看望她的双亲。下午有时在回家的路上，他们会去海册里亚大街艾米尔和尤迪特在那儿的住处转一下，他还单独来过这儿一次，那次他来没让艾玛努爱拉知道，来的目的是为了向她母亲借钱，他希望以此能够拯救他那个难以支撑下去了的皮包厂。

那是他 1975 年接手过来进行合理化改造的一个厂子，假如他救不了它的话，那至少在等来政府许诺的资助款前，还能对付工人们一个月的工资。这期间为了省钱，他都是亲自动手挑选从供货商那儿买来的皮子，他喜欢触摸皮子，还喜欢闻皮子的味道。他想，这都是从他那位当皮匠的祖父那儿继承来的，在摩洛哥时，他也是以此为掩护，来



执行秘密任务的，他自己设计和绘制各种皮包的式样，每天女工们下班走后，都是由他来打扫生产车间、办公室和厕所。尽管当初厂子交由他来进行合理化改造，可他却没有辞退一个女工，而是从银行借钱来支付工资，心里还坚信着政府将给予资助的那个含糊的许诺。当银行停贷后，他就从黑市上借钱，接下来很快各种账单都来了。

艾玛努爱拉还接到过威胁她和奥佛尔生命的电话，她哭着说，她不能再这么过下去了，并且还拒绝接受他带回来送给她的皮包，她说皮包的式样很难看，她不喜欢。他一早就出门，午夜才回到家里，有时干脆就在厂里随便摆放在屋里的一张备用床上过夜，满屋子都是皮革的味道，当他在刚才提到的那一天去向她的母亲借钱时，他就知道，那可是他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了。

跟第一次他和艾玛努爱拉一起到她家时的情形一样，客厅之大再次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而自己父母居住的两居室，外加一个阁楼的面积，或许才与这个客厅的面积相当。他印象最深的是那些家具，椭圆形樱桃木的餐桌，配上十二把式样相同的椅子，古典式的沙发和艾玛努爱拉小时候曾弹过的那架黑色的德国钢琴，还有马克斯·利伯曼及里塞尔·乌里希的那些油画。

她父亲的那个大书房，书架直抵天花板，书桌是英国式样的，她的父母，三十年代初即从汉堡移居过来了，衣着总是很考究，父亲海尔曼的个子瘦高，身穿三件套的西服套装，头戴礼帽，母亲露特一身老式打扮，头发做得一丝不苟，爱乐乐团演奏的音乐会他们一场不漏地前往。

海尔曼 1972 年死后，露特依然去听音乐会，要么跟她的女友们一起儿去，要么独自一人前去，她也常去听宗教和历史方面的报告会，并且还为士兵委员会和国际犹太复国主义者妇女组织义务工作。安息日时，他们就餐的那张大餐桌上摆放着印有罗森塔尔字样的餐具和露特从狮爪形柜脚的餐具柜里拿出来的银器，饭后他常和海尔曼杀上一盘，用的是一副象牙雕刻的棋子，一般都是他赢。而且海尔曼每次都要说，你有一个部长的脑子，走一步会考虑四步。而劳依温回答到，有一

天我会当上部长的,海尔曼说,是啊,是啊,我们会等着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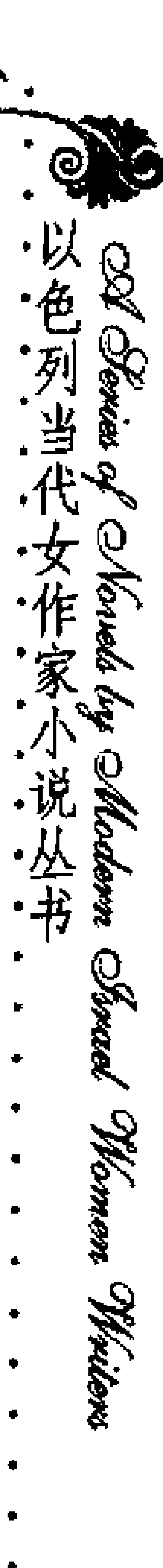
他死后,他们几乎每个安息日都去看露特,吃完饭,他带奥佛尔去雅克夫公园玩,他在那儿教他滑旱冰,就像他小时候从哈达尔大街沿着斜坡滑到下城,滑到巴特·嘎里母时的情形一样,风呼啸着吹过脸庞,衬衫像风帆似的被鼓胀起来。这个时间里,艾玛努爱拉和露特两人收拾着碗碟,他希望艾玛努爱拉少说些他的不是,因为他知道,她母亲是很喜欢他的。就在刚才提到过的那一天,他吃完喝完她放在他面前的所有东西,深呼吸了一口气后跟她说,他不得不向她借些钱用,数目不小,相当于五个女工的月工资总和。

露特从她带有银链的眼镜框上方盯了他一会儿,什么也没说,就填了张支票给了他,就这样,他才得以按时付清了工人的工资,可是政府的资助款还是没等来,最后他被迫将工厂以很低的价钱卖给了成了他的债主的那个大皮货商,因为他欠了他一大笔钱。这样,他才还清了银行的贷款,可露特的钱还不了了。



当艾玛努爱拉知道这事儿后,大发了一通脾气,他第一次见她那么生气,她叫道,她对他那伟大的罗宾·胡德式的小把戏和他那可怜的工党干部事业,以及他的那些空洞的许诺感到厌烦了,他吃起东西来像是个大屠杀的幸存者似的,能把盘子里的汤汤水水吃个一干二净。她也过够了整天一个人待在家里,夜里抱着枕头睡觉的生活,她已经得到了远胜于此的另外一种生活,她现在就带上奥佛尔回特拉维夫去。

当他试着去拥抱她,请她留下来时,她告诉他,她和某人已经幽会了一段时间了。当看到他脸上露出震惊的神情时,她的嘴里立刻爆发出一阵丑陋的大笑来,她说,这一点儿你都没料到,是不是?即使我在你眼皮子底下干了那事,你也不会发现的,你的皮可真厚啊,相比而言,大象的皮就如同一层薄薄的纸片。在办离婚手续的几个月时间里,他还是希望,那些法师们能够说服她同意调解,她要是回来了,所有的事就都算了,但离婚时,当卷着的离婚证书经由他的手递到她的手上



时，他在嘴里叨叨着说，现在你可是自由了，想跟谁就跟谁了。他看着她的绿眼睛，而她则回避着他的目光，他知道，自己的心已碎了，永远也无法复原了。

他内心很想拐到胡伯曼大街去看一眼那个大阳台，尽管那儿已了无过去的踪迹了，因为露特1988年去世后，艾玛努爱拉把她父母的房子卖掉了，又买了两套小些的，亚尔孔大街的那套给了奥佛尔，另一套不知在什么地方，给了她的女儿诺娅。她当时已是重病在身，他心想，她真像是一头狮妈妈，为自己的孩子一直操劳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内心不觉一下子涌起绵绵的哀伤来。

此刻他正经过哈比玛剧院，他想起来，奥佛尔曾跟他说过，它看起来像是动画片里的一只嘴巴大张、牙齿外露、名字叫摩比·迪克的大鲸鱼，所不同的是，在它的大肚子里上演的是美轮美奂的戏剧和一出完整的人生。后来他拐到本-册翁大街，那里同样有着浓密的无花果树荫，他忽然觉得又饿又渴，早晨四点半起床时，他除喝了一杯雀巢咖啡外，什么东西可都没吃啊，他决定走到哈比玛大街对面的小亭子时停一下。多年前，他曾在不同的季节在那儿给奥佛尔买过贝壳状的冰激凌和圆形巧克力蛋糕，他要买点喝的东西和一个三明治，就坐在那边的长椅上吃。

他犹豫不定是买金枪鱼三明治还是煎蛋三明治，最后选了便宜些的后者，他还要了一罐活力牌啤酒，亭子里的那个男人，他不能肯定是不是以前的那一个了，笑着对他说，我有二十年时间都不卖活力啤酒了，您是想要金莱啤酒吧。劳依温说，是的，是的，那就来一听金莱吧，他接过啤酒，付了钱，眼睛数了数找回的钱，找了一张长椅坐下，心里还在怦怦地跳个不停，因为他想在这儿多消磨些时间，以避开在奥佛尔的家里可能会遇到的情形。

在长椅边的垃圾箱里，他发现了一张前一天的《新消息报》，他把它抽出来，边吃边翻，很快地浏览了一下那些他在《国土报》和电视新闻报上早已看过的新闻标题：新选出了一位具有东方背景的总参谋

长；巴基斯坦准备进行核试验，内坦尼亚胡要去纽约访问，并要在联合国演讲；白沙瓦的一个男人杀了他的妻子；在被占领土，巴勒斯坦人在灾难日这一天未发生骚动；弗兰克·西纳特拉83岁高龄去世。在里页上有一篇美国电视连续剧《塞因非尔德》最后一集的故事梗概，他没看过这部电视剧，除此之外，还有达纳国际同性恋同盟会会员在他们赢得欧洲交换节目大奖后举行的胜利庆典情况的介绍。他在心里自问，他的儿子是不是也参加了这个庆典活动，但又极力排除自己的这个想法。接下来他翻到了标题为《保守派——快快从我们的背上滚下来》的反对保守派的文章，他想起了本·古里安，此人在他的讲话中一再声称："在以色列这个国家，无论是信教的还是不信教的犹太人，大家都应当相互尊重，和平共处"，他试图想回忆起，本·古里安针对国家为叶什瓦大学所做的夸张预算和那些为数众多的逃避兵役的保守派人士都说了些什么。在这一页的下半部分，他看到了一个大标题："阳痿时代的终结"，是一则一家诊所做的提高人的性功能的广告。他自言自语道，自己对此尚无需求，尽管在过去的几年里，他的"性"趣已大大地降低了，哈雅也因此而先于他上床睡觉了，她要么沉迷于某本书中，要么津津有味地收看电视一台或二台里某个吵吵闹闹的节目，而这个时候他仍还待在地下室里。

他下班回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地下室的门，通常他也不上去跟他们一起吃晚饭，而是在夜里很晚的时候，溜到厨房里，从冰箱或是锅里拿些剩菜剩饭，再回到地下室里来，继续在电视五台和法国电视二套频道间调来调去。他常常是和衣睡在沙发上，直至第二天早晨醒来。在报纸的最后几个版面上，他看到了一篇有关戛纳电影节的报道，又浏览了一些讣告，最近，他常发现自己多多少少有些熟悉的名字出现在其中，在这些版面上登载了不少对前财政部长的悼念文章，他不禁思忖，一个人的一生，一篇小短文，就可以将他所有的头衔、功绩和他的子孙后代们作了个总结了，寥寥数行，二三十个字，其中还包括葬礼的时间、地点，从讣告的长短和悼念文章的多少上，是可以看出死





者生前贫富情况及其影响力如何的，此时此刻，他就知道自己的讣告大概会是个怎么样子了，它不长也不短，内容是“我们尊敬的劳依温·沙非尔(原姓：施比策尔)博士已经回家了。哀悼者：妻哈雅，儿子及儿媳本尼·莱维和萨里特·莱维，儿子奥佛尔·沙非尔和乔纳森·沙非尔，妹妹米拉及全家，孙石尔和奥尔”。

他知道，旁边会出现两篇悼念文章，其中一篇是以工会的名义，另一篇则是以摩洛哥犹太人联合会的名义登载的，他任报纸从膝上滑落到沙地里。三明治吃完了，但他仍待着没走，他一边痛痛快快呷着啤酒，一边享受着短暂的喘息之机，之前的一早上，自己非常不顺，等会儿到了奥佛尔那里，又不知会碰到什么，他打开“24时”一栏，看到一篇《西纳特拉——一个美国的传说》，文章写道，西纳特拉，一个贫穷的意大利移民的儿子，他用自己的一双手和天鹅绒般的嗓音，为自己铺平了通向事业顶峰的道路，他一生一共结了四次婚，并且还曾与索非亚·罗兰，玛莉莲·梦露和洛丽·芭克尔之间有过绯闻，他结交了不少总统、国王以及黑手党头目。“事实上，西纳特拉有着自己待人处世的方法。”文章的作者最后这样总结道。

劳依温不禁怀疑，一篇短短的讣告能否总结得了西纳特拉的一生，他想起了，艾玛努爱拉并非没爱过自己，她曾说，他是她“心中的野蜜蜂”，但他更偏爱雅各布·布莱尔那直截了当的热情劲儿，每次从车里收音机某个电台里偶然听到“我永远都无法报答你”，心中都有股熊熊燃烧的感觉。他也很喜欢富兰西斯·雷马克和布拉森司，但是“魔幻时刻”这个下午两点钟播送的节目，他常在路上调出这个台来听，里面播放的美国歌太多，法国歌太少。他翻翻后面几版报纸，眼睛不自觉地移到了每日星相命理的巨蟹座上，“感受一种悬浮的状态并有一种计划外的感觉，皆因宝瓶座上月亮的位置距离海王星过近的缘故。今天可能发生令人意外的事情。”他叹了口气后打开报纸的副刊，看了一眼体育栏目，上面写着“距离法国世界杯还有24天”，并自语道，一频道会直播的，他想自己到时候会收看的，他还想到，乔纳森大概也会跟他

一起看的。

他看了一眼手表，吃惊地发现，自己坐在这里已经快一个小时了，可尽管如此，他还是把最后一版全翻看完了。这一版是为女性办的，谈的是幸福这个话题，他看了看那些演员、歌唱家、时装模特和议员们就他们生活中最幸福的时刻都说了些什么，比如叶迩·达阳，他曾多次在工党大会上碰到过她的父亲。她说，自己生活中最幸福的时刻莫过于孩子的出生，17%的被调查者答案都是如此，相反，有15%的人视其婚礼为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其他的答案有：获得驾照，乘飞机去国外，赢得彩票大奖，买房，还有内坦尼亚胡接手政府等等。此刻，他由于休息时间过长而感觉有些着急了，他站起身来，把脚下横七竖八的报纸窝成一团，连同空啤酒罐一起，又重新扔回到垃圾箱里。他又想起了那次穿过安静的里夏维亚街区时的情形，在那个初夏，他从总统府里出来，走进了塔亚蒙咖啡馆，如果有人问他，那他既不会选婚礼的日子，也不会选孩子的出生日，他要选择那个日子，那一天，在那一天即将结束的时候，在艾玛努爱拉租住的房间里，在她的床上，在她的身上，他重新找回了自我。

他沿着林荫大道一直往下走去，走到大道旁无花果树下的沙地上时他想，如果听她的话，在科学院，在希伯来大学一直干下去的话，情况可能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他会被提升，会被提名为教授，就像他的几个学同一个专业的同学一样，那他就有更多的时间跟艾玛努爱拉和奥佛尔在一起了，或许他们还会再添一个女儿，就像诺娅，他们每隔几年就去巴黎旅游一次。他也可能在索邦大学任教，周末他们总是去附近的地方玩，全家人一起去，去卢森堡公园，去土依莱恩打高尔夫，去卢浮宫，星期天那里的门票是免费的，他要是劝她把烟戒了就好了。他一直都为此而谴责自己，自己为何没有这么做，因为他当初考虑，自己并无权力干涉她的生活、她的行为，而且她那小巧而极富女性魅力的指间夹着香烟的样子很像让·赛贝珂，非常可爱。可他从巴黎回来后几个星期，就无所谓地把博士袍脱掉，将它和一顶黑色的四角博士帽一起





挂到衣帽钩上，就马上开着他那辆旧河马牌汽车，脚上穿着凉鞋，开始了在北方的长途跋涉，他跑了一个又一个地方的工人委员会，参加了每一个地方的工党大会。尽管艾米尔在他们安息日坐在游泳池边一起喝着威士忌时常说他，你不适合从政，一个政治家绝对不能非常正直与真诚，一定不能够没有过失，而你既不是骗子，也不是妓女，更不会溜须拍马，你所有的政治活动都无助于你进一步向上发展。

劳依温回答道，或许我是做不了总理，可当劳工部长我还是很适合的，艾米尔闻言笑道，要想坐进沃尔沃车里，你需要握有它的钥匙，而你却只有河马汽车的车钥匙。劳依温平静地说道，劳工部长也不是不可以开河马车嘛。

艾米尔大度而爽朗地笑着说，这正是你的错误所在。尤迪特关切地看着他，带着很重的口音对艾玛努爱拉说，你的丈夫是一位理想主义者，这样的人现在已经没有了。而艾玛努爱拉却阴沉着脸，像是喝了什么酸东西似的说，哪里是什么理想主义者啊，他分明是在扮演上帝的角色。艾米尔提起了丹尼·科恩·班迪特，即那个“红色丹尼”，他那时在法国，领导着大学生们跟政府作对，劳依温带着极大的兴趣在报章上对他进行了追踪，因为他喜欢穿着圆领黑毛衣、有着一双炯炯有神的绿眼睛的他，尤迪特说，难道你们相信，这些个大学生，这些个沙龙里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几年后不会变成小资产阶级吗？

他们又谈起了社会革命之成功或失败的话题，劳依温微微一笑说，尽管如此，那个班迪特还是成功地达到了改善大学生和工人条件的目的，尤迪特说，革命的意义不仅仅就是取得产生革命的结果，革命的过程才是主要的，就像是社会显现的一个信号似的，表明了这个社会还没有失去清白和梦想。他想起来。就是在这时候，艾玛努爱拉从躺椅上突然站了起来，手捂着嘴向屋里跑去，尤迪特跟在后面也追了进去，她俩关门在卧室里待了一两个小时后，尤迪特才走了出来，她宣布道，饭好了，他们就进了屋，奥佛尔跑到艾玛努爱拉的跟前，她已坐在摆满各种好吃东西的桌旁喝起了葡萄酒，奥佛尔抱着她的腿问，妈妈，

你刚才为什么哭呀？她嘴一撮，在他的卷发上亲了一口，什么话也没说。劳依温坐到她的对面，也一个字都没说，免得让她再伤心，那时候她常常这样动感情，此刻他在心里想，她那时候是不是就把自己心里的话向尤迪特道出了，很可能她那时就已经对他感到很失望了，他们间已有小裂痕了，这些小裂痕可是人与人之间决裂的前提啊。

他算了算，自 1968 年的那个安息日至今已过去三十年了，正好三十年过去了，他想起，就在不久前，大概是在两个月前，奥佛尔和他俩人坐在阳台上的时候说过，那个班迪特在德国的某个电视频道上主持一个文学节目，尽管年龄大了，头发变得有些稀疏了，但还是以前那个红头发、急脾气的模样，他上身通常穿一件红色的西服，劳依温说，可惜在卡米尔收不到这个台，奥佛尔马上说，你要是想看，我给你录一两期，可劳依温像往常一样摆摆手说，不必了，不必了，当有人要主动为他做什么时，他总是这样，条件反射似的，可现在想起那过去没多久、却感觉好似很久前发生的那一刻时，他的情绪又低落了下来，当时奥佛尔还好好的，他又想起了那些令人伤心的话，我的儿押沙龙（基督教《圣经》中的人物，大卫王之宠儿，后因反叛其父被杀），押沙龙，我的儿！老天在上，我情愿为你而死，哦，押沙龙啊，我的儿，我的儿。他穿过乔治王大街，上面白色的人行横道线斑驳而凌乱地呈现在他的眼前，他掏出手帕，擦擦眼睛和额头，然后照直沿着布格拉绍夫大街往上向大海的方向走去，前面出现了一个陡坡，在阳光下泛着光，像是登山铁轨似的。

他从咖啡馆，从卖年轻人时髦的东西，卖妇女用品和眼镜的商店旁走过时，感到太阳在他的背后，从肩胛骨间钻过来，他胸前和腋下的衬衫湿透了，他的眼镜也从鼻梁上滑落下来。他看到远处的大海泛着银光，心里感到一阵轻松，可坡路还没爬完，呼吸却变得急促起来，嘴巴也越发地干渴了。但这时到了本-杰胡达路，海尔曼那时总按着德语的发音称它叫本-耶胡达路，他常在那儿的那个维也纳餐厅吃午饭，每次总是点那道酱汁肉排，有几次中午的时间，艾米尔跟他一起从离这





儿不远的银行下班，请他和艾玛努爱拉在那儿吃过饭。劳依温心想，不知那家餐厅还在不在了，他穿过本-杰胡达路，继续向前一直走到亚尔孔路，然后右转，走进新建的大卫王酒店旁边的阴凉地里。高大的大卫王酒店旁边紧邻的是丹尼酒店，它上面的几层看起来像是粉红色的天梯，后来他又走上了福里施曼路，然后是一个陡坡，陡坡的尽头是蔚蓝色的大海，那陡坡像是一下子滑进了大海似的，阿丝图尔酒店，当年他们就是在那里举行的婚礼。他还记得艾玛努爱拉穿的那件缎子短装很白，她穿着高跟鞋，细滑的踝骨裸露在外，还有她透过新娘的披纱向他投射过来的微笑。他还记得优雅漂亮的露特和海尔曼被婚礼感动的样子，还有他的父亲，他非常自豪地穿着他的礼服，带着那顶自己买的礼帽，他的母亲则从她的新衣服口袋里抽出那条男人用的格子手帕，激动地抽泣着，婚礼仪式过后，他跟犹太法师热情地握了握手，艾米尔用力地跟他拥抱，一边还拍拍他的肩，尤迪特则用她那香气四溢的脸亲了亲他的双颊。

这时已到了亚尔孔和马普路的交叉口了，奥佛尔的阳台就在第三层上，他口干舌燥地上了楼梯，心里扑通扑通地跳个不停，他手扶栏杆，两级并作一步地爬上楼去，到了门边他站了一会儿，以稍稍平息一下急促的喘息，他把放到门铃上的手又抽了回来，而后又急急地去敲门，他屏住呼吸，等了一下，就又去敲，敲门响声更大了些，完了听听里面的动静，可什么也没听到，就自言了一句，他不在家。他遗憾而又轻松地转身打算离去，下了几个楼梯时，身后却传出开门声和儿子吃惊的喊声，爸爸？是你吗？我从猫眼里没认出你来，他重又转身上楼，一边仔细地打量着站在门边的奥佛尔，他赤脚光着膀子，瘦弱的身体只穿着条运动裤，指间夹着香烟，他说了声，进来吧。

劳依温走进门里，脱口问了一句，你一切都好吗，身体好吗。奥佛尔吃惊地答道，我身体非常健康，可你看起来不太好，我给你拿点喝的来。劳依温摆摆手说，不需要，但奥佛尔还是去了厨房，他听到冰箱被打开发出的声响，然后是倒水声和冰块发出的叮叮声。一会过后，他才

发觉，这屋里传出的声音其实是他自己的声音，他看了一眼电视机，看到上面是自己正说着话的面孔，他坐到一张凉凉的黑皮沙发椅上，看着电视上的自己紧握着双手说，就像除掉老鼠一样，他把他们给杀死了。

奥佛尔端着两只装满水和冰块的杯子走回这间屋来，他将其中的一杯递给他，有点不好意思地说，我正在看调查来的材料，尽管我看了录像上的你，可在猫眼里，我还是没认出你来，很有意思，是不是？劳依温说，没关系，突然奥佛尔两手抱着头说，我真是个白痴，我想你不会一大早就跑到那个十字路口等我的。劳依温疲倦地点了点头，喝了一口水。奥佛尔说，我晚上跟学生们一起拍片子去了，我们今天不拍了，我忘了告诉你了，很抱歉，你一定给我打过电话，一个小时前，我睡得跟个死人似的。我希望，你可别因为我的失约而耽误了重要的事情，劳依温又说了一遍，没关系。他很快地看了一眼儿子，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够放下心来，奥佛尔看起来很健康，没什么不正常的，可到底什么叫正常什么叫不正常呢。他几乎要脱口问了，你有没有一个什么人，一个女朋友之类的，可说出口的话却是，我在特拉维夫时我们可以接着拍摄。奥佛尔说，我还真是有几件事要问你，但我现在不得不出去见个人，你可以待在这里休息休息，冲个澡，我给你一条毛巾。

劳依温摆摆手拒绝道，不必了，但话却没说出口，奥佛尔向他弯下腰来，看了一眼他的手表说，才十一点啊，我还有点时间，我们能够干完活的，我打个电话，就说迟点再过去。他进了另一个房间，劳依温极力想从他们的对话中听出些什么来，好像让他知道了电话那头到底是男是女的话，那么他心里就一切都明白了。他的眼睛紧盯着面前屏幕上自己的脸，边说边用手比画着，手指头好像在理着思路似的，看着就像是在给某位听众递送一个杏仁或是葡萄似的，头发稀疏灰白，长着一个鹰钩鼻子，鼻子边直至嘴巴的地方有两道深深的皱褶，小眼睛像是装在袋子里的两只蓝颜色的球，藏在厚厚的玻璃镜片的后面，光线强时镜片会变暗。眼镜架不久前他用胶水刚刚粘过，为保险起见还用





橡皮膏缠了几道，自己以前一直引以为豪的白牙，如今也变得像旧钢琴键似的发黄了，前面缺了两颗磨牙，上排和下排各掉了一颗，哈雅总催促他去看牙医，让医生给自己安个齿桥，还叫他去买副新眼镜，说如今眼镜的式样都很漂亮，金属架，薄镜片，即使高度散光的人也不用带厚厚的瓶底似的眼镜了，去理个发对你又没坏处，太不讲究了也不好。他总是摆摆他的手，意思说不必了，多浪费钱啊。这时他拿起遥控器，将录像画面转到电视上来，他不断地揿按钮，直到电视机上显现出五频道来。

他看了看播报的简短新闻，这时奥佛尔拿着摄像机回到客厅里来，他坐到对面的沙发上，边安装录像带边问，家里怎么样，本尼和乔纳森都好吗？劳依温说，好，都很好，奥佛尔又说，你们马上就要选举了，劳依温说，是的，就在下个月，心里迟疑着是不是该跟他讲自己退出选举的事。除了哈雅，他谁也没有告诉，就连她，他也只道出了一半实情，即，他们很显然试图劝他提前退休，现正等他做出决定。这时他开口说道，自我从事工会工作以来，前后一共经历了七位总书记，我在阿哈龙·贝克尔任上就开始干了，在他之后干过总书记一职的还有本-阿哈龙，迈舍尔，卡塞尔，哈贝非尔德，拉蒙，还有佩雷斯，现在只有我还在干着老本行了。奥佛尔不禁大笑起来，他说，你是最后一个莫希干人了，劳依温笑了笑说，是最后一个了。他非常突然地说道，说话的时候极力地保持声音的镇定，别人试图动员他提前退休，奥佛尔吃惊地看了他一眼说，让你？没有你他们怎么能行呢，劳依温摆摆手道，他们能行的，他们已经行了，海里的鱼儿多得是。奥佛尔的眼睛一下子就湿润了，他说，你自己怎么能行呢，劳依温盯着地毯上的菱形图案回答说，我向他们提议，以志愿者的身份继续干，或许上半天班，可还没有得到答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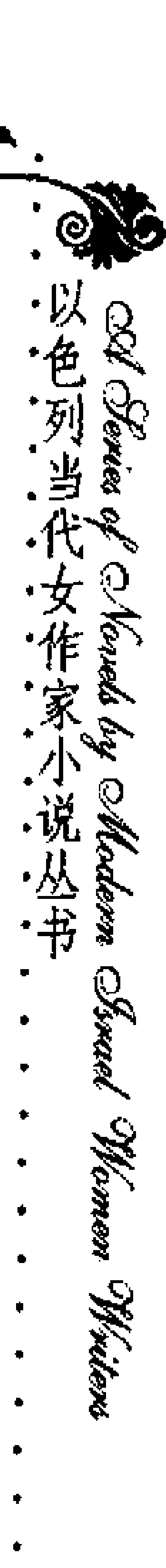
奥佛尔没再说什么，而是从桌上的烟盒里抽了一支烟出来点着。劳依温不禁脱口说道，你必须把烟戒了。奥佛尔再次以同样吃惊的语气看着他说，哪那么容易。劳依温声音哽咽地说，你母亲抽起烟来就像是个大烟囱似的，我当时从未说过她一句，我出去开会的那些个晚上，

她总是坐在家里吃饭的那个角落不停地抽烟，我要是劝她戒烟就好了。可奥佛尔打断了他说，行了，爸爸，你没有责任，劳依温这才住了口。他将目光集中到挂在电视机上方的一幅海报上，《铁丝网》，这是那部电影的片名，上面还有制片、摄影(是奥佛尔)和导演的名字，他知道，这就是那部描写大屠杀第二代人的影片，它曾在德国得过一个奖。他突然冒出了一句，她是一位高尚的女人，你的母亲，奥佛尔有点吃惊地看着他说，生前是的。

劳依温说，什么？噢，是的，是的。说完他看了一眼奥佛尔问，你还记得，我们以往总是去斯特拉·马里斯的灯塔那儿，还记得我曾给你讲过的那个奥德修斯之旅的故事吗？奥佛尔点点头，我记得，劳依温说，我总认为你会回来的。奥佛尔低头看着摄像机说，我从没离开过你，劳依温说，我那时候没有钱，你知道吗，我连给车加油的钱都没有，我挣来的所有的钱都给了你妈妈，给了哈雅，还有还了贷款。奥佛尔抬起目光跟她一样锐利的绿眼睛，他说，你要是告诉我的话，我会乘大巴去看你的。在假期里，劳依温像是自言自语地说道，我自己几乎都维持不了了，我也不可能给你什么，他勉强笑笑继续说道，不管怎样，你过得还很不错，是吧？



奥佛尔阴阳怪气地笑道，我那时有一位很好的心理医生，他用更刻薄些的语气补充道，也是全市最贵的。说完他吸了吸鼻子说，不早了，来吧，我们开始干活吧。他低下头看着镜头，劳依温这个时候发现，儿子金色的卷发里已有了白发，心中不禁好一阵翻腾，他眼里看着这一切，心里却在自问，不知奥佛尔是否明白，人年纪轻轻的时候开端良好，但并不能保证以后的情况都如此，他会有实现不了的希望和梦想，也会有一些梦想成真，而后又破灭了的，人必须学会放弃和满足于现有的东西。奥佛尔打开摄像机，想问问当时那个夜晚的情况，当爱高茨号轮船遭遇风暴的当时，他是不是也在海滩上，可他却打住没问，而是说，我想问问你在执行任务期间的日常生活，谁是你的朋友？劳依温说，我没有朋友，他们将我们每人分在一个区，并禁止我们跟老乡往



来，我唯一有联系的人就是艾米尔和尤迪特，安息日我总是去他们那儿吃晚饭，他们对我来说就像是家人一样。奥佛尔说，那跟女人的关系呢，你毕竟还是个年轻的男人。

劳依温几乎要问出口，那你跟女人的关系呢，可还是说，我们连去找妓女都不允许。奥佛尔问，那你晚上都干些什么，那些时间你是怎么度过的呢，总这么独自一个人待着，人是会变疯的。劳依温答道，我去看电影，巴黎所有的影片都可以到卡萨城来放映，那时正是"新浪潮"兴起的时候，而那些个孤独的长夜，他看过的那些色情杂志，还有他对艾玛努爱拉的思念，他都绝口不提，而是笑着说，我本人还曾装扮过一个妓女呢。就像他事先计划好的那样，他讲述了拉巴特皇宫海滩上发生的事情，他说他带着黑色的绣花面纱，把钱藏在胸罩里，在当晚与警卫大队长幽会的情形。他还讲了艾米尔站在礁石上，他高大的黑色剪影就像是一只灯塔似的，他拿着灯用莫尔斯码给他发信号，奥佛尔笑得眼泪都流出来了，脸庞红红的，跟艾玛努爱拉一模一样，眼角周围的皱纹如同四射的太阳光芒。他笑着说，我很想见识见识你打扮成妓女的样子，这真是一个非常好的故事，我得把它安排在续集里。然后他突然吃惊地说，我约会要迟到了，你可以待在我这里休息一下，冰箱里有吃的东西，要是走的话，把门带上就行了。他走进淋浴间去换衣服，当他再回到客厅里时，看见劳依温坐在沙发椅上睡着了，他两腿叉开着，双手交叠放在自己的小腹上，脑袋耷拉着，下巴贴在胸前，嘴巴大张着，眼镜滑落到了鼻尖上。奥佛尔在他的身边放了一条毛巾，然后就轻轻地向门边走去，这时劳依温的声音却追了过来，来看看我们吧。奥佛尔转过身来说，我会去的，劳依温又加了一句，你也可以带个人来，一个朋友，男的女的都行，晚上家里可以住得下，有的是地方。奥佛尔笑笑，手在身后告别似的挥了挥，就关门走了。

劳依温听见拖鞋踏在楼梯上发出的吧嗒吧嗒的声响，他起身离开沙发椅，尽管只打了几分钟的盹儿，但感觉清醒多了，也感到轻松多了，他走进卫生间，解了个小便，洗洗手，洗洗脸。当他再回到客厅里看

见那条毛巾时，就自语道，只用一次太可惜了，他来到阳台上，紧靠在栏杆边，摘下眼镜，让风吹干脸后又重新戴上，眼睛凝望着大海，心里想，自他们搬到卡米尔去住后，就再也没时间去海里去游过哪怕一次泳了，只有很少几次，他带乔纳森去过阿卡和纳哈里亚的海滩，或许他该下去游个泳。

之后他转身又进到屋里，感觉有急事似的，可也搞不清楚自己到底有什么事情要办，他坐到椅子上，闭上两眼，马上想起来他是要找电话机，他给法院打了个电话，找了奥丽，奥丽说，沙非尔律师，我刚才还在为你担心呢，没什么事吧？劳依温说，没什么事，您能让我跟阿维娜丽法官通个电话吗？奥丽说，如果是有关那个阿拉伯人庭审的事情的话，那她已把它延期到七月十日了，在放假之前，他感到自己就像是如临深渊，很想说，我七月十日是不会再去了，可说出口来的却是，谢谢你，奥丽。然后就挂了电话，他在脑子里马上把其他律师的情况梳理了一遍，其中有老律师也有新律师，考虑来考虑去，看谁能代替他，来担任这场毫无希望的官司的律师，可竟然一个人也找不出来。

他环顾了一下四周，眼光落在了黑色皮沙发上方的那张很大的黑白照片上，照片上是一个金发姑娘的面容，丹凤眼睛闭着，手放在一个非洲的面具上，他想起来这是蔓·蕾的一张照片。对面靠墙放置的松木书架上摆放着一些书、录像带和光盘。他站起来，朝卧室里看了看，他来的次数很有限，卧室里从来没看过；那张双人床上铺着一个花床罩，两边各有一个床头柜，他心想，另外一个床头柜是给谁用的呢，他几乎都想看一眼抽屉里到底放了些什么东西，看看里面有没有诸如避孕套、特别点的护肤霜和色情画刊之类的东西。可临了觉得偷看儿子的东西很可耻，就看了看床边墙上的电影海报，电影的名字叫《第凡内早餐》；奥黛丽·赫本很瘦很漂亮，面带纯真而灿烂的微笑，长而尖的手指间夹着一根香烟，戴着长及肘部的手套。之后他的目光又转到了那两扇无声的衣柜门上，这同样看不出有什么异样来，最后他又回到客厅里来，在书和光盘里翻看了一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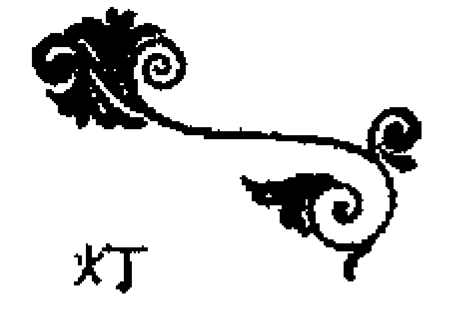


在书架的最下面一层里，他找到了几本外面套着彩色塑料封皮、里面装得鼓鼓囊囊的相册，他抽出一本来，坐到沙发椅上从第一页看起。这是他和艾玛努爱拉微笑着站在奥佛尔小床前的一张黑白照片，他那时带着一副黑色的方框眼镜，那还是艾玛努爱拉在巴黎给他挑选的，她穿着一件紧身套头毛衣，高耸的胸脯很显眼，他用胳膊揽着她的肩，他的喉头哽咽了一下，这么年轻，真是非常的年轻。后面的也是奥佛尔童年的一些黑白相片，一个头发卷曲、笑容满面的婴儿坐在童车里，艾玛努爱拉身着迷你裙，正俯身用勺子喂他，光光的大腿很扎眼，奥佛尔兴高采烈地骑在他的肩上，背后是位于马萨达路自己父母的住房。奥佛尔身着魔术师服装在阿胡撒的家门前拍的相片，灵光节第八天在幼儿园拍的相片，头顶的上方挂着一只纸灯，奥佛尔在巴特-嘎里母沙滩的海水里趴在他胳膊上戏水的情景，奥佛尔和艾玛努爱拉与海尔曼及露特的合影，背景是一只白色的鲸鱼，还有一张他们的合影是在特拉维夫老动物园的海豹池边拍的。

劳依温口中有股咸咸的味道，他咽了一下口水，接着翻开了另一本相册。这本相册上的相片都是彩色的了，而奥佛尔也已经不小了，十一或十二岁的样子，在擦哈拉屋前的草地上，他俯身对着生日蛋糕吹蜡烛，艾玛努爱拉则带着漂亮的微笑站在他的背后，另一个男人揽着她的肩，后面还有他跟他的小妹妹诺娅及那只牧羊犬的合照。他一时间使劲地想记起它叫什么名字。最后才想起来，他压根儿从来就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还有在成人受戒礼上的照片，有很多客人围坐在他们在擦哈拉家院子里的桌旁，他认识其中的一部分人，他与艾玛努爱拉的亲戚和朋友已没有来往了，尽管有几个他俩共同的朋友愿意与他保持接触，可自从离婚后，特别是他认识哈雅后，他不自觉地在时间和周围人上都进行了明确的划分。

有那么一会儿，他好像看到了艾米尔的那缕白发和尤迪特那头浓密的金发，他俩坐在照片上靠后的一张桌旁，他把眼镜推到脑门上，将照片拿近来看，可这两张脸被别人挡住了，他自言自语道，这是不可能

的，这肯定是另一对长相有些相似的夫妇。他忽然想不起来自己到底是否参加了儿子的成人受戒礼，心中一直惶恐不安，后来还是想起来，自己去教堂参加这个仪式了，并且当奥佛尔当众念完他的那一段摩西法典后，劳依温还接着说了一句老套的话“感谢上帝，使我解脱了对这个孩子的罪应负的责任”时，奥佛尔当时还狠狠地看了他一眼呢。后面是他跟他的同学们参加学校组织的游玩和与其他童子军孩子们的合影，还有与全家人去意大利旅行的照片，艾玛努爱拉，那个男人，奥佛尔，还有诺娅，一起在意大利维罗纳广场旁的一家餐厅里，在威尼斯圣·马可广场上喂鸽子，乘坐冈朵拉，高中毕业典礼上与那个男人的合影，那个男人骄傲地用他的一只胳膊搂着奥佛尔，剩下的是在新兵训练结束仪式上拍的照片。奥佛尔当时邀请他去参加这个活动来着，这他还记得，可他想不起来自己为什么没有去，要么是工作脱不开身，要么是他们那天晚上有其他的事情，可能性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不清楚那个男人是否也在场，自己不想跟他碰面。



在另外一本相册上，他看到了奥佛尔出国旅行的照片，他身穿红色的滑雪服，地面上到处都是雪，周围是一群年轻人，他很想找出其中跟他关系似乎特别亲密些的某个姑娘或是小伙子来，可是他们看起来跟他都一样亲密，他继续往下翻，翻到了近些年来的一些相片；奥佛尔站在摄像机的后面，周围是他的学生，奥佛尔站在德国的领奖台上，那不是在慕尼黑就是在斯图加特，也可能是在柏林，是在他的影片第一次获奖的颁奖仪式上。

这可是一生的光景啊，当他合上放在膝上的又厚又重的相册时心想，整整一生啊！为什么过去常觉得自己像是一个被别人抢去了家庭、被赶出了家门的人呢！然而此时此刻他第一次有了这种想法：他自己渐渐地被自己的儿子，同时被海法这座城市，被他所热爱的大海驱逐了，自拉宾遇刺以来，他感觉自己像是在一个听不懂其语言的陌生国度一样，遭到了党派的驱逐。还有一本紫色封面的相册，劳依温费劲地将它抽出来，看到里面的透明玻璃纸下，贴着的是他及艾玛努爱拉举



行婚礼的相片，还有他们与艾米尔和尤迪特一起去里维埃拉海边和巴黎游玩时的照片。他们四人都在上面，在波拿巴咖啡馆里，这张相片很可能是请服务员拍的，这有一张他和艾米尔身穿长大衣，站在巴黎凯旋门前的照片，还有一张是艾玛努爱拉和尤迪特在卢森堡公园里的小池塘边吃冰激凌时照的，这张是艾玛努爱拉，她身穿条纹连衣裙，戴着猫眼太阳镜，走在尼斯的一条小径上朝他笑着，这张是他们四人一起在双马车里拍的，他们站在敞篷车顶口，向外招着手，背景是一片大海，他想，老相册原本都放在艾玛努爱拉那儿的，这些相片一定是奥佛尔在她去世后拿来贴进新相册的。

无论如何，这些年来这些相片都是她保存的，他像得到安慰似的自言道，无论如何，所有的照片都是她保存着的。他将相册放回到书架的下层上，想着要小心地保持原来的顺序，他的目光无意中触及到了一堆录像带上；在一些老影片和从电视上翻录下来的片子旁，他发现了几盒上有手写字迹，很显然是奥佛尔字迹的录像带：《外婆露特的惊喜聚会》，《诺娅的聚会》，《妈妈的生日》，他急忙抓起后一盘录像带，把它放进了录像机里，倒带，打开电视，然后坐到沙发椅上，画面是擦哈拉家中的客厅，镜头里出现了艾玛努爱拉的女友们，她们坐在沙发上，他还记得其中的一两个人，此时镜头正对着坐在沙发椅上的艾玛努爱拉，他非常吃惊她的变化，在她病中及之前的那些年里，他都没再见过她，离婚之后，他俩见面次数很有限，结果她留给他的记忆，还是他俩在塔亚蒙咖啡馆见面时他对她的印象，也就是俩人结婚头几年里她的模样，当他看到她脸色发黄，面颊深陷，原本清澈的绿眼睛变得浑浊而又疲惫不堪，胸部塌陷，脖子上满是皱褶，虚弱的身子上着一身节日的盛装，胳膊很细而腿却很粗肿，只有满头的金色卷发依旧，他马上意识到，她头上戴的是假发，艾玛努爱拉那天已经病得很重了，那个生日是在她死前两个月的时候过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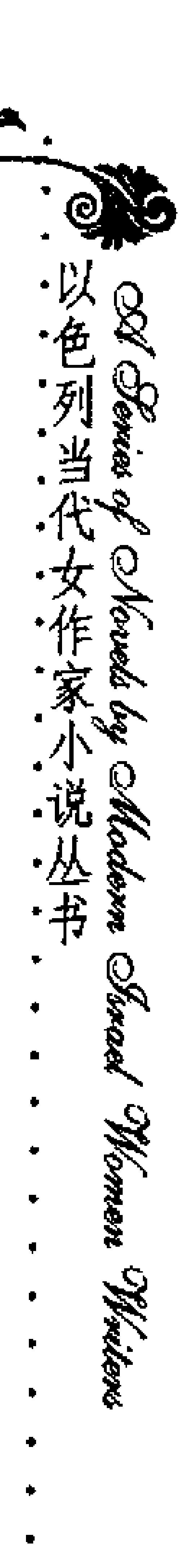
她用手托着下巴，吃力地想跟上她那些女友们聊天的节奏，她们也都尽力地让她感到好像一切如常，间或她会点点头，并不知道奥佛

尔在拍她，这时，后面响起了《祝你生日快乐》的曲子，镜头转到了厨房的门口，那个男人和诺娅走了出来。诺娅端着点着蜡烛的蛋糕，红红的烛光映照在她的脸上，她的脸跟她的母亲是如此的相似，也是长长的金色卷发披垂下来，俩人都朝艾玛努爱拉微笑着，而此时只听她说了句，太让人意外了，你们可得帮我把蜡烛吹灭了，我的肺活量哪能跟运动员比啊。蛋糕被放到了客厅的桌子上，那个男人说，三、四，预备齐，大家都使劲地吹蜡烛，除艾玛努爱拉外，她呼吸急促，远远地好像在微微笑着，突然她发现了奥佛尔在拍她，就朝着他的方向摆摆手说，你在搞什么鬼？她大笑着说，别拍我了，等我好了你再拍我吧，我求你别拍我了，她突然用手捂住自己的脸哭了起来，我这是怎么了，我作了什么孽了，让我遭这么大的罪？她瘦骨嶙峋的肩头随着哭声一起颤动着，奥佛尔那时候打电话给劳依温，告诉了她去世的消息时，他未曾掉过眼泪，参加她葬礼的时候人也只是木木的，而此时此刻，眼泪却模糊了他的视线，并顺着他的脸颊往下流。他摘下眼镜，伤心地用手捂着脸，哀伤传进了他的胸，他的腹，乃至进入到了他的五脏六腑里，他哭得声嘶力竭，嗓音沙哑，为她和奥佛尔，为过去了的所有的时光，为那次走过的里夏维亚街区，为他曾经拥有而又亲手葬送掉的东西，为那个男人，为她被病魔毁掉了的美丽，为她无法治愈、痛苦不堪的疾病。

哭声渐渐弱了下来，这时候，他抬起头，戴上眼镜，透过镜片，看到屏幕上跳动着的是一片黑白雪花点，这才意识到是片子放完了，因为奥佛尔答应她的请求停止了拍摄。他关掉电视，进了浴室，将水龙头开得大大的洗了个脸，却将衬衫溅得透湿，洗完脸，他走出浴室来到阳台上，让风吹干自己那张还热辣辣的脸，嘴里还是有一股咸味，胸口因痛苦而变得很郁闷。你得走了，他自语道，你得走了，可他不知自己下一步该何去何从。

他回到客厅里，环顾了一下四周，看是不是把所有的东西都按原样放好了，之后他走到门口，打开门走了出去，将门在身后带上后就下了楼梯，当他到了楼下，这才想起，自己忘了把带子从录像机里拿出来





了。他很害怕让奥佛尔知道了，但转念又想，这有什么关系，忽然又记起，自己那只用橡皮筋捆着的咖啡色公文包也忘了拿了，里面装的是阿布·扎哈尔的庭审材料，就又说了句，没关系，我可以让奥佛尔寄给我，到七月十号还早呢，这时他想起来，七月十号是他六十一岁的最后一天。

塞王的歌声

他转身朝着旅馆方向，走下通往海滩小径的阶梯，从几家咖啡馆和冷饮店经过，里面几乎没什么人，他沿着岱恩旅馆的那堵马赛克彩墙继续往前走，他一边走一边想，在他的记忆中自己还未曾哭过呢，小时候也没哭过，而近几个月，眼泪就像渗出地表的水珠似的常常涌出他的眼眶。他又想了想，是不是可以脱掉衣服，到海里游个泳，心想，自己又不急着要去什么地方，哈雅知道他在耶路撒冷，还知道他要晚些回去。他看看通往海滩的阶梯，然后走了下去，一直走到水边，深深地吸了一口咸咸的海风。海面很平静，只有一些地方漂浮着些白色的泡沫。近距离看，大海的颜色是灰绿色的，他心想，北部的大海，比如在海法、阿卡，还有纳哈里亚的海滩，大海的颜色看起来要更蓝些，都近乎紫色了，这让他想起了艾玛努爱拉的眼睛，其颜色随着她的服饰和情绪而发生着变化，有时是松石绿的，间或也呈灰绿色。他环顾四周，高兴地发现，海滩上几乎空无一人，许是高峰期尚未到来的缘故。

只在远处的地方，在海滩餐厅前，零星地有几个人躺在蓝白两色相间的垫子上，而后面，在两块海水浴场之间的那个空地上，有个男人躺在一块浴巾上，他的身体被太阳晒得发红，脸上盖着一本外国杂志，封面照片是克林顿总统那张红红的笑脸，这让人感觉躺在那里晒日光浴的就是克林顿本人。他想，自己穿着内裤下水游泳，不会引起旁人注意的，他坐到地上，先脱掉鞋袜，然后又脱去他的衬衫、内衣和他的那

条黑裤子，他把它们团在一起，心里有点不放心他的钱包。但又安慰自己道，这里没有其他人，钱包不会被偷走的，还暗自庆幸自己把公文包忘在奥佛尔那儿了，因为要是带了公文包的话，他会非常担心，怕弄丢的。他看了一眼自己那条洗得发白的灰色棉内裤，心想，它远看或许像是一条游泳裤吧，他拿下眼镜，摘下手表，把它们分别放进两只鞋里，每只鞋口都用一只袜子塞上，又把团起来的裤子盖在鞋子上，以免沙子进到鞋里，上面又盖上他脱下的内衣，最上面盖的是他的白衬衫。他想，这看起来就好像是漂泊到某个荒岛、等待救助的一个什么人留下的一堆衣服，他使劲地用脚踩踩地面上坚硬而晶莹的沙子，一边眯缝着双眼，眼前的大海有点模糊不清，可它看起来是那么的慷慨大方，似乎向他发出了邀请，他感觉到了海水的清凉和白色泡沫在他的脚趾间消散开来了。他像年轻时在巴特-嘎里母那样，纵身一跳，跃入了大海，手脚急速地划动着以使身子暖和起来，他向前游去，享受着周身海水的清凉，品味着迸进嘴里的咸水滴，肌肉的力量和辽阔自由的感觉令他兴奋不已。

当游的足够远时，他停了下来稍作休息，这时候，他眯起两眼，仔细地看着海滩边那个城市的轮廓，它也像大海一样，斑斑驳驳的有些看不清楚，但却非常漂亮，有白色的旅馆，有供人漫步的小径和停泊游艇的小港，桅杆左右摇晃，像是人在做祷告一般。那家叫岱恩的旅馆有一面绚丽灿烂的马赛克墙面，那家大卫王旅馆和那个圆形的高塔，塔上的两个大露台，好似两个螺旋向上，通往天际的大台阶似的，还有那个灰色的新塔，上面的几层被粉刷成刺目的粉红色，看起来也像是通往上天的云梯一般，这些显然都是特拉维夫风格独特的新建筑，他在心里这样想着，远处的山岩上，可以看见雅法城的灯塔，以及教堂的尖塔和婆娑的棕榈树冠，他转过身来背对这些，继续向大海深处游去，这时，他感觉到了自己心跳加快发出的咚咚咚的声音，脑子里突然冒出一个念头，要么就这么一直游下去，直到精疲力竭，一首歌的歌词——这是他在广播里听到的，低低地回荡在他的耳边，葬身大海，葬身在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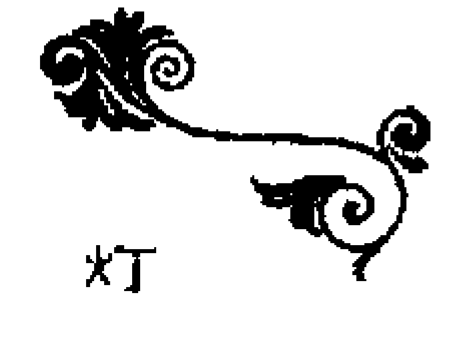
海的波涛里让人畅快，全部的歌词他不记得了，他也不记得是谁写的、又是何人唱的了，只这一句歌词总在耳际回旋。他想，自己在工会的工作实际上是完成了，而之前的那些年里，自己是徒劳无益地虚度过来的，人在慢慢地老去，加之疾病的困扰。自己曾得过一种血栓病，跟父亲一样，他曾在一家护理院住了很久，真的再没谁需要他了，奥佛尔和本尼都已长大成人并独立了，哈雅和乔纳森也会习惯没有了他的日子的。他的补偿费，养老金，还有退休账户里的一些钱以及哈雅的收入足够他们生活的了，二十年前借贷的那笔建房款不久前他也全部还清了，或许现在就了结了自己更好，在自己意识尚还清楚的时候，在这一片他从小就喜欢的蓝色中。他想想觉得好笑，自己留给奥佛尔最后的纪念，那个他讲给他听的故事，那个自己装扮成妓女的故事，被摄入镜头留了下来。他想，自己一生无论怎么说是做了一些事的，没什么可后悔的了，该走的时候就得走了，就像艾米尔那样，他很会生活，懂得人应当及时行乐，他就是在五十六岁的时候，心脏一下子停止了跳动，艾玛努爱拉也是在这么大岁数的时候去世的，可人却遭受了很大的罪。他用力继续往前游，人有点兴奋，一边还在考虑着，一个人在其生命的最后时刻，总要把他的一生在脑子里回忆一遍的，准确地说，他在这一整天里，在无意中就这样做了，他知道，哈雅到了晚上见他还没到家，一定会感觉不安的，她会给奥佛尔打电话，他们都会去找他的，即使他的尸体天黑前不被冲到海滩边，他们也一定会找到那堆衣服的，里面有钱夹和各种证件，到时候，他们什么就都明白了。

突然地，那个上午在报上看到的星象命理在脑中涌现了出来：感受一种悬浮的状态并有一种计划外的感觉，今天可能发生令人意外的事情，他几乎笑出声来。可马上想起来，那张报纸是昨天的。忽然他感到胸部一阵刺痛，立刻惊恐地联想到了心脏病，我会在这里犯心脏病，似乎有个什么人在监视着他的动作。他转身掉头，开始往回游，不顾胸痛，疼痛又蔓延到了背和他的一只胳膊，他只拼命地划着水，可是距离海滩还很远，而他却越来越感到没力气了，突然他感到有一股吸力，这

股吸力阻挡了他，使他无法前进。

一时间他的大脑里浮现出爱髙茨号轮船上那些人的情景，他们可是跟风浪搏斗了好几个小时啊，直至风浪平息了下去。他犹豫着，是不是要示意求救，或许那个救生员发现他了，可一想，等到此人看见他，再赶过来，为时可能已晚了，最好还是别引起别人的注意，只当是自己进入了一片禁止游泳的水域。他继续使尽全身的力气拼命地划水，他感觉自己一生中还从未这么使过劲呢，自己好像不是在水中，而是在某种固体物质里，在土里，或是在钢铁里游泳似的，他尽力不去想胸痛的事，而是专注自己向前划水的动作。一，二，呼吸，一，二，呼吸，他闭着眼睛，却分明看到了乔纳森满脸嬉笑，他拿着那把钢制的发刷，一只耳朵上戴着个耳环，他在心里和着自己呼吸的节奏不断地喊着，乔纳森，乔纳森，过了一会儿，当他再次朝旅馆方向看时，那些建筑似乎变大了，也变近了些。他想，胸部的疼痛还是那样，并没有痛得更厉害，他不假思索，动作自然地继续往前游，他相信自己的身体能扛得住，快到岸边时，他的胳膊不再划水了，而是靠着海浪的推托向前游去，他双臂向上伸开，两腿紧夹，在大浪里紧闭着眼睛和嘴巴，屏住呼吸，这样一遍又一遍，直至抵达风平浪静的水域。他站起身来，摇摇晃晃地走到沙地上，气喘吁吁四仰八叉地躺到坚实的平地上，嘴巴和嗓子里咸得冒烟，整个人就像是获救船只上的遇难者。

他在那儿躺了好一会儿，直到呼吸不再急促，胸部的疼痛渐渐减轻，他想，这可能不是心脏病发作，而是横膈膜肌肉被拉伤了，那块肌肉因为突然用力和受凉而出现了痉挛，他会继续在这儿躺着，一直等到疼痛完全消失了为止。这会儿工夫，要享受享受习习的微风和阳光，让太阳晒干身上的水珠，他心想，情况还好，是自己恢复了理智，也是自己救了自己。他又想起了多年前答应过奥佛尔的话，我要像我父亲的祖父一样活到一百零五岁，他叫罗博·鲁本，是个矿工。他暗暗发笑，为什么不呢，我绝对能活到那个岁数的，他算了算，等到他一百零五岁时，乔纳森就五十八岁了，很可能连他自己都抱上孙子了。



他思忖良久，然后翻过身来，高兴地看到了那堆衣服就在距离自己头顶不远的地方，他伸手从鞋里拿出眼镜，丝毫没怀疑钱包和手表都还在那儿，他戴上眼镜，看了一下周围，发现那个皮肤红红的克林顿已经离开了，他还发现，离自己不远的地方有三个姑娘躺在花浴巾上，旁边放着布包，拖鞋和矿泉水瓶。中间的那位腿弯着，两膝微微分开，露出了大腿根处，那个地方看起来像是正对着两边橘黄色布片微笑着的两张笑脸似的，布片下有些金色卷曲的毛发向外探头张望着，他注意到，她的右半边屁股上，也就是盖着大块布料的那个部位上印着一个小美人鱼，她的那个身穿白色比基尼泳装、皮肤晒得黝黑的女友，脚踝上带着一只亮晶晶的小链子，上面还挂着几条小金鱼。青年人暂时还是无意识回忆自己的过去的，此时此刻，他身上涌起一股对年轻人的渴念，他又朝那个金发姑娘的大腿望去，感到自己的下面有些勃起，这马上让他既高兴又害羞。

那边另外一个姑娘长得很丰满，腿上满是雀斑，穿着上、下分开的蓝色泳装，她一直跟着那只黄色的随身听在哼唱着，她坐起身来，摘下耳塞，喝了口身边瓶子里的水，然后从包里拿出一个咖啡色的塑料瓶子，从里面倒出些白色的液体，抹到大腿和肩上。又碰碰中间的那个金发姑娘，对她说了些什么，那姑娘坐起来，从她手中接过瓶子，劳依温在心里忍住了才没叫出声来，是艾玛努爱拉，不，是诺娅，对，这是诺娅，长长的金色卷发，挺直的鼻梁，脸上有着红晕，跟他一两个小时前在奥佛尔的录像带上看到的她一模一样。

他用胳膊遮挡住面前的阳光，从下方看到诺娅倒了些防晒霜出来，用力地往她的那位红发女友的背上涂抹、他转身面朝大海，背对她们，坐在那里为自己由她而生的欲望感到汗颜，欲望尚未完全消退下去，他考虑着是否该走过去，提醒提醒她，让她知道自己是谁，顺便跟她聊一会儿。他会跟她说，他知道她妈妈生病的那些年里，她是怎么熬过来的，他确实感到很抱歉，他特别后悔的是，他那个时候没有说服艾玛努爱拉把烟戒了。她可能会问她母亲年轻时的情况，他会把他们在

塔亚蒙咖啡馆里约会的情形，他们的婚礼，还有他们的法国之行都讲给她听，他还会告诉她，她跟他第一次见到的她的母亲是多么的相像。当时他担任着学生联合会主席一职，而她还是个大一的学生，她来他的办公室反映情况，他忘了是什么事了，或许他还会跟她说，他去过奥佛尔那儿了，他在他那儿看录像时看到她了，他要问问她在干什么。他算算，她该有二十二岁了，很有可能还在上大学，他可能还要问她，学的是什么专业，将来有什么计划，他刚要站起来，却突然发现身上还只穿着内裤呢，就伸出手拿来衬衫穿上并扣好，心里边想着，衬衫边会遮住短裤的，幸好阴茎也消退下去了。他从坐着的地方站起身来，怀里像揣着面小鼓似的，咚咚地敲个不停，他走近那三个姑娘身边，她们好像睡着了似的，他心里斗争个不停，第一句话该说什么呢，他说了声，对不起，她们三人立刻起身，用肘部支撑着身体，那神情好似是，她们对这个海滩上的骚扰者早就习以为常了。

她们三个人都神情很不友好地看着他，他看了看那个胸部浑圆，长相好看，上身穿着橘黄色比基尼泳装的姑娘，然后向她走过去问道，你是诺娅，对吧？她努努嘴说，不，我是玛雅，那个红发姑娘说，我是诺娅，有什么事吗？那个剪着短发，皮肤黑些的姑娘笑笑说，我叫塞拉，你叫什么？劳依温慌乱地答道，劳依温，劳依温·沙非尔，你跟我认识的一个人很像，是朋友的女儿。那个皮肤黑些的姑娘说，看来你跟她不太熟吧；红发姑娘说，好像那个诺娅并不是你真正的好朋友的女儿吧，或许诺娅的父母是你来自棕榈国的朋友吧。三个人一起吃吃地笑着，中间的那个也在笑，他仍然不敢肯定她到底是不是诺娅，但他觉得自己必须问问，你母亲是不是叫艾玛努爱拉？

那个叫玛雅的诺娅答道，我的母亲叫哈雅，他想说，我的妻子也叫哈雅，但只抱歉地笑笑，说了声，那好，对不起，有时候认错人是难免的。三人就又躺下了，什么话也没说，三人同时都把眼闭上了，好像是接到了某个信号似的。他觉得他不能再在附近逗留了，无论如何该走了，他心想，该收拾收拾衣服了，去洗个淋浴，把身上的沙子和盐冲掉，





然后擦干身子穿上衣服，一会儿后他又想，是否去中央汽车站，从那儿乘车去卡米尔还是去其他什么地方。

在淋浴喷头下，他紧闭着双眼，水洒到他的肩头时，他脑子里才突然跳出一个念头来，或许那个就是诺娅，她不想让他认出来，或许是不愿意忆起他曾在她母亲的过去里存在过，或者是怕在女友们面前难堪，有可能她早就认出他了。就在他背对着她们的时候，她就跟她们讲好了，她们俩同意同她一起跟他开个换名字的玩笑，有可能黑皮肤的是玛雅，红发的是塞拉，她说她母亲叫哈雅，或许是因为她还记得他妻子的名字，他极力不去这么想，自言道，是又怎么样呢？他仰起头迎着水流，张嘴接了口水，他也不顾先前看到一个牌子上写着"淋浴用水，禁止饮用"的字样了，他可是渴极了，喝下水后，立刻感觉周身极度地放松，他的皮肤，尤其是脸上的皮肤很红，心想，自己看起来一定很不错，他仍然身强力壮不显老。

他关上水龙头，带着浑身的水珠，走到太阳地里，胳膊上下挥动做伸展运动，然后将两臂伸出，将手卡在腰际，左右扭动着他的上身，他一边舒服地扭动着，一边暗自好笑自己刚才臆想的那场心脏病发作和涌遍全身的巨大恐惧。他停下来站着休息了一会儿，眼睛沿着那条小径，从北边鳞次栉比的旅馆一直看到南面雅法的那个馒头似的小山包，他立刻明白自己该往哪儿去了，他等不得晾干短裤了，他穿上衬衫，让衬衫拖下来遮挡住短裤，就这样出发了。他从鞋里拿出表来戴上手腕，这时才吃惊地发现，时间不过刚刚两点半，他先前还以为不早了呢，他把鞋拿在手上，将裹着汗衫的长裤往胳膊下一夹，就抬腿向南进发了。

娜 西 卡

他从一个女人身边经过，这女人跟他年纪相仿，身材苗条，穿着热情似火的红色比基尼泳装，头戴宽檐草帽，她步履艰难而又坚定地向

前走着,他又从两个正在挥拍打球的年轻人旁经过。黑色的橡胶球打偏了,滚落在他的脚前,他将球捡起来,扔给其中的一人,那人接球做了个致谢的动作。后面看到的是一男一女两个小孩,男孩理着短发,女孩一头金发随意地扎在一起。他们衣着整齐,俩人在用沙子堆一个不知是宫殿还是城堡的东西,四周还挖开了一个水沟,他看着心想,可别踩坏了人家的东西,他继续赶着路,经过一片开阔的海滩,那里放着很多躺椅和遮阳伞,后面是"耶路撒冷海滨"餐馆。有两个瘦小伙,他们戴着细项链和耳环,躺在晒太阳的垫子上,其中的一个,胳膊上有手镯样的刺青,他心想,他们显然都很性感,而他的儿子可跟他们完全不一样,他从不戴耳环,他走过那家前面放着黄色塑料椅子的饭店,继续朝伸入水中、用石头砌成的防波大堤方向走去。

垂钓的人站在大堤的边上,一动不动地低着头,好像那天是大屠杀纪念日似的,那个日子照例是要拉警报的。水中冒出一个胸脯硕大、身材奇胖的黑发女人来,她身穿一件连衣裙,是天蓝色的,上面有着黑色的圆点,裙子湿湿的紧贴在她的身上,看到这些他暗觉好笑,心想,这可是费里尼电影里的出水维纳斯啊。他爬上岸边的防御工事,发现沙滩并没有往下面继续延伸到防波堤的那头,大海在那儿被一道石砌的墙劈成了两半,他知道他得回头了,就又沿着那条沙滩小径往回走。他弯腿将腿伸进裤子里,高兴地发现他的短裤已经干得差不多了,他把衬衫脱下,穿上了汗衫,又把衬衫套在外边,他走到水龙头那儿冲冲脚底板,以免让脚再沾上沙子,他站在那里摇摇晃晃,费劲地把袜子穿上,试了两次才成功,然后他穿上鞋,沿小径往上走去。小径的尽头是海豚表演馆的停车场,这地方几年前他带乔纳森来过一次,乔纳森可喜欢看海豚表演了。

过了停车场,他走上了小径的另半段,铺着粗石子的路面一段黑一段白,他看见自己的左边是那座修缮一新的清真寺,白色的圆顶上装饰着蓝色的图案,上面是细长的尖塔,清真寺后面是一排排白色的高层建筑,那是岱恩观景饭店和纺织大厦,大厦上无数的小窗子看起





来像是枪眼或是一个巨大鸽棚上的天窗似的。他在安有一些木制玩具的儿童游艺场旁停下脚来歇歇气，他在一块光滑的岩石上坐了下来，眼朝大海方向望去，心想，这个海域的风浪较之别处要更狂野些，闻起来还有一股咸咸的味道。他看到一阵大浪是如何慢慢地升腾、膨胀起来，很像是平滑的鲸鱼，紧接着泡沫像一位勇敢的滑水运动员似的从中嘶嘶地冒了出来，最后打到礁石上碎裂开来，他感到海水溅到脸上后给他带来一股清新的感觉，他瞄了一眼手表，发现快到三点了。

三点半不到，他就可以到达雅法了，他开心地想，我是去追寻一位比利时公主——一位前摩萨德女间谍，而后又不禁自问，不知道美术馆叫什么名字，自己是否能找到她的美术馆，她是不是还在那儿呢。突然间他想，自己无论如何一定要见见她，尽管十七年前艾米尔的葬礼过后他们就再没见过面了，这之前，在他与艾玛努爱拉离婚，与哈雅结婚后，他也再没去过她在海册里亚的家。他去特拉维夫参加工会会议之后，有时就跟艾米尔在他的办公室里见个面，那些神秘的进出口分公司都由这里领导，他想象那些年里尤迪特一定老了不少，他算了算她该有六十五六岁了，心想她是不是又结了婚，他打算问问她，三十年前在海册里亚她家安息日那天到底是怎么回事，问她为什么当时艾玛努爱拉哭了，她都跟她说了些什么，他相信，尤迪特有着间谍的记忆力，她该还记得的。

正想着，突然听到了一阵歌声，他看到一大群年龄各异的女孩子，有的还是个小小孩，有的则有二十来岁了，她们都身着颜色鲜艳的长裙，长袖衬衫和长袜，精神饱满地唱道："重要，重要的是，我们不畏惧，永远不畏惧"，他推测，这是群教会学校的女生，她们是在郊游。有几个女生拿着三明治和水壶，里头的黄色液体是橙汁或是柠檬汁，她们在他的四周，像是一群鹭鸶似的散落在一块块岩石和草地上，她们争先恐后地玩游艺机。这个时候他才刚刚发现，她们都是残疾人，有的是先天弱智，有的是肢体残障，还有些是驼背，她们或拖着不便的身体，或拖着老长的下巴，眼光空洞洞的。

她们的身后响起了女教师的声音，撒拉丽，李薇卡丽，黎丽，他想，她们穿着长衣长袜一定很热，可转而又想，她们反正已经习惯了，她们一定很高兴能到海边来玩，这次郊游打破了她们每天在家的那老一套生活，她们很可能住在保守的布奈-布拉克区或是住在特拉维夫。其中一个弱智女孩走了过来，坐到他的身边，她将一只塑料袋紧紧地挤压在自己的胸前，里面的杏子都被挤烂了，她黑黑的眼睛紧盯着他，结结巴巴、声音粗哑地问他，你叫什么名字？劳依温回答道，我叫劳依温，神情像是雅格布怀抱里刚出生不久的儿子似的。那个小姑娘忽然兴奋而流畅地冒出一大串话来，鲁本西蒙莱维犹大塞布依萨赫戴恩阿瑟纳福塔力何塞本雅明，她对他微笑着，他也对她报以微笑，嘴里说，好极了，好极了。不知怎么的他想起了阿布·扎拉尔和他的儿子来，他感到心里一阵刺痛，他站起身，对那个小姑娘说，我得走了，手在身后摆了摆示意再会，后来，他听到身后有人低低地说了一声，我叫麦尔卡，他转过头去对她又笑了笑，就迈开大步继续赶路了。

他从以前的地下组织艾采尔博物馆的建筑物旁走过，此建筑一半是自然的石块，一半是玻璃，他继续沿着小径前行，在通往雅法的大马路那儿，小径突然中断了，他就沿着这条马路继续前行，一直走到看见了那座钟塔，钟上显示的时间是一点五十，劳依温马上意识到是钟坏了。广场上空挂着一圈蓝白色的三角形塑料小旗，小旗在风中哗啦啦地响着，他想，这些小旗是为了庆祝独立日而挂上去的，之后一定是忘在那儿了，好像是有个人极力地想阻拦住时间的流逝，从而让欢庆时间延长些似的。他决定沿耶非特路向上走，当他经过鱼店时，看到牌匾上写着："渔人祖力的鱼新鲜极了，你想捞哪条就捞哪条"，这时不禁笑出了声。他并没停下脚步，而是又从几个鞋店和阿布拉非亚饼屋的门前走过，饼屋新鲜糕点的香味勾起了他的食欲，他犹豫着自己是否该买个芝麻饼吃，毕竟自早晨到现在，自己除在售货亭买了个三明治吃以外就再没吃过什么了，可小店前有人排着队，因此就决定不等了，还是赶紧赶到美术馆区去好些，所以他就继续沿着这条马路往前走，直





到看见了一条巷子。

巷子向右拐通往珍珠路，此路又将他带到了金匠路和一个公园山脚下的停车场，公园里长满了野草和棕榈树，从那儿，他看见了重新修过的雅法老城的石墙。他从一个蓝色拱形门前经过，门边的花盆围成一圈，里面都种着东西，有仙人掌、天竺葵和散发着一股香味的草药，在一扇有白色条纹的铁门上，用红笔醒目地写着："注意：请勿打搅！"他心想着，这告示是针对谁的，为什么要这么写，没走几步，他就到了一条上面盖有顶棚的小巷里，他知道已经到达美术馆区了。在一块蓝色陶瓷制成的牌子上写着："摩羯星座巷"，他走进巷子，注意地看着每个美术馆门上的牌子，因为尽管他并不知道尤迪特的美术馆叫什么，但他希望，可以从某个馆名上得到一些提示。他想了半天也没想起来，几年前到底是谁跟他说起过，尤迪特开了一家美术馆来着，也可能尤迪特现在已关闭了美术馆，并离开了这个国家，回到布鲁塞尔她的家人那儿去了。她在一个不是自己的家乡，不用自己的母语的国家里失去的都是什么啊，在这儿她没有丈夫，没有孩子，或者说没有家。突然他觉得自己真笨，他在那些巷子里转来转去，从双子星座巷转到金牛座再转到狮子座巷里，所有的美术馆都进去看了看，其中的大部分，里面经营的东西都是卖给游客的旅游纪念品，他看着那些东西，装作很想买的样子，而其实眼光却在搜寻着店主，店主们往往都冷漠地坐在古色古香的桌子后面，好像他们对买东西的人如此之少，对旅游业和政治的艰难状况已不抱什么希望了似的。

大部分店铺都冷冷清清的，玻璃柜里犹太人的一些用品与古董首饰堆放在一起，他在一个柜子里发现了一副象棋，棋子是象牙的，还带有一个棋盘，是装在一个贵重的小皮箱里的，他决定把它买下来，如果不是太贵的话，他想象着在安息日那天，跟沙罗母·科纳福一起下棋的情形，他肯定会说这副棋很漂亮的。他摸摸皮子，又将它拿到鼻子跟前闻了闻，然后指指那副棋问，多少钱？

那个银须、戴着一顶四角帽和一副圆眼镜的商人，嘴唇动都未动

地说，四百美金。原以为价钱不过一百或一百五十谢克尔的劳依温，吓得道了声谢就离开了小店，他想，价格这么高，都是因为旅游业不景气的缘故。他转身朝鱼巷走去，停下脚步站在"小巷剧院"旁，仔细地看着挂在门口玻璃框里的各种演出剧照。他看到这里正上演"加缪事件"，忽然全身涌起了对"圣·盖尔曼"和"圣·米谢尔"小剧院的怀念之情，当时，那些跟他同龄的大学生们在里面组织演出了科克托，热内，尤内斯库和贝克特的话剧。他的印象是，这些照片上的男男女女演员也都非常年轻，青春的朝气和渴望从他们的脸上表露出来，他心想，真该常去剧院才对。可转而就想起来，自己订有海法剧院的戏票，只是自己前几年没能去看过，只看过一部叫《推销员之死》的话剧，是由姚希·亚当和沃尔娜·普拉特主演的。不知为什么，那次看戏自己没有睡着，他很喜欢那次的话剧演出，并且还留下了不错的印象，不过那都是好多年前的事了，可怎么也想不起来，自己到底是跟哈雅，还是离婚前和艾玛努爱拉一起去看的了。



他一直走到小巷的尽头，搜罗遍了所有的美术馆，可一无所获，他又走了回来，拐弯进了维德尔巷，这条小巷向右拐就进入了水瓶星座巷，这时他发现了一块风格独特的陶瓷门牌，上写："马拉喀什美术馆。"他心跳加速地走了进去。美术馆里空无一人。在古雅的桌子后面高高地伸出了一个椅背，这是把转椅，靠垫是红丝绒布做的，店里放有普通的做礼拜的物品，有银烛台和七杈大烛台，还有犹太圣经书签和一些调料瓶。墙上挂着五指护身符，有银的，铜的，还有陶瓷的，许许多多的货架上摆放着的是餐具，这让他想起了卡萨布兰卡和马拉喀什市场上的情景。此外还有带盖的大碗，锥形的盖子上描有蓝、金两色，有饭碗和杯子，有铜托盘，有用银和铜制成、上有动物或人物图案的咖啡壶，壶边放着两副棋，其中有一副跟他在刚才的那个美术馆里见到的那副很像，他心想，这家店主怎么能这么大意呢，说不定什么时进来个什么人，偷了东西，然后溜之大吉了呢。

不一会儿，他听见里间传来了抽水马桶的冲洗声和水龙头流水的

哗哗声,一扇门被打开了,尤迪特从中走了出来,一时间他感到吃惊的是,她跟电影《罗莎夫人》里的希蒙·西格诺里特多像啊,她现在很胖,头发变得灰白了,可她的蓝眼睛依旧,她笑意盈盈地看着他,好像一直在等着他似的。她用法语说,你好,先生,你好吗?他也高兴而轻松地用法语笑着答道,很好,见到你我很高兴!她走近他,用她那柔软而好闻的双唇亲了亲他的脸颊,用希伯来语说了声,请坐,我去拿些喝的来。他在一只藤椅上坐了下来,而她则再次离开了这间屋子,他听到冰箱被打开的声音,然后是水流声和冰块发出的叮叮当当的响声。

过了一会儿,她拿着一玻璃罐果汁,冰块,薄荷叶,以及两只蓝色的玻璃杯重新回到屋里来,她把东西都放在桌上,将果汁倒入杯中,用手递给他一杯。他接过来,一口喝干,直到这时候,他才发觉自己渴极了,她又给他倒了一杯,然后才笨拙地坐到那把帝王气派十足的转椅上,用法语向他打听奥佛尔和哈雅,以及本尼和乔纳森的情况。他答道,他们都很好,令他吃惊的是,她尽管不认识他们,可是却记得他们所有人的名字。她说她听到艾玛努爱拉的消息时感到很难过,她解释道,她当时人在布鲁塞尔,否则她是会去参加她的葬礼的。她又摇摇头补充道,真是一个好女人,一位漂亮的法国女郎,想起那盘录像带,劳依温的心都要碎了,他犹豫着是不是要问三十年前那个安息日的情况,问题都到了嗓子眼了,可他又想,还是再等一等吧,是出于为尤迪特着想。她伤感地微笑着说,整个圈子里的人就只剩下我们俩了,他点点头说,是啊,只剩下我们两个了。

谈起奥佛尔的电视系列纪录片的时候他说,当我参与拍摄的时候,我根本没有想到,我是在做一件很特别的事情,我真的没料到,我的儿子有一天会拍一部这样的片子,尤迪特说,他应当来找我,我可以给他讲很多故事。劳依温问她是不是有时候去摩洛哥旅行,边说边拿手指着货架上的餐具和其他东西。尤迪特大笑着说,我一年里去了好几次,可身份不再是让人瞧不起的金发情人了,而是荷包鼓鼓受欢迎的客人。她跟他谈起自那以后,在他俩都熟悉的那些地方所发生的变

化，后来她看看表，问他是否吃午饭了，当劳依温回答说没有，但是他不饿，其实他已经很饿了。可尤迪特却说，走，我们到港口吃鱼去，我们边喝边再回忆我们过去的好时光，而劳依温一般是没钱下馆子的，他不好意思地说，不用了，真的。尤迪特责怪地看了他一眼说，你可是我的客人，别气我了！

劳依温站起来随她走出门去，她关上了美术馆的铁门，俩人穿行了几条小巷，走过一个铺着石子的广场，从一个很陡的阶梯走下来，来到星座小径上，然后经一个小过道来到了港口。他跟着她走进饭店，坐在她挑选的桌子对面，桌子靠近水边和渔船，他心想，他有好些年都没在饭店吃过饭了，而且是跟一位不是自己老婆的女士一起吃饭，能够说说法语真太好了。

那个年轻的服务员向对老熟人似的跟尤迪特打了声招呼，他麻利地收拾好桌子，向他们推荐这一天的鱼，“新鲜的旗鱼，刚从海里打捞上来的，一小时前它还活着，它对心脏很有好处的，没有一点胆固醇。”尤迪特要了两份不同的色拉，还要了这种鱼和一瓶葡萄酒，服务生记下了所要的东西就走开了，尤迪特大笑着说，他是受过培训的，知道跟我们这样年龄的人先谈心脏病，要是动脉硬化了可怎么办，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发生动脉硬化，供氧就成问题了，氧气跟不上，人也就失掉了对这个世界对人的兴趣了，剩下最大的乐趣就只是吃喝了。劳依温看了她一眼，犹豫地问她，是否想过离开以色列，回到布鲁塞尔去，尤迪特倾身向前，用外国口音很重的希伯来语向他悄声地说道，我早就为这个国家放弃了比利时的王冠了，说完他们俩好一阵儿大笑。

接下来劳依温表情变得严肃起来，他说，自拉宾遭暗杀以来，他总感觉好像是活在梦中一般，梦里的每个人都是一副事事如常的样子，而理智却是如此地不堪一击，在此情形之下，恐怖事件时有发生，一切都偏离了正常的轨道，所有的东西都脱离不了腐败，他继续说道，我百思却不得其解，我们怎会落到这样的境地。这时服务生拿着一只装得满满的托盘回到跟前，他把皮塔面包，酸菜，胡姆斯和盛着各种东方凉





菜的小碟放到他们的面前，非常庄重地打开葡萄酒瓶，给劳依温倒了一些让他品尝一下。这倒让劳依温有些尴尬，这种葡萄酒的味道好像很不错，但他也不能肯定，可他还是向服务生点了点头，那人把酒倒进他们的杯子里，倒酒时，他优雅地转动着瓶子，不让酒滴落出来。他们碰了碰酒杯，像老兵似的相对笑着，尤迪特把一块皮塔面包放到盘子里沾上胡姆斯说，拉宾遇刺对她来说就像是一个圣经故事或是莎士比亚的一出悲剧。

这出悲剧里的国王是上帝和大众幸运儿，他红发美目，是一位伟大的领袖与和平的缔造者，他派出了一位他最优秀的将官，去指挥解放被俘者的战斗。他们不辱使命，战斗获得了巨大的胜利，被俘者被解放出来，回到了家里，然而那位功勋卓著的将官却战死在了沙场，由此出现了一个新英雄传奇故事。他的弟弟，一个野心勃勃的小人，利用其兄的英雄神话，爬上了高层，他伙同一些可恶的策划者和腐败的教会神职人员，利用每一次机会煽动大家反对国王。一个年轻人出现了精神障碍，他听从女巫的鬼话，觉得自己是教皇派来的使节，是一个救世主，从而伏击并刺杀了刚刚成功地召集了一次群众大会、正从讲台上走下来的国王。国王死了，大众悲痛不已，没过多久，他们就把他的那个野心勃勃的弟弟推选到了他的位子上，同时被选上的还有那些策划者和腐败的教会神职人员。

劳依温笑着说，对国王的描写或许夸张了些，幸好她还没把他描画成诗篇作者大卫王，尤迪特眼睛看着他头顶上方的某个地方说，你知道吗，几天前的一个晚上，我梦到了一个城市，那里的居民用兽皮和布片遮蔽身体，就跟电影《水的世界》里一样，你看过这部电影吗？这并不重要，在梦里，他们把所有的孩子集中起来进行教育，教他们跳裸体舞，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跟他们性交，如若孩子们不从，他们就揍他们。长大些后，孩子们相互之间玩战争的游戏，然后他们派他们去跟临近城市的孩子们战斗，他们设炉灶，把他们作为祭祀上帝的供品杀掉，然后吃掉他们的肉，得以成功保全生命并能长大成人的孩子，他们才可

以再生孩子,一代一代就是这样延续下来的,任何人都不得违反,因为这就是法律,其他的真实情况他们是一无所知的。

那天夜里我被惊醒,浑身上下冷汗淋漓,心口怦怦直跳,忍不住大哭了一场,劳依温看见她的眼里有泪水。她用手擦掉眼泪,喝了口酒说,我们结婚时,艾米尔不想要孩子,他说,焚尸场的烟尘还悬浮在空中没有散尽,人类必须首先要加以纯净,然后才值得去生育孩子。而我,有着一位德国父亲的我能说什么呢?许多年后他才迁就我,同意要孩子,但晚了,我生不了了。她喝尽杯中的酒,又斟满,再喝尽,跟白葡萄酒一样颜色的眼泪流淌到她脸上的皱纹里,他只觉喉头哽咽,有股咸咸的味道,却不知该对她说些什么,他将她的手拿到自己的手中,由衷地握着她的手,震惊于她对一个男人的赤胆忠心,而这个男人他直到现在才第一次发现,他是多么的残暴。他想问,你又结婚了?你有其他人了吗?可他知道,这个问题是多余的,尤迪特站起来,用从桌上纸巾盒里抽出的纸巾擦干脸上的泪痕,笑着说,现在跟我说说你吧。



他手拿餐叉剔着鱼刺,很想问她,那个安息日,他们在海册里亚时的情况,可是他听见自己脱口而出的话却是,是第一次,如此地直截了当,他们辞退了我在工会的工作,再过几个星期我就退休了。尤迪特说,按我在新闻媒体上看到的情况,工会实际已是一头濒临死亡的鲸了,所有那些圆滑的说辞,什么解释说明,劳动赤字,整改,节制,统统都是那些位居高官的人编造出来的鬼话,其目的就是掩盖工会管理下的工人们的困境。

她沉默了一会儿,然后问,你有什么打算?劳依温说道,我不知道,我们的法律顾问对我说,你把家里好好安排安排吧,可我从来就不知道,到底该怎么做,我在我的第一个家里是这样,在第二个家里也是如此,我一直在外面跑啊跑的,总没有到终点的时候。艾米尔说得对,我根本不善于玩这样的游戏。他摇摇头,低声说道,我怎么会为了那么一个小小的目的,而给自己带来了那么大的痛苦啊,我对于家,对于自己的私生活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尤迪特考虑了片刻后说,私生活和非



私生活怎么能够分得清呢，对我们这辈子人来说，任何事情都是自己的，现在为时还不晚嘛，你有妻子，还有个小儿子。劳依温苦笑道，儿子已经十四了，他不再需要他的老父亲了，尤迪特反驳道，需要的，不管他多大了。

劳依温此时一定是想起了奥佛尔，他犹豫着，不知是否该向她透露折磨着他的疑惑，他决定还是不这么做，因为她又能怎样安慰他呢，这苦恼还是让他独自承担吧。他不假思索直接谈起哈雅来，他说她在市政部门的民政处所做的工作是富有牺牲精神的，她不知疲倦地帮助那些俄罗斯移民，她如何努力地将一切都安排妥帖，比如房子和生活方面，为的是使一切尽可能的正常，尽可能的完美。尽管我是——他对她笑笑——一个脾气古怪的人，你是知道的，我的话少，什么都闷在心里。尤迪特说，是的，这是间谍这个职业造成的畸形，第一次跟你打交道的人都认为你像条鱼似的冷冰冰的，可我从来都知道你是怎么一回事，艾米尔也知道，他那么喜欢你，就像喜欢自己的家人——自己已经失去的一个弟弟一样。劳依温喝了口酒，这时有种轻飘飘的、近似于幸福的感觉遍布全身，他心想，这真是天赐良机，无论如何这奇妙的一天真是一个仁慈的好日子，此刻微风和煦，太阳正渐渐地从港口落下，美酒，旁边还有这位女士，是朋友的妻子，也是他的朋友。

账单拿来时，他赶紧掏出钱包和支票簿。支票簿平整而又破旧——灰色的簿套上记满了电话号码和与人约见的时间，它们都被他写在簿套的背面上，而不是记在带有日历的记事本上，原因是他压根儿就没有这样一个本子，——他坚持着要付钱。尤迪特说，这个我同意，但条件是，你得让我送你一样东西，她用法语说，是一个小礼物，以祝贺你光荣退休，他几乎要脱口说出，不必了，但却没说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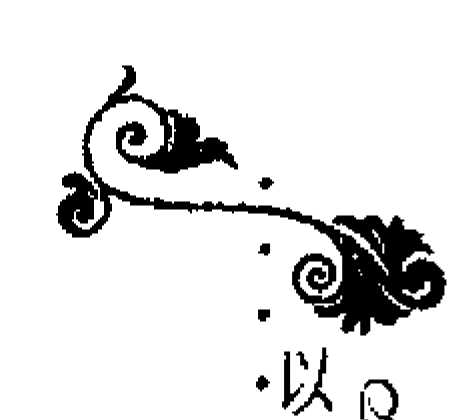
他们穿过光线黑暗的小巷，回到美术馆里，尤迪特将棋盘折叠起来，放进皮盒子里，然后塞到他的手里说，我刚才看见你盯着看它的眼神了，就好像是一个恋爱中的男人似的，你现在可是有的是时间下棋了。他有点歉意地微笑着说，那好吧，我得走了，尤迪特非要开车送他

去中央汽车站。她一边熟练地开着车，一边告诉他，几个星期前，她偶然在大街上碰见了从库法-叶胡叔亚的扬克勒·佩雷克。劳依温说，他还记得他是摩洛哥人，当时由他负责当地犹太人的自卫和武器训练工作。他俩都想起来了，这个扬克勒只会说希伯来语，所以为了一个又聋又哑、头脑又不太清楚的比利时人他可是费了好大的劲，此人的家里不承认他，并把他从他遥远的家乡给赶了出来。但当地警察很难相信是这么回事，他们派人跟踪他，并很快将他抓了起来，艾米尔冥思苦想，怎么才能将他安然无恙地从摩洛哥带出去呢，最后他让他穿的像模像样的，并让边防警察司令，像送一位高级别的大人物似的亲自领他上了飞机，说他是约翰·桑德尔——一位深受政府重视的商人——的朋友，还说他患了一种咽喉病，医生禁止他说话云云。他俩一阵好笑，他记着要把这个故事说给奥佛尔听，让他作为资料收集起来，他知道，此时此刻可是他最后的机会了，他瞥了一眼她臃肿的脸，她眼光朝前直直地看着马路，他嗫嚅着吃力地说，你还记得我们在你们那儿过的那个安息日吗？



是1968年的5月，我们正在谈论科恩·班迪特的时候，她突然冲进屋里哭了起来，你跟在她后面也进去了。尤迪特目光锐利地看着他说，你问这干什么，那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她都不在人世了。劳依温咽了咽口水没说话，尤迪特说，她当时跟我说，她爱上了一个已婚的男人，叫丹·阿罗尼，她准备放弃一切跟随他去，可他对她说，他想再等等，等他的孩子们都长大了，他再跟他妻子离婚，然后跟她一块儿生活。

当劳依温听到那个男人的名字时，不禁打了个寒噤，他在心里不禁叫道，这怎么可能呢，那时候就有这样的事了，他们结婚还没满五年呢，或许在此之前就有这样的事了，那次我们去法国游玩时，她还在双马车的后座上紧紧地粘着我呢。在波拿巴咖啡馆里还带着猫眼形眼镜深情地朝我微笑，而奥佛尔，不，奥佛尔是我的，这是毫无疑问的，即使他是在那个男人的家里长大的。回忆像山崩地裂般令他震撼，她当时



的情绪，她坐在饭厅角落里不停地吸烟的样子，她向他提起的诉讼，每星期两次的法语视听课，还有她频繁地去特拉维夫探望她的父母亲，七年，她等了他七年的时间。他提高了嗓门，声音沙哑地问，艾米尔呢？尤迪特说，艾米尔也知道的，他认识他，他们曾合伙在哥伦比亚做过几年武器交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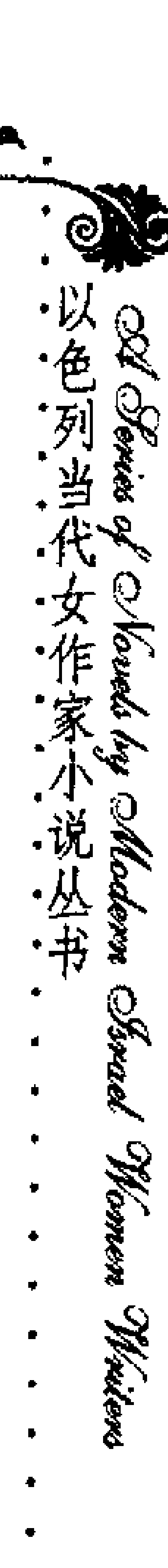
劳依温感到心寒，他们把我给出卖了，他们三个人密谋策划来共同对付我。或许他们在那些年里甚至都相约在一起玩过，是四个人在一起玩，在海册里亚的家里，或者在擦哈拉的家里，在游泳池旁一边喝着威士忌，一边谈着做武器生意的往事。那个曾亲手杀死过纳粹罪犯，并将成千上万的犹太人运送到以色列的艾米尔，他跟哥伦比亚做过生意，他们是做武器生意的弟兄。他内心不禁苦笑，他脑中一闪，忽然明白了在儿子的受戒礼照片上看见的那个有一缕白发和那个满头金发的人，他俩都去了，他们受到邀请，参加了我儿子的受戒礼，那个场合我却没在。他感到很伤心，他本可以给我提个醒的，他本可以眨眨他那明亮的眼睛给我提个醒的，尤迪特轻轻地将她的手放到他的肩上说，他不想让你增加痛苦，我不是告诉过你，他爱你就像是爱他的一个弟弟吗?!

她把他一直送到中央汽车站，她用她那柔软的面颊贴了贴他的脸，他用法语说了句，再见，然后就在身后招招手跟她道别。他知道，这是他们的最后一面了，他走向开往海法的快车车站，上了车，买了一张车票，然后重重地跌坐到后排靠窗子的座位上。车子发动，开了起来。眼前的光线模模糊糊的，他拿出手帕，将镜片上的雾气擦去，心里却在自责着，后来他又用手摸了摸并闻闻棋盒上的皮子，小心地将棋盒打开，手指在象牙制成的国王、王后、象、马、车和卒等棋子上摸摸，他想，她送我象棋是为了赎罪，他决定，要在安息日那天，把它就留在沙罗姆那儿不拿回来了。然后他自言道，无论如何生活是一定要继续下去的，情况会变好的，一定都会变好的，最迟就在下次选举过后，在这一届在罪恶中产生的政府解散过后。

忽然他知道自己退休后第一件要做的是什么事了，他下定决心，明天就去市中心的旅行社订三张七月初去巴黎的飞机票，还要订世界杯足球赛半决赛和决赛的门票，不管要花多少钱，他和乔纳森两人一起去看球赛。比赛间歇的时候，他们三个一起去参观博物馆，卢浮宫、奥塞博物馆和蓬皮杜中心，他要带他们去他以前常去的几家咖啡馆，去福罗赫和波拿巴咖啡馆，带他们去看他和艾夫莱姆·罗内尔在卢森堡公园里的接头地点，还要去参观索邦大学里的各种建筑物。他们还要去又好又便宜的餐馆里吃饭，每天换一家，到时候他们再也不会叫他吝啬鬼阿巴贡了，或许他们还会进眼镜店里看看，哈雅说不定会给他选一副时髦的金属架的眼镜。旅行回来后，他们要去沙洛母–堪扬购物中心和海册尔大街买些新的客厅用家具，然后他还会同意在院子里建一个游泳池，并且还要把它给建好，他都想象到哈雅一脸吃惊的表情了。而乔纳森也会高兴地跳起来，他将额头靠在车窗上，透过玻璃窗，他看见了和平中心那两个高高的塔楼，那个是圆形的，那个是三角形的，塔上折射出万道长长的光芒，就如同是引领船只归航的灯塔一般，他的头随着颠簸行进的汽车左右摇晃着，进入了梦乡。

1998年春夏之交





云彩飘啊飘

我们沿着海滨大道驱车前往卡迈尔山脚下的老公墓。杰尔开着车，我呆呆地看着水滴慢慢地从挡风玻璃上滚落下来，雨刮没启动，也没必要，我把所有的事情都掂量了一番，努力地想弄明白，我是否只是出于同情才这么做的，或者是因为我经期才刚过去没多久，而针扎在我的血管里感觉痒痒的，是不是因为纳亚玛磁带上的那首儿歌，或者是我没能怀上孕的缘故，是不是我的工作停滞不前而感觉要窒息了。

事情起因于两天前。像每天早晨一样他们跟我吻别后走了；杰尔要把纳亚玛送到下一条大街上的市立幼儿园，然后开车去大学工艺系他的办公室，他是那儿某一专业领域的讲师，这个专业我不太懂行，大约跟材料的强度有关，他常写文章写到深夜，希望能得到正式的聘用。像往常一样，他们下了楼，远远地传来了他们的笑声，早晨属于他们，没我参与的份儿。

我走进浴室，掀开衬衫，对着洗脸池上的镜子查看乳房。大小，分量，颜色，摸摸乳头，寻找新的青筋。从屁股上脱下短裤，坐到抽水马桶上，细究着白色的棉短裤。解了泡小便，擦擦屁股，将卫生纸拿近眼前来看看，纸上有些小暗点。对，纸上有。

我掰着手指头算了算日子，又算了一遍，这是第二十八天了。我把一个手指插了进去，是用中指。检查了一下指甲缝，没有血。后来我去给自己煮了一杯咖啡，上到我那位于顶楼的画室里去，茫然地看着我那毫无生气的花园，园子里的植物都是一副要死不活的样子。我把那个系列画的画布挂到墙上，在过去的两年时间里，我就是在这些画布

上干活来着,希望在无果的多年之后能举办一次展览,在那些年里,我只是远远地追踪着曾跟随我学习了三四年画的那些年轻人的成功的消息,他们举办集体或个人展览,以及被派往圣保罗和威尼斯参加国际艺术博览会。我的眼盯着那些白色的斑点,这是从妇产科医生南尼那儿拿来的超声波片子,丝网印制的。在显示着胎儿的斑斑点点之间,可以看见公鸡,青蛙,猫咪,恐龙骨架或是小鲸鱼的影子,尤其是在大块空缺的地方,我用彩色颜料画了纳亚玛的脸和士兵们残缺不全的尸体。这些将我,从狂妄自大到稀松平常直至绝望,包围在中间的画作,散发着一股松脂油的香气。我知道它们是没有生命的。我关上画室的门走了下去,收拾了一个包,又在一张纸条上写上:"我一事无成。我出去几天。照顾好你们自己。吻你们,妈妈。"在楼梯间我又反身上楼。我把纸条扔掉,然后给美泰尔的母亲打了个电话,安排好让她在幼儿园放学后把纳亚玛接到她那儿去。又给杰尔打电话,我告诉他,我要去海法。他说祝我旅途顺利。不,是一次富有成果的旅行。我祝我自己做一次富有成果的旅行,我给纳亚玛画了一个天使,并用一个草莓冰箱贴把它贴到了冰箱上。

在去海法的火车上我靠窗坐着,心想着巴黎。两年前的那个秋季,当时我们俩赤身裸体地站在里夏特·莱瓦大道上那家旅馆的窗子旁边。那儿有一棵槭树,树上长着像手指叉开一样的树叶,经风一吹,咸绿、长有锈斑的黄色、咖啡色及慢慢坠落的焦黄枯萎的树叶落到了人行道上。玄武岩的屋顶上,蜡灰的天空变幻莫测,天空里一个即将消散断裂的白色圆环,渐渐变成了耀眼的蓝色,是一种带有白色的旋涡边的天蓝色。隔着双层玻璃的窗子透不进一丝声响。马路上熙来攘往的景象如同发生在一个玻璃器皿里, 无声无息地展现在我们的眼前:大衣、帽子、围巾在舞动着,雨伞或撑开或闭合着,男男女女的脸或光滑或起了皱褶,有的人戴着眼镜,有的人脸色阴郁,还有的人面色凝重坚毅地迎着风,既陌生又熟悉。就像看电影似的,他们来来往往,行色匆匆地过马路,有背着包的,有胳膊下夹着棍子面包的,还有手里牵着狗



的。穿着橘黄色工装裤的清洁工在打扫路面，万籁俱寂。后来我们打开了窗子，噪声朝着我们直扑进来：汽车和气锤发出的轰隆声，狗叫声和法语的叫喊声，与令人意外的、刺骨的寒冷交织，而我们知道，这一切并非没有秩序没有意义，这跟秋季里树叶凋零的道理是一样的。我们很幸福，那一整天里我们都很幸福。我们穿得暖暖的，戴上围巾、手套及所有的东西，步行来到卢森堡公园。那儿到处都是金黄色的，树叶、太阳、咖啡馆前伸出的玻璃房上洒满了阳光，大理石圆桌上摆放着花瓶和厚重的杯子，每个花瓶里仅插着一枝扶郎花，还有我穿着的毛衣和照片上我的头发，照片是杰尔拍的。那天，即我怀孕的第一天，他给我拍了很多相片。

到了哈代拉时，我突然感觉内急。我想，老得上厕所可是个好征兆。

我走进位于两节车厢间的厕所里，插上门，撩起衬衫和乳罩，对着镜子查看了一下乳房，并用两个大拇指褪下短裤，仔细地查看白色的棉内裤，解了一个小便，擦了擦，然后把手纸举到眼前看一看。上面什么也没有。我脚踩按钮冲洗便器，便器下的口子轰地一声打开。一股风，散发着消毒剂气味的蓝水，车身下面飞驰而过的轨道，用过的手纸，还有先前恐惧的阴影，全都被吸了进去，并碾碎于车轮之下。我回到车厢里，坐到我的旅行包旁，捏了捏身上的肌肉，只要没出现那一点就没事，因为要是现出了那第一个点，那么事情可就全毁了。

到了巴特·嘎里母火车站我打了一辆出租车。您要从斯特拉·马里斯路走吗？不，从哈其翁努特大街走。要下雨了，马路上黑沉沉的。芭海花园，总统林荫大道，鳞次栉比的饭店。谢谢，祝您拥有美好的一天。海法的出租车司机们很有礼貌。他们把车都停到人行道旁。红灯时，这儿的行人们都站在那儿不动，即使马路上没有车辆行驶，跟十年前一样。自我那次到卡迈尔山下的墓地上过一次坟，而后去露特姨妈家喝了茶，吃了些点心，回到特拉维夫后，就再也没回过家乡了。十年了，从我母亲死后，父亲跟爱丽思再婚，卖掉了房子，搬到纳哈里亚去住算

起。

我经玻璃旋转门走进了其中的一家旅馆，要了一间在高层的房间。服务台那个男服务员疑惑地看了我一眼，客气地问了句，住几天？我说，我不知道。我没再多说一句令他心安的话。房间很宽敞，有一扇大窗子朝着西南方向。苏打水罐在两棵松树梢间高高突起，看去好似花椰菜色的美发上冠着的厨师帽。云彩的边缘在太阳的照射下呈现着白色，阳光给海面着上了一种漆红色，透过窗子射入的阳光呈四角形，照在椅子和穿着短裤坐在椅上的我的身上。我手指间夹着香烟，好像是这些爱德华·侯佩尔画的画中人似的。旅馆里的客房，清晨的城市，阳光下的女人，屋内一个小男孩沿马路慢慢地走着，身旁挎着一只紫色的带有拉链的书包，书包上标有记号。我能看出，那书包很重，因为男孩的身体向前倾着。他狭窄肩上那稚嫩的颈脖却要无辜地背负着整个世界。

历史和地理、数学、文学，还有圣经课。脸朝着人行道。突然他去踩一颗松树果。可能是借此发泄自己遭遇的不公，抑或是想着马上要吃午饭了。



我起身来到镜前。每次独自一人待在旅馆的房间时，总不免要在镜前照照自己的身体，而且还要手淫。我想着，这次或许不这么干了。过去的几年里，我对性的兴趣仅限制在某些时间里。我长时间地研究着自己的身体，而他，用他那有些发红的眼，呆呆地斜看着我，却一言不发。就像是更衣室里的一个女人，突然我明白了，真的就像我八岁或十岁，跟母亲去海边或是去游泳馆游泳时，在更衣室里吃惊地偷看到的那些女人们，她们的乳房耷拉到肚皮上，屁股上到处是被裤头勒出的红印子。而裤子里则像是一个凹陷下去的生面团，大腿根很白，大腿与大腿间相互摩擦着，腿上的青筋暴突，其颜色或如地图上的河流般发蓝，或似流血的伤口般泛紫，满是老趼的脚后跟上裂痕道道。我将来是不是也会变成这样啊？我闻到有股来苏水的味道，这味是从腋窝，从肛门，和从水淋淋的拖到下面的、稀疏得像山羊胡子般的长发上散发



出来的，——这是不可能的。

而现在，当我带纳亚玛去游泳池更衣室换衣服时，我发现那些小女孩总是很残酷地拿眼偷看我。不错，我就是这个样子。我把烟抽完了，就穿上衣服出去。

"全景"中心以及我从未劳神进去注销过户头的那家银行。那些新咖啡馆，我从没进去坐过。那家运动用品商店变成一个卖冰淇淋的店铺，有好些年我的体操服都是在这家店里买的：施奈尔父子建材店。小胡子，笑脸，黄黄的指关节，在我脸颊上捏一下，耳后夹着黄色的铅笔，散发着灰尘、石灰和松节油的味道。施奈尔的儿子们是我童年的最后见证人了。我上了台阶，来到玛吉朵大街，沿圣·马克希姆修道院那高高的石墙向前走。柏树散发着干燥的香味。钟声频频，好似节日一般。身材矮小的像孩子似的修女们，头戴灰色的修女帽，身穿黑长袍，看起来好像没有脚似的。她们胸前挂着银十字架，眼睛看着地面，别人看不见她们的脸。课间休息时，我总是和瑙咪一起叠人梯，往那个高墙的花园里看，为的是透过绿色的柏树，看看里面红红绿绿的花草，学校与修道院只这一面墙之隔。现在的修道院门大开着。不，是根本就没有门，只开有一个大大的裂口。我是第一次站到了这个神秘之地的中心处。

大花园里一片破败的景象，玫瑰花旁野草丛生。一些色彩斑斓的牛仔服等衣物晾晒在那栋石头建筑物的窗前，在随风摇摆着，屋里飘出阵阵烧煮东西散发出来的水汽，并能听见有人用俄语交谈的声音。一个头发花白的男人坐在门口一张富丽板的桌旁，在往学生用的练习本上写着什么。是的，这里现在住着新移民。修女？没有修女，他用俄语说道，有一天，她们被风从这里刮走了，走的时候她们的手紧按着大腿以免衣服被风吹起，头顶的大风把她们的帽子直往上拉，她们从这儿永远地飞走了。我用希伯来语说了声谢谢就离开了，我不会俄语。

我站在学校的网格状篱笆旁。眼睛先朝那棵矮粗的松树看了看，那儿曾是我们装扮成摩西教义里的角色游行时的第一站，我再朝人行道边的那块石头上瞧了瞧，三年级玩男女斗游戏时，我曾被那块石头

绊了一跤，磕掉了两颗门牙，都是因为躲避艾力·古特曼那个无赖造成的。有几年时间，我常用舌尖去舔嘴巴上的那个缺口，并且尽量保持笑不露齿，以免让人看见了我的这个缺陷。

从学校大门里涌出来一群孩子，骑自行车的那个哈姆好像还站在这里似的，他穿着干净的制服，黑黑的脸上带着笑意，很像纳赛尔；衬衫笔挺，裤腿卷到膝处，脚穿长及膝部的袜子，阿拉伯式样的鞋子上满是灰尘，装着冰激凌的白箱子上印着一只梭镖，旁边印有"爱斯基摩"的字样，还有他那只橡胶喇叭，吹出的声音跟放屁似的。

满是墨水、拿着各种零钱的手伸出来。哈姆，给我一只双杆雪糕；哈姆，给我来个蛋奶冰激凌；哈姆，我要个蛋筒；哈姆，哈姆，哈姆。

我蹒跚地沿着马路向高处走去，心情因对往事的回忆而变得沉重起来。这里三楼的那套房子，不知已让谁买去并翻修一新了，阳台上的电动卷帘替代了遮阳棚。我进了后院。松树的树干上还绑有两个变成了灰色的杆子，我想起来这是我们，瑙咪和我俩人，用来上树屋的梯子，树上的小屋就是我俩一块儿建的。我心想，我是幸运的，还有谁可以时不时地能来童年住过的屋子看一看呢。不断老去、越发麻烦人的双亲，星期五的晚餐，在沙发上度过的不舒服的一夜，放沙发的屋里有几个从达里亚特·阿尔-卡迈尔买来的藤编书架，墙上挂着数幅毕加索画的复制品。安息日早晨起床，和纳亚玛一道下楼去捡拾松树果。教她如何拿石子打松果，怎么才能把咖啡色的薄丝巾完好无损地摘下来，刮掉手指上黏黏的松油，从大桶旁的水龙头上接水喝。幻想着，这就是那个秘密的五人帮晚祷用餐——吃的是柠檬饼干——的时间。

我沿着捷叔隆大街往下走去。有两栋白色的三层楼，院子很大，种有果树。艾力卡，那个舞蹈老师，正向我走来，她身穿长及脚面的咖啡色裙子，戴着手套的手上拉着一根绳子，绳子的那头系着一条脏兮兮的白狗，烫着钢丝发式的头顶上端端正正地戴着一顶樱桃草帽。她也可能早就死了。那儿有一棵石榴树，中学课间休息时，我们总要去那儿偷摘石榴。那儿是阶梯，还有文理中学，壮实的男孩子们在骑助动车，





抽着烟,说话声音低沉。女孩子们穿着紧身T恤,胸部突出,像是石榴似的。我毕业时他们才出生。有两个女教师笑着走了出来,很年轻,比我年轻。对面是精神病院,让人有点恐惧。那是一栋格窗式的白色四层楼房,望去满目绿色,窗外装有安全网。安静平和的疯子们都是大屠杀的幸存者,就像德福拉,就像瑙咪的母亲一样,她总是伏在厨房的地上,对着地板的接缝处用依地语喃喃地说个不停。瑙咪解释说,她这是在跟她的妹妹和父母聊天,瑙咪的父亲下班回来后,总要用他那做木匠的双手用力地把她抱起来,扯着被香烟熏哑了的嗓子骂道,够了没有,德福拉,够了没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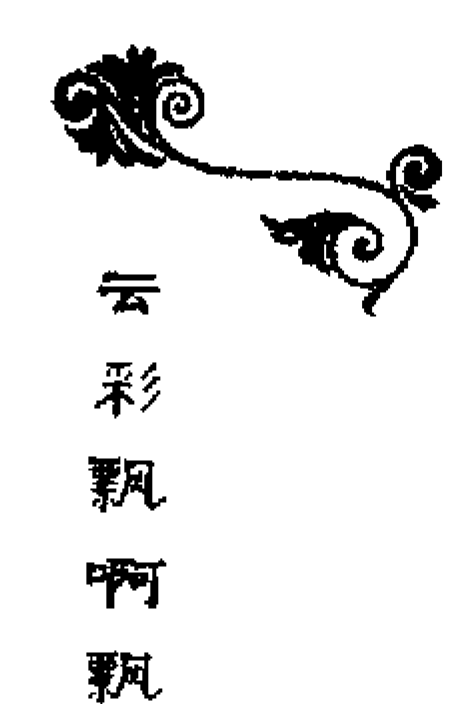
我顺着威吉伍德大街继续往前走,一边回忆着那些已经把我遗忘了的大街。这儿的脚步声和人们的目光淹没了我,我想,这就像是一段被丢弃了的爱情,而同时我又吃惊地发现,我的嘴唇在动,在说话,是的,就像是一个情人,她去跟另一个男人结了婚,他的身体让她忘记了我的身体,此刻的她对我而言既熟悉又陌生,却无法触及。

从"凯斯特勒"糕点铺里散发出一股新鲜糕点的香味。色彩鲜艳的富丽板桌上摆放着白铁皮制的烟灰缸和糖缸。玛尼亚夫人在冰柜后正吃着点心。肉卷,林茨蛋糕,拿破仑面包片,还有中间有孔的圆形果酱饼干。我要了杯咖啡和一小包小而软的小面包;有椭圆的芝麻面包,有月牙形的罂粟子面包,还有上面什么都没有的圆面包。我母亲通常都要在面包上抹上黄油,而露特姨妈则涂苦味的橙子果酱或是蜂蜜。我总是边喝可可,边拿一支笔在餐巾上乱涂乱画:画花和猫,画菠菜水手那张扭曲的脸,画赛曼塔那张完美无缺而迷人的脸,画玛尼亚夫人那张长得像鸟一样的脸,画邻桌身上裹着西服的那些德国犹太老人。在我的头顶上不时地飘来低低的说话声,一阵阵的,像是一个长链条似的。

我点燃一支香烟,决定下一步就去看望我的露特姨妈,她住在德莱西·哈亚姆大街上的养老院里。途中或许我会经过瑙咪家看看,她母亲很可能还住在那里。我去按门铃。可能会是德福拉来给我开门,她身

上穿着花睡衣或是短裤和胸罩，头发乱蓬蓬的，像是吃了药的样子。瑙咪在家吗？瑙咪！你朋友找你来了。一间又黑又乱的屋子，一张睡意蒙眬的脸，短而稀疏的卷发，男人般骨节粗大的手，萨克斯管，画。

我们十四岁就离开了童子军，在路特施尔特大厦报名上了尤迩·莱福的绘画班。我爱上了尤迩·莱福，瑙咪则喜欢上了她的萨克斯管老师。我们称他们为"重要人物"：尤迩·莱福是我的那个"重要人物"，而那个叫阿里的萨克斯管老师是她的那个"重要人物"。"你今天有重要人物的课吗？""我昨天在路上遇到了那个重要人物，是和小红萝卜和孩子一起的。""重要人物"的老婆们被我们称作"小红萝卜"和"甜土豆"。我的那位叫"小红萝卜"。我极力对瑙咪解释说，尤迩尽管很有才华，可就是因为她才没成为有名的画家的，他因此被迫去学校和绘画班教课。他三十五岁，跟我现在同岁，在我的眼里他显得很老成。个子不是特别高，头发卷曲，他黄绿色的眼睛在镜片后总是显得炯炯有神，他的嘴唇轮廓分明，颜色几乎呈青紫色，像是刚被一个性感的女人吻过似的，口红唇印还留在上面。上第一节课时，他先给我们看了一些图片，以测试我们的视图能力，问我们在上面都看到了什么。我们说是两个在跳舞的黑人、蝴蝶、树叶、蝙蝠，挂在一起的几只大象，还有云彩。尤迩听后很失望。他说我们太普通了，没什么创造力。只有瑙咪想象力丰富，她看见了一个蘑菇云，一个透明的肚子，肚子里现出肝脏和肾脏，一张肺部的透视片子，一个骷髅骨，一只被轧死的猫，两个怀孕的男人，往一只耳朵里钻的蟑螂，和一只跳入一杯果汁的海豚。尤迩大笑着说，如果给凡·高做这样的测试，他所看到的东西一定跟这一样，瑙咪问，她是该高兴，还是该生气呢。我们晓得，我们离开童子军后要去巴黎学绘画的，我们永远不要结婚，就像《我与毕加索的生活》一书中的毕加索那样生活；我们要在巴黎蒙马特高地或在特拉维夫拥有一间巨大的画室，我们要在艺术家咖啡馆和爵士俱乐部结交红得发紫的作家、音乐家和画家，要到诸如加勒比岛，普罗旺斯或塔西提之类的具有异域风光的地方去休闲加工作，年轻的男人貌若天仙，逗起乐来赛似





伍迪·艾伦，他们把我们当做典范和倾慕的对象加以追逐。而我们现在暂时还不得不凑合着用一个满身青筋突暴、屁股滚圆的女模特，此人自称叫诺拉，每来当回模特，尤迩付她十个以色列镑。

他只需走近我。只要站在我的身后，以几乎触手可及的距离，他的呼气吹到我的脖颈上。用他那灵巧而保养很好的手握着我那只握着铅笔的手，然后引领着它在纸上移动就行了。只要两手交叠就行了，这样就差不多了。课后我总是最后一个离开。上学时我总想着他，本子上画满了他的脸。将他写入日记里。记录下每一个动作，每一句话。在舒沙纳特-哈卡迈尔大街他的家旁守候着，碰到他带着孩子出来时，就假装恰巧经过这儿。脸上发烧，憋着嗓子叫道，怎么，你住在这儿？我的一个女友也住这一块儿。我想象着我的脸离他格子衬衫的衣领很近。一股清香夹杂着他皮肤的味道，他的嘴唇在我的头发里喃喃地嚅动着。我想象着他张开他的泛着青紫色的嘴朝我伸过来，又甜又香，像一颗熟透了的葡萄似的，他的手轻轻地抚摩着我的脸。我想象着裸露的皮肤之间的接触。一只手伸到了两条大腿间。我想象着，这是他的手。

第二年的年初，在痛苦而无果地在那些没有一点希望的地方转悠了一个夏天之后，我在一节课的课后径直去找他了。我情急之下瞎编了一个用色还是用笔的问题，当他解释完后，我还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我的眼直视着他的脸，他不好意思地笑笑，笑时嘴唇周围形成了一圈皱褶，他用狼一样的声音问，为什么你的瞳孔那么大，我咽了口吐沫，声音低低地说，为了我能更好地看着你。

我在“凯斯特勒”糕点铺里坐了很长时间，长久地沉浸在那个时刻里，不愿与之分离。隔壁桌旁坐着一对老夫妻，他们在用德语说着话。那女人的嘴唇是深红色的，手指甲上涂的颜色很耀眼。她用叉子将点心送进嘴里，拿叉的手微微地有些发抖。我慢吞吞地吸着烟，一边思忖，很显然我把自己遗留在这里了，而那个生活在特拉维夫的女人，一个多少有点儿名气的画家，纳亚玛的母亲，杰尔的妻子，仅仅是一个面貌极为相像的人，是一个借用的女人而已。这么多年了，而我对此却一

直没能习惯，这就跟我不太习惯从更衣室里的镜子里与我对视的那个女人一样。或许这一次我能够将她背上我的肩头，就像背上一个背包，一个受伤的士兵那样，终于一并把她带上。我在那只三角形的绿色铁皮烟灰缸里把烟按灭，到玛尼亚夫人那儿付了钱，她那张长得像鸟一样的脸表情呆呆的，像是在水滴状的琥珀里一般。您还记得我吗，我想问来着，我小的时候，常跟我母亲和露特姨妈来这儿坐，您一定还记得她们吧，其中有一个是金发、长得像赛曼塔一样漂亮的。可我却没问出口。我说了声，谢谢，再见，就走了出去，往市中心的方向走。我继续默默地数着那些活下来的人以及牺牲了的人们。格吕恩贝克甜点和咖啡店上面的大钟还在，跟那时一样，时针正指在十二点二十的位置；"邦比"儿童服装店，以往每年的寒暑假末，父母都要为我在那儿购买校服，已经变成了一家大型眼镜连锁店分店所在的位置。

明天我或许会去拜访尤迩。他已不住在舒沙纳特-哈卡迈尔大街上了，这我是知道的。几个月前他离婚了，并在哈罗夫大街租了套房子。

我沿德莱西-哈亚姆大街走着，这时我想起来我还要给露特姨妈买一个礼物，我就掉头往回走，走进拐角处的"根茨伯格花店"，选了一个红色的陶土花盆，里面栽种着一种叶片坚硬并呈锯齿状的植物，叶子中间伸出一朵巨大的粉色花。我好像曾经在卡迈里亚她的花园里见过类似的花。露特姨妈的花园，她一生的劳作，她的至爱。她退休前的大部时间是在海法的高级实科中学里担任自然课老师，业余时间则全都扑在了花园里。园里盛开着紫色和白色的紫罗兰花，还种有玫瑰、茉莉、鹤望兰、鸡冠花、百合和香巢菜。草坪的中央有两棵双胞胎似的树，一棵开着淡黄色的花，另一棵开着粉红色的花，它们的树枝相互交错，如同新娘和新郎一般。每个寒暑假，我都要和瑙咪一起去她那儿。我们把散落在草丛里的花儿收集起来，用针线穿成夏威夷式的花环带在脖子上，然后打开收音机跳舞，是我们三个人一起跳，就在屋顶的露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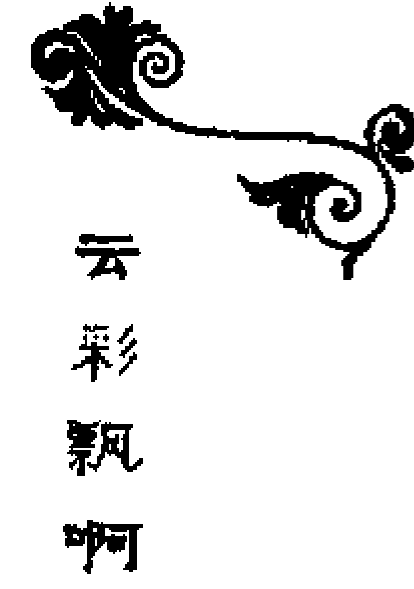
上。每个安息日的下午，我们都会聚在露台上，喝着茶，吃着英式点心；我的父母，达伦和赛曼塔，那时他们大约跟我现在的年龄相仿，我和瑙咪两个坐在白绿两色相间的好莱坞式的秋千上用力地摇晃着，耶西尔老爹——露特的哥哥，则带着他那顶永远不变的大檐帽，以护着他那个大秃顶不被太阳晒着。她的女儿达丽雅身穿超短裙，留着一边高一边低的发式，她的儿子乌里总让我们骑在他强壮的后背上，大声地叫着，谁要来一个面口袋？还带我们一块儿在草坪上疯玩，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73年他在西奈半岛十月战争的那个臭名昭著、令人恐怖的战役中阵亡为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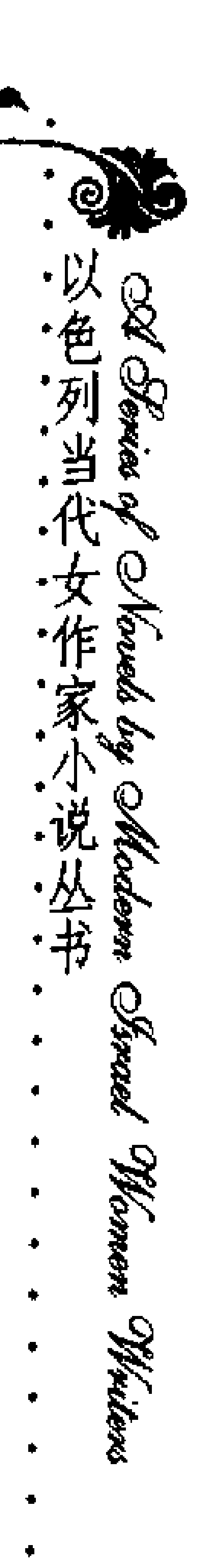
露特姨妈总是照顾好我们大家，她端上点心，将茶水倒进瓷杯子里，当她走到桌子前头坐下时，就会有人，通常都是我，央求她道："露特姨妈，跟我们讲讲，你在'全景'咖啡馆是怎么跟英国士兵跳舞的。"露特姨妈微微一笑，跟以往一样开始说道："以前那个的时候，海法市小巧而漂亮，我还很年轻，长得也还不丑。"接着乌里或达丽雅或耶西尔老爹总会禁不住抗议地说道："什么丑不丑的呀，你可是个大美人哟。"我爸爸手摸着下巴，偷偷地笑着，他说："我可是听说，那些想跟你跳舞的士兵排着长长的队伍，他们从'全景'咖啡馆一直排到了白金汉宫。"露特听后大笑道："好了，好了，越说越离谱了，可我那时腿长得确实很好，并且还会跳舞，像探戈，伦巴，狐步舞什么的，这可不能让我父母知道了，有一个跟英国人跳舞的女儿对他们而言可是一个莫大的耻辱啊，尽管我们的母亲们内心里谁都在偷偷地梦想，我们能俘获一个贵族家庭的绅士。"我的母亲，穿着短裙腿形很美，跷着二郎腿说："我是她的见证人，她总是告诉她们说，她带我去散了会儿步，或是看了下午的演出，接近傍晚小乐队开始演奏时，我们去了咖啡馆，露特为我要了一个冰激凌和果味汽水，我一直看着她跳舞，跳了两三个小时，不休息，也不喝水。"我急不可耐地插了一句："快讲讲那个爱上你的人，那个罗特。"露特通常先叹口气，然后才说道："那个罗特·帕特里格，我是在'全景'咖啡馆认识他的，他不太会跳舞，可他有一天晚上把我带到

了巴特-嘎里母的赌场里，那是一个我永远无法忘怀的夜晚。我们玩的是轮盘赌，我眼看着那个银色的小球，感觉它在我的注视下渐渐地发热，然后我的目光就让它转啊转啊，然后就指挥它定在了那个正确的数字点上了。赌场里所有的人都围在我们的赌桌旁，英国人，阿拉伯人，犹太人，所有的人都皈依了一种宗教。我红光满面，心怦怦地跳个不停，像是在跳舞一样，甚或像是在热恋之中。那个晚上，我们赢了一大笔钱。当我们离开赌场时，已是拂晓时分，我俩来到海滩上散步。那个罗特整个人完全陶醉了，连耳朵也不例外，他有一对跟查尔斯王子一样的招风耳，他爱上了我，要马上跟我结婚，并去英国，去赌赛马。他不顾身上穿着的制服，双膝跪到沙地上向我乞求道，你将来一定会过上女王般的生活的，你什么都不用干，只要跟着我去赛马场，好好地看准是哪匹马就行了，可我还是把赌注下到了缪尼身上。"说到这儿，露特姨妈总要叹口气，我知道，她这时又想起了她的丈夫，那个在我三岁的时候，死于心脏病的人。我心想，她就像女巫安多拉，即赛曼塔的母亲一样，能够影响没有生命的东西，但无法战胜死亡，同时我也明白，故事已到了尾声，而我们也即将离去。

我两手插在大衣的口袋里，继续在德莱西-哈亚姆大街上走着，冷风刮在我的脸上有种痒痒的感觉，我想起我七岁的那个夏天，父母一起外出，把我放在了她那里。我们一清早就去了卡迈尔海滩，有的时候，整个海滩还空无一人，我们坐在海水边，用潮湿的沙团垒建白雪公主居住的冰宫。

下午我们一般去动物园，去给狒狒喂坚果和香蕉，露特姨妈会模仿狒狒各种代表着不同意思的表情，她说，它们让她想起了带着假发的英国法官。一天下午我们看到了一对英国法官似的狒狒在笼子的角落里交配，第三个狒狒法官要小些，他饶有兴趣地注视着它们，手舞足蹈，一会儿在头上，一会儿在胸前捉到一只虱子，然后塞进嘴里，好像是在表演吃爆米花似的。露特姨妈笑着解释道，一部分猴属动物是通





过观察其父母或其他成年的猴属动物来学会怎样生活的。我可以数小时不停地观察它们，特别是怀抱小猴的猴妈妈，小猴紧贴在她身上，宛如她身体一部分似的。露特姨妈可是已经站到了红鹳的水池边了，红鹳伸长脖子，对着盆中的倒影左看右瞧，然后调皮地将身上穿着的粉色芭蕾舞短裙摇来摆去。在秃鹳笼前，她把双翅高高掀起，嘴巴埋进前胸，只留下自己的眼睛左右顾盼着，跟那种稀有的无颈飞行动物的眼神一模一样。后来我们坐到一个长凳上，她从包里拿出夹着保加利亚奶酪的芝麻面包。我们吃面包时，她轻轻地拍了拍我胳膊，朝秃鹳示了示意道，你看，你看发怒的那只，生气的样子是不是像一个银行职员。

夜里我就睡在她旁边，睡在缪尼姨夫睡的位置上。有一天夜里我睡不着觉，非常想念到西班牙什么地方去了的妈妈和爸爸，就哭了起来。露特姨妈被吵醒了，她抚摩着我的头发，尽管只有我们俩人，并且没有其他人会被我们吵醒，她还是低声地说，她也很想念她的乌里，他在苏伊士运河附近当兵，她很为他担心，因为那儿很危险，随时都有士兵被杀害。

而此刻，我们行驶在海滨大道，外面雨下得越来越大，不得不打开雨刮器，收音机里响起了五六十年代的歌曲《魔幻时刻》。杰尔默不作声聚精会神地开着车，泪水涌出了我的眼眶，想起了自己那个时候极其吃惊，眼泪就不禁浸满我的眼眶，当时我明白了大人有时候也会害怕，也会有渴念，也会很无助，只会在夜里哭泣，我带着同情心冲动地拥住她，好像她失去了他似的，尽管他阵亡是三年后的事情，她将脸埋在我的头发里，我们就这样睡着了。

在到达养老院前看到的几栋房子里，我一眼就认出了瑙咪的家，我想，或许我会突然碰到她，她刚探望完她的母亲走出来，手里推着童车。你怎么不见踪影了，瑙咪，你到哪去了？这些年里，我常常会想起你的微笑。你住在噶里尔那个山坡上有监视塔的住宅区吧，你是和你那很有能力的丈夫，三个孩子，还有两条狗住在一所风景非常迷人的房子里吧。你是海法一所学校的美术老师，一位从事教育工作的母亲。你

着长衣，戴假发，躲藏在布内-布拉克还是美·石亚里母。你曾经因为精神受了刺激，就去布鲁门塔或是卡迈尔堡住院了，跟你的母亲一样，就像你当时最害怕的事情一样，跟尤迩·莱福下意识里的预想一样。但也可能你去了巴黎，在蒙马特高地有着斜面玻璃窗的画室里，看着白教堂的圆顶和天上的云彩，白天作画，晚上则到咖啡馆和爵士俱乐部跟那些作家、画家和音乐家在一起，夏季则去风情万种的国外休闲，周围聚满了模特情人。你现在也变得像更衣室见到的那个女人了吗？你有时会想到我吗？那儿就是那所房子，信箱上有名字。还有你吹的萨克斯管音乐，满含思念，咿咿呀呀说个不停，很是俏皮。“我爱他（它），是因为他（它）非常仁慈。”“什么仁慈，是萨克斯音乐还是那个‘重要人物’？”“两个都是。”

我知道，我可以去敲门。你母亲会给我开门的。我会问她，她也会告诉我的。而我却从那所房屋前走过，继续朝前赶路，留下有着各种各样可能性的你。

两块草坪间有一条石子路面的小径通向高坡上的养老院。我手里端着花盆，推开玻璃门。去往电梯的路上，我从一个坐在轮椅上的老妪身旁经过。她伸展不开的拳头在轮椅扶手上绑着的塑料盘子里动来动去，好像是要弄掉一个看不见，很难去掉的一个污点似的，她的目光朝向某个隐秘的地方，而嘴巴却吃惊地大张着。可能她自己都很吃惊，是我在想，她可能昨天还在跳绳子，身穿短裙，头扎丝带，而突然，在一夜间，人降落到了这里。我乘电梯到了五楼，敲敲门，很后悔没事先打了电话，告诉她我要来。里面传出拐杖艰难行走的声音。

“是谁？”

“露特姨妈，是我。”

被阳光晒黑的脸上一双蓝色的眼睛显出意外的神情。白白的头发被剪成短短的童花头。我吻了一下她的右脸颊，一时想起，她是左偏瘫。她得的是脑血栓，是在一年前，非常突然，当时她正在花园里干活。



她一开始在塔本达丽雅的家里住了几个月,后来决定,不再拖累自己的女儿,就搬到养老院来住了。

"多漂亮的苦苣苔啊! 快来看看我在这儿侍弄的小花园。"

我随着她手里拐杖的步调,在房门和小阳台之间四米见方的区域巡看了一番;有两个木盒子,里面种着红白两色的天竺葵,还有五六盆长得很旺盛的花,一种是肥大的蕨类植物,还有几种香料植物,在拐角的一个水罐里面又是叶又是根的。我去掉花盆外的玻璃包装纸,把它放到阳光里,靠近栏杆的地方。

"放在那儿它会死的,它喜欢阴凉。"

我把苦苣苔放到背阴处。露特姨妈用她的那只好手从那棵蕨类植物上摘掉几朵干枯的圆锥形花,她微笑着说:"过来,跟我说些什么?"

我想起了我屋顶上的花圃,里面种植的东西都是一副要死不活的样子,就说道:"真漂亮,而且很香,和在家时差不多。"

一丝阴影掠过她的脸。"来,我们进去喝杯茶。"

"你坐下,我来弄。"

露特姨妈在绿色丝绒靠背转椅上坐下,这张椅子原来放在卡迈里亚家书房的留声机旁。

"装着'立顿'茶的圆筒放在上面柜子的中间,糖罐在左边。杯子放在下面柜子的右边,炉里有英式蛋糕。达丽雅星期五给我带了一块来,为的是让我打牌时垫垫肚子。"

我把茶水倒进花瓷杯里,切了一点蛋糕,然后在那张咖啡色丝绒面的长沙发上坐下。那张红色的地毯上有数只跳动的羚羊,那儿还有古特曼、贝格尔和雷瓦农的画,一个坐在莲花座上的裸体女人的雕刻,装着核桃和泛着银光的核桃壳的木盘,盛满无籽蜜橘的小筐,铺着拼花被子的双人床,小块的粉红地毯,门口画有葡萄藤图案的镜子。数幅装在相框里的缪尼姨夫和乌里的照片,缪尼姨夫穿着短裤,而乌里身上穿着军装,遵命地站在烈日下,脸上带着微笑。她是怎么把她原来那个很大的家缩减到这只有三十平方米的空间里,而且好像还什么都不

缺似的?

“你们每个星期五都打桥牌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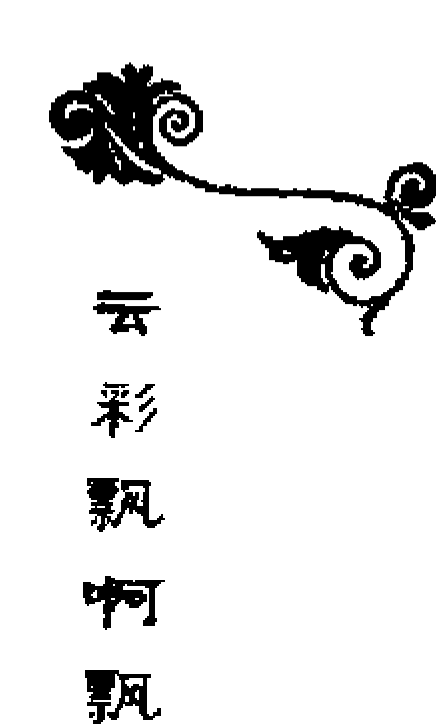
“两个星期打一次。即使这样也很困难了。不是他病了,就是她大腿骨折了。我们都老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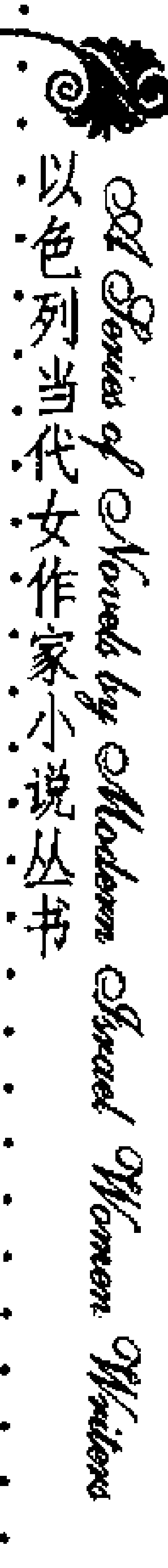
“是不是你拿眼一看,扑克牌就被施了魔法一般,结果所下的牌都被你通吃掉了?”

“很显然,我的这个天赋随着我左身的偏瘫而失去了。”她大笑着说道,“现在他们可是乘此机会,要赢回他们前些年输给我的牌局。”接着,笑声突然变成了哭腔,露特姨妈声音低低地说:“这过的是什么日子啊,你跟我说说看。每天晚上临睡前我都要祷告,希望自己第二天早晨永远再也起不来了。”她抽出一张夹在她那只瘫手和表带间的纸巾,擤了擤鼻涕说:“我认为,上帝真卑鄙。”

我站起身来,用胳膊揽着她的肩头,想起来,两年前,杰尔在她患脑血栓前的几个月,在她的孙女阿雅拉的婚礼上问她的话:“露特姨妈,你最后一次跳舞是在什么时候?”她看了看他,令人意外地说道:“有时候,我看没别人的时候,就会在镜子前尽情地跳一跳的。”杰尔请求道:“我可否请你跳个舞?”他把手伸向她,她站了起来,和他一同走向舞池,他俩跳了华尔兹,跳了探戈,配合得天衣无缝,她的一头白发衬着他的黑西服上装,那还是我们去巴黎时买的。他兴奋的眼睛穿过人头向我看来,我知道,他是她最后的舞伴了,我在心里对自己说,好好看着他们,我摸摸我还怀着胎儿的肚子,心想,我是多么的爱着这两个人啊,而现在,我能说什么呢?

“我乞求达丽雅给我带些药来。可她说,请你理解我,妈妈,这怎么可能呢?我理解她。一个人怎么能够帮助给予了他生命的人去死呢?”她用手掌擦了擦鼻子,继续说道:“我请求上帝,让别的什么人给我带些药来,可叫谁呢?人人在帮助别人之前考虑的都是自己。要是我的乌里还活着,或许我会觉得活下去不是什么难事,可现在还有什么意思啊,活着真是一点意思都没有了。”





"来,再喝点茶。"

"不,不。"她摆摆她那只好手道,"我再喝的话,马上就要上厕所了,我常来不及上厕所就尿了,所以要喊护士来帮我换裤子,我感到很难为情。"

她把手撑在额头上哭泣着。她这样弄得我也喉头发酸。我的眼睛下意识地往别处看去。我看见,在床边带有抽屉的小箱子上,在放阿雅拉婚礼照片的空隙里,有好些花花绿绿的小人。

"你在看箱子上的东西, 是吗?" 她带着哭腔说道,"走近点去看看。"

我走近一看,才弄清,这些小人是用花纸巾叠的,里面用硬纸板条撑着:有一群人在犹太教堂里做礼拜;有虔诚的教徒举行的一个婚礼;有头带红帽、身穿灯笼裙跳舞的村姑;有戴红头巾的阿拉伯人,他们正在咖啡馆里吸水烟;还有站在月球上的宇航员和一群消防队员。

"这是我的邻居伊格尔·拉宾诺维茨做的,很多年前,他是海法市消防队队长。这是他的业余爱好,他从早到晚做个不停。猜猜看,小人头上的东西是用什么做的?"

我看了看那些虔诚教徒的黑帽子,阿拉伯人的头巾,村姑的红帽子,宇航员的白头盔。

"这些都是用药片的包装材料做的。"露特姨妈又转忧为喜了,"装药片锡板的空处跟人头的大小相当。他把这一块小心地剪下来,涂上颜色,这里大家都知道,伊格尔收集装药片的锡板,而这,谢天谢地,正是这儿不缺的东西。"

"他是不是在追求你?"

"瞎说。他每个人都送了。以此来填塞大家的屋子,直到屋里转不过身来。谁也不好拒绝,扔了又不太好。"

我重新坐回到沙发上。露特姨妈又擦了擦发红的鼻子,笑了笑说:"我都变成好哭的小女孩了。"

后来她问了问南尼的情况,又问了纳亚玛和杰尔的近况。

"你丈夫,他人很好。"当我和杰尔第一次到卡迈里亚去看她时,她在厨房里小声地对我说,"他不是一个浮夸的人,以为这个世界离了他就不转了。他会一生爱你、忠实于你的,即使他也会做一两次蠢事,但他会巧妙地不让你知道的,就像我的缪尼那样。"

"这么说我这一注算是下对了?"

"不能肯定他这是第一次恋爱,"她一脸严肃地说,"或许是第二次、第三次,但你可以相信,在这场博弈中,他是不会抛弃你的。"

露特姨妈替代我母亲的角色,帮我戴上结婚的花环,几个月后,她又去齐亚的产科医院看我,并给纳亚玛带去了她的第一条小被子,是一条印着蝴蝶的小花被。

"他们两个都很好,"我说,"而我却不太好。"

接着我就说起了巴黎,说到了那次怀孕的事情,在努力一年之后,我终于怀上了孩子,我们都很高兴。十二周时做了超声波检查,怀疑是唐恩氏综合症,做了各种测试,做了羊水检查,可尚未成形的胎儿还是早产了,是个死胎,也不知被扔到哪儿去了。我还说我做了刮宫手术,谈到了从里面被掏空的感觉是怎样的,还谈了自己对一切都抱怀疑的态度,哪怕是对极其自然的事情也是如此。

"医生建议我,三个月后再试试看。他说,唐恩氏综合症有个统计数字,再次怀孕有助于身体得到较快恢复。而自那以来到现在快两年了,我每个月有两周时间,会伴有强烈的呕吐及与怀孕有关的生理现象出现,一直要持续到月经到来为止。"

露特姨妈点点头。她那只好手抓住椅子的扶手,轻轻地蹭掉指甲缝里的脏东西。

"我们做了各种检查。医生说,我们俩都没问题,没有理由怀不上孩子,可我想,原因恐怕是我已无力再照料一个孩子,而不在于我怀上了有缺陷的胎儿的缘故,是因为我无力照顾一个健康而又活泼好动的孩子,就像我照料纳亚玛那样,日复一日已有五年的时间了;为的是她不生病,不爬上阳台的栏杆,不拿钉子去戳电线,为的是看着她别把松



节油喝进嘴里，不从秋千上摔下来，不跑到马路上去，没完没了的，即使长大了也是如此；是为了他们不死于恐怖袭击或是交通事故，不从西藏的一块岩石上摔下来，不得癌症或艾滋病，不要待在战争的环境里。”

我将嗓子里咸咸的一团东西咽了下去，心想，她在儿子死后是怎么熬过来的，每天早晨起了床，去花园干会活儿，然后去学校上课，每星期两个下午乘车去军人公墓，去给他墓上的花草浇水，花草长得很兴旺。

“没有人告诉过我，情况会是这样的；上帝可能是根据各人照看孩子的能力来分配孩子的。”

露特姨妈苦笑一下用英语说：“你可别高估了他。”

原因或许在于，我有一个并不威严的母亲，她丢三落四的，缺乏耐心，对我本人过于宠爱。或许是我对杰尔还缺乏足够的爱的缘故。落叶满地的卢森堡公园，咖啡馆，金黄色的光线，大门口摊子上的金黄色奶油烙饼，巴黎大皇宫国家美术馆里的人像展，我们在香榭丽舍大街上闲逛，手忙脚乱地剥去滚烫的板栗外壳。最终怀孕的第一天就这么乏味地过去了。

“我有这样的感觉，”她像是自言自语道，“大自然会该怎样就怎样的。”我陪她去吃晚饭，她拄着拐杖缓慢地向前行走，我问了她的日常起居情况。“一清早有一位理疗师来给我做理疗，是一个让人喜欢的姑娘，给我做理疗不容易，可她一点都不马虎。她跟我好似有某种特殊的关系，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午饭后我按照学习计划要看反映大自然的片子，然后看《美丽而勇敢的人》。这是我待在这里的唯一的安慰。”她笑称，“至少我知道，接下来要发生的是什么。”

到了餐厅的门口，她用她那只好手捏捏我的手腕，小声地说：“或许今晚我有好运，我会再也醒不来了。替我吻一下你的丈夫和小女儿。”

后来，事情就如同火山爆发般发生了。一开始是在他的汽车里，是一辆天蓝色的甲克虫车，他把它叫做“布布丽雅”，那是在课后的一个傍晚，在偏僻的小胡同里，在干河道边，我俩甚至连衣服都没脱。我们只是把衣服高高地撩起，为的是让热气蒸腾的皮肤挨到一起，那张在阳光下像紫葡萄般的嘴压在我的嘴上，他的手指抚摩着我的脸，牛仔裤相互摩擦着，大腿缠绕在一起，伴随着突发而甜蜜的高潮，我未曾想到结果会是这样。后来他坐了起来，扶正眼镜，将衣服拉下来，嘴里喃喃地说：“不行，你才十五岁，我这是在干什么，我真是昏了头了。”我也坐了起来，用手摸摸坐垫，摸到了他女儿的那个芭比娃娃，抓着头发将它拎起，娃娃光着身子，它的尖脚戳疼了我的背。

第二天中午放学后，小巧而喜气盈盈的布布丽雅在离学校不远处等着我，它把我们带到加油站附近卖胡姆斯的小饭店，饭后我们去了卡迈尔山顶的深林里，车停在一块坚硬的岩石旁，松枝树梢间蓝天白云依稀可见。

知道这件事的只有瑙咪。

“你是怎么干成的？”她每次都要我交代，“你是怎么干成的？你这个疯子，你是怎么取得成功的？”

或许那个时候就为我们的分离撒下了第一粒种子。

此刻我急急地在德莱西-哈亚母大街上行走着，伴着湿湿的松树香气的细雨越来越大，我被各种画面给淹没了。那些个清明而散发着芳香的秋季的早晨，在他家里，当时正值十年级教师罢课两个月。他的妻子去上班，女儿去幼儿园了，而我们俩躺在床上，脱了衣服，又害怕又害臊。光，阴影，光，还有我身下他那张充满渴望的脸，他那没戴眼镜的近视眼盈满爱意。一切的一切都是第一次。一股皮肤和精液掺杂在一起的味道，一根顽固地留在牙齿缝里的阴毛，还有如蝴蝶般轻盈的舌头的吮吸。

我还记着，我手支着头躺在边上，他则坐在那儿，软弱无力的阴茎上放着一叠纸，他动作很快地给我画素描。我像是在照相似的对他张



嘴微笑着，全然不顾地露出了那块缺牙巴。在我的一生中，我第一次明白了，自己其实是很美的。

"为什么你不画画呢？我是说正儿八经地画，参加画展以及举办个人画展。"

"六日战争之后，我还是作了一些画的，"尤迩答道，说话时眼睛都没从纸上抬起来，"可是近些年来，从那个十月战争之后到现在，我没法再作画了。"

他给我讲了那次战争。讲了那次在西奈半岛上发生的臭名昭著而令人发指的恶战，讲了在他的眼前被炸成碎片的战友。"自那以后，我的脑子就有了障碍。只有跟你在一起时，我才会把它给忘了。"

我问他，是否认识露特姨妈家的乌里。他笑道："你知道，那里死了多少人吗？你要知道，那里发生的是一场不折不扣的大屠杀，一场集体大屠杀。"

不，我不知道。在我的一生中，我这是第一次面临一道无法跨越的深谷，而这深谷似乎总出现于我和所有我爱的男人之间。

他给我念大卫·阿维当的诗歌，我给他朗诵尤拿·乌拉赫的诗歌。他把冯哈斯·撒德的《阿莱克西司·索巴斯》和《生活寓言》借给我。

那一次，是在下午的时候，当听到门上发出钥匙的声响时，我急忙抱着衣服冲到浴室里去，耳旁听到："快去穿上衣服！"我光着身子坐在冰凉的马桶上动不了，只紧紧地抱着肚子，心里似有小锤在敲着，那个告密者，那个告密者。门那边传来他的解释声，有个女生来了，是来拿我给她写的推荐信的，她要申请沙来特基金会的奖学金。我两手飞快地穿上衣服，按下按钮将马桶冲了一下，然后洗了好一会手，用她的外国牌子的肥皂擦了擦手，听到她小声地咕哝："她怎么非得去那里上厕所，你为什么不让她上客人用的卫生间？"

我走出卫生间，朝她客气地笑笑，满心希望我留下一些痕迹，比如枕头上的一根金发，或是床单皱褶里的一团气味什么的。我从他手里接过那只白色的信封，上面写着："沙来特基金会收"，恭恭敬敬地道了

一声谢就走了,我一直跑到路特施尔特大厦后面的公园那儿才停下脚步,打开信封,里面有张折起来的信纸,指望着能看到抱歉或是安慰之类的话,可是纸上空空如也。

那时我们有了第一次争吵,第一次分了手,他给我写信,凄美而又很绝望的信,我们那晚在坦图拉海滩边又和好了,那晚为了恭迎萨达特总统的到访,考虑到安全因素,总统大道的人行道上被设卡阻拦了起来。沙滩上只有我们俩,我们冲进对方的怀里,像是要死了似的紧紧地搂着,我忍不住大声地叫了起来,他用一只手捂住我的脸,我一口咬了上去,直到手出血了才作罢,他抬起头看着将聚集起来的所有的光都洒在了我俩身后的天空,发出了一阵阵的咆哮。

路灯下的总统大道和雨水都是白色的，旅馆的玻璃转门也是如此。接待员的目光依旧充满疑虑。到了房间里,我剥去身上的湿衣服,然后给家里打电话。

“一切都好吗?”杰尔的声音里有一丝担心。

“下雨了。你们那儿呢?”

“十分钟前开始下的。幸好我想到把衣服收了回来。”

“我去看望露特姨妈了。她让我代她吻你们。”

“请你也替我们回吻她。纳亚玛要跟你说话。”

“你好吗,宝贝儿?”

“我给你画了两张画,想让你惊喜一下。一张画的是长着可怕牙齿的怪兽,一张画的是帕帕罗尼。”是那个她找出来的蝴蝶玩偶,线做的腿,长触角,面部很滑稽。近几个月里,她都是用画来跟我交流的,为了这些给我的画,她可是作出了很大的牺牲。她的眼睛渴望得到我的表扬,其神情跟希望得到上帝的赞美一样,而我连做母亲都还没学会。

“妈妈,你为什么要走呢?”

“我想再看看我长大的城市和我小时候的家。”

“它变了还是没变?”



“它变了，也可能是我变了。”

“是因为你已不再是小孩子了，你现在是我妈妈了。”她的话里有一丝责备的痕迹。我的眼泪流了出来。“你什么时候回来？”

“明天或者后天。”

“你给我带东西吗？”

“一定带。你马上就去睡觉吗？”

“要是爸爸给我当马骑，我就马上去睡觉。”我笑了起来。想象着杰尔把纳亚玛背到自己宽大而平滑的背上的样子。在那个早晨，在里夏特·莱瓦大街那个旅馆的窗前，我赤身裸体，从后面抱住他，将脸、腹和乳房都紧贴在他温热的皮肤上，我说，他的背很像杰拉德·德帕丢斯的背。

“那好吧，晚安，吻你，宝贝儿。”

早晨上幼儿园之前，下午从幼儿园回来，晚上临上床前，她的小嘴都要来亲亲我的嘴，这是生活里一剂小小的兴奋剂。

“就说到这儿吧，我要当马了。”杰尔学着马嘶叫了一声，纳亚玛咯咯地笑着。在这个我自己建立的家庭里，有时我感觉自己像是一个抱养来的孩子似的。

“晚安。我明天再打电话。”

“快回来吧，我们都想你。晚安，亲爱的！”他卖弄着他在联邦法语协会学来的法语。在巴黎的旅途中，在餐馆里，在商店里，在地铁上，他每次都能够让我吃惊，而我会禁不住拥住他，用法语来上一句：“我的杰拉德·德帕丢斯！”

在整个事情发生的过程中，我们仍然去路特施尔特大厦上他的绘画课。瑙咪手拿笔刷在她的画布上画来画去，画布上面黑糊糊的，不知画的是什么。她边画边得意地观察着我们俩，我俩装得跟没事儿似的，甚至连目光都不交换一下，以免引起别人的疑心。

“这样或许会毁了我的生活的。”有一次他突然呜咽着说，这让我

大吃一惊，“你的父母会告我引诱未成年人的，我老婆会跟我离婚，会带走孩子的，而我会蹲监狱的。”

“别害怕，”我向他保证道，“没人会知道的。”那个月的月初，我和其他同学一起将一张我母亲给我签写的支票转交给他，心里边愤怒地想着他用这钱给那个小红萝卜买巴黎香皂的样子。我嫉妒她拥有带两个卫生间的漂亮住房，嫉妒她拥有时髦的衣服，嫉妒她三十五岁的年龄，嫉妒她的自由，嫉妒她拥有那个孩子，拥有他，还嫉妒她的婚姻生活，这对我来说充满了神秘，因为这其中必有一个秘密，而这秘密是只有结了婚的人才知晓的，并且这秘密能将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长时间地拴在一起。现在在一所两卫的住房了，在散发着从巴黎老佛爷买来的香水香味的阁楼上，我有时会问自己，杰尔是不是也跟他的女学生们调情，我曾在他们系举办的晚会上见过其中的一些，非常的年轻，她们不时地朝我偷看，目光怯怯的，脸上带着客气的笑容，其背后隐藏着什么却不得而知。或许她们也会给我起个什么蔬菜名字。

有一天上午，在阿特利特海滩上，他把手指插进沙里，嘴里突然说，有件事我不得不告诉你，她怀孕了。我不知自己该说些什么，眼睛直直地盯着大海，大海波涛汹涌，像是一只上下翻腾的巨鲸，它向海滩涌来，像是要吞掉我们，吞掉整个世界似的。我站起来，拼命地跑开，我要拯救自己，我跑到空荡荡的女更衣室里，哭得撕心裂肺，因为我知道，一切都完了，都结束了。但是后来我们仍继续往来，而且胆子更大了，晚上我们假装碰巧在电影院遇上，我们一起看了《巴黎最后的探戈》，当布兰多把玛利亚·施耐德推倒在地上，她身上的牛仔裤被脱了下来，当他的手向一小包黄油抓去时，他把我的手放到他裤缝间那些发烧的纽扣上，我明白，明天上午，如果我去找他的话，那么我们就会做出跟他们俩一样的事来。

后来小孩出生了。因为他的缘故，我们在她休产假的整整三个月时间里都没有见面。再后来，她上班了，他上午在家带孩子，我又去找他了，英语和体操课逃课不上，我相信瑙咪会给我编一个什么借口的。



可是他被迫离开我的身体,去给那个婴儿喂奶,去洗东西,去换尿布。整个时间就听见孩子的哭声,他的大眼睛不让我离去,也不想闭上。

我脑海反复出现自己手拿一只枕头去捂他的脸,直到他的小腿和长着粉红色蠕虫般的小脚不动为止。

有一天上午,当尤迩忙着照料孩子时,我穿上先前飘落到凳子上的蓝色校服上衣后走了,衣服下面是小红萝卜的胸罩,我知道,此一去自己是再也不会回头了。

布布丽雅天天放学后都在校门口等我,它那扭曲的鬼脸总跟着我,一直到我回到家里。在我不喜欢上的课上,他无所顾忌地将目光对着我看,还在我的书包里塞纸条。明天来吧。只这一次。我求你了。可是回头的路没有了。

后来我就遭受了无尽的侮辱。"你妄想成一个大画家,"他在班上当着所有其他同学的面,难以自制地把我的作业扔到我的头上说,"可你太一般了。是一个没有半点独特之处,只会抄袭别人的小剽窃分子。你的朋友瑙咪,她的才能是你的一千倍。如果你想以后能成事儿的话,就只有像只猫似的一直伏在地上,懂得妥协。"

我还深深地爱着他,我哭得很伤心。课后在路特施尔特大厦后面的公园里,瑙咪用手搂着我的肩头说:"忘了这件事吧,他只是在报复你罢了。"我使劲地抓着她的毛衣说:"可要是他说得对,那该怎么办呢?"

有一次,上完了美术课,我们在公园看见两个个子很高,戴着眼镜,相互长得很像的男孩子,他们在一棵灌木丛下挖土,瑙咪问他们:"你们在找什么?"其中的一个男孩回答说:"我们丢了一个手指,你们是不是正好在这里看到了?"我吃惊地问道:"什么?丢了一个人的手指?"接下来两人大笑起来,那个年龄大些的男孩子答道:"不,是上帝的手指。"那个年龄小的摇一摇手中用报纸抱着的东西说:"我找到了,你们愿不愿意一起来吸上一点儿?"我们就去了他们在奥里方特大街上的一楼住房里。这是来自拿撒勒的兄弟俩,他们是来海法上大学的。

卡里穆二十一岁,学心理学专业,比他小两岁的扎米尔学社会教育和犯罪学专业。

整晚,他的目光都锁定在瑙咪的身上,她抽起来可是不淌眼泪、不咳嗽的,抽完两口之后,她一阵爆笑,说:“卡里穆和扎米尔,就像是哈娜·皋能故事里的那对品质恶劣的双胞胎阿西斯和哈里尔似的,你们明天早晨一定要跟我们一起去我们的班上,我们去跟我们的文学老师说,我们准备了一个报告,叫做‘阿西斯和哈里尔完全演绎哈娜·皋能的故事’。”

扎米尔是她的第一个男人。她说,跟他在一起很好,他们恋爱了。

两星期后,她父亲找到奥里方特大街的住处来了,用他那做木匠活的大手把扎米尔给狠狠地揍了一顿,他大叫道,他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熬下来的原因,不是为了让他的女儿成为一个阿拉伯人的婊子。

而扎米尔却说,他虽然不明白两者间有什么关系,但他不会再跟瑙咪见面了,因为他不想以后跟一个疯子吵来吵去的,他必须完成自己的学业。

瑙咪整天躺在床上,不去上学,不吹萨克斯,不画画,不吃饭,她说,我死了也无所谓,生命的价值连一口吐沫都不如。当时我编了个游戏,是这样的:“有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我站在地上的席梦思床垫旁,那就是她的床,我对着枕头上那一头潮湿的乱发说,“活在一个有毕加索画的世上真好。活在一个有伍迪·艾伦电影的世上真好。活在一个有莱奥纳德·科恩,约翰·列侬,艾里克·爱因斯坦,爱默生,湖人和帕尔马球队的世上真好。活在一个有尤拿·乌拉赫和达丽雅·拉宾诺维茨,有赫尔曼·黑塞和冯哈斯·撒德的书,有凡·高和马提斯画的世上真好。活在一个有《爱情故事》的世上真好。活在一个有巴黎这座城市的世上真好。”

我一说就是好几个小时,每天放学后都是如此,上课的时候,我就在想着新名字,还有活下去的其他理由,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有一天晚上我浑身筋疲力尽,头脑昏昏地说:“活在一个这样的世上真好,这



世上有……"就停下不说了，心里边想着，搞不清楚她是睡了还是醒着，忽然从枕头那儿传来："有露伊斯·阿姆斯特朗，查理·帕克，艾拉·费兹杰拉，弗里达·卡洛，约瑟夫·海勒，塞林格，你的品位实在不怎么样。"

我从小吧台里给自己倒了一杯伏特加，并把电视调到静音状态。在《政治热点》这个节目里，所有的人都脸色发红，脖子上青筋突暴，眼神像是刚从洞穴里才出来似的。我把电视调到"塞纳河流域"节目上。活在一个有"塞纳河流域"的世上真好。

我打开浴缸的水龙头，发了疯似的在镜中查看自己的乳房。从前面看，从两边看，将它们托起，又将它们压扁，然后我又用指头摸了摸，还是没有血。明天就是第二十九天了，最后的几天总是最难熬的日子。针头戳进血管里，有种痒痒的感觉，夜里则彻夜不眠。我躺到浴缸里，水上的泡沫堆积得像是一座小山似的，我让热水来抚慰在更衣室的那个女子的身体。我自问道，我到底为什么还想要一个孩子。我回忆起在有了纳亚玛后，最初那几个月里过得如机器人般的生活，寂静无声。高举起孩子让她打嗝，弄掉湿尿布上的大便，换上干净的尿布，洗洗涮涮，亲吻孩子，寂静无声。高举孩子让她打嗝，弄掉湿尿布上的大便，朝孩子微笑，摇晃童车，去新生儿咨询处和婴儿保健站，去散步，换尿布，寂静无声。高举孩子让她打嗝，朝孩子微笑，亲吻孩子，一遍又一遍地拉那个小猫音乐盒上的线绳，一次又一次地从睡梦中惊醒，要发疯了。怎么竟敢这样没完没了地折磨我呢？如果我没有自己的孩子，我还怎么当母亲呢？

晚上，当杰尔下了班回到家里时，我哭着说，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必须重新捡起画笔画画。杰尔建议说，我应当去楼上的画室，他把含着眼泪的纳亚玛抱起来，脸对脸地对她唱道："小象，小象，一只小象，它不知道，该怎么办"，"小兔子"，他又串到"小兔子"歌上去了。我站在门里面，心里酸酸地看着他们，他是多么的爱她啊，而她又回报给

了他多少爱啊。我上楼去了画室，一阵疲倦袭上身来。我在那些未完成的画中间，蜷曲在沙发椅上沉沉睡去。到了夜里，我感觉到他的手摸索着我的脸，我的头发，我猛地转身，背对着他，在床角里呆呆地生闷气。

到了纳亚玛满一岁的那个冬天，她突然发高烧。她哭个不停，哭得都吐出来了，嘴里呼噜呼噜地喘着粗气。我慌了手脚。我把信封弄湿了贴在她的额头上，又往她的肛门里塞了很多退烧栓。我往杰尔的办公室给他打了电话。他说，他不能回来，因为他还要上课。当他终于回来时，我朝他大声吼叫道，他帮不上忙，我不再需要他了，让他走。他瞪眼看着我，却一言没发，收拾了一只旅行包，就去一个朋友家过夜了。两天后，他打来电话，说他想回家，我们俩要好好谈谈，来解决掉所有的问题。我咽下喉头的一阵苦味说道，我暂时想单独待着，杰尔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他要么在附近租一套房子住。

我们俩每人轮流带几天纳亚玛。轮到我带的那几天，我下午四点把她从托儿所接回来，然后跟她一起看"小鹿斑比"。"百首童谣"我们听了有上百遍。我们还去公园玩。我让她荡秋千。我喂她吃东西。我给她洗澡。我很注意，给她穿好衣服，为的是不再得病。我等着她要睡觉时刻的到来，这样我就能上床看电视了。轮到他时，杰尔把她从托儿所直接接到他的住处，我就待在家里看电视，直至睡着为止。有一天，他打来电话说，他很忙，要我去托儿所把纳亚玛接回来，送到他那儿。她的小手拉着我的手，我们一起从黑暗的楼梯间爬上楼，然后走进他的住房。在纳亚玛的房里有一张木床，床上的铺盖花花绿绿的，里面还有一个五斗橱和一块地毯，地毯上的玩具都是新的，墙上贴着"热带丛林历险记"和"加菲猫"的招贴画。我置身其中，心里感到很压抑。我想对他们说，你们在别人的家里干什么，来吧，我的亲人，我们回家去做晚饭吧，可是我的眼泪一直流到脖子上。我匆匆地在纳亚玛的头上亲了一口就走开了，我两眼茫然地跑回了家。

初夏的时候，杰尔搬回来住了。安息日那一天我们三个一起去了海边。我们用潮湿的沙子堆冰宫，给纳亚玛买氦气球，"气球住在天花



板下”，形状有“乐你通”小鸭子的，有小鸟的，还有小美人鱼的。几天后，气球里的氦气就泄出了一些，气球瘪了，悬在半空中，在家里各个房间飘来飘去，上面皱皱巴巴的怪像或在过道上或在某个屋子里直朝我龇牙咧嘴，每次遇上都让我吓一跳。

夏季的尾声，我们决定再要一个孩子。有一年的时间，我们俩在每个月的那几天晚上都要绝望而又狂热地做爱，可结果却一无所获，之后我们去了巴黎。

我清楚地明白，我需要再生个孩子。是为了治疗我的心病。因为这就是人在老去之前，可以用身体做的事情。为了在我死之前再奉献些什么的。对了，在我死之前再奉献一个孩子。

我一气喝完杯中的伏特加酒，眼睛却盯着小山似的闪着亮光的泡沫，看着它的体积变得越来越小，直到在水面露出，在上面形成各式各样的地图，地图上显现的是精灵游走在大陆，海洋，湖泊，岛屿和冰川间，间或也有人和动物的形状出现。一个尖牙利齿，长着骷髅眼的怪物像一艘鱼雷艇似的向我袭来，这时我想起了纳亚玛那双绿葡萄般的眼睛，当我告诉她我怀孕时，她像是遇见了魔鬼一般，那两只眼睛吃惊地大张着，而当我从医院回到家里时，看到我的肚子瘪了，她又哭得死去活来的。我思来想去，或许是瓷砖间的接缝开始在我眼前扭曲变形了，要么就是此事真的发生了，因为我年纪尚幼时，就曾想杀死尤迩·莱福的小宝宝。

我从浴缸里上来，擦干身子，踉跄着走上床。我侧着身睡着了，睡眠中我梦到了我和纳亚玛走向一台电脑 X 光机，去检查是否患了癌症。检查完后，我们就拿到了检查的结果，很像是我们身体的 X 光片，身体一大一小，身体上贴着五彩缤纷的圆形贴画，像是纳亚玛从幼儿园带回来的绘画作业似的。纳亚玛片子上的贴画一律是蓝色的，这意味着那个小身体非常健康，而我的片子上面，根据癌肿的大小，呈现出黄、橙、红三种颜色。那个留着小胡子，耳朵上夹着一支黄色铅笔，长得很像是“施耐尔父子建材店”老板儿子的医生对我说：“您跟您母亲一

样是乳房癌发生了转移。”

我一下醒了过来，感觉嘴发干，有股苦味。我对着水龙头喝了口水，然后将窗帘拉上。我考虑着，自己或许该把这些五彩的贴画用在那些超声波画上，但我马上又对自己说，我绝不会这样做，除非把它们烧掉。

早饭我是在房间里吃的，一边吃着一边看着外边的风景。风像吹走床下的灰尘似的，将天上的云彩驱散，之后大海之上呈现出来的是一个崭新的天空。

我知道自己今天要去尤迩·莱福位于哈罗夫大街的住处看他。我穿上大衣，出了旅馆的大门，朝路特施尔特大厦方向走去。去那儿的路上，我要进地铁站。里面有一股甜热的雾气，我呼吸着这令人恐惧的气味，被吞噬在黑暗的洞口里。我们的超市。那家挂着吐火彩龙的中餐馆，为家人庆贺生日时，我们通常都是去那儿。米勒医生的诊所，他在我服兵役前，给我装了两颗新牙，装好之后他说："现在当你给你的司令官倒咖啡时，就可以朝他微笑了。"还有奥尔立电影院，十年前我跟我母亲一起在那儿看过艾伦·伍迪的《另外一个女人》，这部影片是她生前看的最后一部电影。



那座灰色的水泥建筑就是教学楼，后面是路特施尔特大厦那栋旧石楼。我想推门进到绘画教室里去，从拱形的窗子挤进来的阳光和灰尘呈一个扇形，照在已变旧的花地砖上，形成斑驳的光影，照在诺拉裸露的躯体上，照在尤迩的卷发上，可是所有的门都锁着。我来到公园，坐到我们的长椅上，我和瑙咪有一个星期五中午曾约在那儿碰头，我身着海军服，而她则穿着军警制服，我们抽了很多烟，俩人大声吵吵着，到底是有一个疯妈妈好，还是有一个患癌症的母亲好。

在因不合格被剔除出部队后，我们一起去美国玩了两个月。我们看遍了纽约和新奥尔良的所有博物馆和爵士乐俱乐部，每晚我俩都去喝酒，跟男孩子调情。我们进出迈克尔旅馆，为的是去看伍迪·艾伦演



奏黑管。我们等了一整晚。一个乐队演奏者抱歉地解释道,伍迪在中央公园骑自行车时摔了一跤,心情不好。在乘灰狗的长途行程中,我把头靠在她的肩上,我们连续几个小时玩"有一个世上有……"的游戏。所有的事情对我们来说都还是有可能的,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

从美国回来之后,我透露了我们的巴黎梦,我报名上了本·尤素福穆斯林大学的艺术学院, 瑙咪则去耶路撒冷上了柏斯莱尔艺术学院。她在拿赫劳特大街租了面积挺大的一居室,每当我俩见面时,我们都把自己的新作展示给对方看。瑙咪当时在忙着画一个自画像系列,跟弗里达·卡洛的近似。她在其中的一张画上,画的是她的母亲被绑在床上,太阳穴连着电震器,她肚子里有一个有着瑙咪的脸、身体蜷缩着的胎儿。在她的影响下,我也开始作自己的自画像系列,名为"赛曼塔之肿瘤篇Ⅰ"。我把童年的自己,画成一个万能无比的仙女,她被割掉了一只乳房,光头,打着吊针,站在抽水马桶前呕吐,照镜子,那只具有魔力的鼻子耷拉下来,眼睛木呆呆地瞪着。

瑙咪在学校待不下去了,老师们不喜欢她,同学们也是如此,她太好伤人了。当她父亲死后,她就被迫放弃了大学的学习,回到了海法,去照料她的母亲。那时候她就开始真喝起酒来了。

"她让我发疯," 她在电话里哭诉道,"没有酒, 我一天都过不下去。"

"送她进医院。"

"她不想去。"

"你得为你自己着想。"

"哪有那么好的事,为我自己着想,为什么相比而言,为别人着想更为重要呢?"

"你至少还在画画,是吗?"

"夜里有时画,那时候她看不到。她说,画里的目光跟地狱里的魔鬼一样凶恶。"

我回海法看望我的母亲,她那时正躺在医院里化疗,一头头发全

掉光了，瑙咪见到我时说："你至少还有点盼头，要么她恢复健康，要么死掉。"

她一个男朋友都没有。有时候偶然认识了一个什么人，就跟他在某家小旅馆里鬼混一夜。我跟山逊的交往，始于他来我们学院任教的那一天。他比我大很多，他让我想起了伍迪·艾伦，很有魅力而又心不在焉的样子，我抑制不住自己很想拥抱他。在艺术领域里，他的知识极其丰富，在绘画、服饰、音乐、化装、香水、饮食和品酒方面，他也极富美学品味。

他讲课的时候，鼻子上的眼镜像是跳舞似的动来动去的，一缕被他梳理得一丝不苟的灰白卷发在额头上悬着，样子很时髦。他的四肢很细，走起路来前后左右摇晃，好像是挂在看不见的线绳上似的。他的声音高低起伏，好像是在唱歌剧一样，他知道无数的艺术家的名字，熟知各个时期的发展情况，能对形形色色的流派作出精巧而新颖的分析。几个月里，他像一个热恋中的小伙子似的追求我，在高级饭店里，他低眼深情地看着我的眼睛，会突然从桌子的对面伸出他长满雀斑而苍白的双手抓住我的手。在最后一学年前的那个夏天，他邀请我和他一起去了伦敦。晚上我们去皇家歌剧院听音乐会，去考文垂花园看歌剧，看话剧演出，白天我不得不陪他去逛哈罗德商店的男装部。他的袜子和内裤只在哈罗德买，他买了很多，够用一年的，他在选购的时候，特别注意它们跟衣服、鞋子和领带颜色的搭配。他的两条腿直到脚后跟都光光的无毛，像是个婴儿似的。当我俩睡在一起时，他喜欢压在我的身上吮吸我的乳房，我则将鼻子埋入他的灰白的头发里，那儿散发着一股男用高级爽肤水的味道，这个牌子的香水他同样也只在哈罗德店买。我们从伦敦回来之后，我就开始去他那儿过周末。每到星期五，他都要买来各种报纸，浏览上面的文艺栏目，从中找出又有谁诽谤了他的文章来。安息日他总是穿着毛巾浴衣，回到书房里去工作，两只白而套着柔软拖鞋的脚在书桌下来回搓着。他在那儿将他的一腔愤怒化为言辞激烈的回答，他在写回信时，额上的那缕白发抖落





开来，好像牛的两只角一样。山逊总是说我很有天赋，在我大学毕业后，他帮我跟展览馆的主人联系，在那儿我举办了我的第一次画展“赛曼塔之肿瘤篇Ⅰ”。

在我母亲去世的一个月后，画展举行了开幕式。我二十五岁了，我相信，画展上总会有人跟我眨眼示意，跟我说恭维的话，有美酒和相机闪光灯造成的眩晕。我的父亲和南尼都来了，尽管都还带着哀伤。

来人还有露特姨妈，她眼含热泪拥抱着我说：“你知道这些新派的东西我一点儿也不懂，可我为你感到骄傲。”尤迩·莱福将脸紧贴着我的脸低声说：“你的男朋友帮你开办了这个画展，我可是老早有言在先，你将来总是很侥幸。”

副市长首先致辞，宣布画展开幕，并表达了他对这门年轻艺术的支持。山逊作了一个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讲话时，那缕白发在额头上磕头似的上下颠着，他舞文弄墨地用“主观叙事法”，“人体隐喻法”，“印刷比较法”和“具体和抽象结合法”等词语，还提到了诸如拉康、福柯和德里达的名字，这些都像是五彩缤纷的彩纸般，弄得我头晕目眩，而一边赛曼塔那痛苦的目光却从四面向我投射过来。

瑙咪没来。整晚我都拿眼不停地瞄着门口，期待着她那高大匀称的身材出现，身上裹着从跳蚤市场买来的黑色鳖脚丝绒衣服，手里拿着香烟。他们讲完话后，我躲到展览馆后面的办公室里给她打电话。她的声音含混不清，说话时舌头打着卷。我明白她喝醉了。

“怎么回事，你在哪里？”

“今早我把我妈送走了。她把家里擦了个里三层、外三层，三天都没睡觉，完了她还把剩余的消毒液给喝了。我算是全完了。”

“我整晚都在等你。”

“在……在哪儿等？”她忘了，忘得一干二净。

“在展览馆，”我一字一顿地说，“在我首次画展的开幕式上。”

“来，我们来玩，有一个世界，那里有……”她的声音像是来自一个空啤酒桶里似的。

“现在？你疯了吗？你知道，这里来了多少人吗？”

“只玩一会儿。三四个名字吧。”

可是我一个名字也想不起来，或许除我自己的名字外。

“不行。开幕式过后我再给你打电话。你要挺住啊！”

可当完事后，我跟山逊和另外几个人一起去了一家高级餐厅吃饭了，吃完饭，我们回到了他的住所，很快就上了床，他的嘴又游移到了我的乳房上。

第二天早晨，我给她打电话。我电话吵醒了她。她说，她回头给我打电话。可她再没回过电话。

杰尔也来参加了开幕式。众人里他的一双蓝眼睛火辣辣地望着我。几天后我们开始约会。然后就搬到一块儿住了。三年后我不再服药，并很快怀孕了。我们结婚了。我给瑙咪寄去了婚礼的请帖，她没来，她消失掉了。我也就随她去了。

我从公园里出来上了大马路，打车去哈罗夫大街。二十年前像这一样的冬日的上午，跟现在一样的时间，我总是从学校里溜出来，到他那儿去。我把我的脸贴在他散发着干净衣服香味的格子衬衫上，而他则用他湿热的手，替我解开蓝色校服上衣的纽扣。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什么时候？是两年前。不，还是在那次流产前，大约两年半前的样子。我们在特拉维夫的海滩边喝咖啡。他问我，我结婚是否幸福，他还说他自己从未有过幸福的感觉。几个月前的时候，他在电话留言上说了一句：“今早我离婚了。”另外还有他的电话和新住址。

我没打电话告诉他我要去。我知道，自己等着在他的家里见到他。

还没到塞福尔广场时，我听到自己突然跟那个上了年纪、像耶西尔老爹一样带了一顶鸭舌帽的司机请求道，向右拐，去卡迈里亚，等我几分钟。他从镜中很快地看了我一眼说，女士，请您快点，您要记着，计价器可是在不停地转着。

那扇油漆已经剥落的白色小门，在我的手中发出吱的响声。我推开小门，走进院里，本指望着，新住户白天会正在干活。门口的鹤望兰



枝杈上空空如也,所有的黄头小鸟都飞走了。我将头伸进去,用舌头接从长长的叶片上滴下来的水珠。后来我又从屋外绕到后院。院里松树根下还剩下几棵紫罗兰在那里长着,中间是绿色的花心,水仙花发出像病房里苦中带甜的香味。草地中央的那两棵新娘和新郎树,上面的叶和 V 形花都已落尽了,灰色的枝杈像人的胳膊似的直指白色的天空。我到露台上坐了坐,又来到绿白条相间的秋千上坐了一会儿,秋千在我身下吱吱嘎嘎地响着,并且还向一边歪斜着,扶手上到处都是湿漉漉的雨水。露台的桌子紧靠着墙,上面蒙着一块塑料布,白色的椅子像宝塔似的分两处摞在一起,上面的铁饰已锈迹斑斑。我把它们都拿下来,让我们大家都坐上去:我母亲,她两条完美的腿一只架在另一只上,她头戴金冠,面如仙女;我的父亲手捂着嘴微微地笑着;南尼在我旁边的秋千上,两只毛茸茸腿不停地晃动着;耶西尔老爹头上戴着出租车司机那样的鸭舌帽;达丽雅穿着菱形图案的超短裙,头上是一边耸得高高的发式;乌里身着军装,一脸朝气地微笑着;而缪尼姨夫则穿着他的西装短裤,就像在露特姨妈那儿的五斗橱上看到的照片一样。露特姨妈我把她安排在桌子的顶头坐着,跟那个时候一样,她正叙说着她的光荣史,声音忽而戏剧性地高起来,忽而又变得低下去,悄声细语地,好像在跟我们透露一个秘密似的,而她的不知疲倦的手指,根据季节的不同,或在剥一只无籽蜜橘或在扒一个芒果的皮,要么就是用一个银白色的核桃夹夹着核桃,然后把它们,几乎让人察觉不到地放入我们的盘中。

来者中已有一半的人聚在以往的一张桌子周围,我在心里想着,而其余的人则分散在各地。只是她要陪着她的丈夫和儿子,还有她的兄弟和侄女,这也是很自然的事,因为一个被以往生活切断了的人,或许可以在一种他自己建立的新生活里重新站稳脚跟,可是那个新生活却被再次切断、身体受损、与这里紧密相连的根没有了的人,是无法安慰的。

计价器还在转着,我嘴里冒出这么几个字来,是的,计价器还在转

着。我心情沉重地站起身来走了，并希望，露特姨妈有一天不会实现她来这里——在她的花园里小坐上一会儿的愿望。

到了哈罗夫大街那所房子跟前，我用左手付钱给了那个耐心极好的司机后，就沿楼梯往三楼爬去，心脏在我的胸腔里像只巴甫洛夫狗似的怦怦直跳。门铃旁边的墙上用黑色的毛笔胡乱地写着："莱福。"指头还记得敲上两下，一下、两下。咳嗽声。"等一下。"咳嗽声。脚步声。

门开了。门里露出一张笑脸，镜片后面闪着光。头发又白又枯。那件格子的法兰绒衬衫他穿着太小了，连他的肚子都藏不住。我把脸贴向他满是胡楂的脸。闻到一股汗和酒精夹杂的味道，还有点什么。或许是老了。

"稀客稀客！是哪股风把你吹到我们省来的？"

"我自己也不清楚。我希望，到我离去的时候我会知道。"

他摆了一个庄重的手势邀我进屋。四面墙是空空的，一个分辨不清是什么颜色的破沙发，一张油漆剥落的木桌子，一台电视机，一个藤书架，书籍东一本西一本的，像是大学生宿舍似的。

"我住在这儿才几个月时间，"他抱歉地说道，"我把所有的东西都留给她了。"

"到底怎么了……发生了什么事情？"

"还能是什么，我跟一个女学生来往被她逮到了。"浴室里冰冷的陶瓷马桶。一个字都没有的推荐信。

"千分之一被抓到的比例，很不赖啊。"

"你这个下流坯。总的来说，比例没超过三或四。"

"包括我还是不包括我？无所谓了。宝宝怎么样？"我总是这样问，记忆里那双大眼睛一眨不眨地一直盯着我。

他大笑道："宝宝现在在哥兰尼侦搜队，在黎巴嫩。因为他，我又回忆起了我做的那个有关十月战争的鬼梦。我担心得都无法入睡。我一直在吃安眠药。"



"女孩呢？"

"在念心理学硕士，在巴伊兰大学。"

"你呢，你过得怎么样？"

"相当消沉。怎么也振作不起来。"他伸出手，像是要从我的额上去掉一个看不见的头发。"我很高兴你来。"

他建议我们坐到阳台上去，他从厨房里拿来一瓶白葡萄酒和两只玻璃杯。从阳台看去，外面晴空万里，卡迈尔的山坡上满目苍翠。过了一会儿，云层像是一床灰色的军被似的将海面上方笼罩。

"为你的生活干杯。"他跟我碰杯时说。

"为除它以外的东西而干杯。"

"好了，别夸大了。"

"时间过得越来越快，快得来不及让人对它说，快停下来吧，我受不了了。五六年前，什么事都觉得还早的很，而现在好像忽然感觉一切都太晚了。我很快就要经历人生的每一种选择了，我已接近我母亲生病的那个年龄了。"

"这说明不了什么，"他试图安慰我说，"你会活到八九十岁的。"

"是的，肯定是的，"我尖刻地说，"当你还是个孩子时，他们就欺骗你，你会长大成人的，会生孩子，然后还会有孙子，最后你会死的，可到那时你已经很老很老了。究竟有多少人一生中能够逃脱掉疾病、车祸、战争，以及残暴男人的袭击和谋杀，从而活到八九十岁高龄的？极个别人。"

"我的母亲就是其中之一，"他微微一笑道，"她九十三岁了，近几年来常常神志不清。昨天我去护理院看她，而她竟然问我是不是个男人。我说，是的，她又说，'你过来，我要你'，当然是用意第绪语说的，她还伸出手来拉我的衬衫。我只好对她说，我很爱她，但是今天太累了。"

我听后大笑起来。露特姨妈和那个前消防队指挥，那个用胶囊外壳做帽子的人，还有尤迩的母亲，他们毕竟都是很幸运的人。在一个有着《美丽而勇敢的人》的世上活着真好。

“你丈夫和女儿好吗？”他问，没等回答就又说道，“你知道吗，我原以为你会跟那个讲师结婚的。”

“他已经结婚了，是跟他自己。我感觉自己好像是汽车上的第五个轮子。”

他大笑。“你现在在画什么？”

我跟他讲了画超声波画的事。我拒不承认会很快地将此作品付诸一炬。“我从画中挑出有缺陷的胎儿，可从中看到诸如公鸡，青蛙和猫之类的动物。”

尤迩皱了皱眉头。我真不该跟一个因极度恐惧而无法呼吸的人描述这种令人恐怖的东西，两腿叉开，躺在产床上，肚子上涂抹着冰冷而黏糊糊的东西，屏幕上是片片雪花点。

“就像做心理测试时看到的斑点一样，”我努力地解释着，“每个人都可以从中看到他的心灵之图。恐惧。怀纳亚玛的时候，我害怕了好几个星期，害怕自己会生一只鸡。而第二次怀孕时，害怕变成了现实。”

“别说了，这是病态，”他将一只手向天伸去，“你要人的心灵之图，你为什么不画画云彩呢！”

画云彩。就像埃尔·格列柯的《托莱多港一瞥》。我喝了一口酒。它聚焦在我的眼中，周围的景致渐渐变得清晰起来。穿透云层的太阳，山形，谷地和沟壑。我深深地呼了口气，心中突然为之一亮，以前就是这种感觉开启了我绘画的兴趣的，但是，在过去的一些年里，除了在巴黎的那个早晨，在我面前它藏起了自己的脸。是啊，有好多年来，我都是心情阴郁地来来往往，不断地谈恋爱，到如今，心已是疤痕累累了。心情变得越发沉重，就像身体难以推醒、转身和摇动一样。似乎是一种第六感，即不安的感觉，这种感觉跟另外五个感觉一起随年龄的增长而渐渐消退。

“你是不是把衣服脱了，”他突然说道，“我有种画你的欲望。”

“是对什么有欲望？”

他笑起来。“那方面的也有，但是近来我不行了。很显然是因为吃



了安眠药的缘故。我们拥抱一下,好吗?"

我打量着这个男人,这个我曾经多么的倾心,以至于心里容纳不下任何其他东西的男人。我想亲吻他那熟透了的葡萄嘴唇,它藏住了他的坏牙,因睡眠缺乏而发红的眼睛下方有了眼袋,白发从那件法兰绒衬衫的领口向外窥望。他也想亲吻那个更衣室女人的身体。我们俩想相互安慰一下。

"我很想跟你睡觉,可那些年里,我拼命严格地管束自己,并过着一种规规矩矩的生活。"

"对丈夫和小家庭有一种小市民般的忠诚和关心。"

"不是。是一种规规矩矩的生活。是人的生活,就像我姨妈说的那样。"

雨又下了起来,雨水模糊了视线。我们回到屋里。尤迩拿来素描簿,打开电暖炉,我脱去衣服,几乎是带着渴望,把自己重了二十公斤、老了二十岁的身体展现给他。又从他的眼里找寻吃惊的目光。

"你看看,是不是原来的美味佳肴都变成了一堆肥肉了。"

"胡说,"他低着头在纸上边画边评说道,"你很美。你所拥有的是一个成熟而美丽的女人的体态。"

杰尔也总这么说。"你的身体是大自然的造化。"为什么这让我难以相信?如果他提到鲁本斯或是提奇安的名字,我可能会掐死他。可他没再发表评论。他默默地画着,时不时地抬头看我一眼,螺旋形电暖炉映照在他的眼睛里。我在沙发上躺下,抽着烟,一边还喝着酒,慢慢变得有些醉意蒙眬了,享受着空气在我的皮肤上轻轻地抚摩,还有醉人的暖意和他的目光,一个成熟而美丽的女人的身体。我该为之而高兴。况且这不可能永远如此。用不了多久,衰老就将开始。保养费花得更多,荷尔蒙发生变化,要补钙,每年做一次乳房 X 光检查,配眼镜,治疗牙龈,切除子宫,等等等等,谁知道还有多少诸如此类的事情。而后是脑血栓,帕金森氏综合症,养老院或者护理院。西蒙·波伏娃说得对,最终是身体来决定我们的一切。

忽然他吃惊地站起来说:“几点了?我全忘了,我还有课。你可以待在这里。冰箱里的东西只管拿。只是里面的东西很少,光棍汉的冰箱嘛!”他抱歉地笑笑说,“我回来时,如果你还在这里,那我会很高兴的。”

他去剃胡子了。我跟他进了浴室,赤身坐在冰冷的陶瓷马桶上。

“你说,”这个问题从我的嘴里脱口而出,“人怎么才能放弃伟大的梦想?怎么才能安于……”我不知下面该说些什么了。

“人能安于现状,”他满脸泡沫地从镜子里看着我说,“就像你说的,人要努力地过一种规矩的生活。做生活中的强者。能做的面面俱到。做毕加索那样的人不仅过得不容易,或许还挺艰难的。比如我吧,就是一个失败的例子。”

“或许我当时该选一个别的专业才是,”我想到就大声脱口而出,“像你女儿一样念心理学,或是当医生,给予别人帮助,自己开始做一些有益的事。你从不相信我能成为一个毕加索样的人。你相信瑙咪可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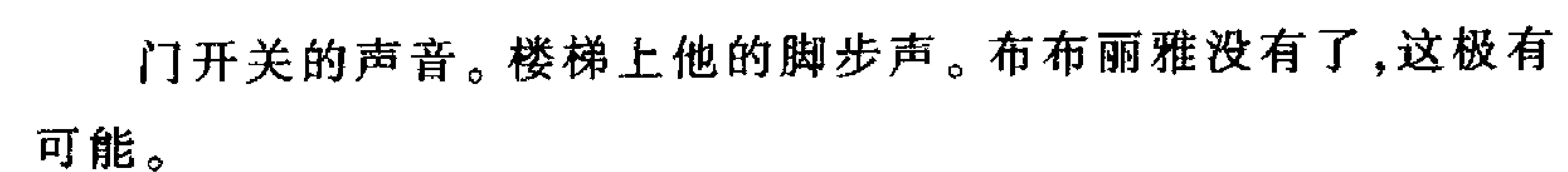
“瑙咪在自信和自我展示方面都有问题。”他笑笑说道,一边用手把剃须爽肤水拍到脸上。以前他衣服上的味道就足以让女生们陶醉不已了。“要获得成功,仅有天分是不够的,这你很清楚。毕加索只是一个个案。她在哪儿,瑙咪,你跟她有联系吗?”

“没有。”瑙咪十年前就消失掉了。是我让她消失掉的。只有在梦里她才回到我的跟前,就像去世的人回来一样。她清醒的眼神,她美丽的卷发,她骨节宽大男孩子般的手。一开始的窘迫过后,我们俩之间又跟以往一样了,好像是乘灰狗,在从纽约到新奥尔良的路上。

“不久前,我遇到你们班里的一个男生。你听他跟我还说了她些什么,她皈依东正教了?差点自杀了?搬到纽约去了?我忘了是什么了。真是老了。”

他用他带有爽肤水味的手捧起我的脸,然后吻了吻我的嘴。

“我得走了。我晚上回来。别走。”



门开关的声音。楼梯上他的脚步声。布布丽雅没有了，这极有可能。

我回到客厅里，喝完剩余的葡萄酒，连他杯里的也喝干了。之后我朝卧室看了一眼：有一个老式的吊柜，有一张双人床，上面有一只枕头和一床没有被套的羽绒被。这张独自一人睡觉的老男人的床。我倒在床上。我认出，已经洗得很旧的床单和橘黄色的花枕套还是从舒沙纳特-哈卡迈尔大街原来的家里拿过来的，可是在她的味道里，像那时他的法兰绒衬衫上一样，混合着一点酸酸的味道。我可以跟他睡觉。只一次。每一个已婚的女人都有权得到一次这样的机会。我想象着他睡在我的身下时，他的身体，他的阴茎，他的嘴唇，还有我嘴里剃须爽肤水的味道。在我的想象里，他变成了二十年前的他。他把我放在地上，脸朝下，然后褪下我的牛仔裤。过了一会儿，他又变成了杰尔，他躺在我的身上，眼睛紧盯着我，在我的头顶上，他的手紧抓着我的手腕。我起身跪着，杰尔在前，尤迩在后，八，九，十，站在我身前和身后的俩人都抓住了目标。我愉快地配合着他们从四面八方进入我的身体，我把手伸到大腿间，是为了延长这一时刻，还没完，还有一点，可身体自有它自己的意志，它在床垫上不停地扭动着，直到整个躯体内达到了高潮，获得了美妙而震颤的满足。此时此刻，身体突然决定要来个庆贺。

过了一会儿，我醒了过来，解了一个时间很长的小便，穿好衣服，去查看冰箱里有什么。里面几乎是空的，只有半包勒伯牌奶酪，一个冰冻的披塔，两瓶白葡萄酒和一瓶伏特加。我把披塔放在面包炉上化冻，从塑料袋拿出来着奶酪的面包，像一个大病初愈的病人似的大口地吃了起来。

后来我又开了一瓶葡萄酒，我把它拿到阳台上，整个人蜷缩在藤椅里，放眼看着灰色低沉的云层，云层缓慢地移动着，渐渐地将天空遮盖了起来，其间露出一些淡蓝色的云彩，飘逸轻盈，很像是夏季的云霞，其边缘耀眼夺目，刺得人睁不开眼睛，其后是一道绚丽的扇形光束散射到鱼鳞似的银白色的海面上。我吮吸着大海和雨后的泥土发出的

芬芳，喝下了很多酒。云彩向我这边飘来，其间变换着各种造型，述说着谜一样的故事；一只狗的笑脸，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像连体双胞胎似的紧挨在一起，一个长着翅膀的老头，纳亚玛的卷发，米开朗琪罗的《亚当的创造》，一只根本就是上帝的戴着鸭舌帽的大象。天空一片一片地清朗起来，变得像是一块蓝布。落下大海的一刻，太阳光芒四射，将云彩染成幻觉中的颜色，然后又渐渐地让它消失，就跟人抽完了一支香烟，烟头上留有的烟火一样。

我思忖，画云彩是很难的，它们飘啊飘啊，飘个不停，就像是纳亚玛磁带里的那首叫"百首童谣"的歌似的，我不由自主地跟着听过不止百遍。我想起了歌词，就醉眼蒙眬大声地唱了起来：

树儿们怎么样？它们欣欣向荣。房子们怎么样？它们矗立在那儿。云彩儿怎么样？它们飘啊飘。刺儿啊，很扎人。鸟儿呢？它们飞啊飞，飞啊飞，直到飞不动。

时光就这样飞逝。大地震动过后复又平静。还有什么事不是这样呢?！我直着身子跪在阳台栏杆边的地上，闭着两眼，双手紧抓栏杆，清凉的风夹杂着一股薄荷味向我扑面而来，我对着天，对着大海，对着渐浓的夜色唱着，就像那时在里夏特·莱瓦大道面对着落叶一样，我明白了，万事皆有其存在的理由和使命的，因为如果没有地震，没有洪水或者导弹的袭击，树木是会年复一年地兴旺繁荣，房屋多数时候都好好地在那儿矗立着的，云彩也会到处飘移的，时光就是这样渐渐地逝去的，地球的平静，说明了，无人死去，大地也就不必张开它那吞食东西的大口了，但这只是暂时的，因为无论是吞下还是让其活着，这些都是它的使命，假如它不吞掉什么的话，那它又怎能拿出些东西来呢，这一刻我的内心深深地懂得了，死同生道理相同，时辰到了，那他是难逃一死的，我明白，上帝并非凶狠残暴，他或许只是有点漫不经心而已。

我急急地走进浴室里，打开镜门后的小药箱，刚才尤迩还满脸泡



沫地对着镜中的我冷笑过。我的眼睛很快便锁定了四包佳乐定和三包舒乐安定。共七十片。应该够了。我每种给他放回去两片，为的是让他度过今晚。其余的我全部塞到我的手提包里，然后我打电话要了一部出租车。当我带上身后的门时，我才想起来，我连他的素描本都没翻一下，也不知他把我画成了什么样儿。

出租车在旅馆过了一下，为的是让我取行李并把房钱付掉。当我在整理衣物时，我又想起了那首歌的最后一段，我轻轻地哼唱着它，酒劲却开始发作起来了。

我，我要干什么？什么也不干，什么也不干。我，我要干什么？什么也不干。我？我就这样问啊问啊。时光就这样飞逝，大地震动过后复又平静。还有什么事不是这样呢？！

车在德莱西-哈亚母大街一路向下行驶着，而那首歌却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挥之不去。我迈着小步慢慢地踱着。我想晚点到那儿，这是为了不让任何人看见我。冷风扫打着我的脸，并从我的领口直往里灌。当我走进旋转门时，服务台上方的时钟正指向十点半。那个年轻的职员眼睛盯着一台小电视，越过她的肩膀，我认出电视上是那个红头发的斯科丽，她是《X 档案》的女主角。我悄悄地溜到电梯那儿，心里有种飘忽不定的感觉。或许露特姨妈已经睡下了，听不见我的敲门声。或许那个前消防队指挥正在她那儿。或许他们今天拿来的是《美丽而勇敢的人》里特惊险的一集，并且她明天还想接着看呢。我咽了下口水，手指僵硬地敲了敲门。

“是谁呀？”她的声音很清晰。

“露特姨妈，是我。”

里面传来拐杖戳在地上的声音。门开了。她的目光很是吃惊。

“我给你带来了，”我气喘吁吁地说，“六十六片。肯定够了。”

她的蓝眼睛一下变得暗淡了。我能从中看出，她的思想在激烈地斗争着。有那么一会儿工夫，我担心她是不是把那事忘了，只是说说而已，一句玩笑罢了，此刻她会怎么想我呢？但她还是伸出了她那只健康

的胳膊搂住我的脖子，把我的头紧贴着自己。

“我把它给你放这儿，”我拼命忍着不让眼泪流出来，“你把它藏好，什么时候准备好了，就把它吃下去。”

“我现在就把它吃下去，”她坚定地说，“你要帮我。我知道，只有你才能帮助我。”

“你能肯定吗？你明天不想看《美丽而勇敢的人》了吗？”

“那东西很无聊，”她用她的好手示意着说，“你可以连着一个月都不看的，到时候你会发现，这期间什么也没发生，而你也就什么都没漏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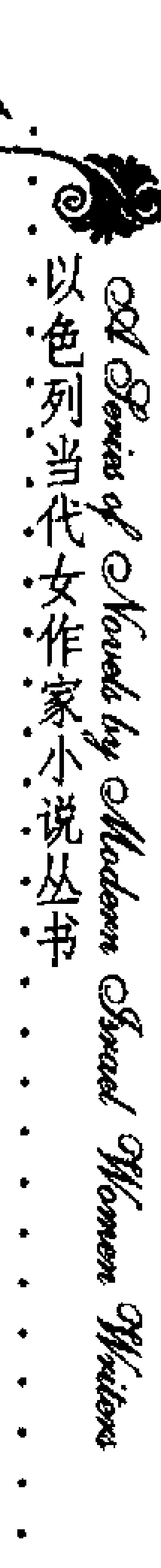
“一个月？”我向她投去怀疑的目光。她朝我眨眨眼。

“你想给达丽雅写封信吗？阿雅拉呢？”

“不必了。她们都会背我的信了。一切准备我都做好了，”她放低声音轻轻说道，“我躺到床上去，穿着衣服，你把包装盒里的药拿给我，我的手不方便，身边这里我需要放上一杯水，喝完了，你把它再添满，我吃下所有的药片后，你就把大灯关上离开。”

我手脚僵硬地帮她把鞋脱掉躺到床上去。我把缪尼和乌里的相片，还有达丽雅和阿雅拉的婚纱照拿近她的身边。我把杯子放在五斗橱上面，然后把药片倒在我僵硬的手掌上。我像是生了一场病似的，每当一粒粒的药片从铝制包装里跳出来时，身体都像高烧似的发冷打战。我知道，我的余生也免不了要服药的，此刻的这种声响，可能会像死神发出的声音一样，在我的耳畔响起。我把药两粒两粒地放到她的手上，放在那条又长又粗的生命线和粘着一点泥土的情感线之间的地方，而她则带着一脸专注又凝重的表情将药与水一起咽下肚去。

“你知不知道，”她突然停了下来，“只有一件事我很后悔，那就是明天一早，给我做理疗的女医师进来发现我这个样子。她会哭得很伤心的。她很喜欢我。可以说是一种爱。她长得像长颈鹿那么高，头上的卷发很漂亮，脸上总是笑嘻嘻的。她从早到晚不辞辛劳地为我们服务。我跟她说，亲爱的，抽点时间去结婚，去生孩子吧，可她却呵呵地笑着



说，你们不就是我的孩子嘛。今天早晨她跟我说，你以后一定要跳舞给我看，就像你年轻的时候那样跳，我问她，你从哪儿知道我以前跳舞的事情来着，她说，我看过你跳舞。我问她，是在什么地方，是什么时候，我怎么记不起她了，可她却不想说。"

是在那个长长假期里的那几个下午。我们仨在房顶的露台上，随着收音机里的音乐旋律跳着舞着，脖子上套着粉白两色的夏威夷花环。她叫什么名字？我本想问来着，但只觉心里狂跳个不停。养老院的理疗师。这有什么不可能的呢？这跟所有可能的情况一样好。比别的一些更好。我突然明白，我可能会见到她，是在葬礼上。

露特姨妈把杯子递给我。我迈着僵硬的步子来到水龙头跟前，将杯子接满水。我继续往她的手上放药片，每次两粒，我的血流都光了。空空的药片外包装堆积在五斗橱上。可以做六十六顶消防队员、宇航员和村姑的帽子。露特姨妈咽下最后两粒佳乐定后就闭上了眼睛。此时我想起了纳亚玛，我还没给她买礼物呢。我怎么能不带礼物回家呢？

"露特姨妈，"我低声说，"我能不能带一件伊格尔·拉宾诺维茨的手工给纳亚玛？"

她睁开眼睛，人还很清醒。"当然可以，都拿去吧。"是的，她很喜欢它们。她也喜欢用纸剪各种形状的东西。她把它们做成各种美丽的装饰。有一只鸭子的两个脚和嘴巴，有一对蝴蝶的翅膀，还带着一个布条尾巴，有一个爱神丘比特的弓，还有一条芭蕾舞裙。她穿或戴着这些东西，脸颊红润，很有活力地单脚立地旋转着，一边嘴里在唱着：

谁不知道
爷爷弄断了他的脚指头
谁没看见
爷爷仍年轻有活力

我站在床边，注视着那张平静的脸。有好多次我都害怕地想象着，

当别人通知我，她——我童年的最后一位见证人，不在了时，是一种怎样的情形。我宁愿躺在她的身边，盖上她的羽绒被将身子暖和起来，就像那天夜里一样偎依在她的身旁，当时我七岁，那时在我一生中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了同情这种崇高的情感，可她又一次睁开了眼，沉重而迟缓地说："现在就走吧。过一会儿样子会不好看的。我想一个人待着。"

我两眼茫然地在冰箱那儿摸到一个塑料袋，把消防队员和村姑放了进去。然后给她鞠了一个躬，嘴唇僵僵地吻了一下她的半边好脸。露特姨妈再次睁开了她的眼睛看着我。眼眶噙满眼泪，沿着太阳穴流了下去。我等着听最后的告别话语，但她闭上了眼，只摆了摆手，用她的手指碰了一下我的手指。我打开门，看了她最后一眼。她的样子很美，而且很勇敢。我关了大灯走了出去，将门在身后轻轻地带上。电梯里的白光在我的面前碎裂成千万道碎片。总台里的那个女工作人员坐在椅子上打盹，电视里现出的是《X 档案》的片尾字幕和音乐。

直到坐上出租车，驶往特拉维夫时，我的眼泪才止不住地往下流，我浑身颤抖，牙齿磕碰发出声响，心里感觉恶心想吐，心跳每分钟两百次。我呼吸急促，拼命地喘着气，一边用大拇指把眼泪抹去。

"有什么好看的，"我急忙跟这位年轻的从俄罗斯来的司机解释道，他正不知所措地从后视镜里看着我，"我很爱的一位姨妈今天去世了。"

或许还没呢，我不安起来，或许此刻正好有个人进了她的房间，发现她呼吸急促，呕吐，就马上向急救站报警了。也可能在最后一刻她自己后悔了，就用手按了床头的按钮。但是，我心里清楚得很，事情已完成了，而且好像谁都不曾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儿，就像是一幅完美但却没有署名的画一样。

黑暗的大海在无声地咆哮着，雨水擦洗着汽车的挡风玻璃。我把手插在大腿间以暖暖手，人仍然抖动个不停。我闭上眼，脑中出现了在



齐亚产房里的情形。纳亚玛的头，一个小黑点点，在我旁边的婴儿床上，露特姨妈给她盖上那床蝴蝶小被，泪眼湿湿地对我说，现在对你来说，一个新的生命开始了。杰尔站在门边，面前拿着一个相机，在给盖着蝴蝶被子的纳亚玛拍照，在她的一边是露特姨妈的一只不再白皙的手，手差不多跟宝宝一样大，手上青筋突出，而且有了老年斑，手指上带着一个结婚戒指，指甲缝里都是泥巴。照完后，他放下相机笑着说，这张照片一定不错，他的两只眼变成了窗外巨大的海面上的两道裂缝。

我想着要把那张照片放大，把它复制成一张画，或许就叫"新的生命"，可转眼我就想，并且自言道，还是把那些个时刻保留在记忆里更好。

我轻轻地走上楼，把房门开得大大的，我的身上像裹了一层冰凉透彻的东西。屋里很黑，有着它自身的味道和声音，像是一个睡眠中的人身体里发出的味和声一样。我走进纳亚玛的房里，看了看她那熟睡中神色凝重的小脸，我把冰冷的鼻子在她温热的小脸上贴了贴，又摸了摸一下她额上汗湿的头发。我把那个村姑和那组消防队员放在她床边的架子上。然后才走进我们俩的卧室，脱掉衣服，紧贴在杰尔热乎乎的背上，他的背宽大而又光滑，跟杰拉德·德帕丢斯的背一样。他向后伸出手来把我拥住。我把我麻木了的手插到他的胳肢窝里，把脚夹进他的两腿间，好半天我才开始渐渐暖和起来。

我知道，明早醒来后，我是要查验一番的。如果我有了它，那我很清楚，这可能是最后一次了，因为现在子宫已做好了准备，并且时机已经成熟了。我看见自己不再像以往那样，在画室的小屋里那一个个已经支起来、但却仍是空白的画布间来回奔波，就跟一只马蜂似的，不停地围着一个伤口，吮吸着它的血腥味，而是坐在屋顶的露台上晒太阳，置身在刚刚浇灌过、新芽正吐绿的花草里。同时我的肚子和乳房都也鼓胀起来，像一个巨大的瓜园似的充满了这个露台，上帝从上往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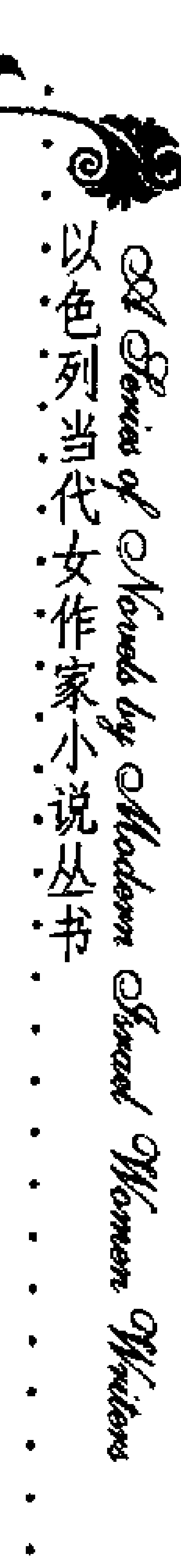
看见我时，肚皮都笑破了。然后我会生出一个宝宝来，我哄他亲他，带他到外边玩，把他用婴儿兜系在我的腹部，好像是我身体的一部分似的，安息日的时候，我们全家，杰尔，纳亚玛，还有我和宝宝，我们一起出去散步，我们去海滩或是去亚尔孔公园，在草地上铺上一块布，我们舒服地躺在上面，透过树上的绿叶看蓝天，在云彩里找像人和动物的造型。

杰尔熟练地驾着车开往公墓。我们马上就要进入大门了，我会跟达丽雅和阿雅拉拥抱，她们的脸上有哭过的痕迹，她们会一直说，她解脱了。然后我的目光会去搜寻一位女士，她长得像长颈鹿一样高，头上的卷发很漂亮，手上拿着一束鲜花，我会走过去，对着她的耳朵小声地说，活在一个有你的世上真好。

此时此刻我们坐在车里，我们还有一些时间。杰尔边打开雨刮边说："幸好你去了趟海法，赶上跟她道了声别。"我答道："是啊，真是很走运。"收音机里他们正播放莱奥纳德·科恩的《幸运姐妹》。二十年前他就上了我们喜欢的歌手名录。活在一个有莱奥纳德·科恩的世上真好。

1998年秋





一首家庭练习曲

“亚得里亚”

海法，1931年8月31日

亲爱的莫瑞雅，你好！

本周已接近尾声。摄影师正忙着，因此我赶紧给你写信，免得你怀疑我不够绅士。

经过极其无聊的四个小时的航行之后，我终于到达了海法。

雅法港将我从快乐的女伴身旁夺走，与她的分别令我很难过，而与勒伯·亚珐长篇小说《亚得里亚》中的主人公们的分别则更是让我伤心百倍。

我仍然希望不久能在海法我们的那个朋友圈中见到你，到时我一定要让你好好地高兴高兴。如果你能够在那所带附属幼儿园的瑞尔里中学里找到一份工作，那么我会很高兴的，我觉得在马特的帮助下，凭借你在德国所学的知识，在即将到来的新学年里，你是完全能够胜任这一工作的。你也可能会对瑞尔里中学旁边的那所寄宿学校感兴趣的。

另外，当马特和哈娜回海法时，我将会很高兴地告诉你的。

就你而言，我希望，你所见到的家人们个个都平平安安，人人都和和美美。

我的父母，还有几位亲戚和朋友都来海法给我接船了。我们这个

城市很小，它方便了我在最短的时间见到了我在海法认识的每一个人，“欢迎”二字我每天都要听上百遍之多。

到达的那天早晨，我就开始了我的工作。节奏如此之快令我本人，也让一些朋友都深感吃惊。实际上你很清楚，乘“亚得里亚”号旅行有多么辛苦。

可是我的迟归以及雇佣一个员工的开销，使得我不得不带着疲惫，刚刚度完美妙的假期，就立刻投身到喧嚣繁杂的工作中去了。

那些我在欧洲逗留期间所拍的照片并不是很成功，我在船上拍的那些也够不上什么水平。尽管如此我还是随信附上几张好的给你。我希望，在你到海法之前情况能有所改善。

我希望你很高兴收到我的来信。

期盼尽快收到你的回信。

你的朋友

艾玛奴埃尔

1931年9月4日，特拉维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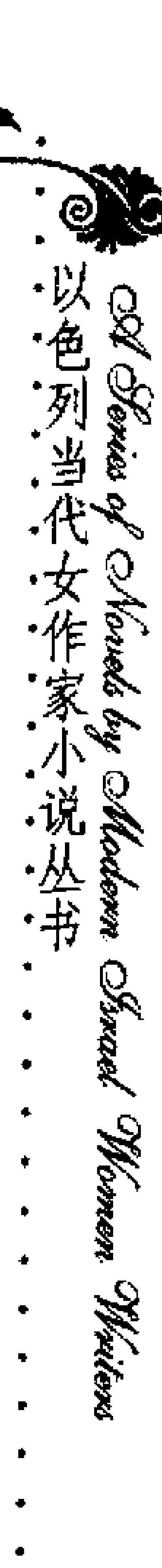
亲爱的艾玛奴埃尔：

我终于收到了你的来信，其实我指望着你一回到海法就会给我来信的，可我错了。谢谢你寄来的相片，它们真的非常漂亮。

你信中的口吻有点像外交辞令，或许你曾答应要这样给我写信，要么就是我事先猜到你会这么写。而我是个普通的人，所以跟你说话也是如此。

我在这儿的日子无所事事。整天不是到海里游泳，就是这里走走，那里逛逛，我见了所有我认识的人，开始几天很累很不适应，整天这个刚走，那个又来了，结果家里上上下下到处都是人。直到这个星期我才真正从乘船航行的疲劳中恢复过来。

安息日过后我就准备去耶路撒冷。我必须开始考虑将来的工作了。我已不习惯整天空寂无聊的日子了，这样的日子我真的过够了。



尽管现在特拉维夫有了发展,但我觉得它还是太小了。一上大街就能碰见所有的人,对此我已无法再适应了。有时候这是让人很为难的事情。明明是你不想看见或不想遇见的脸面,可它们却偏偏违背你的意愿出现在你的面前。可我们又有什么办法呢?我们这里总归不是在柏林,不是在欧洲的另一个城市,这就跟在轮船上的情况一样……

你是清楚的,我们这一路的行程真是美妙极了。时间过去得很快。好东西都是这样转瞬即逝的。

那么,你呢?艾玛奴埃尔,你感觉怎么样?工作如何?是有点想我呢,还是心里早把我给忘了?

共和国节时,我是一定要去海法的。哈娜和马特下个星期就要回海法去了。你去找他们,并代我向他们问声好。之后再写信跟我说说你的印象。

海法现在怎么样?那儿有什么新闻吗?你已经休息好了吗?关于你本人,你母亲都跟你说了些什么?

给我写信,艾玛奴埃尔,多写一些。海法我是一定要去的,所以我希望,到那时,我所见到的你跟我最初相识的那个你一样的完美。答应我,好吗?

对了,艾玛奴埃尔,我很抱歉我下船的时候没把借你的钱还给你。我一直都很担心你的家人会不去接你,而你又身无分文。我当时心里很乱,结果把什么都忘了,你为什么不提醒我呢?我感到很抱歉。

暂且写到这儿吧。再见!

向你致以衷心的问候!

你的

莫瑞雅

以后的工作情况暂且不详,因为我是不会接受教师这一职位的,而是想从事社会方面的工作。大概会受聘于民族委员会。可能会在耶路撒冷,也可能在特拉维夫或是海法。

在回到巴勒斯坦的最初几天里，祖母莫瑞雅穿着她的高跟鞋上街，这是她在柏林买的，她的头上戴着绿色的呢帽，金色的卷发从帽檐垂落下来，这给她带来了“德国美女”的别称，这个外号一直保持到她跟祖父艾玛奴埃尔结婚并搬到海法他父母家附近去住以后。

结婚前她给他的信，一般都是她在阿伦比大街上的贝德尔咖啡馆里写的，坐在那儿的习惯是她在上师范大学的时候就养成的。每一次，她都搜罗出身上的每一分钱，硬拉着她的好朋友——一个叫舒拉米特·波罗霍夫的，几年后嫁给了叫米尔斯基的海法人，他是瑞尔里中学的一位体操教师，婚后，她的名字随夫变成了舒拉米特·米尔斯基；另一个叫哈娜·赖因斯坦，结婚后的名字叫哈娜·弗兰科尔——跟她一起去那儿喝茶，去看比亚里科坐在他的老位子上，此人自那年的春天移民过来了以后，就坐在这家咖啡馆的一个固定座位上了。他坐在那儿俯着身，笔尖下像变戏法似的冒出一行行的诗句，或是一封情书来，因为像他这样的一位大诗人不可能还没有一个恋人，来让他用他的诗歌向她倾诉他的衷肠，并让其做他的秘密缪斯的，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祖母十六岁的时候，常常悄声地跟她吃吃发笑的女友们解释，“你在哪儿？”和“蝴蝶”就是他写给自己的妻子的，她还带着梦幻般的眼神朗诵后一首诗里的片段：“广袤的天宇再次亮了起来——你走上前来，我跟在你的身后！这时大地光芒万丈，万物都变得像你的眼睛般明亮。”她们找各种各样的借口从座位上站起来，从他的背后往桌上看，可是他宽大的肩和白白的手掌挡住了他洋洋洒洒的字迹。间或他会停下手来，心不在焉地看一眼那三个女孩，那是诗人的眼神，祖母会这样对自己说，她极力控制住自己，没向他走过去对他说，她的名字跟他的奥德塞出版商的名字一样也叫莫瑞雅。她们盼着他快点离去，或许他会在烟灰缸里留下一张揉皱了的手稿，可他还是一直坐在那里，舒舒服服地喝着柠檬茶，每当杯中的茶被喝掉大半的时候，他就招呼老贝德尔给他续上热水，杯水几近无色，没有黄黄的茶色时，他的一群朋友就来





到了他的桌前，而祖母认识他们中的每一个人，她这时就嘀嘀咕咕地对她的女友们说："戴圆眼镜秃头的那个，那是拉夫尼茨基，高个子满脸大胡子眉毛像把刷子的那位，那是费希曼，他旁边那个戴墨镜的，那是雅阿克夫·拉比挪维茨，他只有一只眼。"朋友们都要了茶，也给比亚里科要了一杯，他们之间互开着玩笑，交流着政坛上的各种传言和新闻，他们在那儿高谈阔论，大声地说笑，直喊得嗓子发咳才停下。香烟散发的烟雾在他们那一块儿涌动着，像是一朵厚厚的、重要而又富有智慧的云层，直到晚饭时分，他们才都一个个回家去，或是去吃饭，或是去女友处，那个叫拉比挪维茨的小伙子除外。

祖母和她的女友们去翻看烟灰缸，小心地不放过哪怕是一张小纸片儿，她们将纸片抚平，轻轻地吹去上面的烟灰，然后把它们都放在一块瓷砖上，可每次都让她们心里倍感失望，因为她们发现，那个大诗人从头至尾写的全是数字，一串一串的，从数字旁标注着"意大利瓷砖"，"水龙头"，"窗玻璃"，"浴缸"等字样里她们看出，他是在核算他在特拉维夫已经开始修建的房子的开支情况。有时候她们会找出一张记有他一个星期日程安排的纸条，他在上面记着：星期一——在贝采莱尔展览会开幕式上讲话，星期二——作家联合会成立大会开幕式活动，星期三——贝尔福大街白特·施特劳斯大厦的奠基仪式，星期四——希伯来语保护者联合会会议，星期五——在得噶尼亚的基布兹作报告，星期六下午——在欧和尔·色母礼堂参加安息日聚会。有的时候，祖母会使劲地劝说她的女友们跟她一起去参加其中的某一次他要在上面讲话的大会，可是舒拉米特通常都会对她说，莫瑞雅·迈尔尼克夫，你太过分了，而祖母就会一个人前往。

此刻他那个老位子上是空着的，她从"话报"上得知，他去欧洲尚未回来，艾玛奴埃尔在那儿见着他了，他在瑞士巴塞尔召开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大会上看了看。在回巴勒斯坦的轮船上，他给她讲述了一下大会的结果，为了给她留有更加深刻的印象——他立刻就察觉到了她对于作家和领导人物方面的弱项，而且终身都是如此——他还跟她述

说了他在那儿时，与那儿其中的一个修正主义分子结识的情况，那是个年轻的律师，名字叫威士茨，此人将他介绍给了亚伯廷斯基。祖母的嘴微微地撅着，其样子可能是，假如他对她要是能有所预见的话，那么现在就可能让他初尝了一下他们之间一辈子都没完没了的激烈争吵，怒目圆睁，嗓音嘶哑，就像亚伯廷斯基与魏茨曼，哈根纳派与右翼军方组织，右翼的赫鲁特派与统一工人党，本·古里安与梅纳赫姆·贝京之间一样。而我的祖父，只在这一个问题上顽固地坚持自己的信仰，因为在其他任何问题上，他都尽可能地与她保持一致。他从躺椅上站了起来，在甲板上给她表演，亚伯廷斯基是如何从他坐的凳子上站起来，大声地叫道，这已经不再是什么犹太复国主义者大会了，他撕了自己的会员证，之后向魏茨曼夫人走过去，礼貌地吻了吻她的手就离去了。"那比亚里科对这一切都说了些什么？"祖母好奇地问他。

"比亚里科身上裹着件晚礼服坐在那儿，他用手抱着脸，绝望地摇摇头。"祖父说道。

后来比亚里科到卡尔斯巴德温泉去疗养了，并且在冬季到来之前没有可能回来，这个消息她也是从话报上了解到的。医生诊断，他的肾脏上长了结石，她很为他的健康担心。尽管如此她还是不敢去坐他的座位，就坐在边上的桌旁，要了一杯柠檬茶，脱掉将脚挤得又胀又疼的高跟鞋，把格子练习簿和笔及淡蓝色的信纸放到跟前，信是用黑笔写的，字迹娟秀，是艾玛奴埃尔的来信，是她前一天收到的，她的脑海里立刻浮现出他的形象来，瘦瘦的，穿着白色西服的他站在船尾的甲板上是那么的精神，船是从雅法开往海法的，她还记得他金色的头发在风中舞动的样子，五天前他也是那样站在那儿，那次他是乘亚德里亚号离开特里斯特港前往巴勒斯坦的，当时有她站在他的旁边。

那天早晨，即 1931 年 8 月 19 日的早晨，天气晴朗，在机器低低的运转声和吊车及海水噼里啪啦地拍打船板的刺耳声中，那些意大利搬运工们在太阳下光着膀子大声喊叫着，他们的皮肤被太阳晒得黝黑发亮，周身散发着汗味、咸味和沥青的味道。船员们列队站在步桥上，不



停地催促后面的乘客赶紧上船，这是她第一次在码头上看见了他，非常年轻，身材消瘦，长相俊美，他费劲地拖着他的大箱子，脸色苍白，呼吸粗重，而她打小就在自家的果林里，因常搬运装甜橙的筐子而锻炼了臂力，她伸手接过他的箱子，就这样，她两手各拉着一只箱子，脚上穿着细细的高跟鞋，身轻如燕地走过步桥上了船。而他则步伐沉重地跟在她的身后，感叹她的身体那么结实，小腿肚的肌肉那么发达，这让他想起了几天前他在罗马的波尔克海塞别墅里看到的大理石雕塑，她戴着绿色的呢帽，金色的卷发从帽檐脱垂下来，当看到她金发里时隐时现地露出她雪白的脖颈时，他的心跳立刻加速了。她放下箱子，直立起身子，灰色的眼睛直视着他，这时他赶忙在裤子上擦了擦他那汗湿的手掌，跟她握手的时候，他觉得自己的脸红了，尤其是他的那对大耳朵红得很厉害，他结结巴巴地说，真是太谢谢你了，我叫艾玛奴埃尔·利普肯，我有哮喘病。祖母笑着也报出了自己的名字，他问道，你多大了？她估算了一下他的年龄，然后回答道，我二十四岁，其实她差一点就要到二十五了。他说，他二十三岁，而实际上他上个月才刚满二十二岁，他告诉她，他是海法一家储蓄和信贷银行的职员，跟他的父母和妹妹住在一起。这次是他第一次去欧洲，他在那儿待了五个星期，去参加了在巴塞尔举行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大会，他还去巴黎看望了他的姨妈，还参观了伦敦的白金汉宫。她告诉他，自己在柏林的大学里学了三年的社会学专业，现在急切地想回家看看三年未见的家人和朋友。他们靠在甲板的栏杆上，注视着远处渐渐消失的特里斯特港，突然艾玛奴埃尔脸色惨白，他站立不稳，紧紧地抓着她，早饭都吐在了她的新衣服上。这件质地很好的衣服还是她在柏林为回巴勒斯坦特地买的，她抱住他，让他俯身趴在栏杆上，又用一只胳膊搂着他的背，拿手帕擦干他额头上的汗水，并要他做深呼吸，轻声细语地对着他的耳朵说话。他又吐到海里了，连昨天的晚饭都吐了出来，接着吐出是胃液，直到这时她才知道害怕，但旋即又释然了，她对自己说。没什么了不起的，我要照料他，给他擦去额头上的汗水，今生的所有日子，我们两人的箱子都

将由我来提了。

她取下笔帽，心里很矛盾，不知信的开头该用“尊敬的艾玛奴埃尔”还是直接就写上“艾玛奴埃尔”，最后她还是用圆字体在信上写上了“亲爱的艾玛奴埃尔”，因为她想起来他在自己的眼里是那么的可爱。那是在事后的第二天，他们俩都穿着浴衣坐在甲板的躺椅上喝着冰镇汽水，他拼命忍着只看她的眼睛而不去看她身体的其他地方，他觉得自己前一天很丢脸，所以作为补偿，他就给她讲了一些有关他祖父亚尔耶·勒伯——著名的尤尔·莫塞斯·撒罗蒙之子——的英雄事迹，作为这个国家的一位重要缔造者和先锋人物的后代这一事实，似乎也赋予了他一些先人的决心和勇气。他是这么跟她说的，而近六十年后他也是这么跟我说的，或许连用词都完全一样；因为在祖父左一遍右一遍地重述他的故事的那些年岁里，从他嘴里说出的那一套东西，像童话故事一样都成了固定的模式，就连他那双蓝眼睛炯炯发光的样子也都一样。每当他说起自己祖父的时候，总说，他是个高个壮实的犹太人，红头发，络腮胡，一顶红色的非斯帽像个倒扣下来的花盆似的总斜戴在头上，一双满含笑意的蓝眼睛总爱眨巴个不停。他是个生龙活虎的人，祖父带着孩童般景仰的神情说，是个爱冒险而又豪放不羁的人，他爱讲故事，说笑话，喜食味重辛辣的菜肴，烧酒也爱喝上两口。从他家里——他家的房子是那排住房里最漂亮的，家里铺着波斯地毯，窗帘是红丝绒的，墙上挂着金色的画框——总是传出音乐和歌声，这是因为他是那个住宅区里第一个给自己的三个女儿请了小提琴老师的人，三个女儿跟他一样都很结实，长着一头红发。小提琴教师是个新移民来的俄罗斯人，待人接物的方式很随便，这惹恼了当地的住户，他们有好长一段时间在马路上和教堂里遇见的时候都不跟他打招呼，可他总是嘴里骂着一些阿拉伯语脏话，却又面带笑容的对着他们，弄得他们也不好再不理他了，而且他们对他这个人也习以为常了。

祖父勒伯总是骑着马来往于全国各地——祖父接着说他的故事，这时候，祖母发现他的目光里带有一种向往的神情——他跟阿拉伯人





做生意，给他在佩塔禾-提克法的小舅子的店铺带去干无花果串，上好的哈尔玹杏仁，那不勒斯的肥皂，色希母附近出产的橄榄油，土耳其的干鳕鱼，他还从雅法带上俄罗斯的白面，另外还有煤油、矿石和香精油，木盒装的咸鱼，法国的墨倪洱牌巧克力，西班牙的香水和希腊的黑橄榄。我那时还是个不懂事的小男孩，可我清楚地记着我们在小店门口等他的情景，心里是既期盼又有点害怕，直到远远地望见那顶红色的非斯帽，看到祖父策马急驰在大道上，直至看清他那因骑马而弯曲的双腿和背负珍贵货物的两只小毛驴时，内心才能够平静下来。他是整个地区唯一一个不怕"七磨房"黑色蒙面大盗的人，那伙人嘴里衔着一把刀，躲在拿破仑山后的芦苇丛、冲击沙地和野桑树林里伺机作案；相反，他们却害怕他，因为他们知道几年前发生的一件事。

那时祖父勒伯受雇于土耳其政府，他的职责是负责看管当地的农民在取得许可证的情况下才可以种植烟叶，他总是骑着他的马走村串乡，向那些阿拉伯村民们收取烟叶种植许可证费。有一个荷枪实弹的阿拉伯人跟在他的后面，是来保护他免遭坏人袭击的，后来，有两个邻村的村民合谋要杀死他，劫掠钱款，他们买通了那个原本保护他的阿拉伯人，叫他在经过他们其中的一个村子时，从背后向他开枪。那家伙真的那么干了，可他打偏了，击中了祖父的胳膊，又高又壮、性格跟所有长着红头发的人一样刚烈的祖父跳下马来，抓住那个阿拉伯人，从他手里夺下枪，当两村的村民手拿砍刀向他袭来时，他用他那只受伤的胳膊钳制住那个阿拉伯人，余下的那只手举枪向空中射击，村民们鸟兽般飞奔散去。他把那个阿拉伯人架到马上，就这样，他手臂上带着子弹，把他带到了雅法交给了当局，自那以后，他英勇无畏的美名传遍了全国，并传到了大马士革和贝鲁特，至此，没人再胆敢跟他使坏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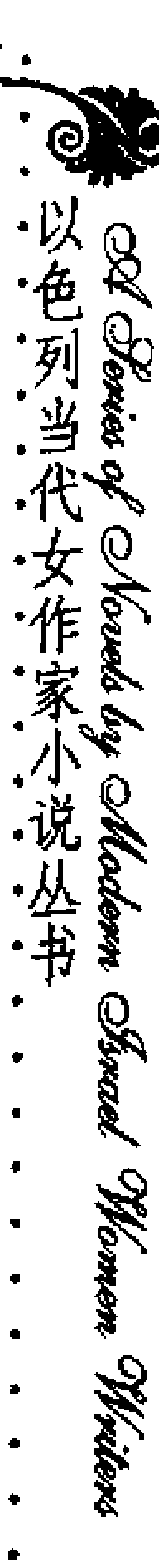
祖父艾玛奴埃尔的两只手一直挥动个不停，而且他还拿手指向天做射击状，他看了一眼祖母，发现她正透过手中的玻璃杯舒服地向他微笑着，她的微笑和眼睛的神态使他深受鼓舞，于是继续加倍投入地叙述亚尔耶·勒伯有一天怎么去雅法做生意的事。他的女儿哈娜——

就是我的母亲，他解释道，祖母莫瑞雅点了点头——陪他一起去的。阿拉伯人都坐在墙根阴凉处，他们手指拨弄着琥珀珠串，每当他们看见一个漂亮的女人，高个金发的女人时，就会马上品头论足一番。祖父勒伯听到他们在议论自己的女儿，恼怒不已，他用阿拉伯语骂了一句，他妈的，就一手一个掀掉了两个阿拉伯人坐着的凳子，又拿凳子砸破了他们的头。当祖父咬牙切齿地说出这些的时候，祖母像是真的听到了他们头盖骨碎裂的声音，做出了一脸痛苦的表情，可随即却又爆发出一阵大笑来，她说，这样一个故事我可不信，一个字儿都不信。祖父责备地看了她一眼，却没注意到，她因被太阳晒得皮肤发干、脑袋生疼，而偷偷地对着空空如也的杯子打着呵欠，他仍自豪地继续说着亚尔耶·勒伯吃的那场官司，说那些土耳其人无论官位大小，一个个都收受贿赂，其神情就好像是发生在他本人身上似的，当法官经过他身边时，他将一瓶拿破仑金奖白兰地酒塞进了他的包里，可法官宣判的时候并没有向着他一边，所以当他们离开法庭时，亚尔耶·勒伯走到法官跟前，从他的包里将那瓶拿破仑金奖白兰地又掏了出来。



祖母不住地打着呵欠，一边还在赔着笑脸，祖父终于发现了这些，他有点尴尬，不再往下说了，可随即作为补偿似的结结巴巴地给她编了几首小诗，什么“美艳而疲倦”，“莫瑞雅与亚德里亚”，然后他把他的躺椅拉近她的旁边，犹豫着用他汗湿的手怯怯地将她的肩环住，他并没把她搂在自己的怀里，他的那条胳膊，像是一只受伤的翅膀似的在她的脖子后面抖动个不停，这时她意识到，他还没有成为一个真正的男人，而她必须让他成为一个真正的男人。

她喝了一口杯中的茶水，在信的开头写上“亲爱的艾玛奴埃尔”和日期：1931 年 9 月 4 日，然后就开始往下写起来，心里边很喜欢纸笔接触发出的沙沙声，很满意用自己的手写出来的一个个漂亮的字母，她可能永远都不会想到，祖父会在大约六十年后，在他临死前的几个月时间，把这第一封信连同其他一打一打的信——他的信是淡蓝色的，她的则是米黄色的，按时间顺序，两封两封连在一起全部都放在一个



牛皮纸袋子里，外面扎着橡皮筋——交到了我的手上，他用他那仍旧年轻的蓝眼睛看着我说，保管好它们，或许将来会对你有用的！

卢森堡公园

特拉维夫，1932 年 6 月 20 日

我的好孩子：

你的信我昨天就收到了。我没有立即给你回信，因为我今天早晨必须去一个地方联系工作，我想把结果很快写信告诉你。可到现在还没有结果。工作可能是在女工委员会里担任半日秘书，还有就是在拉赫尔·卡兹尼尔逊和贝塔·伊戴尔逊不在时替代他们行使职责。这一切还要看拉赫尔·卡兹尼尔逊的国外之行，所以此事尚未确定下来。

昨天晚上我去参加了一个大会，大会是由施泰茵女士主持召开的，另外还有一些很有意思的展览：慕尼黑博物馆技术和电的发展状况。快午夜的时候我才回到家里，家人都睡下了，我躺到饭厅的沙发上，把你的来信又再次看了一遍，我就这么躺在沙发上想着你，一直到深夜，我看到时候真的不早了，就爬了起来，脱了衣服，上床去睡觉。

我心爱的好男孩儿，假如我们能够在一起的话，我又能给予你什么呢，尽管我看得出来，你并没有考虑到这个问题。对我来说，以目前的这种方式生活，我恐怕活不了多久。或许我真的跟别人不一样，我的性格就是如此。我越是担惊受怕，痛苦往往就会不期而至地来折磨我，好像我与你相处的方式也并非是我应有的。亲爱的艾玛奴埃尔，两心相系唯有共同生活在一起，也就是说，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要一起经历生活的每时每刻。

当然我是爱你的，我的天性如此——忠贞不渝，直到永远（我以为，你是应当能够感觉得到的）。到目前为止，我从你身上所感受到的

是你的善良、体贴和关心。可有几次，你的犹豫不决让我有了某种想法：可能你爱我还不够，不是很清楚你我之间的关系——这我绝对理解，有各种各样的可能，但除了希望你我之间能够相互了解外，我别无所求。我不想第二次再在以色列经历同样的过去。这对我而言已无力再次承受了。如是发生在另一个女人身上，可能一切也就过去了，没留下丝毫的踪迹，可我承受不住，我的心灵已经受了折磨，其后便是极度的失望。我直截了当地对你说，是因为我相信你是个正直的人。我们双方都必须对对方的过去有个清醒的认识。我们双方对各自的现在和未来也要认识清楚。或许这样会好一些，我们会相互宽容（你天性也是个宽容之人），避免相互折磨。我不求大富，不求大贵，我只希望拥有一种宁静平和的生活，相互理解，相互尊重。否则为何要先结婚，而其后便是无休止的折磨呢？倒不如全部放弃掉算了。亲爱的，我要你回答我。还有你的想法。

你现在好吗，小坏蛋？你是不是已经开始像你许诺的那样长胖了些？家里有什么变化吗？大家都好吗？

我每天都去海里游泳，皮肤晒得很黑。就写到这里，我的至爱，吻你，我的好孩子。

你的

莫瑞雅

海法，1932年6月22日

最亲爱的小莫瑞雅：

我亲爱的好姑娘，你可能不知道眼下有多难，我觉得这是我一生中所遇到的最艰难的时刻。两天来我一直在外到处奔跑，整个人精疲力尽，心里痛苦不堪，几乎自己都认不出自己来了，但至少我还能够读一读你的来信，只是如若不用回答什么问题的话，那么我此时此刻就成了世上最幸福的人了。



毫无疑问你在焦急地等着我的这封信，正因为如此，我才觉得这封信很难写，这就如同将红海一分为二一样艰难。

我宁愿做世上的任何事情，也不愿去回答你那些令人痛苦的问题。别再去碰它们了，因为无论我怎样回答这些问题，都会带给你无数痛苦的，亲爱的，相信我，我希望并会尽我可能保护你免遭那些痛苦的折磨。

我现在真的像个疯子似的四处奔波。我的头如同轮子一样转来转去，这些话我写了几个小时，有的时候我甚至都不知道我在写什么或是想写些什么。这次我是带着沉重的心情给你写信的，我想你会不难发现的，我的文字里都饱含着热泪。

可你还是以这种决绝的方式提及了这个问题，这个与你我的生活息息相关的问题。那么我只好依你的意思诚实地回答你了。

亲爱的，关于你对我的爱情，这个题目你真的没有必要说出来，我所感受到的你的爱情，你的忠贞，是绝非言语所能够表达得了的。或许我并不值得你爱。在我们共同度过的短暂的时间里，我认识了你并尊重你，如果说我有一个朋友的话，一个爱我并忠实于我的朋友，那么此人就是莫瑞雅。

我觉得，你在我公司里度过的那几个小时是快乐的，我尽我所能，就是为了让你感到快乐。或许你与我有同感，那是一种爱的时刻，其背后是绝对没有义务的。我不知道，也许我过去并没有诚实待你，因此我近些日子里变得极度烦躁，在那个夜晚里，你让我充分感受到了你的爱，之后的三个月里，我人消瘦了，我像个真正的罪犯似的到处溜达，因为我相信，我没有诚实待你。我想，我俩之间存在的亲密关系是有问题的，而且要想抵达目的地，或许我们还须经受许许多多的痛苦。你可能无法理解我的意思，因为我自己也不了解并理解自己。究其原因，大概是年龄的差异所造成的想法上的不同吧。

我相信，尽管你对生活持一种自由的态度，但你这次抛出的问题，将来的某一天你还是会有这样的问题的，而我很害怕它们，对于它们，

我还没有做好思想上的准备,这就如同我还没有准备好过一种独立的生活一样。

你信中写道,你认为再这么下去你就活不下去了——没有长相依,没有共同的生活,你是不可能长久地这样生活下去的。

你很清楚我是多么的重视并爱着你,亲爱的,你也很明白,在我们共同度过的时光里,你对我的影响有多大。你或许是对的,我可能比你更实际一些,可我还不想在自己的经济状况没有改善的情况之下就承担起这个义务来。你可以继续跟我住在一起,也可以像那个冬季一样住在我的附近,当时你在瑞尔里学校上班,住在诺尔道大街,我们每晚都见面,每个星期天我都早早起来,往你的窗子上扔石子。可要长相厮守,亲爱的,那得在三四年之后,如果我们的关系仍一如既往的话,我是这么考虑的。所以你上几次来我这里的时候,就觉察到情况有点变化了。而当你又提及去年在海法度过的秋夜时,我就知道,我和你的关系还没有发生任何改变。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我都希望,让你快乐地度过与我在一起的时间,可是,义务感和对未来孩子似的恐惧让我感到很痛苦,这可能就是你在我这里时偶感不快的原因,这可不是我故意所为啊。

我会倾尽我所之所能,只为使你与我在一起时能够感到快乐。如果有让我尊重的人,那就是莫瑞雅,因为我并非是一天爱一个女孩子的人,在我认识你之前,我没有跟别人有过这种关系。

我可能至今都不了解,爱情到底意味着什么,你或许知道与我的关系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无疑,我们之间存在着一种关系,或许我们可以给它起个名字。

当你提到达尼埃尔的时候,我心痛的无法自制并流了很多的眼泪,——我知道,这个人他伤害了你,我了解你对他的感受,而当我想到,有那么一天你可能不再爱我了,不再写信告诉我让你高兴的事了,而且还把我和达尼埃尔相提并论时,这对我是一种莫大的刺痛,也是你对我的不公。我从未想故意对你做什么,我也未曾有过伤害你的行为。



亲爱的，自始至终我都重视你，爱着你。你要是拒绝我给你写信，打电话向你问好，那么你对我来说就是个罪大恶极的犯人。

亲爱的，我求你千万千万要给我写信。请别生我的气，或许我信中有些东西可能会伤害你，但这并非我的初衷，我并不希望让你心痛，永远都不。我还希望，我在过去的三个月所经受的折磨和我此刻所流下的眼泪，两者相加能足以抵消你的恼怒。你不必绝望，你是我钟爱的可爱的好姑娘。

或许你还会继续爱我，或许来日还将给你带来幸福的时刻，我希望自己能够与你分享之。

望你平安健康，并永远美丽、可爱。

让信捎带去我给你的一千个吻，期盼回复！

爱你的

艾玛奴埃尔

特拉维夫，1932年6月23日，星期四

亲爱的艾玛奴埃尔：

我刚刚才收到你的来信。看了信后，我在床上躺了一会儿，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我想马上就给你写回信，免得回晚了你就说是我不想给你写信，甚至是想中断通信联系。

可我的好人儿，我真的不知道该给你写些什么。有一点我知道，就是我对你感到很抱歉，非常抱歉。由于我的过失，你现在感觉不好；由于我的过失，你现在感到虚弱、乏力、焦躁不安。

为什么会发生这一切呢？为什么平白无故地要给人添加没有必要的痛苦呢？我是了解你的，我知道，你有能力承受痛苦和折磨，这就是我给你写了上一封信的原因，事不宜迟，这只是为了我们彼此间更加相亲相依。

我提及达尼埃尔并不是想伤害你。老天可以作证！我非常尊敬你，

亲爱的，我知道，你比他品格高尚得多，你为人善良、体贴并关心别人。我上封信里写的内容只关乎我本人，即我事先就想避免在与达尼埃尔交往时所遭受的种种痛苦。

艾玛奴埃尔，你不知道，你也不可能知道。在柏林度过的那三年时间我颇感伤痛，有很长一段时间，我的内心极为不平静。那段时间我经历了许许多多的事情。尽管如此，它还是教会了我很多东西，因为折磨可以让人完美，使人更加敏锐。或许正是这些经历塑造了我，锤炼了我。而之前，我完全是一个我行我素的人。可现在，我并不想退回到从前去。没有比时间更加睿智的东西了，该来的它就会来，这是谁也没法阻挡的。

你没有完全明白我的意思。你误解了我信中描述的那种共同生活。

我原想——如果我能像冬天那样在海法那个地方工作的话，就必须每天看到你，给你讲述自己一天的经历，能听到你说话，这就是一种共同生活了。假如在这样的生活里双方都认识到相互缺乏默契，之间没有爱情可言的话，那么每个人只管走自己的路好了，而不必再把所有的痛苦都交织在一起。



可是如果我们相互远离，我感到难以确定你究竟能给予我什么。我曾经告诉你，我必须感觉我在被人爱着。我就是这样一个人。我知道，那种我感觉不到爱的日子，是我生命里最糟糕的时候。我曾经跟你讲过，哈娜这样对我说：莫瑞雅，真遗憾你在达尼埃尔身上浪费了四年半的时间。你当时也称是，还说，她说得很对。

我在特拉维夫有什么？以前我有很多好朋友，周围有很多不错的人。现在我跟他们都不来往了，我什么地方也不去，什么活动也不参加，我把什么事都推到跟你见面的时候再说。可长此下去这样行吗？

是的！也许可以吧，但那得让我相信你的感情是忠实于我的。

根据你几次所说的话，对此我的内心持有怀疑。你今天的来信就可以证实你的爱了吗？可以是可以。但是那恐怕是一种你本人都表示

怀疑的爱。你自己都不知道爱情的本质到底是什么。

而我则不同,换一个女孩子是我的话,也会满心怀疑的。我的母亲也对我说要放开些。我对她说我爱你。而她说:你是知道的,你想怎么做,做什么,我是一个字也不会说的,可你对此至少也要稍稍想一想。你们走得太近了,万一你们以后结不了婚,那可就痛苦了,即使你们可以结婚,而他又适不适合当你孩子的父亲呢?一个年轻的小伙子,没有一技之长,又爱穷讲究。生活可是实实在在的,是讲究不得的东西。家庭重担可不是那么容易担当的。他或许是个很好的年轻人,可他做好了与生活斗争的准备了吗?钱?这并不意味着什么。今天有,明天可能就没了。但是要成为一个能干的人,在最困难的时候能够应付自如,陷入困境时能够自救,明白自己该怎么做,这些才是重要的。这些艾玛奴埃尔行吗?

我对她说,你说得当然对,可他还很年轻,将来的路还很长。他一定会去学一门职业,可以自立,可以成为一个真正的男人。这些都是能够办得到的,然而要成为一个品质良好的年轻人,这恐怕是学不来的,这是与生俱来的东西。他为人很好,品质善良,他会去学一门职业的。我对此从没怀疑过。

吸引我的是什么呢?所有外表的东西,不是;是人们能够得到的东西,也不是。不是一种好的生活,不是教育和受教育,也不是勇敢精神。我喜欢的是根本的东西,就是你本人,而实际上你就是你。我想要的是安宁、平和。

你今天给我回信都会写些什么呢?

我告诉你,我绝对没有控诉你的意思,你不必把自己看做是一个罪犯。你犯了什么罪?这也绝对不是闹着玩的事情。我们之间没有不得不让我们感到后悔的过去。我之所作所为,脑袋都保持在一种很清醒的状态,照我看,你也不该为了什么事情而有负罪感。相反,那些是友谊,是爱情,是给予。我们俩所给予对方的是快乐和满足。只要友谊、爱情和给予仍然在忠实爱慕的范围之内,那么一切就都是美好的。而

从这一切开始消失的时刻起，我们就必须明白，这种感情还对头吗？我们俩必须相互解释清楚，只有这样的话，我才有继续下去的理由；如果不是这样，那我就必须停下来。而且我希望你也要这样，你要清楚地知道，你的感情到底属于何种性质。

艾玛奴埃尔，今天就写这么多吧。

我今天感觉不是太好。下午我睡在床上，不安地在等着你的来信，无法理智地让自己平静下来，睡上一觉。

再说一遍，让你痛苦，我也感到很心痛，要是能在你身边就好了，那样我就会吻住你的眼睛，让你稍稍平静些，别再那么痛苦了。

保重身体，亲爱的，别再为任何事情而感到遗憾了！

吻你。

你的

莫瑞雅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她坐在从拉斯艾因开往海法的火车上，为的是去看她的艾玛奴埃尔，她知道他会在她到达的两小时前，就去港口附近的火车站等她的。因为他喜欢享受期待的快乐，他心神不定地在那些阿拉伯搬运工、售票员和乘客之间踱来踱去，两手插在裤兜里，眼前全是她的影像，他知道，自己的情感之焰马上就能够将她颈肩间的那块柔软之地填满了——她此刻也在努力地想在车轮慢慢驶过亚尔孔河上的桥所发出的摩擦声中听出他的名字来，利-普-肯，利-普-肯，要不了几个月时间，这就变成了自己的名字了；而这时车轮发出的声响，却像故意惹她生气似的，听起来却是舒-哈-特，舒-哈-特，这声响，宛如那个秋季，在柏林到巴黎的整个长途行程中与她低耳细语似的，这是一次她从未跟艾玛奴埃尔讲过、以后也绝不会跟他提起的旅行。达尼埃尔·舒哈特都对你做了什么，他是怎么伤害你的，他总是问她，催促她，央求她，可她却用手指绞弄着一缕头发，一边说道，是一些你



不仅做不出来，我的好孩子，而且连想都想不到的事情。她边说边笑看着他，但是她的目光却慢慢地暗淡了下来，变得像钢的颜色一样灰灰的，对于那个他不认识的达尼埃尔，他的体内升腾起一股可怕的妒忌来，但内心里却整个都是恨，他很生气她管他叫孩子。

祖母将生命中的六年时间都浪费在了达尼埃尔·舒哈特身上。那是我年轻时的最好时光，她常对舒拉米特·米尔斯基这样说，那是在达尼埃尔变成为她心中一个很小的、几乎没有感觉的伤疤后的很长时间。头三年她全身心地爱着他，后三年她对他则是恨之入骨，并且一年甚似一年。她一遍又一遍地数落着：追求之年，思念之年，期待之年，羞辱之年，反感之年，鄙视之年。这些个事情她翻来覆去地说个不停，尽管那个时候她已经数落到了鄙视之年后期的事了，并且也知道，后面再也没有什么之年可数落的了，因为她早就摆脱掉他了。此刻对她来说，忘却才是合适的，尽管她从未宽恕他；虽然她认识艾玛奴埃尔·利普肯才九个多月，但已决定将自己的生命与他的维系在一起了。

因为即使艾玛奴埃尔还有些犹疑，是由于年纪轻和某种性格上的弱点，她已经学会了去接受它们，她心里明白得很，就跟他俩在亚德里亚号甲板上第一次相遇的那个早晨，她在给他擦去额头的汗水时意识到的那样，他们几个月后会成为夫妻的。

现在她最后一次又唠叨了一遍那个故事，有时对她来说都难以置信的是，这是她自己的故事，似乎那时坐在去巴黎火车上的人不是她，而是另一个莫瑞雅似的。因为马上就要见到快两年没见的心上人而激动不已，是那样一个莫瑞雅，她还无法知道，自己就要永远离开美丽的柏林城了，而她是那么的喜欢在那儿散步和怀想。沿着“在菩提树下”大街，在高大的菩提树间，周围是红黄色的落叶，它们在她的脚下轻声低语着，在波茨坦广场那些漂亮的咖啡馆里，或者在位于绿色湖畔边夏洛特城堡的花园里，满含水汽的味道进入鼻子，水中的鸭子，两只短小的红掌踩着水摇摇摆摆地向她游过来，它们的扁嘴贪婪地争食她手中的面包。她坐在岸边的草地上，把印有线格的本子搁在膝

上,本子上已写有“我的达尼埃尔”,接下来她在信中描述上美丽的景色,口气就好像是他们俩一起,正在这里的本桥上闲逛似的,突然兴奋地朝一只灵活而又机敏的松鼠指去,那毛茸茸的大尾巴是栗色的。这会儿她还无法预见,下一次,也就是几天后,她就只能流着雨水般的泪、孤立无助地来到她美丽的爱情见证之地了,直到上了亚德里亚号班上的那一天,她两眼里的泪水也没有干过。

“我记得他们第一次相见的情形。”舒拉米特·米尔斯基在阿胡撒养老院她的房间里对我说,“我们下了课出来,那是在内维-塞德克区,是在春天的时候,逾越节后的几天。我们在那哈雷特-本雅明大街上慢慢走着,一边闲聊着什么,我们那时十九岁,我是个爱笑的女孩,而你的祖母却总是一脸的严肃。突然我们身边冒出了一个骑自行车的男生,他嘴里衔着一只鲜花,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是一朵水仙花,他用牙咬着花,跟阿拉伯强盗嘴里衔着的刀似的,嘴角两边一边是杆子,另一边是花。然后他看着你的祖母,她在特拉维夫的回头率很高,他停下车,把花递给她,可她只是笑了笑,却没接过花来。他把花衔在嘴里,表演着空手骑车的车技,继续往前骑去,我看到他的背很宽,黄褐色的卡其短裤下被太阳晒得黑黑的腿部肌肉很发达。我马上朝她大声说,她真傻,可她理都不理我。就这样我们又朝前走了一段路,突然他再次从我们的身后赶了上来,很显然他是从一条与此平行的马路掉头折回去的,而这一次他嘴里衔的是一朵玫瑰花,可以断定,一定是从哪家花园偷摘来的,花刺把他的嘴唇都戳出血滴来了。他在我们身边停下,将玫瑰花递给莫瑞雅,用一种不大高兴的目光,她看了一会儿他,然后把花接了过来,接花的这回她也没有笑脸。他从自行车上跳下来,用他那宽大的手背擦去嘴唇上的鲜血,将手在裤子上蹭了蹭,然后才向她伸出手说道,我的名字叫达尼埃尔·舒哈特。你祖母握了握他的手说,我叫莫瑞雅·迈尔尼克夫,我说,我叫舒拉米特·波罗霍夫,那是我跟米尔斯基结婚前的名字。我忍不住继续盯着他那张英俊的脸看,那是张棱角分明的脸,宛如某一个希腊神灵的雕塑般,然而也带着一种痛苦的表





情。后来他们俩就交往了几个月,他向她大献殷勤,哎呀,你看他是怎么追求她的,我记得,他在夜里溜进她在杰胡达-哈莱维大街住的楼里,用一只毛笔,把比亚里科的情诗,用红蓝两种颜色写到了她的门上,因为他知道,她对他有一种特别的偏爱。他的字写得很漂亮,每个字母都像是画出来的似的。一大清早,他总会带着一听石灰来,把诗歌抹掉,因为他知道,不然的话,芭特-西娃和哈诺赫两人很可能会生气的。他涂抹石灰的时候,她俩则站在旁边奚落着,说他如果真是爱得那么死心塌地的话,又为何不自己来作一首诗呢,这样就不用把门弄脏了,而且还可以提高自己的声望呢。对此莫瑞雅总付之一笑。她已经深深地爱上了他,他所做的一切都深得她的欢心,她骄傲地对她们说,他不是诗人,他打算去巴黎,到理工大学去念书,将来做工程师,他大学毕业后他们就结婚。几个月后,他真的去了巴黎,自此她就收到带法国香水味、上面写着她的名字和地址的天蓝色信封了,每个字母都像是画出来似的。她一次也没有把信拿给我看,说实话我妒忌死她了。

是的,祖母自言道,此时眼前慢慢掠过的情景,是那些在葡萄架间打盹的阿拉伯村民。当时从柏林乘火车去巴黎的是另一个莫瑞雅,她拼命地忍着车厢里便宜香烟和劣质香水以及人身上的汗臭味,将头伸出窗外,以便好好地吸一口大牧场上的清新气味。牧场上成片成片的是白花花的长得很壮实的奶牛,还有高高的桦树林,牧场的风吹拂着她的脸庞,后来她坐了下来,整个人因为有节奏地摇晃而激动着,这晃动从座位传导到她的臀部乃至整个身上。差不多有两年的时间她都没见到达尼埃尔了,因为在此期间他不得不努力地学习,学习很难,也很辛苦,这是她从他的信中得知的。而他的去柏林看望她的计划则一星期又一星期、一个月又一个月地被推迟了,直到她决定自己动身去他那里,她甚至很高兴能在巴黎与他相会,之前她从未去过巴黎。尽管时间很长了,但他生龙活虎的形象一直清晰地印在她的脑海里,他英俊的面孔,两只棕色的眼睛,眼周围笑起来有很多细密的皱纹,还有他微

笑时露出的白牙，她总想着他牙上咬着一枝玫瑰的样儿。不仅如此，脑海里还时常映现他那长得很结实的整个身体，上面长着金色的毛发，跟她唯一的一次，在他乘船去欧洲的前一天，见到的一模一样。

当时，他们在蒙太非尔公园和沙罗那的柑橘林里度过了整个安息日，她给他讲了她在盖代拉和加沙度过的童年的一些往事，谈到了她十二岁时的初恋，对象是加尔德尼老师。他跟他们一起背着石头爬阿尔蒙塔山，其目的是为了体会英雄山逊的力大无比，此人曾在午夜时分将城门运到了这里，他让他们看南边的沙漠之地，是在丰硕的果林、良田和满坡的绿色葡萄的另一边，东面是爵亚斯山的一些沙丘峰，而西边，在沙丘的后面，是一片大海。他给他们——那九个山逊学校不同年龄的孩子们，其中她最大，也是他最喜欢的一个——讲述位于山下的加沙的历史。在上一次战役中，英国人的榴弹都把它给炸翻了，在其辉煌鼎盛的时期，它曾是个贸易和重要的港口城市，那是在腓力斯人和亚历山大大帝以及彭裴居斯时期，在它的那些古老的海滨城市里，希腊人和罗马人曾在安苔冬和马伊玛司两个城里举行过竞赛、表演和野外庆祝活动。根据阿拉伯人的传说，在那儿的荒山里，埋藏有他们遗留下来的金币和宝石之类的宝贝，那些欧洲的贵族们，性格古怪，脸色苍白，其中也包括美丽的爱冒险的英国公主赫斯特尔·司坦霍普，她身上总穿着阿拉伯式的男装。他们在沙地的废墟间来回走着，手上拿着奇怪的扑克牌，嘴里念着一种咒语，它把挖掘出来的宝物变成了陶土碎片，他们把这些碎片装上船，并自己随船将它们带往他们遥远的国家，在那儿他们又用一种咒语，把那些陶土碎片变为金币。然后他们就站起来，沿着山坡滑了下去，加尔德尼老师把他的手搭在她的肩上，"我周身充满了幸福之感"，当时她对达尼埃尔说，一边把他的手拉往自己的手中，"就跟我现在感到的一样幸福。"

天快黑的时候，他们来到一家小旅店，小旅店的老板是一位年迈的德国老太太，她的客人们主要是她的同乡，来朝圣的人，游客和做生意的人。当他们有点不大好意思地站在她的面前时，她拿锐利的目光



紧盯着她，而莫瑞雅，她已经跟她的一位女邻居宾格太太学过很长时间的德语了，因为自打她得知达尼埃尔要去巴黎的计划的那天起，她就决定，师范研修课程结束后，她就去柏林，去那儿学社会学，那样他们可以相互离得近些。她低声说，他们要一个房间，只需几个小时，老太太一言不发，她盯着莫瑞雅看了好一会儿，然后突然倾身向着她，压低声音激动地对着她的耳朵说，你跟我年轻时在纽伦堡的那位最要好的女友长得一模一样，她也有一头金色的卷发，有一双灰色的眼睛，她被附近城市的一个年轻人弄怀孕后，就跳河淹死了。老太太把钥匙递到她的手中，并紧紧地握住她的手，她打了一个寒噤，并用力地将她攥着钥匙的拳头从她的手中抽了出来，达尼埃尔用发抖而潮湿的手，从自己的口袋里掏出钱，递给了那个女人。他俩走进那间陈设简单却很干净的屋子，床上铺着浆洗过的床单，从窗子的防护网那儿吹进来夏末带有暖意的微风，风吹干了他们身上的汗水，并带来近处面包房那德式上好黑面包的香味。她那个时候对于那种味道尚不熟悉，可在柏林的那些年里，她却渐渐地喜欢上了它，并成了她最喜欢的面包。味道里混杂着那种陌生、紧张而又充满活力的气味，是他们身上发出的味道，那个整晚，他们的身体一刻也没有分离。

很快了，就只有这一晚了，今夜再加早晨两个小时的车程，上午九点，火车就要开进巴黎火车站了，达尼埃尔会在站台上等着我的，我会拥抱他，抚摸他的头发，还会亲吻他的额头和他那双好看的眼睛和他的嘴唇。突然，她在舌头上感觉到了他嘴里的味道，是一种微微的酸味，很像是橘子的味儿，她咽了下口水，把眼闭上，以回避坐在对面的那个女人疑惑的目光。

即使现在，在那次巴黎之行的两年半后，她仍然清楚地记得火车车厢里遇见的那两个乘客。她的正对面，背对火车行驶方向的位子上坐着一个很胖的女人，她在看一本已经很破旧了的袖珍书，并时不时地发出一阵哼哼唧唧的笑声。她还把她那长得像土豆似的鼻子用格子手帕捂着发出很大的响声，像是高音喇叭夹杂着的一阵阵哭声。不哭

不笑时，她的那双红玫瑰似的眼睛从书本上抬起来，带着不信任和一丝讥讽的神情看着她，好像她脑袋里什么时候有何种想法她全知道似的。她的边上坐着的是一个瘦男人，六十岁上下，脸黄黄的，像是有病的样子，头发灰白，胡须浓密。每每看到他穿的跟难民似的又破又寒酸的衣服时，她的心不禁要抽搐一下。

先前，当他们坐在车厢里的时候，他用他的手指尖顶在胸上，一边声音沙哑地小声说道，瓦塔尼安，亚美尼亚，格鲁吉亚人，她明白了，他的名字叫瓦塔尼安，是一个亚美尼亚裔格鲁吉亚人。后来他从他的山羊皮大衣口袋里掏出一张满是油腻粗重指纹的照片。他看了看上面的自己，穿着黑色的西服，一张好脾气人灿烂的笑脸。而后又看了看他身边的那个丰满的脸上带着微笑的女人，很显然这女人是他的妻子，接着又去一个个地看上面他的那些一共不知有多少的孩子们和孙子们，边看边用一种发音很硬的语言低声地说出他们的名字来，并且还不住地跟他们客气地点着头。突然，他解开了里面衬衣的纽扣，露出的肚皮上有一道麻麻赖赖的红色疤痕，疤痕像一条鱼的脊椎骨似的，从他的颈子一直延伸到他的裤腰带那儿。他压低嗓门小声说出了，柏林，手术，医院等字眼来，她听明白了，他曾在柏林的一家医院动过一次手术。他现在肯定是回家去，她心想，忽然她明白了，他存活的时间已不多了，而他也很清楚这一点，这时她有种心痛的感觉。她靠在那儿睡着了，听任自己的身体随着车厢的摇晃而晃动着，一直到传来一阵重重的敲门声，一个身穿蓝色制服的大胡子火车乘务员将她推醒，示意让她站起来。他抽出铺着床单的床板，将先前当做座位靠垫、固定在墙上的几个小垫子放到床板上。那是午夜前差不多一个小时的时候，可这个时候，深邃的天宇下仍有微弱的亮光，宛如一盏魔灯般在不停地闪烁着。莫瑞雅喜欢长长的白天和漫长而清冷的黎明时分，可她却有点渴念黄昏时突然亮起来，然后又消失在特拉维夫海面那炙热而红彤彤的太阳来。

她爬到上铺去睡觉，心里暗自庆幸事先买了卧铺票，尽管这需另





外付钱，她希望能好好睡上一觉，以便达尼埃尔到火车站来接她时，脸上看起来会精神些，自己也有足够的力气跟他去穿行他信中多次跟她描述过的巴黎的大街小巷和许许多多的公园。

可是那个亚美尼亚人，那个在车厢里坐在她旁边的乘客，整夜都在她下面的铺位上翻来覆去，他的每一声叹息都如刀般割她的心。他旁边铺位上的那个女人虽然侧身睡着，可先前她笑起来像猪似的哼哼声，变成了没完没了直往她耳朵里钻的震天动地的呼噜声。慢慢地，渐渐地，各种嘈杂声平息了下来，抑或是她已经习惯了这种嘈杂声，但此刻她还是无法入睡。

她的心在胸膛里突突地跳着，像是在计秒似的，她陷入了对往事的回忆中：他的温热的皮肤，他压在自己身上那相当沉重的身体，他手指用力地在她的嘴上慢慢地抚摸着，带着她的身体一起，扬帆驶向他的马伊玛司和安菩冬港湾。她两手伸进他的发间，拨开他的头发，因为她想看看他的脸，以便把它埋入自己的记忆里。当他慢慢地进入自己的身体时，体内爆发出有如疼痛般的愉悦，回忆令她无法自制，一只手不禁伸到大腿之间，她把脸和牙齿埋进小靠枕里，就跟自己在柏林时一样，每当思念向她袭来时，她都会这么做，以免米勒夫人，那个严厉的房东，听到任何急促的呼吸声。

早晨她很早就醒来了，她沿梯子走下来，经过那个亚美尼亚人身边时，他还在沉沉地睡着，嘴巴张得大大的，好似在吃力地呼吸着空气，她急匆匆地去上厕所。她用那里的小洗脸池，把自己发红的脸和充满期盼和喜悦的眼洗了洗，还把身上和脖子，以及腋窝和露在袖口外的胳膊也擦洗了一番。她把两只手打上肥皂使劲地搓洗，尤其是那只整夜都放在裤子里，上面还沾有她的体味的手。她在睡翘了的头发上洒了些水，并把两个贝壳做的发梳插在头发上，换上特地为这次行程新买的白衬衫。对是否要擦点口红有点犹豫不定，后来还是决定不擦了，因为她想起来达尼埃尔曾对她说过，他更喜欢朴实的装扮。洗漱完毕她就回到她的那个车厢里坐了下来，里面的床铺已被收回到墙上，

又当做座位的靠背了，她从车窗往外看，感觉窗外的树木和小屋好像都在飞，而她自己则静静地站在一边。

当火车开进巴黎北站时，站里的大钟正指在九点上。她已经拿着她的箱子站在车厢的门口，拿眼在搜寻着爱人的那张脸了。

突然她看见了他，她的喉头一紧，可她并没有马上跑向他或是喊他，而是等着让他发现自己，她在心里静静地对自己说道，亲爱的，你的变化可真大啊。他留了个小胡子，穿着毛呢大衣的身材显得又瘦又长，脸色苍白而很严肃。这时他也发现了她，笑着向她走过去，吻了吻她的脸，说了句，你看起来不错嘛，她紧紧地抱住他，把脸贴在他的大衣上一句话也没说，大衣闻起来有股陌生的冷冰冰的味道。

他建议去火车站附近的一家咖啡馆吃早餐，然后就接过她的箱子，她走在他的边上，默默地看着他，心里不禁自问，他眼角的那些皱纹都跑那儿去了。他们进了一家小咖啡馆坐下，喝着在她看来是用汤碗装的大杯的牛奶咖啡，达尼埃尔像个土生土长的法国佬似的吃着奶油牛角面包。直到这时她才克服了先前的沉默不语，开始给他讲述自己的旅途见闻，她心想，自己对此已经习惯了，并且仍然像以往那样爱着他。他说，我可想死你了，他把她的手拉过来握在自己的两只手中，又把她的手拉到自己的唇边亲了亲。她却使劲地将自己的右手往回抽，可他把它握得紧紧的，并一遍又一遍地放在鼻子下闻，他直视着她的两眼，胡子下的嘴巴笑着咧开了，她感到自己的脸红极了，浑身都在发着烧。

"好了，我们走吧，我给你在旅馆订了个房间。"他说，她吃惊而又难过地看着他，可他解释道，他的女房东不允许女孩子在他的房里过夜。"尤其是长着漂亮眼睛的金发美女。"他的样子很高兴，并用手背在她的脸上轻轻地抚摩。他们来到最近的一个地铁站，沿阶梯走了下去，一阵温暖并带点甜丝丝的气息吹在她的脸上。他们挤进一节满载的车厢里，车子以令人吃惊的速度在隧道里轰隆隆地往前开，突然她非常怀念，在广袤而自由的天空下，行驶在柏林那一条条林荫大道上、按着

喇叭的电车来。他们在明星广场站下了地铁,走上地面,她发现自己正站在凯旋门下,她只是在图片上见过凯旋门,没有想到它的气势如此宏伟。

达尼埃尔走得很快,手里提着她的箱子,她跟在他的身后,总保持着一步之遥的距离。呼吸着新鲜的空气,看着那些宽大广场上和露天小咖啡馆里各种不同的情形,闻着身边走过的那些男男女女们身上发出浓浓的科隆香水味,天空云朵间突然露出的一小方蓝天来,是那种清澈的碧蓝。他们拐入一条街巷,那里有个卖蔬菜、水果、奶酪和长棍子面包的市场,她很想停下来给他们俩买一些李子,那些李子晶莹闪亮,堆得像小山似的。可是达尼埃尔不知什么原因箭步如飞,并不安地朝四周张望,所以她只好也急匆匆地跟在他的后面,免得在那些拐弯抹角的巷子里被弄丢了。他们转来转去,来到了一条很窄的马路上,这条马路上的房子,石头砌的墙面都破损得很厉害,好像是硬撑在那里才没有倒在狭窄的马路上的,人并排行走是根本不可能的。她试着大声念出这条马路的名字"阿克西亚路",她心想,是不是可以翻译成"金合欢路",尽管这里看不到一棵金合欢树,这里一棵树都没有,这个时候达尼埃尔说了声,我们到了。

这家旅馆跟这条马路上的所有房子一样很破旧,门上有一个小牌子,上面写着:"金合欢旅店。"一股劣质咖啡、酸牛奶和肮脏的床铺混合在一起的污浊气味向他们迎面扑来。里面有一张颜色斑驳的台子,坐在它后面的那个看门老女人是个黑人,一只慵懒的猫像是死了似的蜷曲在她的膝上,她从身后挂着的一个大木盒里拿出那个房间的钥匙,木盒上千疮百孔,好像是一个鸽子棚,她目光严厉地看了她一眼,这让她不知怎么地想起了沙罗那旅店的那个女老板,只是这个女门房的灰色头发很稀疏,眼里透露出凶险而又狡猾的神情。他们沿木楼梯上了楼,楼梯上铺着一条极其破旧的地毯,上面的花饰好像是上个世纪的样式。他们离房间越来越近,而那股恶心人的气味也越发地浓了,当达尼埃尔打开房门时,她感觉到自己恶心得都无法呼吸了,好像那

堆臭烘烘的东西就在眼前的房里似的。她急忙走进屋里打开窗子，把污迹斑斑的床单掀掉，并窝成一团，她小心翼翼而又很勉强地打开了嘎吱作响的柜门，像是担心里面有什么东西似的，可里面只放着一床发了霉的被子。她赶忙打开房门，把那床被子扔到走廊上去。她带着哭腔请求达尼埃尔，带她出去散散步，要么重找一家旅馆，但他对她的话不置可否，并说巴黎的旅店都差不多，因为法国人就这样，她不可能指望这里的卫生像柏林那样干净，过一天她就会习惯的。

莫瑞雅皱着眉头看了看泛着绿颜色的墙纸，墙纸上湿漉漉一片，她又朝那盏破灯，床边的那个歪歪扭扭的床头柜和屋角里的那个锈迹斑斑的浴盆看了两眼，可这时达尼埃尔抱住了她，并把他温热的身体压向她的身体，他的胡子在她的唇上摸索着，她心想，自己毕竟是为他而来的，其他的东西都不重要了。她用尽全身的力气拥住他，并回应着他的吻，这吻好似让她更加饥渴，更加失望了，他们倒在床上，床在他们的身下吱吱嘎嘎地响着。他们拼命地将身上的衣服褪去，他用嘴唇在她雪白的身体上到处亲吻着，她的皮肤被他的呵气吹得微微发抖，他舔她的乳头，直到乳头疼痛得挺立起来，而她也舔着他那散发着一股淡淡的外国香水味的肌肤，从他的脖子一直到他的脚底板，他呢，则紧闭着双眼，嘴角微咧，露出少见的微笑来。他在她身上前前后后地摸索着，手指在她的头发里，脸庞和吮吸着他的嘴唇上游移着，然后他把她压在床上，进入到她的体内，进入到散发着果味香气的潮水中，而这正是她在所有的时间里，因思念他而积聚的全部。她将自己紧搂着他身体的胳膊尽可能放松些，而大腿则为他尽量张得大些，再大些，以分担他的孤独和思念之情。她轻柔而热烈地吻他的脖子，手指不停地抚摩着他的脸，她把他的头发拨弄开，想好好地看看他脸上的神情。可他一下子将她翻了个身，用手示意让她跪下来，然后从后面骑到她的身上，腰贴着她的腰，气喘吁吁地抽动着，手指将她的屁股扒开，在上面使劲地抚摩着，直到嗓子眼里发出一阵长长的喘息，最后以一阵呻吟声结束，他从她的身上下来，闭着眼仰面躺到床上。她拥着他，头藏在



他的腋窝里，因为她不好意思去看他的脸，他们就这样默默地躺了一会儿，俩人充满活力的气味混杂在一起，被地毯、墙壁和空气吸收，那空气里散发着成千上万个男男女女，在无数个日日夜夜里男欢女爱的气息，这时达尼埃尔突然从床上起身开始穿衣服。"我得去理工大学上课，"他解释道，眼睛却看着自己正系着鞋带的鞋子，"你好好休息一下，我傍晚时回来，到时我们出去散散步，我会带你去看塞纳河，去卢森堡公园玩，然后我们找一家上好的饭店，去美美地吃上一顿晚餐。"莫瑞雅亲了亲他的两颊，心里正猜想着他是不是还记得她是不吃荤菜的，达尼埃尔这就走了。

房门在他身后关上的那一刻，她的眼泪就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她先前可没想到会是这样。没想到在这样一家旅店，没想到是这样一种情况。她原想，达尼埃尔会为了她而不去上课的，他们俩人会有点像是夫妻似的，住在他的房间里，他俩整天一起逛大街，编织着未来的共同的梦。她还是极力地说服自己，说一切都很正常，今晚她就能再次见到他。他们会挎着胳膊，一起去逛卢森堡公园的，她在脑子里重复了好几遍这个名字，这个他在她耳边迷人地许诺过多次的名字。他们会谈起所有方方面面的事情，她会体贴地问他，他的毕业考试什么时候进行，他们最好何时结婚。他仍然是她的达尼埃尔，他没有任何变化，只是孤独、思念和艰苦的学习，还有雨天……到了巴勒斯坦，一切又会恢复如常。她试着睡一会儿，可她太过激动了，以致无法入睡，两点钟的时候，她就开始洗漱打扮，准备着晚上的见面了。她穿上那件专为这次行程而在特里茨商店买的高档毛料连衣裙，将头发梳理整齐，以使自己漂亮些。她坐下来，把那本巴黎的导游书又翻了一遍，这书还是她两年前买的，她想好好地熟悉一下自己心上人所生活的环境。她知道，她要做的事情很多，要去参观的地方很多，像卢浮宫，艾菲尔铁塔，圣·露易丝教堂，巴黎圣母院，拉丁区的那些老店，蒙马特高地和蒙巴拿斯的咖啡馆，香榭丽舍大街，歌剧院和巴士底狱……这么多地方，五天的时间怎么能看得完呢？突然她的肚子叽里咕噜地叫了起来，她这才想起

来自己从昨天中午起，也就是临行前到现在一点东西都没有吃。她在考虑，自己是不是该下楼上趟街，去买些吃的东西回来，要么就去他们先前经过的那个小市场。但她知道，自己没法在门房那儿给达尼埃尔留个信，因为自己不会说法语，而那个老女人很有可能也没有耐心跟她打哑语，另外，如果她现在就吃东西，那到了饭店后就没有胃口了。

四点钟过去了，五点，六点也过了，可达尼埃尔还迟迟不见人影。莫瑞雅坐在柳编的靠椅上，呆呆地看着窗外，窗子正对着的是一个内院，院墙上爬满了碧绿的爬墙虎。四方石砌的院落里空无一人。只有两只狗在里面自娱自乐着，它们在那打转转，大些的母狗有着一身泛红光亮的毛皮，小些的公狗身子很长，毛皮短而蓬乱，长着一张老鼠般的尖嘴巴。公狗想直立起后腿趴到母狗的后腰上，但因自己体格太小，而从上面滑落掉到了地上。它努力了一次又一次，累得直喘气，可它的腿实在是太短了，尽管它使尽了全身的力气，最终还是没能伸进母狗的两腿里去。莫瑞雅大笑着，并镇静地看着眼前的情形。最后，那条母狗失去了耐心，它厌烦地将那条公狗抖落下来，并用爪子去打它的鼻子。公狗痛得嚎叫一声跑开了，它从院墙上往外逃，逃跑的时候还不忘回过头来，在爬墙虎丛中对着母狗狠狠地唬了两嗓子。

天慢慢地，像是不知不觉似的，开始黑了下来，莫瑞雅意识到，她今晚是不可能去卢森堡公园散步了。心里开始不安起来。可现在毕竟才八点钟，她安慰自己道，晚上才刚刚开始罢了，达尼埃尔一会儿就要来了，他会为自己的迟到道歉的，他们晚上会一起出去的。但随后听到的却是隔壁房间的门响声和墙里锈蚀的水管发出的水流声，然后又听见人的呻吟声，是一个男人在用法语叫着什么，还有一个女人含混不清的喊叫声，再后来是浴盆发出的轰然一下的水流声，这声响不知怎么让她想起了大卫·哈诺赫那辆破摩托车的响声来。突然，她特别特别地想家，想自己的爸爸妈妈，想大卫·哈诺赫和在家里那个大厨房里共进的晚餐，兄弟姐妹们在那里说着笑话和各种睿智的格言警句，在他们没见面的那段时间里，他们一定都长高了，想到这些，她的眼泪又流





了下来。

那一整夜，祖母莫瑞雅就这么坐在那里，等待着达尼埃尔的到来，直到黎明时分，她心里才相信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了。她知道，自己一清早或许会去他的住处的，那是在圣·日耳曼大街。之前给他写信时，这个地址她不知在信封上写过多少遍了，她知道，那个达尼埃尔在他的信中总是拿来开玩笑的看门黑女人。她可能会透过自己位于过道上的那个房间的小窗子，向她投来怀疑的目光，并且还会迟疑地说，达尼埃尔·舒哈特。接着这女人会不耐烦地用法语说，在五楼，然后将她那只红润的手掌，伸到疑惑不解的她的面前，在上面写上数字五。接下来，她心里会像揣了只小兔子似的，爬上那个很宽的木楼梯，来到他的门前，喘着粗气在门上敲上一两下。然后会有一个女人来开门，不是那个面庞严肃的老房东，而是一个年轻苗条的女人，穿着一件黄圆点的连衣裙，脚上蹬着高跟鞋，她光滑的棕色头发做成一种高耸的发型，嘴唇和指甲都涂得红红的，身上发出的香味就是昨天她在他皮肤上闻到的那种好闻的香水味。她会问，声音近乎无声，达尼埃尔，那女人会用一种怀疑的目光看着她，并用法语说，达尼埃尔不在家，达尼埃尔出去了。而莫瑞雅，她突然每个字都听懂了，会问她，你是谁？那个女人会说，我嘛，我是他的未婚妻。一边还在微笑着，她还会把手指上的钻戒伸过来给莫瑞雅看，我们就要结婚了，十二月份。莫瑞雅会马上转过身来往楼下跑，速度达到了腿所能承受的极限，她听见那女人在后面说，等一下，等一下，可她是不会停下来的，她才不管那个黑女人，是不是正从小窗子里，拿她的那双象牙似的眼睛正偷偷地看着她呢。她会沿着眼前看见的任何一条大街跑下去，一直跑到一个不知叫什么的大公园的门里，不再喘息了，两腿却像灌了铅似的，累得坐到一个长凳上。然后，她也清楚地知道，她会双手捂着脸，直哭得昏天黑地，全身乏力，也没有人过来问她是怎么一回事。爱情和心碎在法国人看来，不过是稀松平常之事，巴黎人对正在接吻的情侣，或是公园长凳上哭泣的女孩子，是不会报以特别的目光的。远处，她注意到，有几个孩子在一个小池塘

里放小帆船玩，他们身上的衣服因着自己的眼睛被泪水模糊而变得色彩斑斓了。那女人的声音，用软软的外国腔，叫着他的名字“达尼埃尔”，就跟是她自己似的，那么自然，那声音好像还在耳畔回响。几分钟或是几小时后，她从长凳上站起来，离开了公园，离开时也没搞清她来的到底是卢森堡公园，还是别的什么公园；她找到了那条“金合欢路”，即通往那个可怕的旅馆的路。当天刚刚露出第一道鱼肚白的时候，祖母莫瑞雅就已明白了所有的真相，毫无疑问就是这么一回事。在她匆忙收拾东西，决定就在当天登上开往柏林的火车的时候，她那时还不明白的事情只有一件，即，自己是再也不会回巴黎来了。

火车开过阿·撒尔卡河——希伯来语叫纳哈尔·塔尼尼母，即鳄鱼河——上的大桥，停在了撒马林站。有几个农村人在这儿下了车，快步向隐藏在塞芭尔山顶上的紫赫隆-亚克夫村走去，中午时分的村子静悄悄的，仿佛安息日开始前的午休一般。而后火车沿着海滨继续前行，中途经过渔人村坦图拉和废墟遗址，停在终点站阿特里特车站的轨道上。



莫瑞雅看着大海，在这里，大海的颜色比特拉维夫更蓝，都近乎紫色了，海面上波光粼粼。那件几天前在斯比内司百货商店买的红色泳装，她带在了身边，因为第二天他们可能要与舒拉米特和米尔斯基一起去徒步旅行，后者总是用他那低沉的声音，给他们做报告，就像自己在瑞尔里高中上体育课前对学生进行的训话似的。他讲述步行对身体和智力的意义，他们会从哈代尔-哈卡迈尔经过海册里亚区，去穿行一个个蜿蜒曲折的阿拉伯小街巷，小巷两边的石墙间，腐烂的水果味和脏水味好像总也消散不掉，他们最后要去的地方是干净而漂亮的德国人聚居区。那里马路笔直宽阔，他们要去那里的贝尔科面包店吃新鲜的面包，再来上一壶酸牛奶，然后再从那儿去巴特·嘎里母的浴场。也许他们会决定，拂晓时去爬卡迈尔山，到撒尔曼的旅店去吃一顿丰盛的早餐，再向卡迈里特修道院进发。从修道院的屋顶上，像米尔斯基总

带在身边的那本配有百合花图案的导游书中鼓噪的那样，在晴朗的天气，你可以往南一直看到雅法，春天的时候，甚至还能闻到柑橘园的芳香，向北，目光可及苏尔和赛达。可他们还从没有这么好运气过，眼睛睁得酸疼，他们甚至连阿卡也没能看到。他们要从修道院下到干涸谷地去，艾玛奴埃尔或许又要花粉过敏哮喘病发作了，他的脸，因咳嗽而羞得发红，埋藏在她的肩上。下午时，他们浑身大汗，累得半死地来到海滩上。想到要跟艾玛奴埃尔一起过安息日，她的心里一阵激动，撕心裂肺的记忆如同垃圾似的一扫而光了。大约半小时后火车就要进站了，艾玛奴埃尔会紧紧地拥抱她，因为长时间的等待，紧张而又担心，他曾经这么评价自己。他们会去卡母匹尼亚茨或是叁瑞母咖啡馆，全海法的人星期五下午都聚集于此，米尔斯基一家，伊达尔曼一家，莱文一家，还有像约迩和萨拉这样的单身姑娘们。她们和那些她认为长得并不英俊的小伙子们调情说笑，之后，他们可能要去艾玛奴埃尔的家吃安息日聚餐。在他母亲面前，她还是会很不自在的，因为他母亲会专门为她一人做素食吃，尽管她多次请求艾玛奴埃尔跟他母亲说，不用那么麻烦，因为有一个蔬菜和一个水果沙拉对她来说就够了。可她还是要听他那个长得很漂亮，但有点傻乎乎的十六岁妹妹托娃的话，她满脑子的迷信思想，跟个老太太似的冥顽不化。那些个迷信想法完全是她自己臆想出来并加以修饰过的，她让这些东西来左右自己那由担心、害怕和各种礼俗组成的生活。

或许她会向她提个醒，让她不要背朝落地钟坐着，为的是不要年轻轻的就死于了某种严重的疾病；剥橘子皮的时候要小心，因为要是伤着了果肉，那她可能就会怀孕的，而假如发生了伤了果肉的事的话，那她是不可以吃这个水果的，她应当把这个水果放在一个白色的袋子里包好，并埋在院子的土里；还有，梳头时要从右边开始梳，而且只能用木柄的发刷，否则的话，头发就会脱落；在月圆之夜，要换个方向睡觉，头冲床脚，脚朝床头，以此来迷惑鬼魂和恶魔，它们往往会从隐身的地方出来，在月明星稀的十五夜里偷袭人类，等等等等，诸如此类的

荒唐行为，祖母莫瑞雅自己可是从未坚持这样做过。

之后，他们可能会在客房的长沙发上给她铺了个床铺，她会在黑暗中躺在被子下面，心怦怦地跳个不停，直等到他妹妹和父母亲房间里的声息消停为止。然后她会蹑手蹑脚地偷偷去他的房里，寻着艾玛奴埃尔那粗重的呼吸声找到他的床边，而他正身着他的条子睡衣，期待着她的到来。她会钻进被窝，两个人搂抱在一起，他会用他的唇去找寻她的，他汗津津的手会像胆怯的小动物似的伸进她的衣服里游移摩挲。他们会在被子里脱光衣物，相互抚摩，直到她感觉到他已经为她做好了准备为止，然后她会伸开大腿，紧贴着他那单薄瘦弱的身体，将自己的手伸入他的发间。然后他们就在黑暗中，两人都努力地压低喘息声，静静地合而为一，直到他的身体忽然变硬，并瘫软在她的身上，她感觉到他在她的体内，连同他最后剩下的那丝迟疑，都渐渐地消失无影了。

花街十九号

海法，1932年6月26日

亲爱的莫瑞雅：

你真是个好姑娘。我原以为星期五收不到你的信了，所以就没等邮递员办完事回来，因此今天才收到你的来信。

我万分地感谢你的大度和你对我内心矛盾的理解。我很高兴你有望得到一份工作，尽管这只是临时性的，并且你相信，这些不久就都会实现的。

你的来信我细细研读了多遍，有几点我很想谈谈我的看法。

我同意你的看法，所有需要写下来的东西，现在就把它写下来，这比等到以后，当两人之间的关系出现危机的，随后再跟着失望要好。这就是为什么我说了你还在海法时我说的那些话，写了你回特拉维夫后



那些内容的原因。

亲爱的,我一直都尽量地让自己的言辞显得温和些,目的就是为了免得激怒你。因而我考虑,亲爱的,请你注意对我们双方都有好处的一些东西,假如两人之间出现了理解上的分歧这种情况的话,那么也可免遭悔恨的折磨。

这封信里,我着重想讲的一个话题,就是你信中提及的那个,即在柏林浪费的三年时间。

我的好姑娘,你很清楚,最近我或许觉察到了你不在我身边时,我对周围的一切都了无兴趣了,这都是因为你的不在造成的。而现在你提到了在柏林的三年时间。你认为,放弃生活根本不值得,你不想再重犯那些你曾经犯过的错误了。前一阵子,这个情况我也想到了,并且也觉察到了,我希望我们两个要避免产生误解。

你不在海法的日子,我过得并不好。你说,我曾有几次表示过我对你的信任持怀疑态度。话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我预见,如我们俩分居两地,时间长了情况可能就是这样。为了避免两人间产生痛苦,我想请你注意这点。我不知道你和达尼埃尔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然而根据你的叙说,你认为是他缺乏真诚。可是如果达尼埃尔跟你一样,你们的爱情因为某种原因而没有得以实现的话,那他跟你的情形其实可能也是一样的。我已经在担心,如果我们之间相距遥远,那么到底会发展成什么样呢!

可我觉得,似乎不该以两副面孔对待你。如果你、我之间相距过远,那么就可能出现,两人的关系渐渐地会变得不冷不热的,我就会处于一种不值得你信任的状态中。

亲爱的,此时此刻你不必怀疑我对你的爱情,尤其是,我觉得,经历了持久的结合之后的爱情,它所显示的是一种生活习惯。这可能值得你去追求,也可能是不值得的,具体要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怎样。

这同样适用于你,分居异地已给你造成过一次伤害,我不希望这种经历在你身上重演,特别是因为我的缘故。这是为了免得将来悔恨,

因为你的年龄已不允许你与达尼埃尔之间的经历重演了，到时候再遭受失望，痛苦是两个人，而我的痛苦并不会比你的轻。

如果近期我们不能住得近些的话，那么我是不会要求你为了我的缘故而放弃自己周围的人和生活的（尽管我的感情是自私的）。同样，亲爱的姑娘，我希望相信爱情，并对此满怀憧憬，即，生活的车轮不久将向好的方向行进。

现在来说说我们这里的情况：可以说海法最近没有什么新闻。本周对我来说并不是事事顺心，我没有什么空闲的时间，这是因为我得用英文处理大量的工作，那都是你在这里时积攒下来的。

安息日那天，我们一大群人是在卡迈尔度过的，我们在沃尔施泰茵旅店里跳舞了。周三，我们还去海里游泳了。

本周有一天，埃茨拉来了，并在我们这儿待到很晚才走，他是个好小伙，但是他的关于"驱赶阿拉伯人和犹太复国主义者的不幸"的言论给他带来了不少负面的影响。

我希望，我的好姑娘，我的信安然地到达你的手中，假如我此封信中有什么内容伤着了你，那么我要请求得到你的谅解，我本意并非要激怒你的。望你在本周内事事顺心。

代问你的家人和所有我认识的人好。

吻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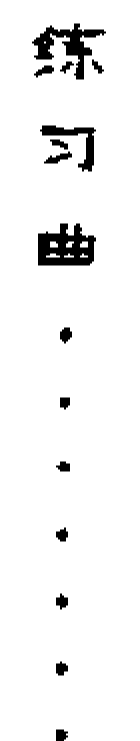
爱你的艾玛奴埃尔

特拉维夫，1932年6月27日

最亲爱的艾玛奴埃尔：

我于今天收到你的来信，之前我是多么的担心啊，我断定，你一定是病了。三点我就得走，我决定，到那时我还收不到你的信的话，我就要在你办公室关门之前赶紧打个电话。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很傻，可我非常害怕等来的是一个陌生人告诉





我你病了。我确实很傻,我星期四写信的目的是为了安慰你,而你却在忙着准备安息日出去游玩和消遣,认为没有必要回信。而其他时候,你却能寄三封或更多的信来。我还能相信你的爱吗?

我这里没什么新闻,一切如常。我每天早晨去海里游泳,今早六点半我就去了海滩,这个时候的空气非常清凉。

约娜·格拉斯纳星期天回柏林了。安息日晚上在艾登电影院的莫石·维德尔厅举办了一个晚会。我,哈娜,还有其他两个姑娘去得早些,我们准备了三明治和好多好吃的东西。

后来那四个曾在"七七节"期间去过你们那儿楼顶的小伙子来了。纳胡母·艾恩斯坦棒极了,他把大家逗得开心极了。本迪·古特不停地弹奏着钢琴,那对兄弟拉手风琴给他伴奏。大家都纷纷上来唱歌跳舞,结束的时候,海尔茨尔·福兰克尔去他的办公室拿来了一台录音机。我们录了说话声,还有唱歌和演奏音乐的声音,每人都得说点什么,以给约娜带去柏林后留作纪念。大约来了有三十个人,晚会进行得很愉快。

昨天我很累,晚上哈娜陪我散步到十点钟,我们俩谈了很多,聊得非常投机。我们提起了柏林,谈了她的一些情况,说了我的一些事情,还有其他的一些东西。

艾玛奴埃尔,此次你的来信我不太明白。什么叫"你不在海法的日子,我过得并不好"?

我感觉难以相信你对我的爱。一个恋爱中的人是没有心计的,他并不希望老早就能肯定,自己可以应付将来可能发生的任何事情。恋爱中的人所看见就是眼前的东西,他不想,而且也不会认同,事情可能会有不同的情况的。或许是我搞错了。我给你再说一遍,你的很多话我看不明白。

艾玛奴埃尔,看了我的信你别难过。我感觉离你很近,因此像是在跟一位站在我面前的人在说话。也许是我弄错了,没有完全理解你的意思。如果你愿意的话,不妨这个周末来一趟特拉维夫。不是因为我写信让

你来,而是你自己自愿来的。

我想,我会在一个月后再去海法的。我得开始找份工作了,决心已定。我的好孩子,你不必吃惊,我为什么偏偏在海法找工作。这不仅是因为你,对我来说,那儿更方便些。假如我俩间的关系一如既往,那岂不很好。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则可以只是偶尔见个面。我想,我是不会麻烦你的。

亲爱的艾玛奴埃尔,我得再次强调一下,看了我的信,你可千万别难过。我担心自己是不是与你过于亲近,并做了一些或许你并非愿意或是害怕的事情。不多写了,等你回信。

向大家问好,保重,晚安,吻你。

你的莫瑞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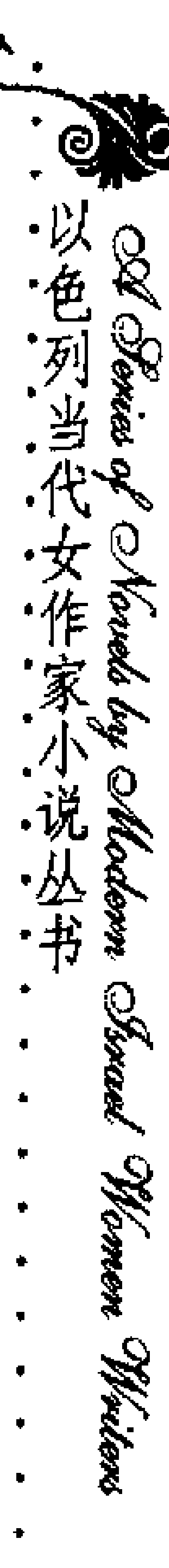
海法,1932年9月9日



我最最亲爱的姑娘:

今天很高兴,我终于收到了你的来信,它让我等得整日焦躁不安,这封信是快傍晚的时候才到的。得知你旅途顺利,很为你感到高兴。亲爱的,听说你的感觉跟你在这儿时我的感觉一样,我深感欣慰,那些珍贵的日子给我留下的印象已深深铭记在我的脑海里了。令人疲倦和痛苦等待的日子重又回来,然而这一次却是希望的等待,希望我们不久就可以再次相见。

亲爱的,听到你很有希望得到在本－舍门青年村的工作,我是多么高兴啊。那些安宁祥和的日子将重归你的身边,你又可以如你所愿,自由而独立了。只是让我感到遗憾的是,你工作的地方很远,而你的住处也不在诺尔道大街上了,多少个漫长而寂寥的冬日夜晚,我将在思念并见不着我亲爱的莫瑞雅中慢慢度过。尽管如此,还是让我们希望,我们的相会并不会减少,并且每次的会面都充满真挚的情感,这情感远远超越友情,这情感就是爱,让不愉快的感觉离我们远去。你要乐观



地期待，你的好运即将来临，你要知道，亲爱的，无论你身处何方，我的祝福都会永远伴随着你。

说到我，亲爱的，我还长时间地站在那里，注视着从我身边开过的火车，直到它消失在远方的地平线上。这次的分离，在那些亲密无间刻骨铭心的日子过后，真的是让我难舍难分。你的吻在我的唇上尚留有余温的时候，我回到了卡迈尔。我心绪不佳，躺在那儿看书，不知不觉竟和衣睡着了。

此刻，我正坐在家里给你写信，收音机开着，音乐旋律不绝于耳。全世界的声音我都听见了，至亲的人，唯独没有你的。

你的那个感谢你在这儿度过了那些美好日子的、要吻你一千次的爱人。

艾玛奴埃尔

特拉维夫，1932年9月11日，星期天

艾玛奴埃尔，我的好人儿：

你的来信我于今天上午收到。我计划，就在今天去盖代拉旅行，明天就是国父纪念日，那里一定会很热闹。他们让我早晨就过去，可我推迟到下午四点钟，就是为了还能收到你的来信，可你看看，你的信十一点钟就到了。

亲爱的，再次听到你的消息真是太好了；和你一样，我满心只有一个感觉，那就是你，我全身心地思念着你。我们的会面只过去了短短的几天时间，可在我看来，那几天是如此的漫长，我渴望立即再见到我的那个可爱而完美的小伙子。

昨天我去看了话剧。话剧的演出我并不十分喜欢，因我是和一个年轻的男士一起去的，此人我以前很讨厌他，因此不喜欢的主要原因在此。我很想发挥我的想象，想象着身边的人就是你。可是不管用，我感觉不到身旁的人就是我至亲至爱的人。

有关我的工作还没有新消息。一切结果下个星期才可知晓。没关系,我的好孩子;当然这样或许更好,如果我去海法,并住在与你平行的一条大街上,下班后唯一的念头就是:艾玛奴埃尔过一会儿就要来了,下午的时光就这样过去了。夜晚来临,六点及六点过后——你都在那儿。毫无疑问,这样或许更好。可就是现在,我的孩子,我们两人要尽可能地差不多每周都见上一面,每周的剩余日子,我们要生活在一起,想法只有一个,即寻找彼此的感觉,并相互关爱对方,那么我的假期所给我们带来的就会是愉快美好的日子了。

你对昨天的雨有何看法?我,还有齐珀拉,我们俩当时正在海里游泳,这时突然大雨倾盆。海滩上一片惊慌。游泳的人急急忙忙穿上衣服离去。可马路上的情形倒没什么。万千思绪涌上我的心头,渴念,一种不可名状的渴念在我的心中升腾,春夏两季在柏林度过的那些个时日浮现在我的眼前。暖风夹杂着小雨,一条条街巷,车声和人声,这一切使得生活充满了生机,这时我有一种强烈的置身其中的愿望。

我们家里正忙着做准备。犹太新年就要到了,另外,纳坦两星期后要去布拉格上大学。从某方面来说我很羡慕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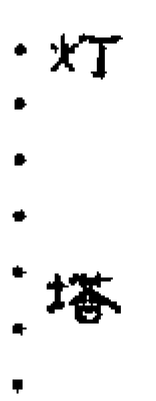
是的,齐沃娜·卡廷斯基跟哈娜和哈娃说了她的海法之行。谈到你们她说,你们都不错,就是太嫩了些。随后她又补充道:“艾玛奴埃尔老缠着我,如果我愿意的话,我就可以得到他,可我并没有发疯。”我当然对此没作任何反应。我只是口气相当冷淡地对她们说,我肯定实际情况不是这么回事。现在仔细想来,才认识到,这世上竟还有这样卑鄙无耻的小人。我不知道,好像我是绝对不会使用这样的言辞的,即使是真的也不会的。

就此打住。顺颂平安,我最亲爱的孩子。

吻你。

你的莫瑞雅

可是那些信,那些信,在去柏林的长途行程中,这几个字她自言自



语叨叨了一遍又一遍，像是在不停地诉说着冤屈似的。当她早晨到达她那位于德累斯顿大街的住处时，她迫不及待地连鞋都没脱，就扯断那根捆扎信件的紫色毛线。祖母一页接着一页地读着那些天蓝色、非常精美而轻薄的信笺，书写工整的字母卷翘着，如同素描中的一群鸟一样。她将信笺一张接一张地扔进火炉里。多少个小莫瑞雅、我亲爱的、我的爱人、我的好孩子、我最亲爱的、我未来的好爱人，多少个念你、期待你、永远爱你、你的达尼埃尔，多少个饱含笔墨深情的"吻你"，都在那天化为了灰烬，融入了柏林那灰色的天空，空留一丝慰藉。

几天后又来了一封信，是最后一封。

里面写着的，我这样猜测着，是一些解释和道歉的字眼，或许在信中，达尼埃尔还会写上，诸如自己已经跟新恋人订婚了的内容。那是在他收到她的信，告知他她到达的时间，而他知道他已来不及回信让她取消行程了。不管怎样，他还是很思念她的，想着他们俩人或许能够在一起，他打算花点时间，以一种不伤害她的方式，将情况一点一点地告诉她，而且还邀请她参加他的婚礼，尽管她会很生他的气，但他会把她——自己的初恋情人——永远地留在自己的心里，并珍藏在自己的记忆中。他希望，随着时间的推移，她会原谅他，要能正确地看待事物，并且在不久的将来，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我不知道，达尼埃尔·舒哈特是不是真的这么写的，祖母莫瑞雅也不清楚。她连信封都没拆，就把那封信给扔了，之后她进了浴室，对着洗脸池呕吐不止。

祖母跟谁都没说起过她怀孕的事。仇恨似一粒种子般在她的体内萌生，并一天天膨胀起来，与此同时，她的身体和燃烧着的心灵也在日夜遭受着痛楚。原本寄回家的信，通常都是充满朝气和憧憬的，说的都是有关社会工作学校里的那些女同学和女教师们各种各样好玩的事情，还有有关那两个跟她学希伯来语的孩子，以及她在柏林大街和公园里搜罗到的赏心悦目的印象的一些内容。那些信后来变得少而简短了，显得漫不经心的而且很死板，曾祖母白莎瓦感觉自己的女儿好像隐瞒了什么，而且她很不开心。"一定是巴黎的那个捣蛋鬼伤了她的

心，他叫什么来着？那个带石灰的诗人。”而每次哈诺赫舅舅都要极力地安慰她：“她还年轻，会从这件事情中解脱出来的，她会另找一个捣蛋鬼的。新的恋爱会使人忘却了旧的。”可曾祖母白莎瓦，她突然患了早间呕吐症，此前她已有很长时间没有了味觉，并且在一次做柑橘果酱时，那种甜味很重的味道让她在水池前吐了一两次。她又担心又害怕，思忖着是否该派阿莫斯和纳坦去一趟柏林，要么自己从柑橘园的活中抽身出来休息一段时间，亲自去那儿一趟。

然而祖母莫瑞雅总是安慰她说，一切都好，事实上她只是有点儿感冒，毕竟柏林的冬天还是相当冷的，可她此刻已好些了，绝对没必要为她担心了。

可是随着胎儿周数的不断增加，她意识到，那东西是不会仅仅凭自己的意愿和憎恨就可以摆脱掉的。她开始搬扛很重的家具，在自己房里搬书桌，搬那只大沙发椅，强迫自己尽可能长时间的搬扛着这些东西，然后再听听肚子里的动静。当这一举措并不奏效时，她就试着去滚楼梯，这让米勒夫人大为吃惊。那天她正提着篮子买东西回来，正好碰上莫瑞雅壮着胆叮叮咚咚地沿楼梯往下滚，一直滚到她脚跟前的垫子上才停下来。可除了右膝碰青了一大块，两只胳膊受了点擦伤外，她和胎儿都安然无恙。

1929年至1930年的那个冬季据说非常寒冷。冰冷的空气令人窒息，人的手指头都被冻得发紫。柏林上空雪花飞舞，人行道上积满了皑皑的白雪，汽车和电车驶过，将泥水溅到行人的鞋、袜和大衣边角上。成千上万的失业者和小业主们每天早晨离开他们没有暖气的家，要么去排长队买面包，要么聚在拥挤的小酒馆里，他们在那儿大杯大杯地将冰冷的啤酒灌到肚子里，用以暖和自己的肠胃和身体。祖母就读学校的建筑里，暖气供应也很不足，女学生们都裹着大衣坐在教室里，这让她得以隐藏住已经鼓出来的腹部。她绝望地自言道，假如再找不出办法来，那她就不得不在春季来临的时候离开学校，去某个失身妇女避难所生产。那是她在去城东北角的贫民区进行教学调研时认识的，





然后把婴儿交给教会，没有人会知道孩子的存在的。

但是，想到孩子不知在柏林的什么地方被兜来兜去，没有家，没有母爱，她自己也见不着，这未免太可怕了。每天，当她乘电车，沿艾尔萨斯大街去科恩家上希伯来语课时，他们家偏偏供暖很好，她不得不脱去身上的大衣，迎接科恩夫人那关切的目光。她有一次忍不住开玩笑说，年轻的男士们都不喜欢长得圆滚滚的姑娘，你或许该注意一下身材为好。每天她都告诫自己，今晚就请她跟自己两个人私下里谈谈，跟她坦白一切，向她讨个主意，或许她知道哪儿有个好心的妇科医生愿意帮助自己。可当约瑟夫和斯蒂芬两个孩子合上书本，亲亲她的面颊，并用希伯来语道"晚安"的时候——他们都很喜欢她，而她也很喜欢他们，因为他们都有一双聪明的大眼睛和敏锐的理解力——她和他们的母亲单独在一起，尽管她要她注意身材，但总会给她递上要么是一杯咖啡或热巧克力，要么是一块蛋糕，那个时候，她往往就失去跟她说实话的勇气了。她低下眼看着杯中，任由科恩夫人在自己的耳边轻轻地絮叨着。

有时候，她会受邀参加在他们家中豪华的餐厅举办的安息日晚宴。桌头那儿摆放着陶瓷和银制的餐具，以及高脚水晶酒杯，父亲坐在那儿，他名叫伊萨克·科恩，是一家大工厂的老板，同时也是一位著名的犹太复国主义者的领袖人物。每次总有几位柏林有名望的犹太富人，带着他们举止优雅、穿着体面的夫人来参加晚宴。女仆端来清爽的汤，送上烤肉，还专给莫瑞雅准备了一道素菜——蔬菜圆子。谈话的内容围绕着那场已严重影响到工厂企业及金融业的经济危机，危机何时才能结束谁也难以预料，他们谈了今冬去阿尔卑斯山度假和赖因哈特那场美妙的《仲夏夜之梦》，说他在席勒剧院的演出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他们还谈到了维斯曼最近出的一本新书，谈着谈着他们渐渐地因为卡斯帕尔·豪斯尔事件争了起来，说到底是不是确有其事。

而莫瑞雅整晚未曾主动说过一句话，因为她感觉自己的肚子好像每一分钟都在膨胀，眼前似乎都看见了肚子里的小脚和小手，那小手

指像粉红色的蠕虫似的动个不停，好像还看见了那张脸的轮廓，是达尼埃尔的脸，还有一双紧闭着的眼睛。她喉头一阵恶心，觉得自己受不了屋内弥漫着的烟味了，就直接起身离开座位，疲倦地道了声歉。穿上大衣后，科恩夫人送她到门口，关切地问她是否能够自己回去，莫瑞雅含糊不清地回答，行，行，谢谢你，没问题的，就逃也似的离开了。她决定走着回去，觉得夜晚刺骨的寒风或许对她有什么好处似的。这么晚了，马路上空无一人，只是在亚历山大广场附近还有几家开着门的酒馆，一些孤独的黑色身影穿梭在那些酒馆里。一家酒馆的门口突然爆发出一阵酒鬼间的争吵，有个人在高声大叫，肮脏的社员，她加快脚步，离开了那儿。

在亚历山大大街和皇帝大街交叉拐角处，每次经过那里，她总是低着头走过去，免得看到那些妓女们，她们穿着劣质的人造毛皮衣、短裙和高筒靴，在那一块地方荡来荡去——曾经有人，那还是她刚到柏林的时候，跟她解释过不同颜色的靴子意味着什么，黑色是寻找性虐狂的，黄色是找受虐狂的，而红色则是找“正常人”的。她听后既震惊又羞怯，就像穿那玩意的人是自己似的。这天晚上，街角处只有一个姑娘在那儿站着，她穿着黑色的毛皮衣，脚上蹬着一双红色的高筒靴，长着一张稚气未脱的脸，满头的栗色头发。她在那块地方急促地走来走去，以暖暖身子，她两只胳膊交叉着抱在胸前。莫瑞雅红着脸看着她，而那个年轻的女子和善地向她报以微笑，突然，她脑袋一热，像是被什么越发强烈的念头牵引着似的，她疾步向她走去，慌乱地跟她低声地说了自己的问题。你是知道的，你一定是知道的，哪里有位医生或是一个女人，或是某种可以服用的药物，主要就是可以——打下来，她结结巴巴地说，而那个姑娘瞪着大大的黑眼睛听着。你几个月了？她问，莫瑞雅低声说，四个月了，那个姑娘说，你要知道，这是很危险的，说不定以后你再也怀不了孕了，永远都怀不上了，并且还可能死于感染。莫瑞雅说，我知道，那个姑娘说，离这儿不远处，在花街十五号有一个女人，科瑙普福夫人，她是个助产士，也做诸如人流等手术，她会向你要三百马





克的，一分都不会少，你有钱吗？莫瑞雅只动了动嘴唇，声音听起来冷冰冰的，她低低地说，这钱我会想法子的。那姑娘说，你跟她说，是一个叫格蕾卿的人叫我来的，她认识我。我去过她那儿几次了。或许她会给你点优惠的。莫瑞雅向她道了声谢，转身就要走，可她又突然回过头来问了句，你多大了？那姑娘说，我十七岁，她又骄傲地补充道，昨天我才过的生日。这时黑暗里突然出现了一个穿长大衣的男人，头上戴的帽子遮盖了眼睛，手里拿有一根燃着的香烟，他用力地抓住她的胳膊，搂住她的肩头，拉着她跟自己一起沿马路朝前走去，一边嘴里还朝她骂骂咧咧个不停。那姑娘还是回头朝莫瑞雅叫道，你告诉她，就说是我，格蕾卿，叫你去找她的，别忘了。之后就只听到靴子的鞋跟在夜色中发出的响声，莫瑞雅听着那远处传来的回响声，直至听不见为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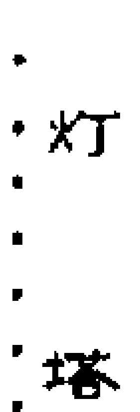
第二天一早，祖母就去了花街十五号，中午的时候她就回到了自己的住处。当看见她手扶栏杆，喘着粗气，面色蜡黄，吃力地上楼梯时，米勒夫人很是吃惊，对此她解释说，她感觉不舒服，因为学校流感流行，她显然是染上了，所以她想卧床休息几天，直至康复为止。她躺了差不多有两个星期的时间，人烧得迷迷糊糊的，好像在这个时候——下身在流着血的时候，她才对毁了自己希望和生活的不幸有了深切的感受。达尼埃尔那隐藏在胡须里的笑脸又重现在她的眼前，并且像幻灯投影似的不断闪现，她远远地大声呼唤他，没有声音的，可你怎么能将所有的事都一笔勾销了呢？你怎么敢这样做？我可是还清楚地记着那个时刻，我又想起来了，现在它已死去了，以前可是会跟你一样笑得生龙活虎的。现在它死了，死了，死了，你看见了那个满头灰发目光狡黠的老女人了吗？是她杀死了它，我躺在那儿两腿叉开，她用一根长铁针在里面翻挖着，我很疼，我还从来没有感到这么痛过。后来她递给了我一个盛着水的脏杯子，说我可以回家了。我说是格蕾卿让我来的，可她不知道格蕾卿是谁。我不得不给了她三百马克，我一分钱也没有了，妈妈你不必来，是真的不必，我只是有点感冒，我会好的。如果你能来待上片刻，用手摸摸我的额头，我是多么的想念你们大家啊。

下午的时候坐在院子里的酸橙树下，看着特西雅和内亚米那些孩子们练习芭蕾舞，喝着橙汁。要是我现在能喝上四杯橙汁，我就没事了。我流了很多血，米勒夫人，米勒夫人，她听不见，科恩夫人您来看我真是太好了，斯蒂芬和约瑟夫他们好吗？您听不懂我说的是什么，因为这是希伯来语。您认识达尼埃尔·舒哈特吗？他曾经爱过我，我却徒劳无益地爱他思念了他两年。用希伯来语说，真的就是徒劳无益的思念。如果我现在死了，他连知道都不会知道的。格蕾卿说这样会死人的，那个小姑娘格蕾卿，我会去皇帝大街找她并送她点好东西的。怎么大家都在哭，阿莫斯你别哭，妈妈爸爸，大家为什么要哭呢？我还没死，我还有很多事要做，我要活着。纳坦你在这里做什么？他们给你理了个多可笑的发型啊，就像弗里茨·科特纳在《渴望》里戴的假发似的。你用一块蘸着柠檬汁的毛巾在我的额头上擦拭着，多清凉啊，可我要是能够睡上一会儿，不梦见他和宝宝以及那个追着我说等一等等一等的女人，什么都不梦见该多好啊。

当她醒来时，大卫·纳坦正坐在她的床边，往她的额头上更换一块新毛巾，厚密的睫毛下他的一双满含同情的蓝眼睛看着她说，好些了吗？他关切地问，而莫瑞雅把他的头拉人自己的怀中，无所顾忌地放声大哭起来。

慢慢地，在弟弟无微不至的照料下，她一天天地好起来了。就在他到达柏林一个星期以后，她感觉自己已经很有力气了，他们去亚历山大广场散了会儿步，去特里茨百货中心买了东西。纳坦打算去柏林工大学机器制造专业——大卫·哈诺赫舅舅和曾祖母白莎瓦指望他今后在改进和发展自家生产柑果制品的小厂方面能够帮上忙。除了有一条蓝色安息日穿的裤子和两件夏季穿的衬衫外——那条裤子的式样跟柏林的风格一点也不吻合——他没有一件像样的服装。莫瑞雅给他选了一套漂亮的灰西服和一双上好的皮鞋，一件芝麻呢大衣和一顶很花哨、滚着丝边的礼帽。纳坦把帽子歪戴到宽大的额头上，她在男装部那面大镜子里高兴地看着他，并对他说，她要给关切地等着柏林来信的





母亲写些什么内容呢，就说她的小弟弟成了一个真正的“科拉萨维茨”,一个真正的花花公子。祖母这次什么都没给自己买。纳坦拉她去女装部给自己买一件连衣裙或一双新鞋，可她躲开了他的拉扯说,她不想买东西。

“我什么都知道。”后来当他俩坐在阿新格咖啡馆里吃着东西休息时,他对她说:“你不必骗我,莫瑞雅,如果你需要钱的话,只管跟我说,可别不好意思。”可祖母保证说,她什么都不缺,并要他发誓,替她保密,不告诉任何人,不跟他们的父母和弟兄们说,永远都不说。大卫·纳坦信守誓言,在长达三十多年的时间里,他把他的同情和愤怒都埋藏在了心里。只是在祖母的葬礼上,那是在1962年的春天,他的头已秃了,在葬礼上,他阴沉着脸,坚持要站在祖父艾玛奴埃尔的旁边一起抬棺木,抽泣中还一直念念不忘地向仁慈的上帝做着祈祷。当他看见面带微笑、身材壮实、常常手提着漆桶在他们家附近的杰胡达-哈莱维大街上转悠的那个小伙子时,他再也无法自制,失去了控制,他拔出愤怒的老拳挥向他,把他推倒在地,并骑到他的身上,因痛苦和愤怒而浑身颤抖着。他把他的脸按到地上,嘴里叫着,流氓,你这个流氓,就好像他姐姐的不合时宜的死是他造成的。所有参加葬礼的客人都跑了过来,将他们拉开,并安抚大卫·纳坦,他显然因过于痛苦而无法自控了。所有的人里面,只有曾祖母白莎瓦和大卫·哈诺赫舅舅相互搀扶着站在边上,一句话都没说。

可是,在1930年早春那个天气晴好的傍晚,在那家阿新格咖啡馆里,姐弟俩在里面翻着报纸,弟弟穿着他那套新西服,神情像一只骄傲的孔雀,而姐姐人很消瘦,可健康的红晕又重回她的面颊,两只眼睛也亮闪闪的。他们在《柏林报》上查找影院晚上放映的电影目录,决定下来去看《伤心的街巷》,并且是去挪伦多夫广场附近的法比翁电影院看。十七岁的大卫·纳坦,对他来说,去影院看电影是他有生以来的第一次,从头至尾,他都坐在椅子前端上,眼睁得大大的,似乎眨一下眼,眼前的魔法就会消失了似的。当他俩手挽手走出影院后,他还是那么

兴奋，从头到脚对格蕾塔·嘉宝生出无限的爱慕，以至于根本没注意到那些矫揉造作、涂脂抹粉的年轻男人们，他们在广场上像女人似的走来走去，等着顾客的到来，莫瑞雅祖母赶紧把他从那儿拉上电车。在那个春季，以及接下来的夏季、冬季和1931年的春天，许多的日子他们都是在一起度过的。大卫·纳坦开始了他在柏林工大的学习，他在德累斯顿大街租了一间房，离祖母的住处仅隔三栋楼。她给他在科恩先生的厂子里找了份半日制工作——要获得学位必须得去一家德国工厂实习——晚上他总是去她那里吃饭，有时他们会去外面吃饭，饭后去看场电影或是话剧什么的。之后的时间他们通常都是在阿新格或是罗曼尼圣咖啡馆度过，是和纳坦的几个同学一起，他们一连几个小时在那热烈地讨论着，到底是那个嘉宝，还是扮演帕普斯特《潘多拉的魔盒》剧中露露一角的露易斯·布鲁克斯最优秀。可当约瑟夫·封·施泰恩贝格的闹剧《蓝色的天使》出来后，他们都一致认为，马林娜·迪特里希才是真正的女王。



他们或送小礼物给莫瑞雅或是恭维她以讨她的欢心。埃里希·德拉施克是个金发高个小伙，他是纳坦的好朋友。有一天晚上，他在她的耳边跟她低声说，她是个美人，她的表情，她细长而会说话的灰眼睛，她脸颊上的颧骨，她希腊式笔挺的鼻子，薄薄的嘴唇和一头金色的卷发，这些都是一个电影明星的典型特征。为什么她不去试试看自己的运气呢，最终那个迪特里希，那个嘉宝，以及所有其他的女演员们都会成为她脚底下的尘土的，他承认他很爱她，她的影子搅得他每晚都睡不好觉。可祖母听后只是笑笑，就转到其他话题上了。她不断地告诫自己，要特别地小心，决不随便听信于任何人，她心底里相信，会遇上一个与自己共享未来生活的男人的——到底是谁，到时候她会立刻就明白的。星期天，他们会去柏林周边的公园踏青游玩，去特莱普腾公园，或去美丽山城市公园，只是她拒绝跟他们一同去那个给自己留下了许多的回忆和思念之情的夏洛特城堡，纳坦就只好独自前往。

有时，他们一群人一起去动物园玩。埃里希·德拉施克总要在猴笼



前歪鼻子斜眼地做怪相，那些猴子们却是又严肃又关切地看着他，一边抓着耳挠着腮，神情像是老精神病医生似的，逗得祖母大笑不止。她也很喜欢绿莹莹的、宁静的水族馆，那些慢慢游动的色彩斑斓的鱼儿，它们像是合着一种人耳听不见的无声的水中音乐在舞动着，透明的鱼鳍轻轻地摆动着，长长的尾巴在自己身体的周围划着圈，嘴巴翘起张开的样子像要接吻似的。之后他们走进动物园的花园里，那儿到处是含苞欲放的花蕾，他们在地上铺上块格子布，莫瑞雅从她带的篮子里给每人都拿出一个夹着香肠和煎鸡蛋的面包，还有一瓶红酒。吃完东西后，他们都躺下来休息，德拉施克将他的头枕在她的大腿上，他嘴里面衔着一根草，陶醉地闭着眼睛。

她那个时候写给舒拉米特·米尔斯基的信中——这些信是我有一天经过百般乞求后，她才让我在养老院她的房间里看了一眼的。当时她膝盖跪在地上，将它们从床底下翻出来。信是捆扎着放在一个旧鞋盒的，可无论如何我就是无法将它们借出来——这些信的多数内容写的都是祖母前一年的学习情况，当时她在社会救济部门实习，去探访住在城市东北角的住户，眯着眼皱着眉倾听着那些不幸的妇女和孩子们的哭诉，奔忙于孤儿院和难民营，以及市级和国家级的各个行政部门之间——那年里，她不仅觉得她的专业学习很有意思，而且还开始看到了自己生活的真正目的了。“我觉得，我会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社会工作者的。”1930 年的夏末她这样写道。她没再提及达尼埃尔·舒哈特了。

从巴黎回来后，她在写给舒拉米特的信中只写了一句，他俩闹翻并分手了，也没解释是为何事，以及为什么。她给舒拉米特大讲特讲自己学习的情况，还非常热情地描述了她在麦耶家——科恩家的邻居，因为科恩一家很突然地做出决定，处理掉他们在德国的生意，移居到巴勒斯坦去了——帮忙干家务以及每次她在克莱斯特大街的俄罗斯-犹太人知识分子俱乐部所听报告的详情，要么就是有关她几乎每晚必看无疑的电影或者话剧的内容，她或是与纳坦等一帮人一起去，或是

自己独自一人前往。但从其对那件事的沉默态度中，舒拉米特推断，她的女友是咬着牙，极力地要忘掉她从前的男朋友，但是却不能够。“她永远都忘不了他。我不知道原因何在。”她用她已显苍老的教师口吻直接说出口来，并且还带着一种既无辜又狡黠的目光从自己双手握着的茶杯上向我看了一眼。“后来，在最后几个月里，所有的情况都变糟了。”她几乎是从我的手中把信夺走并小心地放进鞋盒子里的。“那个时候，犹太人就开始受到虐待了。纳坦在厂里被人揍了几次，不得不辞职了，他决定回家去，并且在下一年里，要去布拉格的理工大学继续学习。我给她写信，让她也回来，可她坚持要参加考试并拿到学位，也就没回来。原先常在她那儿进进出出的那些纳坦的朋友们，她可是又烧又洗的为他们忙活了好几个月时间，这时候都不再往来了。那个老在她耳边哭哭啼啼地说他如何爱她，如果她不跟他结婚，他就要自杀的德拉施克，如今也不来了，她感到特别的孤独。那个她在那里照看孩子的姓麦耶人家的老婆开始刁难起她来。大雪天，她让她去图书馆给她换借其他的书来看，自己则整天躺在床上，吃着巧克力，看着爱情小说，每次莫瑞雅借书回来，她都要讥讽地对她说，莫瑞雅小姐，难道您不知道，这本书我看过了吗？然后就让她再次出门去借书。有一天，你祖母实在是气极了，她把书扔到了她的脸上，说辞职不干了。最后的那几个月她过得相当艰难。她找不到别的工作，考试期间，她生活困顿。最后，尽管她在那儿非常出类拔萃，但他们还是没让她通过考试，并拒绝发给她文凭。

1931年8月她离开了柏林，回到家里，在轮船上，她认识了你的祖父，并当场就做出决定，要和他结婚。我记得，那时她父母对他并不太热情。我也对她说，你母亲说得没错，艾玛奴埃尔条件并不好；可莫瑞雅却说，我一眼就能看穿他的心思，而这一点是很重要的。我记得，米尔斯基帮她在瑞尔里中学里找了份临时工作，她搬到海法去了，住在海册尔大街，噢，不，是住在诺尔道大街，就这样，慢慢地，他俩渐渐地走近了。那时我们常一起行动，我们四个人，看电影，喝咖啡，安息日时





出去游玩。

几个月后，她回特拉维夫去了，之后他俩之间鸿雁传情，每隔几个月她就来看他一趟，或是他去看她，她母亲也开始习惯他了，1933年的10月初，他们在她家的院子里举行了婚礼。说实在话，那时你祖母穿着白色的婚纱可是光艳照人啊。后来的情况是，她怀不上孩子，经过四年的努力，终于生出了你的母亲。医生说，她的子宫有问题，上面有撕裂伤，她没跟我透露过详情和事情的原委，我只知道，再次怀孕对她来说很危险，所以她就只有你母亲一个独生女儿。她将她所有的精力都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了她在聋哑学校里的那些学生们。后来她发现乳房上长有肿瘤，而你祖父，我还记得，他在那家意大利医院的过道上哭着说，我该怎么办啊，舒拉米特，没她我可怎么活啊。他一辈子都像是她的孩子似的。

她为他往面包上抹黄油。她给他嗑葵花子，然后像喂小鸡似的喂给他吃。她做凝乳布丁给他吃，为的是让他长胖些。就在她死前的几天，那时她的头发都掉光了，话也说不出来了，她还请我给他介绍一个人，介绍一个好女人来照料他。后来她就走了，不过五十五岁，而他那样一个懦弱的人，有哮喘病、过敏症，整天不是叫这里疼，就是那里痛的家伙，他却偏偏活得好好的。"你只知道她的名字而没见过她，这太遗憾了。"舒拉米特停顿了一会儿，眼睛盯着两手握着的茶杯上，而后她摇了摇头，郁郁地说道："哦，过去了，哦，全都过去了！"口气像是在对自己身体内的某个人在说似的。

特拉维夫，1933年9月17日

我的好孩子，

现在已是晚上八点了，而这时我才刚刚收到你的来信，就又赶忙

给你写回信，为的是让你明天能够收到。

我很高兴你一切都好。相反我却病了一天，甚至还有点低烧。但此刻什么事又都没有了。在家里我很少帮忙干活，是娜米和提克娃她俩在帮着干，家里还有一个从基布兹来的姑娘。可缝纫活很花时间，布料我们差不多都洗完了，现在就要开始做衣服了，我们每人一件，那件婚纱是给我做的。慢慢地，所有的事情都会干完的。

我的好孩子，你该去我们将来要住的房子看看，去看看情况怎样了。你必须去催催他们，叫他们用淡颜色粉刷墙壁。一间要粉刷成米色，另一间粉刷成淡蓝色。或许你正好顺道去那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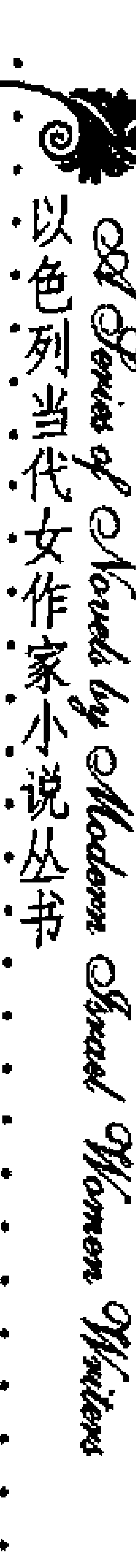
今天我去逛了特拉维夫的一些商店。我买了锅、盘子、平底锅、液化气灶等等东西，我的小猫咪，别忘了带几只大箱子过来。

我还去看了看德国式样的家具，是和我母亲一起去的。那里还有成套的卧室家具，价钱是一百三十英镑。其中包括两张绿色的大床，两个高度接近天花板的大衣柜，四把漂亮的绿色椅子，两个床头柜和一个梳妆台。那种绿色真漂亮，可我觉得，花这么多钱，我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定做比这些更漂亮的东西。

昨晚我原本准备和娜米还有提克娃一起去波洛霍夫区听布拉哈·茨费拉唱歌来着。我当然对她不感兴趣，但在月光下面散散步还是非常美妙的。可我出门前，施代马茨基一家人来到了我们家里，我只好待在家里了。那两个姑娘去了。十点半时，家人都去睡觉了，这时却来了三个男孩和两个女孩，他们是娜米的朋友。他们带了西瓜来。我不得不跟他们一起一直坐到十一点半钟。他们要等着娜米回来。

现在没人来找我了。我不出门，不见任何人，也不邀请人来家里。我期待着你的到来。什么也抑制不住我要见你并拥抱你的巨大渴望。星期五晚你就要来到我的身边了，你那双神气的蓝眼睛又要注视着我了，而我则高兴地期待着再次看见你那漂亮而善良的眼睛。

艾玛奴埃尔，至于我的大衣，现在还不是季节。等我到海法后过一段时间再去买。要是到那时没有钱的话，我就不买大衣了。你别担心！



就写到这儿吧，我的小猫咪，我们全家人都问你好，并祝你新年快乐，万事如意。

后天见，给你一千个吻！

你的莫瑞雅

对了，亲爱的，你去找一下，看看我那件蓝色的新连衣裙是不是丢在你们家了，请给我带过来。

1933年10月4日　　　　海法工人委员会
员工分会

致尊敬的艾玛奴埃尔·利普肯同志
海法

亲爱的同志：

在你与你的心上人莫瑞雅结婚之际，我们谨向你致以真诚和衷心的祝福。

愿你的新生活美满幸福，也但愿我们能够一如既往地见到你，一个无论在生活中还是在我们工会的各项活动中都朝气蓬勃积极向上的你。

本人以工会分会的名义，向你及你的生活伴侣致以同志般的祝福！

拉夫斯基

写于1991年秋